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四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四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www.mzdbl.cn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四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主编 胡 华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850x1168 1/32 印张11.375 插页8 字数250,000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

统一书号：11094•82 定价：1.05元

 网站编辑
www.mzdbl.cn

www.mzdbl.cn

副主编：陈志凌 杨世兰

参加本卷审稿编委： 彭 明 方大铭 高玉临 郑洪泉
李育安 刘富恒 房成祥 唐纯良 元邦建 何鹤志
范寅铮 卢 权 曹木清 廖鑫初

责任编辑：郭洛夫



何 叔 衡



陈 昌



张 太 雷



贺 锦 斋



张兆丰



林育南



杨 匏 安



许 继 慎



刘 伯 坚



杨 靖 宇



陈 翰 章

目 录

何叔衡	王兴刚	方大铭	(1)
陈 昌		钱家楣	(39)
张太雷		林鸿暖	(62)
贺锦斋		刘梦华	(109)
张兆丰	张璧珩	李凌宇	(121)
林育南	廖鑫初	李良明	(132)
杨匏安	李 坚	曾庆榴	(196)
许继慎	翁德清	林世良	(231)
刘伯坚	蔡燕士	刘虎生 郑 文	刘豹生 章克昌 (255)
杨靖宇	陈瑞云	张留学 王保源	(295)
陈翰章		陈瑞云	(334)

附 录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 理事、常务理事名单	(359)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聘请的顾问名单	(360)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聘请的编委名单	(360)

何叔衡

王兴刚 方大铭

叔衡才调质且华，
独辟谿径无纤瑕，
临危一剑不返顾，
衣冠何日葬梅花。

——谢觉哉一九四三年《感旧》诗

(一)

何叔衡，家谱名启璿，字玉衡，号琥璜，学名瞻岵。一八七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清光绪二年五月初五日）生于湖南省宁乡县杓子冲。这里离县城一百四十华里，是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山村。村里住有七八户人家，都是缺吃少穿的贫苦农民。只有叔衡家稍好一点，有田约十二、三亩。但因家庭人口多（分家前有四十余口人），日子也不好过。后来只得又在横山湾租种了一些田亩。

父亲何绍春，是个勤劳能干的农民。年轻时，除在家种地外，每年都到洞庭湖沿岸一带做两三个月短工，赚些钱米回家贴补生活。叔衡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弟弟。他五岁

丧母，父亲没有再娶，小时候生活靠姐姐照料。七岁开始学着看牛、割草、砍柴。因家中粮少，每到青黄不接时，父亲对儿女们吃饭都加以限量。他年纪小，每餐只限一碗，总感到吃不饱。一次，他放牛回来，几口吃完定量的那碗饭后，望着姐姐说：“吃饭要是象牛吃草那样能放肆吃饱就好了。”父亲在旁听了，对他说：“你长大了象牛一样地做事，一定会吃得饱的。”自此，他牢记着“象牛一样地做事”这句话，并用以激励自己。

那时，流传着一种迷信的说法：男子要五不得五（午）。意思是说：生辰逢五是很难得的，因而也是很吉祥的。叔衡生辰逢五（午），在堂兄弟中又排列第五。亲友们都说这孩子将来能有出息。他父亲也很相信，便省吃节用，送他念书。

他从十二岁到二十二岁，除中间有两年在家种地外，读了八年私塾。在这期间，有个叫姜方谷的塾师对他影响颇大。姜曾在外地做过小官，为人耿直，不随流俗，学识比较渊博，藏书也多，因不满意清政府对外屈膝投降，经常用历史上民族英雄的事迹启迪学生的思想。他随这位老师读书四年，不但修完了《四书》、《五经》，而且还阅读了不少历代名著。当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加深入，清王朝更加腐败。在姜师的启发下，他目睹国事日非，官绅肆虐，苛捐杂税层出不穷，人民生活水深火热，对清王朝的颞预残暴深为愤慨。从现在还保存着他当时写的一篇题为《旱》的古体文中，可以看出这时他感时忧民的思想极为强烈。在这篇文章中，他借题发挥，一开头就写道：“即旱以惟罕譬之，知虐政之为害深矣。夫旱，固亦伤仁爱者也，乃今日之虐民者竟如此，不可即旱以罕譬之乎？且今日之天下，一酷烈之天下

也。其万姓之如炎如焚者，岂不甚于旱魃之为虐哉！顾无形之旱，民嗟荼毒，司牧者或不知草野之薰蒸，惟即有形之旱以显形之，则蕴隆致虫虫之慨，山川有滌滌之容，当必知此不为福矣。嗟嗟！何辜今之人而竟罹此酷烈之祸而不可遏也！”^①这篇形式上的古体文，实际上是一篇挞伐清朝暴政的战斗檄文。

一九〇二年，他二十六岁时，遵父命参加科举考试，得中秀才。同年十一月，县衙门送来请他去管钱粮的任职书，乡里都来祝贺，但他“感世局之涵涵，人情之愤愤”，拒不就职，宁愿在乡种地、教书。因此，乡里称他为“穷秀才”。

“穷秀才”在乡间教过五年私塾。据曾在他门下读过三年书的刘华陔回忆说：“他教私塾收费比别人低。那时中了秀才的教私塾至少得八九十担谷一年，他得四五十担谷一年就满足了。我在别的先生那里读书，要出七八块光洋一年，在他那里读书，我拿出五块光洋，他还说不必交那么多。家里穷一点的学生，他只收一块到两块一年，也有个别的没有收过学费。他《四书》、《五经》也教，但教得最多的是《楚辞》、唐诗、宋词，还讲岳飞、文天祥和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八国联军的事，时常讲得流泪。他和学生很合得来，总是鼓励我们努力读书。他喜欢到学生家里串门，也常邀学生到他家里作客。学生和家长都很喜欢他。但他对学习要求很严，书背不得，他就发脾气。”^②

在教私塾期间，他有两件事至今仍为乡间传诵。

一件事发生在一九〇六年。这年宁乡遭灾，“春夏谷米昂

① <旱> 文存于湖南省档案馆。

② 1980年5月4日访问宁乡县七里山公社联江大队六亩冲93岁的老人刘华陔记录。

贵，饥民排户索食”^①，遭到官绅严厉镇压。对此，他十分愤慨，便邀集好友谢觉哉、姜梦周、王凌波、夏果雅和堂弟何梓林等结成“盟兄”（即拜把兄弟），他为“盟首”，在乡间见义勇为，替穷人打抱不平。一次，在何氏祠堂做长工的余某，因孩子饥饿，拿了祠堂一点稻谷，被族长抓住要沉塘处死。他即邀集盟兄弟闯进祠堂，把余某救了出来。秀才带头“造反”，引起当时人们极大的惊奇和钦佩。后来，谢觉哉、姜梦周、王凌波在他的影响下，都先后参加革命，入了党。大革命时，他们四人在长沙拍了一张合影。因四人都留了须，谢觉哉就在照片上题了“宁乡四髯”四个字。自此，“宁乡四髯”便传诵于湘中。四人中以叔衡年纪最长，而又善于领导，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何胡子”。

另一件事发生在一九〇八年。叔衡是一八九八年结婚的。妻子袁少娥是个文盲，比他大三岁。但婚后夫妻感情很好。袁氏生的男孩夭折，只有两个女儿。这年，袁氏又生了一个女孩。亲友们怕秀才绝后，便联合起来，共同劝他再娶。他坚决不答应，并把刚生下的女儿取名“实嗣”，意即他家的实际继承者，以示反对女儿不能传宗接代的封建伦理观念。这一举动，也使乡里为之惊异。女儿长大后，他不让她们跟别人念《女儿经》之类的书，亲自教女儿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诗篇，启蒙识字。于是，乡里又称他为“反封建的穷秀才”。

这时，他一面教书，一面抓紧时间自学，涉猎范围遍及经、史、子、集，特别注意研究历史、地理和人生观问题。他对

^①民国24年《宁乡县志》。

自学要求很严，常恨时间为冗事所占，不能充分用来读书。一九〇七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数日践亥迎寅，席未及煖，常为人摄去。一部奏议，阅六日始完，用功迟慢。如此计，所积两柜三麓之书，必十年始完。而十年沧桑之变，又不知何底！其蹉跎终古哉！”^①读书时，他联系所读内容，在日记中写了大量的心得笔记。例如，读谢叠山的《文章轨范》后写道：“胡澹黄先生上高宗封事，论王伦、秦桧之奸，真觉慷慨痛快，谈谈如见须眉之闪闪欲动也。”^②阅山东半岛地图后，他写道：“自甲午之后，我国全师婚告，今俄租旅顺，英租威海，德强借胶州湾，渤海、黄海之防，蒙杳不知其下手也。”^③阅《高士传》后，他写道：“困辱非忧，取困为忧，荣利非乐，忘荣利为乐。数语当铭座右。”^④从这些心得笔记中，可以窥见他当时思想的一斑。

一九〇九年春，他受聘到离家五十华里的云山高等小学堂任教。这个学堂的前身叫云山书院，是清同治三四年间由地方士绅集资兴建的，有田租一千三百多担，与县城玉潭书院齐名，并称宁乡的两大书院。据《宁乡县志》记载：“光绪二十八九年，廖湘衡等请改云山书院为高等小学堂，然考试犹存，学生不甚踊跃。”学堂开设有读经、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图画、英文、体操等课程。叔衡担任高年級的国文、历史、地理教员。

这时，清政府虽已明令废科举、兴学堂，但在地方顽固势力对“新学”攻击的影响下，到学堂来读书的仍然不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向学堂提了三条建议：一是组织人员下乡宣

^{①②③④}均见何叔衡日记，原件存湖南省博物馆。

传，讲解学堂比私塾、“新学”比“旧学”的好处，击破顽固势力的反动宣传；二是利用学堂租谷多的优越条件，降低对学生的收费标准，使贫苦农民的子弟能够入学；三是延聘思想开明，有真才实学的教师来校任教，扩大学堂的进步力量；并向学堂陆续推荐了李藕苏、张岳群、谢觉哉、姜梦周等人。当时主持学堂教务的喻徽五，是个廪生，后又毕业于省速成师范，思想比较进步，在地方上也有声望，一一接受了他的建议。以后云山学堂的兴旺和成为当时一所比较进步的学堂，与这时期实行他的建议是分不开的。

这时，小时和他一起放牛的堂弟何梓林已在福建参加了同盟会，经常给他寄来革命的书报，向他报道同盟会组织武装起义的消息，促使他的思想由痛恨清朝的祸国殃民转向接受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他在教课时，经常以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联系中国历史上的盛衰荣辱，教育学生关心国家大事，立志改革，救国救民。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湖南首先响应，宣布独立，脱离清朝的统治。消息传来，他欣喜若狂，开怀畅饮，带头剪掉自己头上的辫子，并在学校积极宣传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揭露清朝腐朽媚外的罪行。十一月四日（农历九月十三日），他还专程回到家里，动员父亲、兄弟和邻居剪掉辫子。一九一三年他到长沙后，又曾连续三次写信回家，要全家女人放脚。这一年暑假，他回到家里，看到都未放脚，便风趣地说：看来只动嘴动笔不行，还得要动手动刀才能解决问题。接着，他搜拢一石灰篓子的裹脚布和尖脚鞋，拿了菜刀，搬出木凳，在地坪里当场砍烂，终于迫使全家裹脚的女人都放了脚。

一九一二年元旦，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不

久，清帝宣布退位。他心情十分振奋，决心在云山学堂开展教学改革，树立新的学风，使之符合“民国”的要求。他与谢觉哉、姜梦周等进步教师一起，办学生会，反对尊孔读经，提倡做应用文，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劝阻富家子弟坐轿子上学，吸收附近贫苦农民子弟免费上学，号召学生自己动手栽树、修操场等，使学堂面目为之一新。

但是，就在这年，来了一个姓黄的校长，是所谓世家子弟，思想十分守旧。他与学堂内外顽固势力沆瀣一气，竭力攻击学堂出现的新气象；诬蔑叔衡是“学匪”和“非孝的三无党首领”^①。对此，叔衡虽然无所畏惧，但是，当时他看到辛亥革命的果实已被袁世凯篡夺，革命大势已去，便对多次劝他留下莫走的同事说：“争百年，不争一夕”，毅然辞掉云山教职，奔赴省会长沙寻找新的道路。

(二)

一九一三年春，叔衡三十七岁时，在长沙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一年后，四师并入湖南公立第一师范，他又转入一师讲习科一班就读。学校负责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大的年纪还来当学生？他诚恳地说：深居穷乡僻壤，风气不开，外事不知，耽误了青春，旧学根底浅，新学才启蒙，急盼求新学，想为国为民出力。他的回答深受学校负责人的赞许。

在此期间，叔衡结识了比他年轻十七岁的毛泽东。他们两人虽然年龄相差很大，但因志趣相同，通过共同探讨救国救民

^① “三无党”，即无圣君、无父母、无礼仪的“乱党”，是顽固保守势力对进步力量的蔑称。

的真理，很快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毛泽东对他十分尊重，特别是为他的办事热忱、感情热烈所感动，常说：“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①他对毛泽东的勤奋好学和远见卓识，更是钦佩，常向人介绍说：“毛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②并说：“润之说我不能谋而能断，这话是道着了。”^③由此可见二人相知之深，自此，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的革命活动，他无不以极大热情和实际行动加以赞助；他的革命行为，毛泽东也同样予以全力支持。

叔衡在一师只读了半年就提前毕业了。这时，他父亲和妻子都希望他回乡教书，派了他的侄儿到长沙来接行李。但他认为现在是“世道乖漓，人心浇薄”，要改变这个世道，决不能株守家园。于是，他向父亲写了一封信说：我的一生不想为一家一身发财升官，或者安居在家以求善终。恳切地说明了他不能回家的理由。

一九一四年七月，他受聘于长沙楚怡学校任主任教员，教高年级的国文课。但仍和还在一师读书的毛泽东等人时相往来，保持着极密切的联系。

由于他教学认真负责，关心热爱学生，到楚怡不久，就赢得了“老母鸡”的称号。学生家长反映：何先生痛爱学生胜过父母。他生活艰苦，自己洗衣做饭，上街从不坐人力车；课余常和学生一起做清洁工作；同事有困难，最肯出力帮忙。因此，他在教师和学生中威信很高。这时，楚怡的校长就是原四师的校长陈凤荒，对他很了解也很器重。这些都是他在楚怡开展革命活动的有利条件。

^{①②}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版。

^③谢觉哉：《忆叔衡同志》，1945年5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

一九一五年，以陈独秀等人创办的《新青年》为号角，一个强大的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展开了。它预示着在中国的大地上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风暴即将来临。这时，正在为“如何使个人和全人类生活向上”而进行艰苦探索的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从新文化运动中看到了曙光，“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①，开始了“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之追求。”^②他们经过两年时间的酝酿，百次以上的讨论，到一九一七年冬，乃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③。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倡议下，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一个五四时期著名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成立了。参加成立会的有十三人，以后会员发展到七八十人。叔衡是会员中年龄最大的，但他对会务很热心，很努力，和大家很合得来。现在还健在的一些当时新民学会会员回忆说：叔衡在学会中既是益友，又是良师。他常说：“后生可畏”，很乐于和青年交往。他最反对追求个人名利、升官发财，对湖南流行的“此人有福气”这句话很反感。他说：“福气”是很庸俗的东西，做人要有志气，要为国家、民族做一番事业，不要斤斤于家庭、个人的利益。这些话对大家教育很深。由于他感情热烈，开诚布公，正义凛然，大家称他是至诚格物的人，很尊重他，信任他。学会成立的这年六月和八月，蔡和森、毛泽东等人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相继赴京。在长沙的会务和通讯联络，实际上是由他负责的。

一九一九年，伟大的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爆发了。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这个运动，全力协助已经由北京返回长沙

①②③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

的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为核心，组织和推动湖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不断深入和发展。这年十一月六日，新民学会按新会章改选时，他被选为执行委员长。

当时湖南的统治者是皖系军阀张敬尧。他与其弟敬舜、敬禹、敬汤四人，在湖南无恶不作，人民早就恨之入骨。有民谣云：“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五四运动爆发后，张敬尧横加镇压，更激起了湖南人民的极大愤怒。

“张毒不除，湖南无望”，成了一致的呼声。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日在张敬尧指使其弟张敬汤镇压了湖南省会各界焚烧日货的正义行动后，人民的反抗情绪更大。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计议，决定因势利导，开展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十二月四日，在楚怡学校召开了长沙市各校师生代表会议，由叔衡担任主席。会上，他根据事先和毛泽东等商议的意见，阐明了驱张的意义和策略，提出了“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教师一日不受聘”的斗争口号，获得会议的一致通过。接着，他和毛泽东又在楚怡召集了新民学会会员、学联骨干和教育界部分人士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立即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株洲、常德等地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造成全国上下一致的驱张舆论，掀起波澜壮阔的驱张怒潮。

驱张运动的开展，是湖南反帝反封建斗争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在驱张运动中，叔衡受命负责衡阳代表团的工作。他于一九二〇年三月一日到达衡阳，以湖南公民代表名义，与其他代表团成员一道，以衡阳三师（即湖南公立第三师范）为基地，蒋先云、夏明翰等积极分子为骨干，首先把衡阳的学生发动起来，并以此为核心，组织湘南各界共同战斗。他们与北京、

上海等地的驱张代表团紧密配合，一面开展宣传攻势，揭露张敬尧的祸湘罪行，在雁塔寺召开万人驱张大会，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发行《湘潮》周刊，“做去张运动的加紧鼓吹”，并发表通电，呼吁全国同胞大力声援，拯救湘人脱离水火，以造成驱张声势和社会舆论；一面利用驻衡阳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张敬尧的矛盾，动员群众向吴佩孚请愿，促使吴对张施加压力，并联络驻郴州一带的湘军首领谭延闿等以军事实力向张敬尧进逼，以加强驱张运动的力量。一九二〇年五月下旬，吴佩孚率部由衡阳北撤，沿湘江而下，过长沙直退武汉。吴军退一步，湘军进一步。在强大社会舆论的严厉指责和湘军的步步进逼下，张部不战自溃。六月十一日，张敬尧自长沙仓皇逃走，二十六日，张部全部撤离湖南。

驱张斗争的胜利，衡阳代表团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个斗争中，叔衡表现既坚决勇敢，又注意策略。还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日张敬尧镇压焚烧日货时，他就当场挺身而出，高呼：大家不要怕，团结起来，把日货烧光。并向人表示：如果张氏兄弟公开杀人，自己愿用鲜血和生命换得张敬尧的迅速滚蛋，为湖南人民除害，死而无憾。他作为驱张代表团成员赴衡阳后，张敬尧通电全国，明令查办他，将他革出教育界，“永不叙用”。对此，他付之一笑，毫不畏惧地奔走于长沙、衡阳、郴州之间，积极领导斗争。他去郴州时，带领一部分学生，步行耒阳、资兴、临武、宜章等县，沿途宣传、发动群众。许多人脚都走肿了，而他却精神抖擞，晚上不是听汇报，就是写稿。在衡阳时，他除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进行斗争外，还十分注意广泛地与当地上层人士联系，争取他们共同驱张。湘南学联骨干夏明翰的祖父夏时济，任过清朝的户部主事、江西和江

苏督销局以及两江营务处总办等职，在衡阳绅士界很有地位，同吴佩孚也很有交情。他就亲自去拜访，争取夏时济领衔联合湘南各界知名人士发表了驱张请愿电文。开始时，夏明翰对此十分不满，认为自己祖父老朽顽固，驱张不应和这样的人打交道。经过叔衡的耐心说服教育，不但使夏明翰提高了认识，而且说服了夏明翰利用祖父与吴佩孚的关系，亲自带领一部分同学向吴请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由于叔衡在驱张运动中的表现，毛泽东在一九二〇年四月称赞他说：“叔翁办事，可当大局”^①。

经过驱张斗争的战斗洗礼，在“五四”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和毛泽东对他的影响下，他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斗争的伟大力量，开始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一九二〇年六月十七日，他从衡阳回到长沙不久，就协助毛泽东在湖南展开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立共产党的准备工作。

为了在湖南宣传马克思主义，他首先协助毛泽东创办了文化书社。由于张敬尧统治期间对一切新事物的摧残，当时湖南的思想文化界还是一片乌烟瘴气，新文化运动没有广泛展开，新书刊很少看到，正如《发起文化书社缘起》中说的：“湖南人现在脑子的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②。因此，要在湖南开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建立一个推销各种新书刊的机构，实在是当务之急。但是，要建立这样一个机构是很不容易的。关键是要有经费和取得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叔衡除把自己能拿出的钱都给了书

^①转引自1979年8月13日李维汉给何实嗣的信。

^②《五四时期湖南人民革命斗争史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社外，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到处奔走，为书社筹集资金。当时的长沙县长姜济寰，是他一个学生的父亲，思想比较开明。他邀毛泽东一起去拜访了姜，取得了支持。在姜的影响下，商会会长左学谦和教育界朱剑凡、易培基等知名人士，也对书社予以资助。不仅资金问题得到解决，同时，也打破了社会阻力，使一些守旧顽固势力对书社的建立不便公开反对。一九二〇年八月一日，在楚怡学校召开了书社发起人会议。九月九日，书社开始正式营业。叔衡随即在楚怡设立了贩卖部。接着，又和老友姜梦周在宁乡创办了文化书社的分社。最初文化书社的营业员只有两人。后来营业发展，人手不敷，他又介绍在衡阳驱张时发现的积极分子夏明翰到书社工作。

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他还和毛泽东、彭璜等联合教育界、新闻界进步人士，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假长沙县知事公署召开发起会时，他在会上宣读了研究会的简章，指出“本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本会会务：一，研究所得后，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实地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①当场，他被举为研究会的筹备员之一。俄罗斯研究会成立后，不但在介绍俄国情况，推动湖南人民研究俄国方面起了重大作用，而且还介绍了一些进步青年赴俄学习，任弼时、肖劲光就是其中的两个。

一九二〇年九月，叔衡被省教育委员会委派为湖南全省通俗教育馆馆长。他利用这个职务，为传播新文化，进行建党准备做了大量工作。

首先是刷新了该馆发行的《湖南通俗报》。此报是一种四

^① 1920年8月29日上海《民国日报》。

开四版的小报，辛亥革命后创刊。原是为当时的省政府粉饰门面，表示关心民众教育的东西。报纸刊载的多是政府文告和从大报摘抄的消息、文章，内容贫乏，形式呆板，发行量既少，看的人更是不多。他任职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老友谢觉哉和新民学会会员熊瑾玎、周世钊等人的帮助下，把这张小报办成了提高人民思想觉悟的有力的宣传工具。报纸着重刊登劳工神圣、妇女解放、民众联合、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贪官污吏等内容的文章，敢于说话，敢于提出问题，揭露问题，态度明朗，文字浅显生动，短小精悍，大受群众欢迎。几个月后，发行量急剧增加。不仅工人和市民读者一天天增多，就是原来没有看报习惯的农村也有了订户。不少中小学校，还把《湖南通俗报》规定为学生的课外必读物，叔衡曾经任教过的宁乡云山学校学生，几乎人手一份。据谢觉哉日记记载：一九二一年元月十二日下午，船山学社开游艺会时，当场就出售《湖南通俗报》八百多份。

其次是培育和发现了革命人材。他利用馆长的身份和馆里的经费，以通俗教育讲演所的名义，用补助薪金的办法，在全省很多县，聘请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小学教员充当通俗讲解员，下乡向农民读报作宣传，不但扩大了新文化的传播，而且也促进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培养了干部。这些讲解员中有不少人以后参加了革命，成了领导农民运动的基层骨干。例如，他在宁乡县聘请的通俗讲解员梅冶成，一九二五年加入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农运兴起后，是宁乡县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同时，他还十分注意从《湖南通俗报》的审稿中发现可以培养的对象。一次，他看到了一篇题为《田东与佃农》的稿子，极言地主剥削农民的罪恶，反映了作者对封建剥削关系的无比痛恨。

他就亲自去拜访作者许抱凡，和许交了朋友，经常给许一些革命书刊看。一九二一年下半年他担任一师附小主事时，聘许当了教员，不久又发展许入了党。另外，对来通俗教育馆求教的男女青年，他总是热情接待，给以革命教育。一次，几个女知识青年来馆问他妇女何时才能得自由？他反问说：“你们看牵到小吴门外去杀头的有没有女的？”当女青年回答说：“没有，尽是男的”后，他便说：“如果牵去杀头的十人中有两、三个是女的时候，就是你们自由时期快到的时候。”^①风趣地启示这几个女青年认识妇女的解放要靠妇女自己起来进行斗争。

一九二〇年八月（一说是五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组织。九月，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会员中的积极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是为在湖南建党培养骨干，叔衡和彭璜、陈昌、熊瑾玎、郭亮、夏曦、肖述凡、易礼容等，参加了学习。

这时，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主要分为两支：一支在国内，主要在湖南；一支在国外，主要在法国。国内外密切联系，声息相通。一九二〇年七月五日至十日，留法会员蔡和森、肖子昇等在蒙达尼集会，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等问题。蔡和森等多数会员主张仿效俄国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另一些会员，以肖子昇为代表，则认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不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幸福”^②，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蔡和森、肖子昇等将他们争论的情

①许抱凡1950年回忆。

②《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第3集。

况写信告诉毛泽东等人，征求国内会员的意见。

恰好这年十月间，美国鼓吹实用主义的社威和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先后来湘讲学。他们以“社会主义”和“进步学者”相标榜，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使一般进步青年受到迷惑。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中，更激起了不同的反映。

为了明确新民学会的方向，毛泽东与何叔衡等商议，决定召集在长沙的会员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三日开会三天，讨论“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等重大问题。三天的会议均由叔衡主持。第二天，讨论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題时，他首先发言说：“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了这些话”^①。紧接着毛泽东发言同意他的意见，并对诸如所谓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作了击中要害的批判。参加当日会议的十七人，依次发言后付表决时，同意何叔衡和毛泽东意见，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有十二人。第三天，讨论“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时，叔衡又首先发言说：“一方面成就自己，多研究；一方面注意传播，从劳动者及士兵入手，将武人政客财阀之腐败专利情形，尽情宣布；鼓吹劳工神圣，促进冲突暴动，次则多与俄人联络”^②。最后，他又综合大家发言，将着手方法归纳为六项：

“1. 研究及修养：A、主义；B、各项学术。

2. 组织：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①②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 第2号。

3. 宣传：A、教育；B、报及小册；C、演说。
4. 联络同志。
5. 基本金：组织储蓄会。
6. 基本事业：A、学校（又夜学）；B、推广文化书社；C、印刷局；D、编辑社；E、通俗报；F、讲演团；G、菜园。”^①

这六项各节付诸表决时，得到全体与会者的赞同。这次会议在新民学会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这次会议讨论，新民学会的宗旨由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叔衡在会上的发言，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会议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二一年六月，叔衡被湖南军阀赵恒惕加以“宣传过激主义”罪名，撤销通俗教育馆馆长职务，他主办的《湖南通俗报》也随之被勒令停刊。但是，他在此期间为革命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全国解放后，毛泽东还多次提到：这一年的通俗报办得很不错。

何叔衡被撤销馆长后不久，毛泽东接到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开会通知。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傍晚，他和毛泽东一同踏上了停靠在长沙码头的一艘轮船，代表湖南的共产主义者前往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了党的成立。“一大”闭幕后，何叔衡和毛泽东一道被派回长

^①《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号。

沙，在湖南建立党的地方组织。肖三在《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书中记述：“一个秋凉的日子，在长沙城郊协操坪旁边的一个小丛林里，有几个人在散步。他们一时沉默地站在树丛和石碑中间，一时在丛林的小路上走动。他们热烈地谈论着。在脚步缓重的毛泽东的旁边，走着矮矮身材的何叔衡，此外还有彭平之、陈子博、易礼容等。这几个人这一天在这里讨论建立共产党湖南支部的问题。这一天是民国十年的十月十日，因此湖南党组织正式成立日，曾被戏称为“三十节”^①。

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后，首先在长沙发展党的组织；同时，根据全省各地工作的基础，建立各地党的组织。一九二一年冬至一九二二年，除长沙外，在衡阳、平江、安源、岳州、常德等地，都发展了党员，有的地方建立了党的小组或支部。一九二二年“五一”节前后，中共湘区（包括安源）委员会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书记，叔衡任组织委员。

为了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训练党、团干部，加强党的建设，一九二一年八月，毛泽东和何叔衡等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船山学社是民国初年湖南的一些文人学士办研究王船山学术思想而设立的。他们把“船山之言”看成是“建设民国的金科玉律”^②，曾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在此每周讲演船山学术一次，藉此抨击袁世凯的帝制阴谋，颇受一般人的欢迎。该社每月有四百元的经费，主持社务的多是老学先生，其中有的人也曾参加过驱张运动。叔衡是

^①转引自李锐：《毛泽东的早年革命活动》。

^②《船山学社讲演集》，存湖南省档案馆。

该社社员，并一度担任过社长，对创办自修大学出力甚多。自修大学成立后，他与毛泽东等都是这个大学的最初学员，他们在这里经常组织对马克思主义种种问题的讨论，从学员中培养和发展党员，用自修大学的名义开展各种革命活动。自修大学一时被称为“湖南革命的总汇处”。著名的革命烈士夏明翰就是在这里经毛泽东和何叔衡的介绍于一九二一年冬入党的。

自修大学招生的条件较高，不能适应一般知识青年，特别是青年工人的要求。一九二二年九月，经党组织研究，自修大学正式附设补习学校（后来附设初中班），公开招生，为党训练青年干部。叔衡担任补习学校主事（校长），为办好这个学校呕尽心血。他对学生的学习十分关心，经常参加学生的讨论会，找学生谈心。当时在补习学校以后又转到湘江学校读书的贺尔康，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五年的日记中，多次记载了叔衡对他的循循善诱、严格要求和殷切期望。下面是贺尔康日记中的几个片断：

傍晚时，才到灯下读书。何先生（即叔衡）唤我到房中，问我家之状况，又问我怎样要来读书？读书是为了什么呢？于是出了一个题目给我来做：‘述我之家世及我之志愿。’我就写道：我将来之志愿，是要能为国家做事。先生看到这里，就对我讲：‘你将来想做官，还是想为国做事？但是，现在想为国家担任事的很多，这个国家不好到了这样，你还是想做官去弄钱吧？’我没有话回答，我的心思实在不是想做官去弄钱。

晚间，何师遣余广云叫我去，便要我日记看。看了便

问：我何要你做日记？你今还只做得这两天，前几天做什么事去了？又问道：‘你作了几篇文章？’我说还只作得□篇。他说：‘你到校已有三四周，怎么只作得□篇？懒吧！各位先生都说你读书不发狠，你岂忘了当时初到船山来的那時候吗？你要懒惰还读书做什么？今后我要来额定你做事，否则是我害了你。’后命我：

1. 定要每日作日记，一练习有恒，二整理思想；
2. 写字不潦草；
3. 每周无论如何须作两篇文；
4. 每日扫屋须定午后六时。

何师又痛骂了我这一会。他老素待我比待他的亲子还过，我现在能够在此读书，就都是承他老的帮助，他老并对我有一个比天还大的希望——是要我能去与这万恶的社会奋斗，去改造恶社会。前为他所大希望的我，今为他失望。他平日看我作事无能力，做事无胆量，无勇敢奋斗的精神，又骄傲，又老实，又说象女孩子一样怕丑，又懒惰，这不是要使他失望吗？所以，前日何师要我：‘一、多接见有学识声望之人；二、多发表自己的意见；三、去羞涩态度；四、戒骄傲。’这是没有一点不对的。的确，我的行为性质确是如此，观察得的确，一丝都不错。

晚，何先生到房里细嘱一番，……‘我没有崽——你初到船山来的时候，在那灯下读书，人人都注意你——我现在要把你似我的崽样教出来，我才放心！’何先生这样叮嘱我。

唉！他真如何的爱我呵！我的父亲那有如此呵！谁人的父亲对儿子有多少是这样呵！如何真实诚恳的话呵！此嘱是如何的须要放在心头，刻刻秒秒的记着，不应忘记，以自惩其身。①

贺尔康，湘潭人，家离韶山不远。从小过着贫苦的生活，读不起书。后得毛泽东帮助，来到长沙进自修大学补习学校，又免费入湘江学校，经过这两个学校的培养，贺尔康成了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叔衡为党培养青年是如何地尽心和学生对他的爱戴。

叔衡说过：自己要有真才，然后才能造就人才。为了教好学生，为革命多作贡献，他对自己的学习抓得很紧。这时，他担负的工作很多，除了做党的工作和担任自修大学补习学校主事外，还担任了一师附小的主事和其他社会工作。白天没有时间，他就晚上抓紧读书。据当时住在自修大学的一个学生后来回忆，他每晚要看书到十二点，早晨又起得很早，要读一个小时书才开门，读到精彩处，还拍桌子，引起了住在他附近的几个贪睡的青年不满，向他提意见，要他早晨多睡一会。他语重心长地说：我年纪大了，不拚命学习，怎能胜任工作呢？你们将来也许会体会到的，希望你们把全部精力放在学习上。

在自修大学工作期间，他还参与了对当时湖南工人运动的领导。一九二二年九月，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罢工遭到镇压，死伤多人，郭亮等四十六人被捕押送到武昌陆军监狱。他由党

① <湖南历史资料> 1979年第1辑。

组织和毛泽东派往武汉，与湖北党组织共商营救被捕工人和把罢工斗争进行到底的办法。他到武汉后，即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北分部主任林育南等商议，决定湖南、湖北协同作战，紧密配合，号召工人齐心协力，团结战斗，不达目的，决不休止。在两省工人的坚决斗争和全国铁路工人的有力支持下，最后罢工获得了胜利。

由于自修大学宣传革命，推动革命，影响日益扩大，引起了反动派的惶恐不安。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终于被军阀赵恒惕下令封闭。党对此早有准备，立即筹办了一所正规学校——湘江学校。原在自修大学补习学校的学生大部分转入了这所学校。

湘江学校开始由罗宗翰、易礼容任校长，但任职时间均不长。以后即由叔衡担任校长。他的好友姜梦周则一直在学校担任管理员。

叔衡接任湘江学校校长不久，震撼全国的五卅运动爆发，阶级斗争更加激化。赵恒惕进一步撕下所谓“省宪”的假面具，厉行白色恐怖。六月，发布“四斩”^①反革命布告，学校“乃居恐怖之中，而暗探则无日不枉顾也”^②。经费亦大受影响。到一九二五年暑假后，“校中所负债务，已近六千，不但薪资无着，伙食且不易支持。”^③他与姜梦周在党的领导下，一面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坚持奋斗；一面四出活动，争取社会同情，致使“各教职员大半不支薪，努力从事，未尝稍萌退忘，”^④赵恒惕下令封闭，教育司也“未允执行”^⑤。为了解

①“四斩”：“宣传过激者斩”、“煽惑军心者斩”、“造谣生事者斩”、“扰乱秩序者斩”。

②③④⑤姜梦周：《本校三周年之回顾》，载1926年11月《湘江》3周年特刊。

决经费困难，他又专程前往广州，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监委员的身份，向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呼吁请款。不料这时正值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国民党中央党部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军费必须保证为理由，拒绝津贴。他就利用堂弟何梓林生前是粤军许崇智部属的司令和阵亡后孙中山亲笔题词“为国捐躯”的声誉，多方奔走，向原何梓林部属下的在粤湘籍的国民革命军将领募集款项，终于解决了湘江学校严重的经费困难。

湘江学校在党的领导和何叔衡、姜梦周等人的主持下，继承了自修大学的传统，“以启迪学生，使为健全的战士，为国民除障碍，为民族争自由”^①为宗旨，“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民族独立思想与革命精神”^②。在教学内容上，除了中学应教的功课尽力教授外，并注意下列教材：“一、注意解释近代的国耻史，使学生了解中国民族受压迫的来源及其因果关系。二、注意解释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各种侵略方式。三、指示学生注意时事，多出关于讨论时事的作文题，并演讲国内外所发生的问题及应付的办法。四、注意演讲国际形势，及被压迫民族独立运动之趋势。五、指导学生或领导学生参与各种爱国活动，暴露军阀的罪恶，使他们与实际政治发生关系。六、注意农民问题，使学生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及解决办法。”^③在对学生的要求上，则根据教育宗旨，定了十条标准：“一、为公服务的热忱；二、对团体公意的服从；三、做事有责任心；四、自己有主张；五、不自私自利；六、革除恶

①②③姜梦周：《本校三周年之回顾》，载1926年11月《湘江》3周年特刊。

习的影响；七、规律的生活；八、对现代研究的注意；九、科学研究的态度；十、合理的反抗性。”^①

湘江学校分中学和农村师范两部。农村师范是湖南党组织在一九二四年下半年看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非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参加，就不能成功而特意创设的。它的目的在“造就一班农民运动人才，到农村去做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教育农民，使农民了解痛苦的来源，与求得解除痛苦的方法。”^②正如姜梦周所说：“此在湖南教育为破天荒之第一举也”^③。

叔衡在湘江学校十分注意利用各种机会向学生进行革命教育。他经常告诫学生说：革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革命的力量愈强大，反革命力量就会愈加疯狂地镇压革命。作为一个革命者要做到一个“信”字。“信”就是信仰坚定，在革命道路上不动摇，革命是要人头落地的，看你怕不怕？要做到真正不怕，就要在“信”字上下功夫。

湘江学校在何叔衡、姜梦周等人的努力下，办成了真正党的学校，被誉为“湖南革命的先锋”。为党培养了很多坚强的革命干部，其中农村师范部的毕业生，绝大多数在大革命时期成了农民运动的骨干。例如，宁乡县在湘江学校农村师范部毕业的学生共二十八人，后来都成了基层农运的领导者。湘江学校顶住逆流，战胜困难，一直坚持到一九二七年三月，才由党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决定自动停办。停办时，学校开了同乐会。叔衡在会上讲了话，大意是说：湘江是脱胎于自修大学，

①②③姜梦周：《本校三周年之回顾》，载1926年11月《湘江》3周年特刊。

在教职员工及学生的一齐奋斗中，由听外面很多不好的批评，到现在成为革命策源地，其间所经困难，一言难尽。所有同学和教职员正好比是酒药子。今天学校虽然停办了，希望这些酒药子到处去发酵^①。

叔衡在主持湘江学校的同时，还根据党的指示，与夏曦等一道为在湖南重建国民党，使之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进行了积极的努力。一九二三年六月党的“三大”正式确定了与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后，湖南党组织即开始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建立党部。一九二五年春，湖南国民党在长沙岳麓山蔡锷墓庐秘密召开了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成立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叔衡和李维汉、夏曦、郭亮等共产党员均当选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一届执监委员。此后，湘江学校即成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经常开会的地方。叔衡除了在长沙参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领导工作以外，还经常奔走全省各地，帮助建立和整顿国民党的组织。一九二四年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他就在宁乡指定共产党员许抱凡及梅冶成负责“民运”，在农民中发展国民党员，秘密组织国民党。又介绍他的好友王凌波加入国民党（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他又介绍王凌波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五月，他又到常德帮助整顿和改组了国民党组织。周恩来在《关于一九二四年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一文中指出：“是我们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是我们党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②在谈到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时，在湖南就举了何叔衡和夏

^①参见1927年3月20日《湖南民报》。

^②《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2—113页。

曦。

一九二六年三月，倾向国民革命的唐生智部由衡阳进驻长沙，赵恒惕被赶走。四月末，唐部受叶开鑫部压迫又退回衡阳。何叔衡与夏曦、曾三等即尾随唐生智部到达衡阳，成立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别委员会，负责同唐生智联络和迎接广东国民政府北伐，为促使唐生智于六月二日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中路前敌总指挥和迎接北伐军入湘，作了重要工作。

(四)

一九二六年六月，叶挺独立团进入湖南。七月十二日，北伐军攻克长沙。叔衡随军由衡阳回到长沙，参加了八月召开的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第二届监察委员。这次大会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通过了关于开展湖南农、工、商、学、妇运的决议案，发表了扶助工农运动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促使全省的工农革命运动和其他群众运动一齐走向高潮。这时，叔衡心情非常兴奋，工作特别起劲，先后担任湖南省法院（即控诉法院）陪审员、惩治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成员、省中山图书馆馆长、水口山矿局监理、《湖南民报》馆馆长等职务。一九二七年四月还被选为中国济难会湖南总会执行委员兼财务委员。在工作中，他旗帜鲜明，无私无畏，严肃认真，积极负责，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一九二六年十月，叔衡以国民党省党部监察委员和水口山矿局监理的身份，到水口山传达党关于大力开展农民运动的指示与发展国民党的党务时，受到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在该矿国民党党员举行的欢迎会上，主持会议的陈章甫特别介绍了他的简历及

革命精神，称赞他“足为党员模范”。

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时，他正在宁乡林山寺、五里堆、石板上等地指导农民运动。事变发生后，他化妆离开了湖南，经武汉到达上海，接受了与谢觉哉、徐特立、毛泽民等一道筹办党的聚成印刷公司的任务。这个公司对外公开营业，承印商标、簿记等业务；对内专门印刷党的文件和刊物。他既是聚成印刷公司的经理，又担任上海互济会的书记。在刀枪林立、刑场绞架遍地的白色恐怖之中，他心细胆大，临机应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沉着机智地对付国民党特务，坚持党的地下斗争。

一九二八年六月，党决定叔衡赴莫斯科学习。途经哈尔滨时，他改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一诗，以抒发自己当时的感情。诗云：

身上征衣杂酒痕，
远游无处不消魂，
此生合是忘家客，
风雨登轮出国门。

到莫斯科后，他参加了当时在这里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九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同班的有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方维夏、叶剑英等十余人。其中多数是年龄四五十岁，斗争经验较丰富，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因此，当时又戏称为“老头班”。根据这种情况，这个班的学习内容偏重于对革命理论和领导方法的研究，上课也不象普通班那样讲课，而更类似于毕业答辩式的讨论。他对学习环

境很满意。在写回的家信中说：“我在此住在一个东吴王旧宅，睡在一个有两丈高的玻璃窗下，求学做事，均能自如”，“衣食均无缺”，“面包还吃得惯”，“身体很好”，“不过因气候关系，骨节稍微疼痛”^①。他担心的只是年纪大了，“记忆力太薄弱，即两年或三年内能否毕业，实成问题也。”^②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学习十分刻苦，有时为熟记一个俄文单词，要读几百遍甚至上千遍。被大家称之为“学习上永不疲倦的人。”

在学习期间，他在政治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徐特立曾说：“在莫斯科，我们几个年老的同志，政治上是跟叔衡同志走的。开头都说叔衡同志笨，不能做事，清党事起，大家还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叔衡同志早就看到了，布置斗争，很敏捷，很周密，谁说他笨！”^③

这期间，他虽身在国外，但无时无刻不关注着国内的情况和斗争。一九二七年一月，他在给哥哥玉书、玉明的信中说：“我在此阅中国报纸，见白崇禧在北京演说词云，湖南自去年起死去十七万人。又十二月报载，河南饥民有六百万人，即此之事，可见中国之一切情形矣”^④。同年八月，他在写给过继来的儿子新九的信中又说：“前阅报章，云湖南夏秋又遭旱灾，并非常普遍。到底情形怎样？颇难释念”^⑤。在信中，他一再告诫家人，在白色恐怖下，要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要挺起腰杆。他说：“凡事只有快快活活地去想，天大地大的事都是如此。”^⑥“不要向别人乞怜，须知现在被压迫的太多，

①②家信现存湖南省博物馆。

③谢觉哉：《忆叔衡同志》。

④⑤⑥信存湖南省博物馆。

都是可怜的人，所以乞怜是空的。”^①他还说：“我不希望我家活多人，只望活的人要真活，不要活着还不如死。”^②他写信给妻子说：“您如果活到六十岁，我或者与您有见面之日。但您的一生，要是捡柴、栽菜、喂猪的一生，不要去求人的一生。”^③他教育自己的家人，不管时局变化如何，都要立足现实，“做对于现时人生有益的事”^④。他说：“幸福绝不是天地鬼神赐给的，病痛绝不是时运限定的，都是人自己造成的。”^⑤“我平生对于过去的失败，绝不懊悔，未来的微幸，绝不强求，只我现在应做的事，不敢稍为放松，所以免去许多烦恼。”^⑥他在给儿子新九的信中，还一再表明自己的志愿，借以对他儿子进行革命的教育。他说：“我承你祖父之命抚你为嗣。……当你过继结婚时，即已当亲友声明，我是绝对不靠你供养的。且我绝对不是我一家一乡的人，我的人生观，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善终的，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的。此数言请你注意。”^⑦他也向妻子表示说：“我是要永远对得起我的骨肉和您的啊！……我要问您，假使我遭了危险，您还是求死呢，还是求生呢？请您答复我。”^⑧在这些平常的家信中，一个革命者的伟大胸怀，跃然纸上，不能不令人感动。

一九三〇年七月，他圆满地完成了学习任务从莫斯科回国，在上海担任共产国际救济总会和全国互济会的主要负责人。

这时，他的二女、三女实山和实嗣，也在上海党举办的聚成印刷公司的一个工厂做工，秘密地为党印刷文件。他经常教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信存湖南省博物馆。

育女儿说：搞地下工作很艰苦，环境也十分复杂，要经得起考验，要提高警惕，防止叛徒出卖。他还严肃地教育女儿，要有随时随地为革命牺牲的思想准备，并耐心地向她们讲授应付敌探的本领。

然而，不幸的事接连发生。印刷厂遭破坏，实山、实嗣被捕，实嗣的爱人杜延庆也在另地被捕。不久，又传来了实山的爱人夏尺冰为叛徒出卖，在长沙被捕的消息。两个女儿、两个女婿统统被捕，这对叔衡是一个多么沉重的打击啊！但是，他仍然昼夜不停地为党工作。党组织为此派人四处奔走，多方营救。由于实山、实嗣在党组织和父亲的教育下，早已准备好了被捕后的答词，经过审讯，敌人没有捞到任何东西，很快由组织设法保释出狱。实嗣的爱人杜延庆被判处八个月徒刑，党组织为他请了律师辩护，刑满后也出狱了。可是，实山的爱人夏尺冰因坚贞不屈，受尽了折磨，最后被湖南军阀何键惨杀在长沙的大马路上。

夏尺冰是叔衡年青时代好友夏果雅的儿子。夏果雅曾参加过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〇年间宁乡沩山贫农张三元所领导的震撼湘中的宁（乡）、益（阳）、安（化）地区的农民起义，后流亡在外，尺冰就在叔衡家长大。在叔衡的教育下，这个青年萌发了革命思想，一九二四年冬在宁乡甲种师范读书时入党，一九二五年冬，由党组织保送去黄埔军校学习。毕业后，在北伐军中任营指导员。他思想敏捷，对敌斗争坚决果敢。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潜回湖南，由省委派任为中共宁乡县委书记。后又活动于湘东南一带，曾任湘东南特委书记。

叔衡得知尺冰牺牲的消息后，十分悲痛。但他强忍着眼泪对实山说：“一个共产党员就是不应死在病床上，他一定要死

在大马路上。”教育和安慰女儿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坚持做好党的工作。

一九三一年八月后，由于蒋介石对红军第一、二、三次反革命“围剿”连遭惨败，国民党反动派在白区更加疯狂地进行大逮捕、大屠杀，上海环境更加险恶。党决定让叔衡转移到苏区去。临行前，他将女儿找去吃饭，谆谆教育女儿说：作共产党员的就应该是不怕死的。我们从入党的那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党了。说着，他又重读了自己去苏联路过哈尔滨时写的诗，并特别解释了“此生合是忘家客”一句，语重心长地对女儿说：革命者就是要抱定舍身忘家的决心，他既希望女儿了解他的过去，又鼓励女儿说，你们将来也会有机会到苏区去的，那时我们又会在在一起的。谁知这次父女的亲切聚会，竟成了永诀。临行前，实山给他赶织了一件毛衣，他也给了实山一只刻有“衡”字的戒指。这些都成了父女永别的纪念物。

（五）

一九三一年秋，叔衡离开上海经香港、广东、闽西，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瑞金，住在叶坪一个叫谢桂明的老乡家里。他看到粉碎蒋介石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后根据地的一片兴旺景象，心情格外舒畅。这年十一月七日至二十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谢家祠堂隆重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叔衡出席了这次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接着，又被任为内务部代理部长和

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还兼任各级苏维埃政府干部训练班主任和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举凡检察、民政、司法，从对政府方针、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纵火烧山、偷税漏税、违法乱纪和反革命犯罪的处理与惩办，苏维埃干部的训练，到省、县印信的颁发，行政区划的增设与撤并，以及有关婚姻、死亡、土地契约、工商业的登记、拥军优属、修路搭桥、邮政传递、禁杀耕牛、调解纠纷、社会救济等等，都由他主管，任务繁重而复杂。他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曾和他在工农检察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回忆说，何老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工农检察部是一个大部，有七八十个干部，常分批轮流下到各地，检察各种贪污、违法乱纪、失职渎职的行为，调查落实各种控告材料。每批人员下去前，他都要详细交代应注意的问题，特别强调不能对群众耍态度，要搞好和群众的关系，深入群众，了解真实情况。每批下去的干部回部后，他都要亲自听取汇报，干部有什么事做错了，他就指出错在哪里，今后应注意什么。他对干部要求严格，但他批评人，不是疾言厉色，而是和风细雨，耐心教育。在部里，他的威信是很高的。

这时，王明左倾严重错误已在中央苏区逐步贯彻。经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苏区党代表会（通称赣南会议）和一九三二年八月党的宁都会议，左倾错误领导相继剥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对此，叔衡十分不满。在工作中，他对左倾错误的某些作法进行了抵制。当时，在过左的肃反政策的影响下，一些省、县司法机关的干部认为，多判死刑保险。叔衡主管司法，对下面报来审批的案件，总是仔细审查，反复推敲，凡是他认为材料不够判处死刑的，就不予批准。例如，一九三

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他在审批瑞金县苏裁判部第二十号判决书时写道：“关于朱××判死刑一案不能批准，朱××一名由枪毙改为监禁二年。根据口供和判决书所列举的事实……是普通刑事案件，并非反革命罪。”^①又如，一九三二年七月七日，他对江西省苏裁判部省字第二号关于温×、余××等六犯并案分别判处一案的批示中写道：“余××判处死刑暂时不能批准，因余的罪状不很明白。……原判发还，……暂作悬案，待接到你们详细报告之后再作决定。”^②同年十月十日，他在给会昌县苏裁判部的指示信中说：“第二号判决书主要是些偷牛偷鱼的事，至于与反动土豪通信，到底通些什么信，发生了什么影响，未曾证明，不能处死，需再搜查反革命证据或发现反革命的新材料可以复审。不过，主审人要改换”^③。诸如此类，还有不少。

但是，他对真正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决不心慈手软。例如，一九三二年秋，瑞金县黄柏区的干部和群众揭发县委组织部长陈××有严重问题。他立即派干部进行调查。随后，又亲自到黄柏区了解情况。结果证实陈××确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罪恶累累、民愤很大的恶霸地主，并任过“民团”团长。他就毫不犹豫地排除各种阻力，将陈××依法逮捕、公审、枪毙了。

由于叔衡发表过一些对左倾错误不满的言论，又在审判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罪证确实，量刑准确，重罪不轻判，轻罪不重判，对当时过左的肃反政策进行抵制，导致了左倾错误领导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指责他为“严重的官僚主义

^①1932年6月2日《红色中华》。

^②1932年7月7日《红色中华》。

^③1932年10月16日《红色中华》。

者”，说他“政治上动摇”，“拿法律观念来代替了残酷的阶级斗争。……使反革命受不到应有的处罚”，“在查田运动中，在改造苏维埃运动中，甚至在肃反运动中都没有起积极作用，是站在旁观的样子”^①等等。一九三二年冬，中央政府机关的党总支委员会召开会议对他进行批判。左倾错误在苏区全面贯彻后，从一九三三年夏开始，又在报刊上对他进行点名批判。一九三三年七月七日，在中央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第十七期上，还发表了左倾错误的主要领导者写的《火力向着右倾机会主义》一文，集中批判何叔衡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声言要兴师动众，“用全部力量”对他“去作斗争。”

对于这些无理指责，叔衡并不畏惧。在批判会上，他虽承认官僚主义是有一点，但公开声言：“在政治上我从来没有动摇过。”^②在实际工作中，他仍然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例如：一九三三年十月，他在审批江西省苏裁判部第一八二号判决书关于王××判处枪决一案时，仔细地审查了判决书中关于王××犯罪的全部材料，认为只有少量贪污公款一项是属实的，其他各项或者是任意夸大的，或者是很不落实的。十月十二日，他对这个案件作了一个很长的批示，对全案材料所列举的事实一一作了分析，指出原判是“过左的判决”，“王××只是贪污公款（量少），不见有反革命重大行为，处以死刑，是非常失当的，应改为监禁一年，剥夺公民权一年。”^③并在批示中指出除所贪污的财物收缴回公家外，“原判宣布无效，希即照批示执行。”^④

叔衡这种原则精神，不仅表现在能不顾政治压力，坚持自

^{①②}1933年9月3日《红色中华》。

^{③④}《裁判半月刊》，1933年10月20日第6期。

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同时也表现在不固执己见，知错即改的方面。他在对干部的处分问题上，也曾作过某些错误的决定。但是，当别人指出后，就立即予以改正。一次，他错误地批判了几个干部，这几个干部不服气，把详细情况书面报告了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并请主席阅后转给他。他看后亲自找到这几个干部作检讨说：我当时不了解情况，现在看来你们没错，我错了。这几个干部听后很受感动，非常钦佩他的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

早在一九三二年冬，中央机关党总支委员会组织对他的批判时，就曾提议撤销他的领导职务。当时，因云集区区委和瑞金县委都不同意而作罢^①。后来，左倾错误领导见批他不服，斗他不改，终于在一九三三年冬撤销了他的全部领导职务。

他在政治上受打击，行政上被撤职后，仍然踏踏实实、忠心耿耿地从事党分配给他的工作，经常和其他同志一道去医院慰问红军伤病员和到烈军属家里去帮助劳动、解决困难。表现了他对党对革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

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终于失败。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出根据地进行长征。叔衡被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当他在江西余江县梅坑和战友依依惜别时，他以革命的深厚友谊，将女儿实山为他编织的毛衣送给林伯渠，供林老长征路上御寒。林伯渠深为感动，写了《别梅坑》一诗，其中有四句是：“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赠我绌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现在，这件毛衣已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①当时中央政府机关总支是属瑞金县云集区区委会管辖的，故处分干部要区委、县委表态。

何叔衡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的情况，后来李六如回忆说：

“红军长征，江西苏区沦为游击区时，叔衡同志随队伍驻于都公馆乡，党派他帮助乡政府作动员工作，每天扶一根拐杖，朝出晚归，口不言劳。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作这种工作，我们当时的心里是很难过的。就在该乡工作时，党要他同秋白同志去白区时，脚上没有鞋子穿。穿一双破鞋子。动身的晚上来问我：‘六如，你有鞋子么？’我把江口贸易局局长陈祥生送的一双皮胶鞋给他。他长叹一声：‘咳！六如，不料我这副老骨头，还要送到白区去啊！’他一面说，一面流下泪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①

叔衡大约是一九三五年一月，与瞿秋白、邓子恢及张亮、周月林（张、周后叛变），由江西瑞金附近出发转移去闽西的。其中秋白、叔衡等拟经广东、香港去上海，邓子恢则决定留在福建与张鼎丞等坚持游击战争。他们一行化妆成商人及眷属，在几天后到达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在汤屋停留了一段时间，继续启程去永定。福建省委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选调人员组成护送队沿途护送。他们昼伏夜行，通过层层关卡，于二月二十四日凌晨到达上杭县濯田区水口镇附近的小径村。队伍在这里休息吃饭时，由于麻痹大意，被地主武装“义勇队”发现，报告了驻扎在水口镇的敌保安第十四团二营。该营营长李玉率队迅速包围了小径村，护送队仓促应战，叔衡等闻枪声即从村里转移到村南的牛子仁栋大山上，在护送队掩护下分别进行突围。敌人尾追不放，叔衡身负重伤，躺倒在山下一块水田附近，被两个匪兵发现，以为他已身死，在搜身时，叔衡奋力反抗，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实践了他生前“我要为

^①引自《湖南革命烈士传》，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1952年版。

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①的誓言。

一九三七年，在党中央纪念党成立十六周年大会上，对牺牲同志默哀，当毛泽东主席数到叔衡名字时，大家惊悉他的死已经证实，感到无限悲痛。一九四二年五月，谢觉哉在《忆叔衡同志》一文中，概括了叔衡一生的高尚品质，表达了人民对他的深切怀念。文章说：

“叔衡同志以不能谋自谦，故很能虚怀接受人家的意见；但也以能断自负，每当危疑震憾，人们犹豫的时候，他能不顾人家的反对，不要人家的赞助，毅然走自己的路，站在人们的前面。

叔衡同志对党的认识深刻和意志坚定，是超人一等的。

叔衡同志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叔衡同志能见微知著，语中肯綮，尤其是在重要环节，紧急关头，总能给你以启示，而且使你于不知不觉中服从其启示。如果说叔衡同志是模范的共产党员，那他不仅是给人以模范，而且很热忱地希望人家赛过他的模范。

我不是为着‘忘却’而写；写，为着不‘忘却’。

‘哲人其萎，吾将安放？’写此告人，且以自励。”^②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五日，诗人萧三第三次修改了他悼念叔衡的诗，寄给何实嗣，诗曰：

①关于叔衡牺牲的时间与怎么牺牲的说法不一，尚待考证。本文暂用陈铁健《关于何叔衡同志的牺牲》的说法，见《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谢觉哉《忆叔衡同志》。

夔铄老翁何叔衡，
十二人建党立殊勋。
作事不辞牛犇重，
感情一堆烈火熊。
生平能谋尤能断，
赤胆忠心无与伦。
铁骨铮铮壮烈死，
高风亮节万年型。①

何叔衡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高尚品质将永远放射灿烂的光辉。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编：《湖南革命烈士传》，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1952年版。
2. 《五四运动在湖南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版。
3.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版。
4. 湖南省博物馆历史组校编：《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版。
5. 何实山、何实嗣：《忆父亲何叔衡烈士》，1980年6月14日《人民日报》。
6. 湖南省博物馆校编：《蒸阳请愿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版。
7. 中共宁乡县委宣传部关于何叔衡事迹的调查访问材料，被访问的有：萧三、罗章龙、易礼容、李维汉、周谷城、张国基、朱开铨、欧阳毅、曾三、张琼、张永辛、何瞻贵、何士尤、黄长蛟、朱招娣等七十多人。

①诗存何实嗣处。

陈 昌

钱 家 楠

(一)

陈昌，一名章甫，一八九四年七月十四日生于广西梧州。八岁，随父母回到故乡旧居——湖南浏阳土桥炭坡陈家大屋。

陈昌先在其叔祖所设蒙馆中念书，后就读于附近的金江高小。陈昌容貌俊秀，聪敏好学，善长诗文，尤擅演讲，颇为师友所重。十六岁毕业，因贫辍学，在家务农。次年夏，考入湖南全省中路师范学堂。翌年，中路师范学堂改为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一师范学校是当时办得较好的学校，不仅校舍宽敞、图书丰富，且拥有一批思想开明，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黎锦熙等。学生多系家境贫寒、学业优秀的农家子弟，生活朴素，学习勤奋，故校风良好，为他校所不及。有了这样好的学习条件，加之不收学宿膳费，免去了经济上的顾虑，陈昌更专心一致地刻苦学习，自强不息。课堂之外，不是在阅报室读报，就是在自习室读书，往往读至学校熄灯，才回寝室睡觉。他在日记中写道：“人不能天生聪明也，发愤就是聪明。人一知之，吾十可知也，人十知之，吾百可知也。”他好学兼深思，读书思考有得，必记之笔记。遇有

特别喜爱的文章，辄整段摘录，不惮烦劳。尤重实践，教授伦理学的杨昌济先生，在《达化斋日记》中写道：“阅熊、肖、陈三生笔记，均有长进。焜甫多记读书讲论所得，子升多记思虑所得，昌甫多记行事所得。一重博学，一重深思，一重力行。”陈昌重气节，轻财货，见义勇为。他常说，“赴义恐后，见利莫先。”“为人要以事为目的，不要以钱为目的。”当时在一师教授历史的黎锦熙先生，对他和毛泽东曾有这样的评语：“在润之处观其日记，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其为师长见重如此。

一九一四年春，毛泽东来到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英姿勃发的进取精神，博览群书、独立思考的学习态度，以及他那不平凡的才具、胆略，都使陈昌无限钦敬。时蔡和森、何叔衡、罗学瓚、张昆弟等，也在一师读书，他们都是有远大理想、志在匡时济世的有为青年，很快就成为声应气求的挚友。他们时或同去杨昌济、黎锦熙等老师家中，讲求治学或为人处世之道；或时聚于岳麓山畔、爱晚亭中，纵论天下大事，臧否人物。毛泽东纵横捭阖的雄论，深刻精辟的见解，常使陈昌心胸豁然开朗，受益甚多。

那时候，正是辛亥革命失败，袁世凯进一步勾结帝国主义，图谋恢复帝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的全面侵略，企图变中国为日本帝国主义独占的殖民地；湖南则处于袁世凯的爪牙汤芑铭的统治之下，革命人民惨遭屠杀。加之兵连祸结，苛政如虎，湖南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着灾难深重的国家和人民，他们满怀忧愤。中国如何能富强起来？如何解除人民的痛苦？为了求得正确的答案，他们对明末乃至近代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各家学

说，无不网罗，认真研读，从中撷取有益的东西。初期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通过杨昌济的介绍，他们都成为《新青年》的热心的读者。《新青年》上的文章，尤其是李大钊、陈独秀的文章，给他们思想以极大的启发。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他们——毛泽东、陈昌、张昆弟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专门研究《新青年》上所提出的新思想、新问题。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下，陈昌在探索真理的程途上，向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跨进了一步。

为了将来能承担起救国救民的重任，他们坚持不懈地锻炼身体。他们有意地实践孟子上的一段话：“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如大雨滂沱，赤膊冒雨跑步；寒风凛冽，单衣短褐当风而立；炎夏烈日当空，赤膊在骄阳下曝晒。还经常进行远足、游泳、登山等多种项目的锻炼。陈昌毕业以后，虽不能如在校时那样锻炼了，但仍有意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以锻炼自己的意志，如外出遇雨，坚持冒雨步行，不乘肩舆。

和在金江高小一样，陈昌的演讲才能名闻全校。每日清晨或傍晚，同学们常见他独自一个跑到猴子石旁，面对湘江，大声练习演讲，如对千百群众一样，风晨雨夕，恒未中辍。他声音宏亮，演辞逻辑周密，说理辟透，且极富文采，加之顾盼神飞的丰采，俱令听讲者为之心折。时学校经常举行各种活动，如成绩展览会、演讲辩论会、各种专题学术讨论会、运动会等，陈昌常是辩论会的积极组织者和领导者，人称雄辩部长。他的富有感染力的演说才能，后来成为他在革命斗争中的锋利武器。

(二)

一九一五年秋，陈昌于第一师范毕业，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担任级任。年末，返回家乡。十二月，袁世凯在各地所谓劝进声中宣布：明年改年号为“洪宪元年”，定于元旦正式即皇帝位。陈昌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写下了一九一五年十二月除夕的日记：“今日是民国四年之末日，或谓乃共和之末日。今日可恋，今日可悲。呜呼一去几时归，烈士空劳举世悲，沧海桑田成幻影，万民齐上帝王徽。”表达了他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沉痛和惋惜，以及对袁世凯称帝的憎恨。

当时袁世凯拥有军事实权，为帝国主义所支持。在他称帝前后，为了装点门面，也曾学历史上夺国奸雄的样，玩弄所谓“收揽名流”的把戏。一时反动官僚政客、无耻文人，争相趋附，甚至有些革命党人也变节在袁的帐下趋之若鹜。陈昌对这种趋炎附势、卖身求荣的“名流”、“第一流人才”非常鄙视，他在一九一六年元月二日的日记中，愤怒地写道：“自五七以后，始知中国之真弱，自恢复帝制之后，始知中国致弱之因。昔之士大夫，不过心死，今日一发连脸面都不要了”；“夫亡国必有一班亡国之士大夫，败家必有一班败家子。今日败亡之材料，丰富充塞九州，虽有掌火焚山者出，莫能尽此妖孽也。”他沉痛地说：“禹域虽广，举目无人，有人则有土，今既无人，土将安附？宜乎国之亡矣。”日记中固然反映了陈昌对趋附袁氏的无耻之徒的憎恨，但也反映了当时陈昌思想的局限性，他只看到了“士”的作用，没有见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因之才会有“禹域虽广，举目无人”之叹！当然，对于中

国致弱的原因，当时的陈昌也不可能有科学的认识。

陈昌预见到，袁氏虽然一时貌似强大，然终究不过是一座冰山，遇到太阳就要融化，不会久长的。当一帮士子纷纷卖身投靠时，陈昌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荫，宁可寒窗读书，也不同流合污。他在一九一六年一月七日日记中写道：“生平今之世，不可趋时，纵令得志，能发展几何事业？不若埋头读书之为益也。”同年二月三日，即农历正月初一这天，他更写下了“处乱世，贵独善其身”的誓言，当时曾一度误传正在北京的黎锦熙被袁世凯所罗致，毛泽东于一九一五年十月九日曾致函给黎，信中说：“今方恶声日高，正义蒙尘，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时，不可急图进取。……凯臣舜，服善也，杨、刘臣莽，附势也。辩夫今之为舜欤？为莽欤？则何以自处明矣。”事后证明事属子虚，但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到，在政治上坚持操守，不肯随波逐流，陈昌和毛泽东是何等相似。陈昌后来成为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中的得力助手，并不是偶然的。

然则，陈昌并非愤世嫉俗、超然物外，他之认真读书、锻炼身体，正是为了“以待有时”。他在一九一六年五月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读书之要，在体察人心，留意军国，所谓居水边林下，志不忘世道民生。”又说：“非有强力之精神手腕者，不足以当今日之书生，故读书、体育先焉。弟日夜奋张空拳、摩挲武器，良以百重强敌有待武攻之驱逐也。虽属九牛一毛，敢荒匹夫之责。”这一时期，陈昌读了不少书，特别认真研读了《通鉴辑览》。他每天去“北溪草堂读书，朝去暮归，……自朝至昃，未尝释卷，夜辄近三更。”还写了不少诗，从这些诗中，亦可看出陈昌无时无刻不以洗雪国耻、振兴祖国为

念。如一九一六年四月十八日月下怀友：“中原方逐鹿，东海又扬波，为问幽燕客，何时一枕戈？”又五月一日写的感怀诗：“唯有强权足自豪，兴邦雪耻在吾曹，挥戈直渡朝鲜峡，爱国头颅等弁毛。”

一九一六年上期，陈昌在徐特立主办的五美小学教授地理和修身课。他在信中对毛泽东说：“此时读书颇乐，为教亦有方针。法人某氏曰：战争为一大教育场。吾亦利用之而施其教也。”他在授课时，经常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军阀混战给中国造成的四分五裂的局面，以及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下人民生活的痛苦，结合课文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在自编的一篇教材中写道：“中国雄踞亚洲之东南，土地辽阔膏腴，罕有能比，诚世界大国也。然自清末道光以来，外交失败，丧权割地，时有所闻，……东三省已在日人势力之范围，……他若旅大割，我国失东北第一之军港；香港让，我国失欧亚要冲之商场。环顾中原，强邻虎视，非独撤我藩篱，近且蚕食腹地，势必裂而吞之不已。诸生睹此，能不痛心。尚志沙场，誓图恢复，山河依旧，不难一一收回，庶可以绍祖先之丕烈，洗百年之奇耻也。愿与诸生共勉之。”

袁世凯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首义讨袁，揭开护国战争序幕。次年六月，袁世凯在四面楚歌声中死去。但护国战争后的中国，形成了更加混乱的封建割据。湖南的驱汤，也不过是由此一军阀变成彼一军阀的统治而已。正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面对着朝云暮雨、风云变幻的混乱局面，陈昌偶尔也感到悲观失望，“愧无击楫匡时略，极目遥天空自悲。”所幸他有毛泽东这一良师益友，每当他感到苦闷彷徨的时候，只

要一接到润之兄的信，他的心情就会立刻开朗起来。一九一六年元旦，他正为袁世凯登基称帝感到无比悲愤的时候，忽接毛泽东信，他在日记中写道：“读罢甚感，少去其萎靡气，故人贵有师友也。”从仅存的自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一六年五月陈昌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和毛泽东常有书信往来。毛泽东还常寄书刊给他，如《中华杂志》、《时事痛言》等。这些书信可惜都已亡佚，可以想见，必是议论时局及互相策勉之意。在毛泽东的鼓励和帮助下，陈昌始终坚定地朝着革命的方向前进。

（三）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七日，在长沙岳麓山茱萸湾市侧刘家台子蔡和森家中，正式成立了新民学会。学会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是毛泽东、蔡和森，陈昌也是发起人之一。

早在两年前，毛泽东就有组织团体的考虑。他深切地感到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必须联合许多有为的、勇于为国为人民献身的青年，共同奋斗，才能有所作为。第一师范虽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挚友，但数量毕竟太少了，必须突破一师的圈子，向社会上广大青年群中去物色，方有可能联合更多的同志。陈昌是他这一想法的积极赞助者。一九一五年暑假之后，毛泽东发出了有名的以二十八划生署名的征友启事，这一征友活动的联系人便是陈昌。启事寄到长沙各个学校，也在长沙城门口和通衢要道上张贴出来，一位女校校长收到这张启事，怀疑征友者是位登徒子，想藉此找女学生搞恋爱。于是按照启事上所写的联系人的姓名地址，来到一师附小找着了陈昌。经陈昌再三解

释，说明二十八划生是一位品学兼优，胸怀大志的青年，老校长方才放心而去。

这种征友方式效果并不很理想，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应征者只有三个半人。于是他转而有组织团体的考虑。他和他的朋友们——约十五人内外，其中有何叔衡、蔡和森、罗学瓚、张昆弟及陈昌等，经过为时两年、上百次的讨论，终于决定“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一个革命的青年组织——新民学会，便象一盏明灯一样，在漆黑如夜的中国中南一隅——长沙升了起来。

新民学会成立后，实际上成为湖南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陈昌则是这个核心的重要骨干之一。它曾团结湖南的青年和各界人民，发动了一系列革命群众运动，如五四爱国运动、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新文化运动等，新民学会会员在运动中，都曾起了先锋作用。

从学会成立伊始，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学会的建设。为了了解俄国和欧洲革命的经验，探求新的思想学说，以求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主张会员多到国外去学习。因此，当北京教育界人士发起勤工俭学运动时，毛泽东极力倡导并大力组织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不少会员，如蔡和森、李维汉、张昆弟等，相继到了法国。还有些会员到了南洋、日本。时陈昌亦有东渡日本的计划。毛泽东考虑到国内工作的需要，学会的巩固与发展，不主张陈昌到日本去，希望他留在长沙，以学校为阵地，为学会同时也是为革命事业培育人才。从蔡和森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可以知道，毛泽东曾把这一想法写信商之于他。蔡和森和毛泽东一样，非常重视学会的建设问题，他认为培养和造就人才是学会的长久之计。因此，也不同

意陈昌去日本，建议陈昌应当毅然决然，就省中教席，一同提携会中大事，为学会立其基础。蔡和森给毛泽东的另一封信中再次表示，希望陈昌于毛泽东在湖南时不要外出，留在长沙极力办小学。陈昌听从了他们的意见，放弃了自己的出国计划，直到一九二五年底，他始终坚守教育这块阵地，从事各项革命活动。

会员分散到各地后，为了互通情况，毛泽东以通讯方式和会员联系，并将这些通讯按内容编印成集，发给会员和少数爱读者阅读，其中重要问题，毛泽东还特别提出来在会员中间用通讯方法进行讨论。他日益明确地认识到：“学会必须是主义的结合，不可以徒然是人的聚会，感情的结合”；“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帜树立了，大家才有指望，才知有所趋赴。”因此，在组织大家讨论时，他总是循循善诱地引导大家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问题。通过这样的讨论，陈昌的思想又向前跨进了一步，逐渐地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着马克思主义转化。特别是，一九二〇年毛泽东在长沙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昌是研究会的成员。在毛泽东指导下，他阅读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及苏联十月革命情况的书籍，及《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更促进了陈昌这一思想的转化。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五日，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关于学会宗旨的讨论，则是陈昌这一重大思想变化的标志。

一九二〇年七月六日至十日，留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在蔡和森主持下，在蒙达尼连开了五天会，就会务方针——改造中国和世界，展开了热烈的辩论。对会务方针为“改造中国和世界”大家基本同意，但在革命道路和方法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种意见以蔡和森为代表，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

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另一种意见以肖子升为代表，主张温和的革命，“即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颇不以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毛泽东对蔡和森的意见“表示深切的赞同”，同时认为“蒙达尼开会情况及会务发展意见颇关重要，是会友人应该注意的”，决定邀集在长沙的会员开会讨论蒙达尼会上所提出的问题。会上，毛泽东做了重要的发言，他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罗素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及社会政策，认为这些都是办不到的，“只有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陈昌赞成毛泽东的见解，谈了自己的思想认识过程：“以前单从贫民方面看，以为社会政策亦可，但后来从各方面看，知道社会政策不行，所以我现在也主张用布尔什维主义。”发言虽然很简略，但表明陈昌思想已发生了质的飞跃。

(四)

一九二〇年七月，湖南人民驱张胜利之后，毛泽东由上海返回长沙，随即开始了以建党为中心的活动。他一方面在新民学会会员中反复进行建党问题的讨论，一方面着手进行各方面的建党准备。这时，毛泽东在一师附小担任主事，陈昌也从北京学完国语注音回来，在一师附小教书兼一师国语注音教员。他们同住在天鹅塘青山祠一所房屋内，还有两位教员也住在那里。毛泽东建议成立革命大家庭，由陈昌爱人毛秉琴管理大家生活并做饭，四家同在一处吃。毛泽东喊毛秉琴为大姐，陈昌

女儿一元喊毛泽东为舅舅，相处如同家人。

为开展新文化运动，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建党做好思想准备，毛泽东和何叔衡、易礼容、彭璜等新民学会会员，创办了文化书社，大力经销全国各地出版的进步书刊。陈昌也是文化书社发起人之一。为使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迅速普及到全省，毛泽东等还计划在各县建立分社。陈昌和宋先觉一道，在浏阳西乡建立了浏西文化分社，不仅推销总社发行的各种进步书刊，还自己刻印进步书刊上的好文章，广为印发，对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在浏阳的传播，起了推动的作用。毛东泽知道以后，特地送给他们一副梨木刻版。

一九二一年春，根据毛泽东建议，陈昌偕陈作为等回到浏阳，以金江高小为据点，继续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进行教育改革。时进步知识分子黄甫生长校。当地习俗，每年农历正月初十，由学正主持召开一次大会，乡里头面人物都要参加。先祭孔，吃酒席，然后研究浏西三镇教育问题。这年大会，祭孔、吃酒毕，首由黄甫生报告一年来教学工作，次由陈昌演讲，历数旧教育积弊，倡导教育改革，获得进步知识界的拥护，公举陈昌为校长。陈昌为更好地团结知识界，仍推黄甫生长校，自任训育主任，一起进行教育改革。

陈昌等进校后不久，学校面貌为之一新，如学生不再着长袍马褂，改着短衫。学校有数千石谷的土地，辟作了农场，学生不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是读书之外，还要从事劳动生产。为破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陈腐观念，树立“劳工神圣”思想，在学生们上课必经的地方（老师吃饭的房间前），竖立了一块上书“劳工神圣”的木牌。陈昌还亲率学生参加劳动。学校周围原是一片荒地，乱石堆积，杂草丛生，

遇有雨雪，泥泞难行。陈昌率领学生修筑了一条环校马路，还自编了一支修路歌，教同学们边劳动边唱。原在金江高小读书现仍健在的一些老人，至今还记得这首歌词：

修我们的马路，贯彻我们的精神，
怕什么寒和暑，雨和风，
拿起我们的锄头、铲子，快来做工。
怕什么高和低，土和石，
凡阻碍我们的，就要把它铲平！
大家起来，大家起来！
做一个真正的劳工！

为增加学校进步力量，并使新文化运动深入其他各乡，陈昌又向毛泽东请求从自修大学派一些人来充任教师。随之，夏明翰、傅昌钰、潘介棠、陈飘飘等，先后来校执教。不久，又分别赴洞溪、蕉溪、枫林、上东等乡，担任各该乡高小教师，或为当地新文化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由于浏西文化分社就设在金江高小校内，同学们可以自由阅读一些进步书刊，加之，陈昌、夏明翰、陈作为等革命教师的循循诱导，对一些同学要求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觉悟有一定的影响。他们积极参加当时的革命活动，如一九二三年，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拒不归还旅大，反对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金江高小同学们曾组织起来到西乡普迹镇上街游行，并且积极参加了对日经济绝交运动，有的同学还在作文课上撰写反对反动军阀赵恒惕的文章。

当时浏阳各校都不招收女生，更没有女学。妇女受着封建

宗法的压迫，被剥夺了读书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利。陈昌不顾社会的非难，排除封建势力的种种阻挠，卖掉学校农场几百担积谷，筹措了一笔经费，创办了浏阳第一座女学——金江高等职业女子学校，校长便是夏明翰的姐姐。次年，为使更多妇女就学起见，金江高等职业女子学校改为三座女校，分设在普安、崇义、柘中三镇。当西乡女学蓬勃兴起时，东乡的永和、上东；南乡的明章；北乡的乾乾等高等女子职业学校，也都雨后春笋般地陆续开办起来了。

陈昌等还创办了金江农民夜校，向农民传授文化知识，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农民觉悟。

为了团结进步力量，扩大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陈昌还组织了浏西文化促进会，自任会长，引导知识分子对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陈昌等还把浏阳在省城读书的学生约数百名，组织起来，成立浏阳驻省同学会，并创办了《浏阳旬刊》，由陈昌、陈清河、陈飘飘、陈作为担任首届主编。旬刊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以驻省学友和小学教师为对象，内容包括国内外新闻、马列主义介绍、学术讨论及文艺小品等，曾经转载过毛泽东早期著作《民众的大联合》及李维汉纪念我国十月革命的演讲辞等。由于刊物能反映时代精神，满足青年对新文化、新思想的要求，不仅为浏阳驻省同学和小学教师所欢迎，且销行到醴陵、平江等县，在知识界中起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陈昌等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浏阳反动当局的不安，他们另委思想反动的邱培钧去金江高小当校长，黄甫生被迫辞职。随之，陈昌、夏明翰、陈作为等也相继离校。同学们曾为此事进

行过一次罢课斗争，以示对反动当局和邱培钧的不满和反抗。

（五）

陈昌于一九二三年回到长沙，此时，毛泽东由于赵恒惕省政府的通缉，已经离开长沙，毛泽东所创办的自修大学及其附属补习学校，也被赵恒惕下令解散，部分教职员在湘区区委书记李维汉领导下，奋起重新组织湘江中学，陈昌积极参加了筹办工作。首先组织湘江学会（即校董会）。最初校董只十二人，即毛泽东（名誉校董）、李维汉、何叔衡、罗学瓚、夏明翰、曹典琦、熊瑾玎、姜梦周、廖锡瑞、陈昌、易礼容、夏蔓伯。当时，经费至为困难，由校董每人出洋五十元，凑合补习学校剩余之款，做为学校开办费用。陈昌还把自己的两橱书连同书橱一起捐赠给学校。

湘江中学和自修大学补习学校的性质一样，主要任务是培训革命干部。一九二四年又增设了农村师范，为农民运动准备干部。因此，它除了一般文化课外，着重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并引导学生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如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为抗议英、日帝国主义屠杀青岛、上海工人，以及同年十月，为抗议赵恒惕屠杀安源路矿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在湘区委领导下，都曾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当时，赵恒惕有所谓四斩令（即宣传过激者斩，煽惑军心者斩，造谣生事者斩，扰乱秩序者斩），且派军警特务，日夜在学校周围侦伺。时陈昌就住在湘江中学校内，但他毫无惧色，始终和湘江中学师生一起，勇敢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陈昌还把自己的亲弟弟陈安怀送到湘江中学学习。陈安怀在学校里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毕业后被派到株萍铁路做宣传员，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英勇不屈，壮烈牺牲，时年十六岁。

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末这一段时间里，陈昌除在金江高小从事新文化运动及在长沙筹办湘江中学并在湘江中学执教外，他还先后在醴陵师范讲习所、宁乡甲种师范讲习所、长沙师范（女部）、兑泽中学等校教书。在教学中，他热情地向学生宣传革命道理，领导学生参加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不少学生参加了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有的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负责干部。他好比一粒酒药子，在他所到的地方，起着革命的发酵作用。

一九二二年秋，陈昌在醴陵师范讲习所教书，团结进步知识分子、讲习所所长张啸霞一起进行教学改革，使醴陵师范讲习所第一次实行男女合校，并把顽固士绅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庙，辟作了女生宿舍。在教学方面，增设了社会科学方面的科目，陈昌自任教员。还订了许多进步书刊，如《新青年》、《解放》、《改造》等，供学生们自由阅读。

他依靠张啸霞和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易足三等，领导全校师生展开反对军阀赵恒惕的斗争。赵恒惕在取代谭延闿而统治湖南以后，于一九二二年一月推行所谓省自治，在省县各级建立选举事务所，限期选举出省县议员。首由选举事务所伪造名册，按照名册将选票分给城乡豪绅，豪绅们即持选票与竞选者大做其交易，每张选票价一、二角至二、三元不等，演出了一场把持选务，争夺选票的丑剧。八月，醴陵开始“选举”，讲习所本应有选票六十张，但选票为劣绅——觉民书店老板刘宗感

所把持，不发给讲习所。为了揭穿赵恒惕所谓选举的欺骗性，经陈昌等商议后，由张啸霞向全体学生说明真象，学生们异常愤慨，当即推易足三为代表，率领同学直奔刘宗感家，把六十张选票全部追回，当众撕毁，掷在地上。经过这次斗争，同学们受到一次深刻的政治教育，进一步认识了赵恒惕政权的反动实质。

陈昌讲课最受学生欢迎，他能很巧妙地把课文同当前时局联系起来。有时讲到帝国主义的欺凌，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往往泣不可仰，堂上堂下一片唏嘘。他在宁乡甲种师范讲习所讲授地理时，有一次讲到汉冶萍公司，他从日本帝国主义如何利用汉冶萍公司掠夺我国煤铁资源，一直讲到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深刻而通俗地讲解了我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最后归结到要使中国富强起来，必须打倒列强，铲除军阀。同学们听了个个义愤填膺，热血沸腾。又一次讲到上海，他讲了上海沦为殖民地的历史以后，说道：在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上海一方面是冒险家的乐园，一方面是劳动人民的地狱，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之一。他举着地球仪，指着莫斯科的方位说：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最光明，那就是莫斯科。接着他给大家介绍苏俄十月革命情况，激起大家对莫斯科的向往，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类似事例很多，他的一些学生说，他们就是在他的思想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通过教学 and 实际斗争，陈昌在宁乡甲种师范还培养和发展了一些党员，为在宁乡建立党的组织创造了条件。一九二四年下期，在宁乡甲种师范讲习所建立了中共宁乡直属支部，代号宁党，支部书记就是甲师的学生胡辉。支部成立那天，湘区委书记李维汉亲来参加，并讲了话。支部成立后，甲种师范成了

党在宁乡的活动中心，推动全县革命斗争更加有力地向前发展。

（六）

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后，湖南共产党员亦多参加国民党组织。一九二五年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长沙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了第一届执、监委员，其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陈昌也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并被选为执行委员，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他曾以省党部特派员身份，改组国民党常德市党部，促进了国民党的革命化。

一九二六年春，北伐前夕，为了争取湖南境内民军参加北伐，陈昌受党的委派前往湘西贺龙部驻地，进行工作，卓有成效。

九月，湘区委派以周逸群为首的国民革命军左翼宣传队到常德贺龙部工作，同时在醴州举办政治讲习所，为贺龙部培训骨干（包括袁枢铭等部），以备早日开赴北伐前线。陈昌曾任讲习所政治教官。政治讲习所共办了两个月，受训学员结业后，均派往贺龙部担任连、营指导员，成为贺部在北伐和南昌起义时的骨干力量。

（七）

一九二六年夏，党派陈昌及总工会特派员刘汉之等前往水口山，重建党的组织及工会，深入开展工人运动。陈昌还以国民党特派员身份，负责筹备建立国民党水口山市党部。

水口山矿是我国最大铅锌矿，约三千多工人，是湖南经济命脉之所在。清末以来，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疯狂掠夺和残酷压榨下，工人生活极其痛苦。一九二二年，党派蒋先云等去水口山开展工人运动，成立了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组织了震惊中外的水口山大罢工，取得了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之自由、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等重大胜利。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进入低潮，赵恒惕也更加凶残地摧残水口山工人运动，派军队一营进驻水口山，封闭工人俱乐部，追捕工人积极分子，解雇一千多名工人，蒋先云被迫离开水口山，党组织遭到破坏。

陈昌等来到水口山后，首先重建了党的组织——中共水口山县委员会，由刘汉之担任书记。十二月，湖南区委派何寅修（大革命失败后叛变）来水口山担任县委书记，一九二七年一月，县委改为地委，仍由何寅修担任书记，地委下设九个支部，工会和工人子弟学校是一个支部，支部书记由刘汉之担任，陈昌、刘汉之俱为地委委员。同时，陈昌也筹建起国民党水口山市党部，自任书记。

党委成立后，即着手成立工会的筹备工作。他们一面深入群众，进行思想发动；一面组织工会筹备处，向矿方提出恢复一九二二年大罢工时所取得的一切权利，发清欠饷，容纳失业工人，释放在押工人，赔偿工人俱乐部损失等要求。矿局当局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坏活动。首先他们收买工贼朱科益、戴子和组织所谓“同乐会”与工会相对抗，同时散布流言蜚语，妄图破坏陈昌等在群众中的威信。陈昌、刘汉之等领导全矿工人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及时揭露了他们的工贼面目，指出“同乐会”的非法性质，使他们的阴谋很快地破产了。继之，

他们又指使朱科益等率领一批歹徒，手持钢钎、斧头，闯至陈昌住处，假借工人名义，反对成立工会，胁迫陈昌等离山。以后，甚至派人暗杀陈昌等。但暗杀者俱被在暗中保护的工人秘密组织的义勇队拿获，押送至正在召开的湖南全省工人代表大会处理。由于工人们的坚决斗争和革命形势所迫，矿局当局不得不承认工会提出的条件。

九月七日，矿工举行工会成立典礼，除工会会员六千余人全部参加外，附近商民协会、砂船工会、湖南第三师范学校，以及衡阳、衡山、安源等地工农团体也各派代表前来参加，岳北白果农民来了五千多人。当年由一位姓康的老工人秘密保存的工人俱乐部大旗，重新飘扬高空；工会门口用松柏枝扎了一个牌坊，上书“重见天日”四个大字。陈昌、刘汉之相继在大会上发表演说。会后组织大游行，工人沿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高呼口号，欢声震天。游行队伍长达十里，观者塞途，真是盛况空前。

工会成立后，刘汉之兼委员长，黎海云为秘书长。为提高工人文化、政治水平，先后成立了工人师范班、工人子弟学校、工人夜校等。工人夜校不仅是工人学习文化的场所，还是党组织进行活动的地方。当时党组织尚未公开，共产党人大都以工人子弟学校或夜校教员为掩护进行活动。

为巩固北伐后方，保卫工人斗争胜利果实，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工人自己的武装——工人纠察队。一九二七年二月，又举办工人纠察训练班，对工人纠察队骨干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四月份，又组织工人纠察队夺了矿井队八十多支枪，武装了自己。马日事变以后，这支工人武装会同附近农民约万余人，在党的领导下，攻打车江，计划“占领衡阳，打到长沙

去，活捉许克祥”，但因缺乏战斗经验而告失败。后来在一九二八年，这支武装编为红四军特务营，在宋乔生率领下，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日，湖南省委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农民最低限度之政治、经济要求”三十八条，号召湖南农民起来进行政治上经济上的各种斗争。十月十三日，何叔衡来到水口山，向全矿党员传达了省代表大会的精神，号召党员深入农村，发动农民，以水口山党组织为中枢，掀起新的革命高潮。十二月一日，省农协和省总工会在湖南区委领导下，召开了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的毛泽东也应邀参加了大会，并做了两次重要讲话。他指出：“中国革命问题是农民问题”，“反革命方面已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组织，革命方面也应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对抗他们。”还指出：“湖南现在虽然由国民政府所统治，但实际上仍由国民政府与赵恒惕余孽——土豪劣绅共同统治。他们的势力还很大。”号召大家加强阶级斗争。

根据毛泽东指示和湖南省委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陈昌、刘汉之等在水口山大力开展了农民运动，使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他们先后派出了大批党团员和工人骨干，到常宁及水口山周围农村进行宣传、协助组织农民协会，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止，水口山周围已建立起十八个农民协会，会员达二万余人。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减租减息退押、阻运禁柴，打击团防，建立农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运动，实现了“一切政权归农会”。凡是成立了农协的地方，都建立了党、团组织，革命形势高涨。

为了进一步打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巩固工农革命联

盟，促进工农运动更加深入发展，陈昌等决定在五一劳动节，召开第一次工农联合大会，同时组织特别法庭，公审两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烟州的何遥卿和官庄的谷玉衡。大会在矿区四十八间前面大坪上举行。矿区工人和十八个地区的农民协会会员全来参加。陈昌、刘汉之等俱在会上讲了话。公审开始，农民们争先恐后上台控诉两犯罪行，当陈昌代表特别法庭宣布两犯死刑时，全场欢声雷动，经久不息。这次大会，大大地显示了工农群众联合的威力，土豪劣绅威风扫地。

(八)

一九二七年五月初，陈昌自水口山回到长沙，参加国民党省党部召开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五月二十一日，反动军官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团长许克祥发动了反革命武装叛乱，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省工会、农会、省党校及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等革命机关悉被摧毁，党的组织亦遭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进步人士惨遭杀害。长沙陷入极度白色恐怖之中。陈昌隐蔽在长沙郊区一位亲戚家中，后来呆不下去了，又转移到附近一座名叫飞龙亭的破庙中躲藏。这期间，他一面设法寻找组织，一面读书，有时做诗抒发自己的革命情怀，如一九二八年除夕有感：“壮志未酬身尚健，豺狼当道志弥坚，鸡鸣起舞迎新岁，披衣秉剑划长天。”表达了他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

一九二九年春，他终于接到上海党组织来信，要他即赴上海工作。在上海，他曾在一所湖南人办的群治大学教书，作为掩护，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革命工作。年底，党中央军委

决定派他去湘鄂西，与贺龙一起扩大革命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陈昌和另一位名叫李季庸的同志，带着党的指示，昼夜兼程，奔赴湘鄂西。行至澧县，被伪县长唐佑越——他从前的一個学生诱捕，押解到长沙，关进陆军监狱。在法庭上，敌人用尽种种威逼、利诱等等无耻手段，企图使陈昌说出党的秘密，但陈昌坚贞不屈，敌人得到的只是无言的蔑视，或义正词严的怒斥。敌人又把毛秉琴找来，企图用骨肉之情软化战士的心，但这一着也失败了，陈昌平静地对毛秉琴说：献身党的事业，是我生平志愿。今日我为党的事业而死，正是死得其所，死而无憾。叮嘱毛秉琴千万不要悲伤，好好抚育三个女儿，继承父志。

两个多月过去了，敌人始终一无所获，而浏阳、长沙的保释信却如雪片飞来。敌人惊恐万状，于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三日将陈昌杀害在长沙浏阳门外。陈昌绑赴刑场时，沿途讲演，痛斥国民党反动派之罪行，指出革命最后一定会胜利，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就义前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在场群众无不为之感泣。

李季庸和陈昌同时罹难。

陈昌牺牲时年仅三十六岁。在他短短一生中，为党、为国、为人民做了许多工作，最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虽然牺牲了，但是，他给后人留下的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将与衡山湘水一样，永世长存！

毛泽东得知陈昌被害的消息后，非常悲愤。后来，他在和宋任穷等谈话时，曾经无限深情地谈起过陈昌，赞许陈昌“是个好同志”，“死得很英勇”。对陈昌家属也非常关怀，解放以后，曾多次亲笔写信给陈昌的女儿，要她们好好照料母亲，鼓励她们好好学习和工作。还从自己的工资中寄过数百元给她

们，以为生活补助之资。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和党的抚育之下，陈昌的三个女儿，都已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正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勤奋地劳动着。

作者附记：本文承李维汉、宋任穷、张启龙等同志关怀指导、审阅、修改，编写中参阅的主要资料如下：

1.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
2. 《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第1集、第3集。
3.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5年10月9日）。
4. 毛泽东在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农民代表大会闭幕典礼上的讲话，1926年12月29日《湖南民报》。
5. 《黎锦熙日记》。
6.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7. 《陈昌日记》（1915年12月——1916年5月），存湖南省浏阳县档案馆。
8. 陈昌致毛泽东信（1916年5月，手稿），存湖南省浏阳县档案馆。
9. 《文化书社会务报告》第二期。
10. 姜梦周在湘江学校结业会上的讲演，存长沙清水塘纪念馆。
11. 《水口山矿工人运动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2. 《湖南省志·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3. 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
14. 《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出版。
15.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6. 斯诺：《西行漫记》（第四篇第二章）。
17. 访问易礼容、朱端绶、黄颐、刘立清、汤弼中、杨裕淮、宁柏轩、杜修经、陈新宪、陈云、陈文新、罗立洲、郭一字等谈话记录。

张 太 雷

林 鸿 暖

青 少 年 时 代

张太雷，江苏武进人，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七日生于常州市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他原名张曾让，乳名泰来，学名张复，谱名张孝曾；参加革命后，初名张春木、张椿年，后改张太雷，有把自己化作巨雷，冲破旧社会的反动统治的抱负。

太雷的父亲名亮彩，原住常州城中西下坊，由于家境清贫，长大后，无钱结婚，后被同邑薛锦元招过门当女婿。结婚后一直寄住在岳父家里。太雷是随父母亲在外祖父家出生和长大的。

一九〇一年，太雷的父亲到安源煤矿工作。从此，太雷随父母亲 and 姐姐搬到了江西萍乡，全家生活靠父亲的微薄收入维持。一九〇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他的父亲病故，太雷又随母亲和姐姐迁回常州。为了生活，他的母亲在张绍曾家帮助料理家务，所得工钱，难以维持一家生活，不时要靠亲戚接济或借债度日。太雷由于天资聪颖，张家认为他有培养前途，乃资助他陪同其儿子一起在贞和堂张氏私塾上学，希望他日后能为张家管事。

太雷在张氏私塾念了一年，转入了西郊初等小学。由于他刻苦好学，母亲平常又殷勤管教，所以学习成绩很好。

太雷小时，就爱听父亲讲述一些历史上英雄人物的故事和动人的民间传说。进小学后，课余之暇，仍孜孜不倦地看那些具有反封建思想内容的小说。古老的常州，是江南著名的文化之乡。太雷少年时代，又常听人讲述有关常州地区历史典故和名人故事。宋末万安和尚的抗元斗争事迹（万安牺牲后葬于常州）；明代民族英雄唐荆川抗击倭寇的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太平军中杰出将领护王陈坤书抗击英、法帝国主义和清军联合进攻，坚贞不屈的英勇斗争事迹等等，都强烈地打动了张太雷的心，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①。

太雷从小就对劳动人民有同情感。一天，他和同学们在街上行走，看到一位拉黄包车的工人的帽子被一阵大风吹掉了，连忙跑去把它拾起来，并给那位黄包车工人戴好。一位同学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他拉着车子，停下车来拾帽子很费力，而我这样做是很容易的。”^②

一九一一年冬，太雷在西郊初等小学以优秀的成绩毕业。校长马次立见他是一位有志气的少年，便为他取名张复，以示复兴中华的意思，并资助他考进常州府中学堂（现名江苏省立常州中学）预科学习；翌年，正式转入该校本科一年级三班学习。

太雷进入常州府中学堂的那一年，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举行了辛亥革命。

常州府中学堂的校长屠元博，在日本留学时，就参加了孙

^①转引自澄碧：《长空惊雷》，见《常州古今》（一）。

^②陆静华：《回忆张太雷同志》，见《常州古今》（一）。

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积极参加反对清朝卖国统治的活动。还有几个教员也是日本留学生和同盟会会员。在他们的熏陶下，常州府中学堂当时是进行民主革命宣传和活动的场所。他们常常向学生们宣传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的民主爱国思想，讲述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秋瑾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人的英勇斗争事迹。悲壮的史实，激昂的言词，使太雷和同学们听得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太雷等在校长和老师的影响下，对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活动十分关注。他听到孙中山曾印发邹容十九岁时写的《革命军》，对清朝统治者的残酷压迫给以无情的揭露，同时提出了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国的政治主张后，就立即从图书馆里把《革命军》这本小册子借来，并一口气把它看完。读后，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屠元博在热情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同时，还积极组织学生进行军事训练，打算作反抗清朝统治的武装革命活动。太雷积极地参加这些活动。那时府中学堂学生全部寄宿，有时深夜紧急集合，太雷立刻爬起来，动作迅速地跑去操场参加操练，从不缺勤，而且还鼓励同学们上好军事操练课。

太雷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十分厌恶头上的那条长辫子。在武昌起义前夕，他和同班友好瞿秋白都异口同声地说：“尾巴样的东西，留着它毫无道理，我们剪掉它！”^①表示对清朝反动统治的憎恨，并随即和几位同学一起，带头剪掉了辫子。太雷还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一道，上街进行反对清朝反动统治的宣传。武昌起义爆发后，太雷和老师、同学们闻讯，拿着小旗上街庆祝游行，高呼革命口号。

^①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见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史资料》1979年第1辑。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不久，又从上海乘火车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消息传到常州时，常州军政府组织群众到车站迎送，校长屠元博率领全校师生同往。太雷怀着敬仰孙中山的心情，争着排在队伍的前面。当列车徐徐开进常州车站，孙中山在窗口微笑着向人们频频招手致意时，车站里立刻激起了一片欢呼声、口号声。太雷的心情也十分激动。

在那政治局势瞬息万变的日子里，太雷十分关心国家大事。他一面勤奋学习，努力掌握基础知识；一面注意阅读新的报刊书籍，了解国内外大事，寻求新知。他常到图书馆阅览《民权报》、《民呼报》和上海《申报》等报刊，也读了《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等，还经常和一些好友促膝谈心，议论时政，引吭高歌，抒发胸怀。

一九一三年府中学堂改名省立第五中学，校长屠元博调离学校，新任校长童伯章对学生实行封建管束，要他们一味死读书，不要过问国家大事。太雷和一些好友，对学校当局的管教方式十分不满，因而成为学校当局的管制对象。

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窃国大盗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款，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纷纷起来声讨袁世凯的卖国罪行。太雷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他激愤地向同学们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是要独占中国，灭亡中国，而袁世凯为了要当皇帝，不惜出卖国家主权。”^①江苏省立五中学生自治会举行了反日爱国活动，太雷也积极参加了，与同学们一起，时常到校外作宣传。

^①李子宽：《追忆学生时期之瞿秋白、张太雷两先烈》，见《上海文史资料》第1期。

太雷本来应于一九一五年冬在江苏省立第五中学毕业，但在这年暑假之前，校中发生了一起风潮。毕业班有一名同学叫李子宽，平时曾对个别老师开过玩笑。学校便以此为借口把李开除。该班的同学十分不满学校的做法，迅即举行罢课，表示抗议。太雷平时与李子宽感情融洽，认为学校无理，因此和同学一道，向学校当局提出质问，并举行罢课一星期。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当局又宣称：张复（张太雷）等素行不谨，与李子宽相似，如不悔改，下期毋庸来校。太雷等不堪受辱，遂毅然离校。

一九一五年秋，太雷考入了北京大学法科预科，改名张曾让。但当时北大的学制很长，他估计自己的经济条件难以支持，同年冬，乃转往天津北洋大学法政科临时预备班肄业。

在“五四”洪流中

一九一六年秋，太雷升入北洋大学法科法律学门。由于家道清贫，无法负担读书费用，入学以后，他就一面读书，一面工作。

由于太雷读书勤奋，才华出众，各科成绩很好；尤其英文课程，从中学开始，一贯成绩突出。因此入校后，很快就在该校一位美国教授创办的《华北明星报》担任英文翻译。

一九一七年冬，俄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情赞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太雷看了后深受教育，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和希望，认为要使中国不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控制和压榨，只有走十月革命的路。他每天利用自

修时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并秘密翻译了一些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革命后苏俄新貌的文章。当时，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李子宽，去北洋大学探望张太雷，两人交谈中，太雷坚定地
说：“做人要整个儿改，我以后不到上海当律师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走十月革命的路，才能救中国！”^①

一九一九年，太雷积极地参加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并且成为天津地区爱国运动的骨干之一。他积极参加了北洋大学学生组织的演讲团，经常到天津市内和附近城镇乡村进行宣传活动，揭露反动政府出卖山东权益的罪行，唤醒民众团结御侮。六月一日，他和三位同学赴塘沽两等小学讲演，接着又乘船过海河到八里外的东大沽去演讲，还不辞劳苦，赶到西大沽演讲。他们痛切的言词，革命的激情，使听众十分感动，不少人主动给他们搬凳子，烧茶倒水，对他们说：“先生讲话真对。能一月来一次，使大家永远不忘才好。”在从大沽返回塘沽的路上，他们又在车站附近进行演讲，听众几乎把道路都堵塞了。直到车快开动时，他们才匆忙地跳上火车。听众们依依不舍地目送太雷等人离去^②。

五四运动的怒涛，猛烈地冲击着北洋军阀政府。六月五日，直隶省省长曹锐悍然派兵镇压天津学生运动，监视学生爱国活动。对于反动当局的蛮横镇压，北洋大学爱国学生异常激愤，决定冲出学校，出外演讲。六月二十四日，天津各界联合会与学生联合会密切合作，成立了抵制日货委员会，举行抵制日货活动。太雷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该会，积极和同学们到

①李子宽：《追忆学生时期之瞿秋白、张太雷两先烈》，见《上海文史资料》第1期。

②转引自《张太雷》，见《革命文物》1980年第6期。

各店铺，对商标、包装、品种逐项检查，有时还拿上煤油灯，深入仓库进行检查。在斗争中，太雷被选为天津学生的联合决策机构——评议会的评议长，负责主持斗争的部署和策略事宜。

八月二十三日，天津的四十多名群众代表组成请愿团，和北京代表一起，在北京新华门前请愿，抗议山东惨案，要求惩办枪杀爱国人民的刽子手马良，以平民愤。结果有二十五名代表遭到北洋军阀政府逮捕。消息传到天津，天津学生联合会决定立即组织数百人的代表团分批赴京营救。太雷被选为赴京营救代表之一^①，冲破反动当局的层层阻挠，和同学们到了北京，与北京的三千多青年学生汇合一道，浩浩荡荡地到北洋军阀的总统府请愿。张太雷和同学们表示：“如果需要，我们可以随时抛头颅，洒热血，决不迟疑！”在广大群众的坚持斗争下，在各界人士的努力营救下，终于迫使反动军阀释放了全部被捕代表。

同年十二月，天津男、女学校学生合组的新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太雷被选为该会演讲委员会筹备委员。

通过五四爱国运动的斗争实践，张太雷进一步认识了人民群众团结战斗的巨大威力，并与景仰已久的李大钊建立了联系，同时与天津爱国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周恩来、于方舟等，开始结下了战斗的情谊。

参加党的创建工作

五四运动和反帝爱国斗争，打击和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北洋

^①访问李子宽记录。

军阀政府的阴谋，教育和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同时，也显示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五四运动后，宣传和介绍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书刊、文章，纷纷出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特别是在革命知识界中，日益广泛传播开来，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许多进步青年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各种社会主义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一九二〇年四月，共产国际东方局派魏金斯基和杨明斋来到中国，会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了解中国政治情况。他们通过北京大学俄文教授鲍立维的介绍，与李大钊等会晤。接着，又到上海访问了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人，和他们进行过几次座谈，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实际情况和对外政策；讨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这些活动，张太雷都积极参加，并在会见中担任他们的英语翻译。嗣后，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等人，在上海发起建立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推选陈独秀为书记。它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

六月，太雷在北洋大学法科法律学门毕业后，前往上海；八月，与俞秀松等一些向往十月革命的青年，发起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上海期间，他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活动。回到天津后，和于方舟（于兰渚）分别在天津北洋大学和省立中学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活动。

同年九月中旬，继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以后，李大钊发起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其成员以北京大学的师生为主。十月，张太雷和邓中夏、高尚德（高君宇）、何孟雄等先后加入了该

组。^①

太雷参加北京共产党小组后，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去天津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首先把他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不久，于兰渚主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并入该组，成员增加到十余人，太雷是该小组的书记。

青年团小组成立后，即在天津、唐山、南口、长辛店等地开展工人运动，并出版了小型日刊《劳报》，以研究工人问题及进行宣传。他们还把《共产党宣言》、上海共产党组织出版的《共产党》月刊，以及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印成单行本，分送给各地工人。《劳报》创刊不久，即被北洋军阀查封。

为了继续开展工人运动，太雷把该报改名《来报》继续出版，后来又被军阀发现，连该报的发行人也遭逮捕，最后被迫停刊。

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还曾派人到唐山和京奉铁路机车厂与工人邓培等联系，研究如何在工人中开展工作以及建立组织等问题。不久，唐山等地的团组织就相继成立，工人运动也逐步开展起来。

一九二〇年冬，北京共产党小组为了进一步在工人中开展宣传、组织活动，决定在长辛店创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作为开展工人运动的据点。太雷接受了这一任务，与邓中夏等人多次到长辛店找一些工人积极分子商谈。十二月十九日，劳动补习学校在长辛店正式召开了筹办会议，张太雷和邓中夏等四人出席，讨论了学校的简章、预算案和募捐启事，并确定一九二

^①访问王一知和罗章龙的记录。

一年元旦开学^①。

劳动补习学校的教学内容，注意把提高工人文化水平与传播革命思想结合起来。识字课本是由教员自己编写的，他们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用字编成课文，讲课时先教识字，再讲道理，使工人既能学到文化知识，又能学到革命思想。劳动补习学校创办后，李大钊、张太雷、邓中夏等经常到这里来讲课。太雷讲课生动，感情充沛，又了解工人的思想特点，善于启发工人的觉悟；他联系修路、盖房、织布、造机器等日常现象，讲解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揭露军阀、资本家如何榨取工人的血汗，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生产社会财富的劳动人民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最后，又讲到工人团结起来斗争的重要性。这些深入浅出的道理，工人们一听就明白，阶级觉悟因而迅速提高，表示要学俄国工农的榜样，团结起来闹革命，把地主、资本家、洋厂长、总管统统打倒，由咱们工人当国家的主人。

李大钊、张太雷、邓中夏还经常深入到工人家里去访问，了解工人生活情况。他们不怕生活艰苦，和工人一同吃窝窝头、睡土炕。他们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七块钱，但他们只吃三块钱的伙食，省下的几块钱拿来买茶叶、糖果，招待前来谈心的工人们。这种精神使工人很为感动，因而很快和工人打成一片。

由于李大钊、张太雷、邓中夏等人的辛勤劳动，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并通过他们逐步将长辛店全体工人团结起来，成立了长辛店铁路工会。在这年五一节的庆祝

^①心美（邓中夏）：《长辛店旅行一日记》，见1920年12月21日北京《晨报》。

大会上，还宣布成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工人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了。

派往共产国际的使者

一九二一年春，太雷受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委托，赴俄国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东方局任中国科的书记，从事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工作，向中国共产党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并以共产国际工作人员身份从事共产国际组织局委派的工作。这是第一个被派赴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人。

一九二一年五月，朝鲜共产党在伊尔库茨克举行建党大会，太雷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向大会致辞^①。

为了筹建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一年六月，太雷陪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洛斯基来到中国。他们先到北京同李大钊、张国焘等会谈了几次。马林建议召集一个全国性的建党会议，李大钊同意这个建议，但他因为工作关系，不能离开北京，即由张太雷和张国焘陪同马林等到上海与李达、李汉俊会谈。经过反复的商议，大家同意召开一个全国性的建党会议；同时致函湖南、武汉、广州、山东和日本等地的共产党组织，征询他们的意见。经过多次函商，最后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张太雷并为大会筹备组翻译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宣言》草案的文件，提交马

^①达林：《中国回忆录》第3章。

林进行修改。^①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张太雷受党的委托，出席了这次会议^②。这是以中国共产党代表身份出现于共产国际会议的第一个使者，他参照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草拟了一份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七月十二日，在大会结束的一天，太雷在会上作了发言，介绍了中国革命情况，呼吁共产国际重视和支持中国革命。

八月，太雷从俄国回到中国，继续担任马林的翻译。当时陈独秀已辞去了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回到上海，马林和陈独秀进行了两次会谈，都由太雷担任翻译。会谈中，马林提议中国共产党应该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还建议中国共产党应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陈独秀对这些意见初时表示拒绝。太雷认为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整体，应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活动，因此中国共产党应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表示支持马林的观点^③；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党，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不必接受别人的任何经济援助。不久，陈独秀的住宅被法国巡捕查抄，陈独秀等五人因有“过激主义”的嫌疑被捕。事情发生后，马林和太雷积极设法营救。几天后，陈独秀等被保释出来。经过太雷的努力，马林与陈独秀之间的了解加深，彼此之间的意见渐趋一致，最后确定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篇第6章。

②舒米亚茨基：《纪念中国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同志》，见《革命的东方》，1928年第4—5期。

③包惠僧：《回忆张太雷》，见《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

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太雷还陪同马林和陈独秀讨论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初步决定了在民主革命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方案，由马林出面与孙中山进行初步商谈。

为了对抗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结束后，即决定召开一次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以显示远东民族革命力量的强大，向帝国主义示威。太雷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和各国革命活动家共同负责草拟召开大会的方案；太雷还负责起草了要求亚洲各国民族的革命组织选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的呼吁书。当时有些人对邀请的代表范围有分歧，一些人主张召开远东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代表大会；太雷和另一些人则主张扩大范围，邀请中国、朝鲜、日本和爪哇等远东国家的所有革命组织，包括民族主义的组织都能选派代表参加，以显示代表的广泛性。争论结果，最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采纳了太雷等人的意见，决定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大会。

大会筹备期间，太雷负责与中国、日本的革命组织联系，选派以及组织代表到俄国参加会议等工作。一九二一年八月，太雷曾作为共产国际密使，前往日本，与该国的革命组织取得联系，圆满地完成了使命。返回中国后，又到各城市去邀请有关革命团体选派代表出席会议。

当时整个俄国都被帝国主义的封锁线包围着，参加会议的日本等国的代表赴会，要经过中国。而当时中国的东北是由军阀张作霖统治着。太雷对于代表们越境路线，秘密接头地点，如何乔装打扮，都作了仔细的调查研究，细心布置，因而使得

代表们往返都能安全通过。

在中俄边境附近负责接待代表的列车上，住着一批中国、朝鲜、日本等国的代表。他们中既有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也有民族主义者的代表。路上，张国焘坚持只有相信共产主义的人才能前往参加，因此在车上和一些民族主义者的代表争论不休，叫嚷不许他们参加会议。太雷做了耐心的调解工作，才使争论平息下来。

十二月十日，太雷还把他日前翻译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由英文回译成中文，并写了译者的说明，发给了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中的共产主义者组织讨论。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在俄国伊尔库茨克召开。参加会议的五十四名中国代表中，除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外，还有国民党员、民族主义者和革命知识分子十余人。张太雷则以大会筹备者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

大会开幕后不久，就迁到莫斯科继续举行。代表们抵莫斯科后，共产国际书记处又有些人想重新变大会为远东各国共产党人的大会，把民族主义者排除会外，因而又产生了分歧。列宁采纳了太雷等人的意见，决定大会仍然是民族革命性质，从而使大会得以继续进行。

太雷在这次会议中表现了充沛的精力和卓越的组织能力。他参与了大会宣言《告东方各民族书》的起草工作。会议期间，他还介绍瞿秋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会后，一九二二年二三月间，赤色职工国际成立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相继在莫斯科召开。太雷又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了这两次大会，并当选为青年共产国

际的执行委员^①。

太雷参加了上述几个会议后返回上海。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太雷和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列席了会议，并将列宁对中国革命所作的重要指示以及大会精神，向党的“二大”作了汇报。

为建设社会主义青年团而奋斗

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初建期间，团员成分很复杂，除了少数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信仰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工团主义以及各种社会思潮的人。不少人参加团的动机很不纯，有些是怀着好奇的心理，有些则是赶“时髦”。加以团的性质和任务也不够明确，所以一遇问题，各人意见就不一致。团的组织和纪律涣散，缺乏战斗力。因此，各地团组织的活动，到一九二一年五月，就先后陷于停顿。

一九二一年八月，太雷从俄国回来时，曾与邓中夏、俞秀松等积极从事团的建设工作。他们四出宣传，积极团结那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争取教育那些认识模糊、动摇不定的青年，让那些坚决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离开团组织，团员重新进行了登记。经过太雷等人的努力，至一九二一年底，各地团的组织就渐渐健全起来。要求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青年也日益增多，北京、天津、太原、上海、湖南、湖北、广东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团的组织。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

①刘仁静：《回忆社会主义青年团》。

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统一领导各地团的工作以及青年运动，是非常必要的。

一九二一年底，太雷陪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桂林与孙中山会谈时，往返都经过广州。当时香港海员工人正举行震惊中外的大罢工。很多青年海员工人在海员工会领导下，团结一致，积极投入罢工斗争，表现得十分英勇。当时广州各界青年组织举办的各种活动也十分活跃。这些情景，给太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到上海后，就积极向中央局建议，提出“把这些地方性组织联合在一起，就可创建出一个有影响的青年组织。”^①中央局接受了太雷的意见，准备在广州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

一九二二年三月，太雷从俄国回来后，一方面和向警予等领导上海丝厂、烟厂、纱厂的女工同盟罢工，一方面受中央局的委托，与瞿秋白以及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组成大会组织处，负责筹备青年团“一大”的召开。他们积极与各地团的组织联系，酝酿选派代表，研究会议内容，并为大会草拟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草案。四月，太雷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到北京领导团组织开展非基督教活动后，就与瞿秋白和达林一起到广州，随即参加了中央局在广州召集的讨论有关第一次劳动大会和青年团大会的方针以及国共合作问题的党团负责干部会议。会上，关于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太雷和瞿秋白认为：“在反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与小资产阶级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和国民党联合以及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都是必要的。”会后，太雷和瞿秋白

^①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

还随达林拜会了孙中山。^①

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至十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二十五人，代表着全国各地十五个地方团组织、五千多名团员。会议由张太雷主持，他向大会致开幕词，还代表组织处向大会作了团纲和团章草案报告。大会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以来第一个团纲和团章。团的纲领和章程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性质是“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即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它的任务，“一方面为改良青年工人、农人的生活状况而奋斗，并为青年妇女、青年学生的利益而奋斗；一方面养成青年革命的精神，使向为解放一般无产阶级而奋斗的路上走。”在政治方面，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任务，要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在中国实现初期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同时，还明确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

大会还一致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青年共产国际组织，在青年共产国际旗帜之下，使西方青年无产阶级与东方被压迫青年群众联合起来。

会上，成立了团的中央组织，选举了施存统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太雷当时因致力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选为团的中央委员。

在举行团的“一大”之前，太雷（当时叫张椿年）还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了于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至五日在广州举行的

^①达林：《中国回忆录》第9、10章。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向大会致贺词，高度赞扬了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下进行斗争取得的成绩；对不久前举行的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给予高度的评价；还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表示坚决支持工人阶级的斗争。

在广州期间，五月二十八日晚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发生军人枪杀中国工人事件，激起了广州人民的愤慨，纷纷声讨这一暴行。太雷积极参加这一活动，为青年团草拟了一篇声讨葡政府的檄文，还出席了团广东区委组织的集会。

为了进一步发动广大青年，积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一九二三年八月，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张太雷、恽代英、邓中夏等参加并主持了大会。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贯彻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关于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问题。太雷在会上传达了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同时，对团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要求全体团员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大革命的洪流，充分发挥战斗作用。

会议完全接受党的“三大”通过的《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努力协助党进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宣传，以促进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决议案》等文件，并修改了团章，使团的组织和纪律更趋完善。

会上，太雷当选为团的中央常务委员，负责团中央日常工作。

团的“二大”结束不久，太雷接受党的派遣，参加孙逸仙（中山）博士代表团到俄国考察。^①一九二三年十月，青年共产国际

^①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由蒋介石、王登云、沈定一和张太雷组成，孙中山本人未去。

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太雷继续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后，奉中央局的指派，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期间，一九二四年一月，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太雷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在莫斯科工会大厦瞻仰了列宁遗容，参加了列宁的葬仪，并在苏联报纸上发表了《列宁与中国青年》一文，高度赞扬列宁的伟大业绩以及在中国青年学生心目中的伟大形象。

一九二四年春，在大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刻，太雷奉调回国。当时团的中央书记刘仁静因犯错误辞职，太雷接任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①三月，他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团的中央扩大会议，根据当时革命形势，调整和制定了团的行动纲领和策略，并根据青年的特点，特别提出了注意青年本身利益的口号，积极动员全国的团员和青年，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同年四月，太雷再次赴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他在会上发了言，并向俄国少年先锋队致词。会议期间，太雷还会见了俄国《青年建设者》杂志和莫斯科《工人日报》的青年记者马克西莫夫。五月一日，又在莫斯科《工人日报》题词，指出：“俄国的十月革命唤醒了中国工人的觉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要宣誓用全部精力来继续列宁所开创的事业，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世界无产阶级。”^②

为了积极组织广大革命青年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举行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太雷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为大会作了政

^①刘仁静：《回忆社会主义青年团》。

^②马克西莫夫：《张太雷谈列宁》，见《苏中友好》1958年第16期。

治报告，向全国广大团员和青年提出了战斗任务，号召他们积极投入当前全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之中，积极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军阀勾结发动战争的罪恶目的，号召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向帝国主义和军阀进行大示威，以遏制他们的阴谋。

这次大会决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仍选举张太雷为团中央书记，兼妇女部长^①。

太雷对于团的建设和领导广大青年争取民族解放事业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不愧为广大革命青年的引路人。

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奔忙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始终坚持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立场，不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就在这时，孙中山得到了共产党人的帮助，从此开始了他的伟大转变。

一九二〇年秋天，共产国际派来的魏金斯基，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这是共产国际同孙中山的第一次接触。一九二一年冬，共产国际派来的马林，又同孙中山交谈了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

当时，太雷已从俄国回到上海，受党的委托，担任马林的助手和翻译。十二月十日，太雷随同马林和国民党的张继，由上海到广州会见孙中山，但孙中山此时已经转往桂林。

马林和太雷在广州会见了广东省省长陈炯明。接着，张继又邀集陈公博同马林、张太雷，就国共建立统一战线问题，进行了几次会谈。张继提出：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党既然固是革

^①1925年春张太雷调广州工作后，团中央书记由任弼时代理。

命党，可以进行合并。但马林强调两党合并后，共产党作为一个独立政党依然存在，而不是解散。陈公博则说：“国民党的主义和共产党的主义究竟不同，今日即合，终久必分，与其将来分裂，倒不如各行其是，只在党外合作。”他还认为国共合作“只是一种旁门左道，而非正当革命的方法。”^① 太雷积极支持马林的意见。各人观点很不一致。

马林和太雷在广州没有久停，便在张继等人的陪同下，于十二月二十三日抵达桂林。

那时候，孙中山在桂林独秀峰下旧桂王府设立了大本营，正在进行整军和练兵，准备由桂入湘进行北伐。马林和太雷抵桂林后，在本营住了九天，朝夕和孙中山、廖仲恺等人进行会谈，讨论国民党与俄国建立联盟以及国共合作的可能性。在整个会谈过程中，都由太雷担任翻译。他帮助马林和孙中山交谈，帮助孙中山了解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沟通他们的感情，从中起了积极的作用，成为他们两人的得力助手。

会谈时，马林同孙中山讨论了群众运动和在工人中进行宣传的问题。关于中国革命问题，马林提出了下列意见：（一）改组国民党，与社会各阶层，尤其与农民、劳工大众联合；（二）创立军官学校，以建立革命的基础；（三）促进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②。

孙中山告诉马林，他愿意派一个代表团作为使者去莫斯科进行考察；对于马林所提出的其他建议，如改组国民党、建立军官学校等，也答应在完成反对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后，立即实行。

^①陈公博：《我与共产党》，见《古今半月刊》第35期。

^②《孙中山与马林会谈纪要》，见《蒋介石秘录》。

孙中山还专门同张太雷长时间地讨论了如何动员我国广大青年，积极投入民族主义运动的问题。太雷主张把广大青年发动起来，动员他们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孙中山很欣赏太雷的主张，表示完全支持，愿意和共产党合作，并希望先把南方各省的青年动员起来，投入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太雷和孙中山之间的谈话非常融洽。

会谈后，马林和太雷回到广州。他们在广州见到了香港海员罢工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情景，以及广州各界群众举行的一系列政治活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①。他们还参加了广州青年的一些集会，然后从陆路经汕头，坐船回到上海。

一九二二年六月，广东军阀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炮轰设在广州越秀山下的总统府，迫使孙中山离开广东。孙中山到达上海后，李大钊、陈独秀、张太雷和马林等多次同他会见，提出国共合作的主张。正处于困难境况之中的孙中山，对共产党的真诚帮助深表快慰，立即赞成国共合作。

中共中央为了加速与孙中山建立联合战线，一面声明中国共产党将不因孙中山所受到的暂时挫折而改变与其合作的原有立场，一面指派张太雷赴广州，代表中央调查处理陈公博等人支持军阀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的错误，要他们迅速转变立场，断绝与陈炯明的一切关系，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但陈公博等人坚持其顽固立场，太雷的任务没能完成。

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指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命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会

^①马林：《访问中国南方的革命家》，见1922年9月7日苏联《真理报》，王福曾译。

后，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在杭州举行中央全会，商讨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太雷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他以陪同马林参加桂林会谈的亲身体会，肯定孙中山的积极表现，主张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以建立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会议经过两天的争论，原则上确定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方针，通过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决议。

会后，张太雷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在上海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

同年九月四日，孙中山约集各省在沪的党员座谈改组国民党党务问题，张太雷和陈独秀均应邀参加。座谈中，太雷积极主张国共合作。

一九二三年夏，太雷在上海大学教书。同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我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太雷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出席了大会。

会上，太雷积极赞成关于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针。他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故应与资产阶级联合”，共产党人“目前应加入国民党，作为国民党的骨干力量。”^①他分析了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主主义立场，以及把他领导的国民党改造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可能性，坚持共产党同国民党结成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经过充分讨论，大会最后决定和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

^①蔡和森：《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提纲)》(1926年)。

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改组。会上，太雷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并受大会委托，草拟了《青年运动决议案》，提出青年运动为本党重要工作之一。

中共“三大”以后，孙中山在上海筹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政治、军事及党务，同时就苏联援助问题进行谈判。代表团成员分别由国共两党人员共四人组成。张太雷是共产党代表之一。八月十六日，他们从上海乘日轮“神丸号”出发，于九月二日抵达莫斯科，先后会晤了苏联党、政、军各方的领导人，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进行了考察，并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举行了会谈，签署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民党的援助协议，聘请苏联的政治和军事顾问来广州帮助中国革命。当时，太雷曾专门向孙中山写了一份报告，介绍了代表团在苏联的活动情况。

一九二四年春，张太雷从苏联回国接任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总书记后，同年下半年，他还在国共合作创办的上海《民国日报》工作，担任主笔兼社论委员会的委员。他办事非常认真，每晚工作至深夜，直到看完大样才回家。太雷除了为该报起草社论外，又经常以“泰雷”、“大雷”等笔名，为《向导》周报和《中国青年》撰写文章，还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以《马克思政治学》为题，连续发表了列宁所著《国家与革命》一书的第一章中译文，传播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五年一月，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太雷出席了大会，继续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会后，他被派到广州，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任苏联顾问鲍罗庭的翻译。太雷和鲍罗庭工作、生活在一起，成为他的得力助手。

鲍罗庭的办公室设在广州东较场附近的一所二层楼的小洋

房里。鲍罗庭和军事顾问团住在楼上，太雷住在楼下。楼下还设有一个翻译室，也归太雷负责。日间，国民党以及各方面人士川流不息地来到办公处找鲍罗庭商量问题。这些活动事前都由太雷负责安排，谈话时他也在场担任翻译。当时在广州地区工作的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陈延年等共产党人，也经常在与张太雷的陪同下，与鲍罗庭就中国革命问题交换意见。鲍罗庭还经常出席各种会议，或向群众发表演说，这些活动也多由太雷陪同前往，担任翻译。有时，鲍罗庭对我国的一些具体问题或情况不熟悉，也主动找太雷商量。因此太雷的工作是十分繁忙紧张的。但他总以饱满的情绪，很高的工作效率，出色地完成任任务，对促进革命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广东区委的战斗岁月

张太雷在担任鲍罗庭顾问的翻译和助手的同时，一九二五年秋，还兼任了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宣传部长。他在负责广东区委宣传部工作期间，经常同邓中夏、陈延年、苏兆征等分析省港罢工形势，研究斗争策略；还经常受区委的委托草拟党的各项文件，编写各项运动或中心任务的宣传材料，主编区委的机关刊物《人民周刊》。

《人民周刊》创办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十日，先后出版了五十期，其中创刊号至第二十九期，是太雷负责主编的。该刊向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及时揭露与打击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各种阴谋，对指导与推动广东工农群众运动和北伐进军，起了重要作用。张太雷还经常以“木”、“大”、“雷”、“大雷”、“泰雷”、“春木”、“太侔”、“之

椿”、“椿”等笔名，在《人民周刊》、《政治周报》和《革命青年》等刊物发表文章。从《人民周刊》创刊起至一九二六年十月止，太雷在该刊共发表了七十多篇评论文章。他以精辟的道理，通俗的语言，针对当时国际国内情况，宣传马列主义，揭发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军阀势力互相勾结的罪恶行径，教育和鼓动广大群众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

张太雷还是党的一位宣传鼓动家，常以各种身份到群众中去演讲。广州东较场、广东省农会、广东大学、第一公园、广东区委以及黄埔军校等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当时，党为了培养革命干部，举办了各种讲习班和训练班，聘请党内负责同志或社会名流担任讲课，太雷就是其中的一个。一九二五年夏，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举办团员训练班，聘请太雷在该班讲授《少年国际》、《第三国际》、《C Y 与 CP》等课程^①。同年冬，太雷受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办的政治讲习班里讲授《世界政治经济状况》，每周两小时^②。一九二六年二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办了广东省青年训育员养成所，培训宣传人员，太雷在该班讲授《民族问题》^③。三月二十三日，中共广东区委举办第二期干部训练班，太雷又在该班讲授《目前时局与党的策略》。五月，毛泽东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农民运动干部，太雷也被聘为教员，讲授《中国革命问题》。

太雷在广东区委一年多的战斗岁月里，还对帝国主义和国

①广校教务长黄居仁《给中央的特别报告》第6号（1925年8月21日）。

②《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教授一览表》。

③《国民党广东省党务月刊》，1926年2月出版。

民党右派的阴谋破坏，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英帝国主义的授意下，粤海关税务司贝尔（英国人）借口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扣留未经海关查验之八船货物，妨碍其职务之行使，悍然制造了封闭粤海关事件，以达到其破坏罢工的目的。英帝国主义这一阴谋，激起了广东以至全国各地人民的愤慨与抗议。太雷于二月二十五日在广东区委举办的党员训练班上作政治报告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粤海关税务司停止验货是英帝国主义有阴谋、有目的地破坏省港罢工的伎俩。”^①他还发表评论，指出：“应该认清税务司此次举动是香港破坏罢工的把戏，我们应一致起来抗议香港此种卑下的诡计”^②，提出“我们更当团结一致，进行撤换税务司与收回海关管理权之运动。”^③贝尔慑于广大人民的坚决反对，只得于二月二十六日重开粤海关。这是广州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反革命的“中山舰事件”，这是资产阶级新右派对革命力量发动进攻的一个信号。

对于“中山舰事件”的发生，太雷表现得十分沉着冷静。事件发生当晚，他果断地对爱人说：“这里面有鬼！”^④当毛泽东、陈延年、张太雷以及苏联军事参谋团就“中山舰事件”交换意见，商讨对策时，太雷对毛泽东提出的以武力进行回击

^①广东区委举办的党员训练班学员李羽吉的笔记。

^②太雷：《抗议粤海关停止验货起卸》，《人民周刊》第3期，1926年2月24日出版。

^③太雷：《海关问题发生之各方面》，《人民周刊》第4期，1926年3月4日出版。

^④访问王一知谈话记录，（1973年1月13日）。

的主张十分同意。他还提议把工农武装起来，组织十万工农群众，以革命武装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进攻^①。

为了阐明共产党人对“中山舰事件”的态度，太雷受广东区委的委托，草拟了一封揭露国民党右派通过制造“中山舰事件”，阴谋陷害共产党的《公开信》。《公开信》郑重声明：共产党决心“与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地主劣绅、贪官污吏奋斗”，“共产党决计不因为敌人的造谣而放弃他革命的工作。”《公开信》还深刻揭露：“帝国主义、反革命派对于共产党这一种的造谣是分裂国民革命的势力，破坏国民党，推翻国民政府，危害广东和平的一种阴谋。”^②它的发表，给予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

但是，毛泽东、张太雷等人的正确主张，却为陈独秀所拒绝。他坚持其右的错误的退让政策，胡说“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广州同志们的左倾错误所引起的”，从而更加助长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

五月十五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进一步限制和打击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领导地位。

对于蒋介石这一得寸进尺的反革命阴谋，毛泽东、邓颖超以及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都表示反对^③。广东区委的领导人对此同样表示无限激愤。五月下旬，在区委的一次会议上，区委书记陈延年指出蒋介石是个政治骗子，他极力

①访王一知谈话记录，（1973年1月13日）。

②中共广东区委：《给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两广人民的一封公开信》，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21日。

③《邓颖超访问广东区委旧址时的回忆》，（1971年8月11日）。

想捞取政治资本，野心勃勃地搞他自己的打算，主张对他给予坚决的回击^①。张太雷也说：“我们除了目前的联合战线以外，总应有自己的打算。蒋介石和国民党迟早是要同我们分家的。”^②

为了揭露蒋介石制造的一系列反革命阴谋，五月二十六日，太雷发表了《反动派在广东之活动》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的发生，“很显而易见的就是那班已开除与未开除的反动派所造成的，他们趁了全国现时反动势力高涨的时候，想把革命基础断送。”^③六月上旬，他又发表《到底要不要国民党？》的文章，指出：“是否五月十五日的‘整理党务案’能解决党内反共产党的纠纷，而因此维持这革命的结合呢？或者将由此而更进一步驱逐共产分子，以破坏这革命的结合呢？这是现在个个革命党人所最忧虑的，而希望得到一个确定的回答。”“我们可以说，攻击共产分子不是共产分子的问题，而是国民党生死的问题。是整个儿国民革命的问题。如果那个革命同志不相信这话，历史事实自能强迫你相信这话。”太雷在文章中还提醒大家：“如果国民党党员、一切革命分子及人民，不起来防止这种阴谋的实现，我们只能看见革命的结合破坏，国民党的势力衰落。”^④

太雷的文章，打中了蒋介石的要害，蒋介石对此怀恨在心。六月二十八日，他在黄埔军校的一次纪念周上对学生讲话时，乘机对太雷的文章进行攻击，说什么“引起两党恶感是不

①郭瘦真的回忆，（1973年7月13日）。

②包惠僧：《回忆张太雷》，《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

③大：《反动派在广东之活动》，《人民周刊》第12、13期合刊，1926年5月26日出版。

④太雷：《到底要不要国民党》，《人民周刊》第14期，1926年6月10日出版。

行的”^①。太雷对蒋介石的挑衅，立即发表了一个声明，批驳了他的攻击，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指出：“共产分子问题是政策问题，不是组织问题，不是一个党员人数的问题，而是左派或右派在党内掌权的问题。”^②进一步揭穿了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

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全国的政治、军事重心北移。十一月十六日，太雷随同苏联顾问鲍罗庭以及国民政府委员宋庆龄等以国民党中央暨国民政府代表团的名义离开广州，从陆路经江西南昌、九江，然后坐船到武汉，负责筹备国民政府迁都事宜。途中，十二月七日，太雷、鲍罗庭等人专程到庐山，与蒋介石商谈国民政府迁都问题。

北伐初期，蒋介石害怕广州的工农革命力量，曾提议一俟北伐军攻克武汉，就把国民政府迁往那里。现在蒋介石却又自食其言，提出异议，反对迁都武汉。他进驻南昌后，把南昌作为国民党新右派的巢穴，聚集了张静江等一批右派，积极与帝国主义眉来眼去，策划反革命阴谋。商谈时，蒋介石借口定都问题应以战略与军事发展来决定，而目前长江下游的军事正在进行，坚持国民政府暂设南昌，并声言俟南京光复后，再依照孙中山生前意见，建都南京。张太雷和鲍罗庭等人极力主张应按照十月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的决定迁都武汉。谈判没有结果。太雷等遂由九江坐船，于十二月十日抵达武汉。此后，他便留在武汉，一方面继续担任鲍罗庭的助手，一方面积极参加领导湖北革命群众运动的活动。

① <总理纪念周训词>；见 <蒋校长演讲集>，黄埔军校出版。

② 太雷：<关于蒋介石同志对 <要不要国民党> 误会之解释>；<人民周刊> 第 18 期，1926 年 8 月 12 日出版。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由于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助长了隐藏在革命营垒中的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反革命气焰。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叛变；接着，在全国各地又进行了大屠杀。刹那间，中国大地上乌云翻滚，山河变色。

为了总结过去的斗争经验，制定党今后的方针、任务，挽救革命危机，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党在武昌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太雷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上，他和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李立三、任弼时等一起，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领导，支持毛泽东关于进行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武装的正确主张，还与其他代表一起酝酿，不选陈独秀当总书记^①。但是，大会在陈独秀的控制下，拒绝讨论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等人提出的正确意见。结果，会议没能解决在革命危急关头指导革命的正确方针。张太雷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中央委员。

蒋介石公开叛变后，汪精卫集团也加紧反共活动，并和蒋介石勾结，阴谋叛变。在这关键的时刻，担任湖北区委书记职务的张太雷，不畏困难，坚定地面对逆流，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当时，党组织已经不能公开活动，太雷夜以继日地处理纷繁的事务，和周恩来等加紧部署应变的各种准备工作，安排党员的撤离，将一些政治面貌已经暴露的同志分别实行隐蔽、转

^① <访问黄平资料> 以及王一知：<张太雷烈士传略>。

移，或把一些干部派往贺龙、叶挺部队，去掌握武装工农力量，准备对抗国民党的反动压迫；同时，又安排一些政治面貌没有暴露的干部坚持下来工作。

太雷还在百忙中挤出时间撰写文章，对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战斗。六月五日，他发表了《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一文，尖锐地批驳那些官僚政客、地主豪绅散布的所谓工农运动造成蒋介石叛变与武汉政府困难的谬论，指出：“困迫武汉革命政府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大资产阶级的阴谋”，“假使我们现时看见反革命势力浩大及革命势力无组织，我们就忘记了抵抗反革命，或竟转而拆散自己队伍，长反动派之气焰，在客观上便是满足敌人的愿望，这便是革命的危机。”文章强调要支持农民“继续进行打倒劣绅土豪的运动”，“给农民政权以法律上的保障”，“帮助农民武装起来，以保卫自己。”^①太雷还经常提醒大家：“暴风雨来了，我们要随时准备应变。”^②

六月二十八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时局问题，太雷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提出，敌人可能会耍出“马日事变”同一把戏，对我们党发动进攻，因此我们一定要及早预防。与会同志认真考虑了太雷的意见，为了安全起见，决定将中央机关由汉口迁至武昌湖上园，湖北区委也同时迁至武昌胭脂山嘴楼巷二号办公。

七月一日，党中央在汉口继续开会，陈独秀被反革命势力表面上的强大所吓倒，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他在会上顽固地拒绝检查他的机会主义错误，继续坚持其右倾投降论调。周恩来、张太雷、瞿秋白等相继在会上斥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

^①太雷：《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问题》，《向导》周报第197期。

^②王一知：《忆太雷》。

的错误及其对于中国革命所带来的损失。在大家的坚持下，会议最后作出了与汪精卫把持的武汉政府实行决裂的决议。

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党，七月十日前后，中央政治局断然进行改组，撤除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由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张国焘等人组成中央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负责“召集全党紧急的正式会议，以审查旧政策及旧指导机关，以决定新的政策。”^①

七月十三日，中央常务委员会于汉口召开秘密的紧急会议，分析政治、军事形势。鉴于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汪精卫和蒋介石已联合起来，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因此我们决不能束手待毙。另一方面，敌人的血腥屠杀，并没有把革命镇压下去，湘、鄂、赣、粤等省的工人和农民，仍不断地和反动派作殊死的斗争，并且局部地区如广东的海陆丰等地已发生了武装斗争。据此，会议作出决定：（一）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暴动；（二）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中，发动军事暴动，地点在九江、南昌一带；（三）迅速召开党的扩大紧急会议。会议还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布从即日起退出国民政府，痛斥汪精卫反动集团继蒋介石反动集团之后叛变革命的罪行。宣言并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决心要推翻反动政权，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②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集团继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正式和共产党决裂，公开叛变革命，并与蒋介石合流，大肆逮捕与通缉共产党人（太雷也被列入通缉名单之列）^③。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

① 《中央紧急会议小引》，（1927年8月7日）。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向导》周报第201期。

③ 《国民政府通缉共产党首要令》，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下）第635页。

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屠杀政策下，到处弥漫着白色恐怖气氛。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大革命失败后，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太雷毫无惧色，对革命前途始终充满着信心。他面迎逆流，排除恶浪，以钢铁一般的意志表示：“无论怎样，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的失败只是暂时的。”^①

这时，党中央与湖北区委已全部转入了地下斗争。太雷也从武昌湖上园迁往附近的老百姓家里去住。他日以继夜地战斗着，并积极组织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迅速向九江、南昌转移，准备参加起义。七月中旬，他还秘密赶往庐山，在那里邀集几位中央委员听取了汇报，了解了武装起义的准备情况。

七月下旬，太雷和瞿秋白从庐山回到武汉，同在武汉的中央常委李维汉以及共产国际新来的代表罗明纳滋一起进行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准备工作的。七月二十八日，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筹备召集党的紧急扩大会议问题。会议要求各地区迅速选派代表来汉，共商当前革命决策。会议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告国民党同志书》，号召国民党党员及一般民众起来，反对背叛革命的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

八月三日，中央常务委员会继续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紧急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张太雷和李维汉在会上报告了与国际代表谈话结果，并讨论了改组中央的问题。

八月七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

^①王一知：《忆太雷》。

的右倾严重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太雷出席了紧急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为了加强对广东、广西以及闽南等地（包括南洋一带）的武装斗争和政治军事工作的领导，八月十一日，决定任命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彭湃、恽代英、黄平和陈权等组成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张国焘任书记。南方局设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兼主任，并调张太雷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在周恩来等到职以前，由张太雷、杨殷、黄平组织临时的南方局，负责准备并指导上述区域内之暴动及一切政治军事事宜^①。

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

当时，周恩来、彭湃、恽代英等已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并率领大军向广东进发。太雷参加“八七”会议后，即兼程南下，于八月十九日到达香港，与原中共广东区委有关同志杨殷、阮啸仙等取得了联系。

八月二十日，太雷根据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指示，召开关于成立广东省委的筹备会议，并在会上传达了“八七”紧急会议精神以及中央对广东工作的指示。会议一致通过完全接受“八七”紧急会议的决议案，积极准备组织武装起义，配合南昌起义大军夺取广东，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会议还详细讨论和制定了暴动计划，决定分别组

^① 《中央给广东、广西省委、闽南临委的信》（1927年8月11日）。

织广州、北江、西江暴动委员会，通过了暴动口号、暴动时的军事编制、工作大纲等，并决定正式成立省委，选举了省委委员^①。

八月二十二日，中央指示南方局及广东省委，在起义部队入粤时，“东江须立即开始广大的暴动，发表政治的口号，为叶、贺（指南昌起义军叶挺、贺龙部队）内应。”^②省委当即制订了“起义军打到那里，就在那里组织暴动响应”^③的部署，决定在南昌起义部队进入广东后，首先发动潮汕地区人民武装起义。

九月十九日，张太雷为了向领导南昌起义的前委传达“八七”紧急会议精神以及领导潮汕地区人民武装起义，秘密从香港来到潮州。

此时，南昌起义部队在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的领导下，从闽西上杭插入广东大埔，直奔潮汕地区。九月下旬，太雷发动潮汕铁路工人起来罢工，挖断路基，使汕头的敌人无法运兵到潮州增援；还发动潮汕地区的商民、店员举行罢市；领导浮洋区的农民自卫军举行武装起义，围攻徐陇、洪港等地的封建地主堡垒达三昼夜，一直坚持到起义大军到来时，配合起义军消灭了敌人。潮汕地区的工农赤卫队，还占领了敌人的警察署及国民党的重要机关，打开监狱，释放了被囚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①太雷：《给中央常委报告》，（1927年8月22日）。

②吴世荣（中央代号）：《致南方局及广东省委的信》，（1927年8月22日）。

③邓中夏：《广州暴动与共产党的策略》，见《广州公社》，无产阶级书店1930年12月25日出版。

九月二十三日，南昌起义部队打退了敌人的截击，以破竹之势，一举攻下了潮州；接着，潮州县工农兵学商联合政府成立。

为了迅速解放汕头，太雷又把潮汕铁路的工人组织起来，连夜抢修铁路，以供起义部队使用。当地农军也配合起义部队击垮了铁路沿线浮洋、斗文、金石、彩塘等地的反动民团武装。第二日，在当地工农群众的热烈支援下，起义部队即从潮州乘火车南下，迅速攻克了汕头。当日，成立了汕头市人民政府。汕头人民为庆祝人民政权的建立，在牛屠地举行规模盛大的群众大会。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出席大会，和群众见面。

起义军攻克汕头后，太雷赶往汕头，向周恩来、李立三等传达了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精神，并转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决定：将南昌起义后建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唾弃中国国民党的旗帜，改树斧头镰刀的红旗，由我们党单独领导革命；放弃潮汕，部队转移到海陆丰与当地农民武装会合，建立革命根据地等等^①。

在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反扑的情况下，我起义部队于九月三十日撤出了汕头。留守在潮州的另一部分起义部队，也于三十日晚上，主动向普宁撤退。十月一日，周恩来以及革命委员会的成员，经揭阳炮台、贵屿来到普宁流沙，指挥部设在天后庙（即流沙教堂）。张太雷也随指挥部来到这里。十月二日，在周恩来主持下，革命委员会以及指挥部的成员，联合在天后庙举行了紧急会议，主要由张太雷代表中央临时政治局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以及研究起义部队的最后决策^②。

①陈公培：《谈“八一”起义军在潮汕活动》。

②郭沫若：《海涛》。

当时周恩来正患病，发高烧。为了研究护送周恩来和指挥部的成员迅速撤离战区，十月三日，张太雷等人在流沙平湖读书楼举行会议。正当会议进行时刻，敌人向起义军进行反扑，太雷等迅速转移，于十月十三日回到了香港。周恩来和叶挺、聂荣臻等一道，在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陪同下，冒着敌人的炮火转移到陆丰南塘区委书记黄秀文处，半个月后，再转往香港。

十月十五日，太雷在香港主持召开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总结南昌起义部队主力在广东失败的教训。会上，他作了《“八一事变”的经过、失败原因和前途》的报告，着重提出：“军队必须在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南方局领导下的参谋团的指导下全部转变为工农革命军，军旗改为红旗”，“各地仍应积极准备，一有机会就发动起义。”^①会议通过了《最近工作纲领》，表示“广东的工农斗争决不会因东江军事失败而消沉，反将完全抛弃等待军队帮助的观念，而有更自动努力奋斗之决心”^②。

为了迎接新的战斗，会议重新改组了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南方局由国际代表指定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黄平、杨殷、彭湃六人为委员，下设军事委员会，指定周恩来、张太雷、黄平、赵自选、黄锦辉和杨殷负责；改选后的广东省委，仍由太雷任书记，阮啸仙、恽代英、杨殷等三十六人为委员或候补委员^③。太雷主持了南方局、省委联席会议后，就离开香

①张太雷：《“八一事变”的经过，失败原因和前途》，见《中央政治通讯》第7期。

②《最近工作纲领》（10月15日南方局、省委联席会议通过），见《广东省委通讯》第2期。

③广东省委《关于南方局和省委联席会议经过情形给中央报告》（1927年10月）。

港，前往汕头，处理南昌起义军的善后工作；十月二十二日从汕头抵达上海，向中央直接请示有关组织广州起义问题，并出席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

会后，太雷与苏兆征以及国际代表罗乃曼等一道，继续研究关于制定广州起义的计划。十一月十七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讨论了广东形势，通过了由苏兆征、张太雷等草拟的《中央对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太雷在上海逗留了二十余天，于十一月二十日晨离开了上海，担负领导广州起义的重担，返回广东。

广州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张太雷返回香港后，十一月二十六日亲赴广州，在那里主持召开了一次有吴毅、黄平、陈郁、黄谦、沈青、王强亚以及国际代表罗乃曼等人参加的省委常委会议。他在会上指出张发奎同桂系军阀是一丘之貉，决不能对他抱任何幻想，或与他妥协，我们党只有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发动工农兵群众武装夺取政权，才有出路。

会上，成立了起义总指挥部——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张太雷担任总指挥。十一月二十八日，广东省委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号召暴动宣言》，向工农兵群众提出：“决战的时间快到了！”在太雷的领导下，广东省委还及时出版了《红旗》，并印发大量传单，积极鼓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起义。

当时，白色恐怖正笼罩着整个广州城。张太雷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为准备起义而紧张地工作着。他亲自跑到停泊在白

鹅潭的一艘邮政船上，召开了秘密的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负责人会议，传达和部署了起义有关决定。他兴奋地说：“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重要消息，党决定在广州举行武装暴动！”他还告诉大家：“暴动是个大事情，一点也急不得，省委决定从现在起，积极进行准备工作，什么时候准备好，就什么时候动手干！”^①大家听了太雷的讲话，十分兴奋，恨不得立刻揭竿而起。最后，太雷对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作了具体布置。

张太雷十分重视对张发奎军队的争取工作，认为这是夺取起义胜利的一项重要保证。他亲自来到了设在财政厅附近的一所党的地下联络站，召集了教导团骨干李云鹏、王侃玉、唐维等人举行秘密会议，传达了国内的革命形势和党的政策，并对上述工作进行具体安排。十二月四日傍晚，张太雷又于黄花岗召集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军校特务营等单位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二百多名举行秘密会议，向大家作了关于当前国内形势以及目前广州敌我情况等问题的报告，要求大家分工联系周围群众，加紧做好全体革命官兵的思想发动工作，并仔细调查和严密监视团内反动分子的活动等等。会后，太雷还亲自主持了教导团各级干部的分组训练，做好教导团的各项起义准备工作^②。

与此同时，省委通知全省各地党组织，准备发动农民起义，与广州起义配合。并相继派出了张善鸣、阮啸仙、赵自选、周其鉴、黄谦、潘兆璠、吴勤等人分赴省内各地组织农民武装，准备配合广州起义；又加强彭湃率领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军的联系，要他们尽快向惠州方向移动，以便与广州起义呼

^①何振武：〈广州起义回忆〉。

^②曾于庭：〈广州暴动工作报告〉（1928年1月4日）。

应，争取与广州迅速连成一片；此外，省委还通知正在湘粤边活动的朱德、陈毅率领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赶紧南下，准备参加广州起义。

十二月五日，中央给广东省委来信，同意广州暴动的计划。在这之前，中央已指示省委，“暴动后成立的广州市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可选进兆征、恩来等为主要干部”^①。

起义的准备工作在积极进行着。为了进一步研究起义有关的重大问题，十二月六日上午，太雷在沙面西桥附近一所党的地下联络站，召开了一次省委常委紧急会议，讨论了起义政纲、宣言、告民众书和起义时的力量部署、起义后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时各部门的人选。会议最后决定：十二月十二日举行起义。

为了做好起义后成立苏维埃政府问题，十二月七日，张太雷又在司后街附近一间戏院秘密召开了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他在会上详细分析了当时形势以及广东、广州市的敌我情况后指出：“现在，正是我们举行暴动，夺取政权的大好时机”^②。大家听了太雷的讲话，都十分激动和兴奋。接着，太雷在会上宣读了起义政纲、口号，并逐条解释通过。这次会议还选举通过了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执行委员名单。

广州起义，象箭在弦上，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正在这个时刻，我小北直街秘密掩藏武器的大安米店被敌人破坏；教导团内部的反动分子也闻讯告密。汪精卫在上海接到了共产党准备在广州举行起义的密报，连夜派了他的老婆陈璧君赶赴广州。令张发奎迅速解除教导团的武装，镇压工人赤卫队，搜查各工

^①中央致南方局暨广东省委信（1927年10月）。

^②陈功武：《夺城记》。

会。十二月九日，汪精卫又电令张发奎马上采取行动。张发奎接电后，立即着手准备镇压，密令他的“护党军”前敌总指挥、第四军军长黄琪翔赶紧由西江前线返回广州执行汪精卫的计划，公安局也加紧全市户口的检查工作。

在这紧急时刻，张太雷于十二月十日召开革命军事委员会紧急会议，向大家报告了上述情况，建议当机立断，先行动手，把起义日期提前在十二月十一日凌晨举行，大家充分研究了变化了的形势，一致同意张太雷的意见。会后，省委即向中央作了紧急报告，指出：“广州暴动之时机已到，此时如不动作，教导团力量将被其解散，同时敌人更加紧的向我们进攻”，“省委决定明日即行暴发广州之暴动”，并要求“中央对此事给我们以迅速而详细的指导。”报告还再次希望“派恩来同志来指导最近工作”^①。

为了保证起义行动的顺利进行，起义前夕，太雷在财政厅前附近一幢党的秘密机关，又召开了教导团、警卫团的骨干会议，决定十一日凌晨三时半起义，当日的行动口令为“暴动”。会上，太雷任命了李云鹏为起义时的团长，叶镛、赵希杰、饶寿柏为第一、二、三营营长，各连连长皆由共产党员担任，各排排长和班长也多是积极分子。会议还确定了起义部队的标志、各连队进攻的目标和起义时对团内敌人采取措施等问题^②。会后，太雷派了一个青年携着包袱，装着预先准备好的铁锤镰刀旗子以及红领带等物，随新团长先到教导团。

接着，太雷和周文雍等赶到西关潭新街六号党的秘密机

^① <广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27年12月10日），见<中央政治通讯>第15期。

^② 曾干庭：<广州暴动工作报告>（1928年1月4日），

关，主持工人赤卫队各级领导人会议。太雷庄严地宣布：今晚下半夜(十一日)三点半举行全线暴动，要求各联队必须在半夜两点半以前赶到指定地点集中。太雷讲话后，周文雍作了战斗部署，分配各联队进攻目标，明确起义标志以及当日口令等。

十一日凌晨二时许，太雷和工农红军总指挥叶挺、秘书长恽代英以及工人赤卫队的代表等，在教导团派出的一位连长陪同下，乘小汽车来到教导团驻地四标营，命令新团长立即紧急集合，把队伍带到操场集中；又命令一些人去解决反动参谋长朱勉芳，拘禁其他反动分子。部署既定，随即举行全团官兵一千多人的誓师大会，张太雷在会上作起义动员说：“今天夜间，我们要在广州举行暴动，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完全解除敌人在广州的武装，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教导团是暴动的主力，你们要勇敢战斗，完成我们党交给的任务！”^①最后，他慷慨激昂地号召说：“革命士兵兄弟们！在国民党反动残暴统治下，革命士兵除了和工人、农民一道，高举革命红旗，拿起武器，和国民党反动派拚个死活外，第二条出路是没有的。起来吧！广州苏维埃万岁！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万岁！”^②太雷的语音刚落，台下就响起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广州苏维埃万岁！”等雷鸣般的口号声。

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也在会上宣布了起义的战斗部署和教导团各营的战斗任务；还宣布了各营、连、排的指挥员名单。

十一日凌晨三时三十分，“轰！轰！轰！”三声炮响和“砰！砰！砰！”一阵信号排枪，宣告了震撼中外的广州起

^①刘祖靖：《广州起义中的教导团》。

^②张晋庭：《广州起义中的军官教导团》。

义爆发了。霎时，全团官兵高举铁锤镰刀红旗，分三路出发，投入战斗。东路攻击沙河步兵团，燕塘炮兵团；南路联合工人赤卫队攻击东山、广九铁路车站及伪公安局；北路攻击伪省府公署、军事厅、观音山敌军，占领城北制高点。与此同时，警卫团第三营革命士兵，在枪毙该团反动参谋长唐继元等反动军官后，也分两路出发，一路攻击南堤驻肇庆会馆的第四军军部；一路攻击仰忠街第四军军械库和驻文德路之第十二师后方留守处。在广州各处集中待命的工人赤卫队，听到教导团响起的排枪信号后，也纷纷举起红旗，系上红领带或带着红臂章，手持梭标、大刀、铁尺、手榴弹等武器，按预定目标，向反动派进攻。黄埔特务营的官兵也迅速参加起义，占领了黄埔军校校部以及鱼珠炮台等险要地点。

由于起义的工农兵群众英勇奋战，不到两个小时的战斗，即占领了珠江北岸大部分地区。红旗到处飘扬，标语贴满大街小巷。转瞬之间，白色恐怖的广州变成了红色的革命城市。

十一日黎明，广州苏维埃政府成员和工农兵执委会的代表三十余人，在已经回到人民手中的原公安局中楼楼下会议室里，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张太雷身着戎装，容光焕发地主持会议。他站起来庄严地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中国工人阶级处在几重压迫之下，身受的痛苦太多太重了。今天正好起来，挣脱身上的枷锁，打断手脚上的镣铐，扬眉吐气，抬头做主人！”^①他还宣读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纲。

接着，叶挺报告军事情况；杨殷报告肃反情况；周文雍报告工人赤卫队情况；恽代英代表宣读《苏维埃告民众书》。然

^①陈功武：《夺城记》。

后，大家对政纲、告民众书以及起义后的情况一一进行认真讨论，通过了各项决议。会议还决定发动广大工农兵群众拥护广州苏维埃政府，定当天中午在第一公园召开群众大会，并一致通过了广州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名单，太雷当选为代理苏维埃政府主席兼人民海陆军委员。

会议期间，不时有人前来向张太雷请示工作或报告军情。在他讲话的时候，贺诚代表第四军军医处前来报告说：“四军军医处人员决定参加起义了，我是特来报告的。”在座同志听了十分高兴。太雷连忙抓住贺诚的手说：“好！好！太好了！同志，革命正需要自己的医生。参加起义的有工人、农民、士兵和知识分子，他们正在打仗，就是没有一个军医处担负伤病员的救治工作，你来得好，你回去赶快组织抢救队伍，不能让自己的同志在那儿白白流血，把受伤人员的治疗任务全部管起来”^①。

广州苏维埃政府在原公安局开始办公后，太雷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各条战线的负责人相继前来向他汇报请示工作。当时还有部分敌军据点没有拿下，战斗甚为激烈，他和叶挺、叶剑英、聂荣臻、黄锦辉等还要指挥战斗。太雷精神饱满，果敢地处理各项工作与问题。当日，以太雷、苏兆征、黄平、叶挺名义发表了《广州苏维埃宣言》，又发表了《苏维埃告民众书》，省委也发表了《告工人、农民书》，号召工人、农民继续战斗。

由于战事激烈，苏维埃政府成立伊始，不少问题均待解决。十一日晚上八时和十二日凌晨一时，太雷在指挥部连续召

^①贺诚：《广州起义回忆》（1978年1月）。

开了两次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讨论局势问题。叶挺主张把队伍拉到郊外农村，罗乃曼主张坚守广州，还大骂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①。经过争论，作出了如下决定：以教导团为基础，迅速扩建军队，并将战线推向郊外，发动农民，组织农民队伍，以便迎击前来增援的敌人；打通与海陆丰的联络道路；晨四时半向盘踞长堤的敌军残部据点发动总攻击；准备进攻珠江河南岸的李福林部；将原定十一日中午在第一公园举行的群众大会，改在十二日中午举行。会议还商议了加强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加强和巩固起义队伍，训练俘虏等问题^②。

十二日，广东工农兵热烈庆祝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的群众大会，在市内丰宁路西瓜园召开。张太雷主持了大会，他以洪亮的声音宣布：“同志们！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全场立即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锣鼓声和欢呼声，表达了革命人民的无比喜悦和拥戴之情。太雷接着宣布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政纲、政府的成员名单以及工农兵代表会议选出的代表名单等。群众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完全赞同。群众大会在下午二时多圆满结束后，太雷满怀胜利喜悦，返回起义总指挥部。

就在这时，一股敌人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从珠江河南岸渡过珠江到猎德，绕道小北门外，占领了观音山，乘起义军后方空虚之机，集合反动分子数百人，分两路沿第一公园两旁马路向起义总指挥部扑来，大北直街亦为敌军冲入。在赤卫队总部内的武装工人赤卫队数百人分两路迎战；就近的教导团工兵连亦闻讯赶来。敌人不支，狼狈逃窜，我军重新收复了观音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4页。

^② 黄平：《回忆广州起义》。

山。当时，起义军的领导人都分别在前方指挥战斗。太雷从西瓜园大会返回总部不久，听说敌人扑来，就急忙与第三国际代表乘车赶到大北门去指挥战斗。当他们驶至大北直街（现解放北路）附近时，遭到敌人伏击，太雷身受重伤，医治无效，壮烈牺牲^①，时年仅二十九岁。

太雷是这次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的死，使起义队伍失却领导中心，使起义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当日晚上，因敌人援军纷纷赶到，敌我力量悬殊，起义总指挥部下达了撤出广州的紧急命令。

撤出广州的起义武装，分别转移到东江海陆丰、北江韶关以及广西左、右江等地，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其中许多人日后成了红军的骨干。

^①曾千庭：《广州暴动工作报告》（1928年1月4日）。

贺 锦 斋

刘 梦 华

贺锦斋，是湘鄂边红军创建人之一。他原名贺文绣，一九〇一年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个村塾教师的家庭。父亲贺兴楼，是清末的一名秀才，擅长书法和诗词，在村里设帐授徒，维持一家的清贫生活。

贺锦斋从六岁开始入其父所设私塾攻读，在父亲的薰染下，喜习诗词歌赋。同时，由于他的家乡是素有“歌海”之称的澧水源头，民间歌手甚多。在他们的影响下，贺锦斋十分喜爱乡间流行的优秀民歌。到十三四岁，他便能根据现实生活编唱一些激动人心的歌词了。例如，一九一六年春，贺龙率领二十多个青年，以两把菜刀夺取芭茅溪盐局的枪支，组成一支讨伐袁世凯称帝的武装后，贺锦斋怀着赞佩的心情歌唱道：“桑植有个贺文常^①，不怕猛虎与豺狼，星夜奔赴芭茅溪，两把菜刀打胜仗。”以后，贺锦斋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常常用诗歌来抒发自己的革命情怀，歌颂共产党人的英雄业绩，揭露反动统治者的残暴罪行。

一九一六年贺龙夺枪组成讨袁军后，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慌和仇视。他们一面出兵“围剿”贺军，一面派人到洪家关搜捕

^①贺龙原名贺文常。

贺龙的家族，贺锦斋因系贺龙的堂弟，也被株连，不得不逃到仓关峪一家山货店当学徒。他白天烧火做饭，推磨养猪，还要为老板娘带小孩，洗尿布，从早晨一直忙到深夜，没有片刻空闲；稍不如意，还要挨打受骂。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残汤剩饭，晚上就睡在山货店仓库的楼板上看守货物，盖着一床又薄又破的被子。他把这种苦难的生活编成歌词：“我当学徒真心寒，夜夜睡的硬床板，身上穿的破筋筋，餐餐吃的冷现饭。”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忧伤。

三年奴隶般的学徒生涯和广大贫苦农民的斑斑血泪，在贺锦斋的心灵上深深地打下了反剥削反压迫的思想烙印。

一九一九年，贺锦斋听说贺龙带着军队打回了桑植，便毅然离开山货店，赶回洪家关参加了贺龙的部队。除了刻苦操练军事技术外，贺锦斋还孜孜不倦地阅读书报杂志，并常常写作诗词，抒发自己的情怀。其中一首这样写道：“黑夜茫茫风雨狂，跟随常兄赴疆场，流血身死何足惧，刀剑丛中斩豺狼！”贺龙看到贺锦斋这样勤奋好学，又具有如此坚定的意志，便决定送他到长沙一所武备学堂去学习。但当贺锦斋到达长沙时，这所学堂已经停办了，只得又返回桑植。这时贺龙的部队已开到沅陵一带，贺锦斋便跟踪追赶，终于在泸溪县的浦市赶上了部队。开始，他在贺龙身边当卫士，由于他平时勤奋好学，行军能吃苦耐劳，作战机智勇敢，五六年间，便由卫士而司务长，而排长、连长、营长，再递升为团长。

一九二六年秋，贺龙部在常德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贺锦斋仍在该师任团长。不久，党中央派遣周逸群从长沙带领左翼军宣传队到贺龙部队工作。在周逸群等共产党人的宣传和影响下，贺龙确认“共产党好，共产主义对，因为它是

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并向周逸群提出了入党和改造部队的要求。贺锦斋也经常请周逸群到他的团里去讲演，向官兵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理论。在周逸群的帮助下，贺锦斋读了《共产党宣言》和其他一些进步书刊，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政治主张以及工农运动等重大问题，都有了初步的认识。当时，在贺龙的部队中，也同其他北伐军部队一样，既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也有国民党右派，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在斗争中，贺锦斋也同贺龙一样，总是旗帜鲜明地站在共产党人这边，坚决支持共产党在部队中的政治活动。每当听到部下有人加入了共产党时，他总是高兴地说：“好，你们走在我前面了，望你们好好带头，把我们的部队统统‘赤化’起来。”后来，周逸群根据贺龙提出的改造部队的要求，创办了政治讲习所。贺锦斋便从自己团里精心挑选了一大批思想进步的青年士兵和低级官佐，送去学习，鼓励他们努力提高政治觉悟，学好军事技术。这些学员回来后大都成了部队的骨干力量。

一九二六年九十月间，贺龙部奉命从湘西北进。贺锦斋率领先头部队进攻北洋军阀所占领的澧县。守敌顽抗，屡攻未下。锦斋乃同几名战士扮成卖鱼的农民混进县城，对敌城防工事和兵力布署作了详细的侦察，制订了攻城计划。入夜，他又亲率战士百余人，择敌防守空疏处攀沿进城，炸毁几处通道的工事，并用机枪控制住敌人主要火力点，使城外部队得以迅速冲进，攻占全城，生俘敌守城司令。接着，部队继续北进，在公安县的斗湖堤与敌援军激战一周，双方伤亡甚巨，贺龙部第二旅旅长贺登吾阵亡，贺锦斋被任命为代理旅长。他以两团兵力担任正面主攻，一团迂回敌后进行夹击，迫使敌军退守长江北岸。

敌军为了阻止北伐军继续前进，在退守江北时将南岸的船

只统统虏去，贺锦斋率部抵达江边时，只见大江上下，空无一舟。他徘徊江岸，苦思渡江之法，以致彻夜难眠。下面的诗句就是他当时焦急心情的写照。诗曰：“大江东去浪滔天，心神不安似油煎；我欲渡江苦无计，夜伴灯火未入眠。”经过日夜苦思，他终于想出了泅渡夺船的办法。一批深谙水性的士兵，在贺锦斋的宣传鼓动下，以夜幕为掩护，借助烧酒增加的体温，奋勇泅渡长江，把敌船从江北岸划了过来，使全师得以渡过长江，攻占鄂西重镇宜昌；并迫使杨森不得不表面接受广东革命政府的北伐主张，解除了北洋军阀勾结川军对武汉的威胁。

一九二七年春，贺龙部奉调从宜昌进驻鄂城整编，改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取消旅的编制，贺锦斋仍任该师第一团团团长。兵力较前增加了将近一倍，特别是团、营都有了共产党委派的党代表或宣传员，使部队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战斗力大大提高了。因此，在从鄂城出发继续北伐的征途中，部队屡战屡胜。先是大破奉军于武胜关，接着又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大败奉军于逍遥镇，直逼河南省会开封。

正当贺锦斋所在的贺龙部和其他北伐兄弟部队在河南境内节节取得胜利，工农群众运动迅猛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在中外反动派的支持下，悍然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湖南发生了“马日事变”。尽管沧海横流，贺龙和贺锦斋仍然屹立不动，坚定地站在革命一边。为此，武汉政府中的反动派妄想在河南把贺龙的部队就地消灭，多次阻挠他们回师武汉。贺龙和贺锦斋等不顾反动派的阻挠，毅然于六月把部队带回武汉。党把在湖南等地逃脱反动派追捕而来武汉的工农革命骨干和汉口的工农革命武装，编入贺龙的部队，使贺部很

快得以扩充编成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贺龙任军长，贺锦斋升任该军第一师师长，时年二十六岁，是当时革命军中最年轻的师长之一。

随着时局的逆转，二十军内部革命与反革命两派势力的斗争也日趋激烈。投机革命的原参谋长陈图南勾结少数反动军官，密图发动兵变，把部队拉到国民党右派那边去。贺锦斋协助贺龙当机立断，把陈图南等反动分子处决了，清除了内部一大隐患，使二十军得以顺利地参加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前夕，为了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方维夏被派任为第一师党代表。贺锦斋在方维夏的帮助和影响下，政治觉悟得以迅速提高。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凌晨，由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爆发了。贺锦斋师受命进攻敌第五路军总指挥部，任务艰巨，因为敌方的警备团是朱培德从云南带来的“精锐”，加之该部敌军事先得到叛徒告密，作了准备。敌军凭借有利地形，以猛烈的炮火封锁了起义军进攻的必经要道——鼓楼。在起义军总指挥贺龙亲自指挥下，贺锦斋率部奋不顾身地从侧面民房屋顶爬上鼓楼，由上往下猛烈射击，把敌军的火力压了下去，一部分起义军乘势冲了进去，另一部分起义军迂回到敌总指挥部背后，攀墙跳进院内，把敌军压入总部。但敌人又利用坚固的房屋和一座高耸的楼房继续顽抗，激战三个多小时，歼敌一部，迫使余敌全部缴械投降。拂晓时其他各路起义军都先后得手。

南昌起义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都调兵遣将“讨伐”起义军，企图将革命扼杀在摇篮里。面对这一形势，起义军按预定计划于八月三日

至五日先后撤离南昌，准备由瑞金经寻邬、梅县直取东江，以东江为基地，依靠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组织力量重新北伐。时值酷暑，又有敌军前堵后追，行军十分困难。贺锦斋处处以身作则，不骑马，不坐轿，坚持同战士们一同步行，并利用一切时机向部队作宣传鼓动工作，鼓励他们克服困难，坚持到底。在瑞金县的壬田战斗中，贺锦斋身先士卒，击溃了拦截起义军的敌新编第二十师王文翰部，使起义军得以进入瑞金城。以后，他又率领所部，克服疲劳、饥饿和疾病交织在一起的极度困难，通过福建而进入广东境内。

一九二七年九月下旬至十月上旬，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遭到数倍于己的强大敌军夹击，加上战术上分兵的失误，除朱德、陈毅等领导的一小部分起义军得以突出重围，后来辗转上了井冈山以外，其余大都散失。十月三日，前委主要成员周恩来、恽代英同贺龙、叶挺等十余人在普宁县境流沙镇的天后庙内，召开了最后决策会议。周恩来带病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指示“武装人员退往海陆丰，今后要作长期的革命斗争。”^①当天午后三时，当贺锦斋师和第二师经过距流沙镇三公里半的乌石山时，遭到敌东路军陈济棠的第十一师和徐景唐的第十三师截击，把他们同后续部队隔断了，使他们与总指挥部失掉了联系。随后，贺锦斋师的副师长欧学海以“总指挥不知下落，伙食无着”为词，煽动起义部队向敌军缴枪投降^②；贺锦斋未能坚决制止部队交枪^③，仅自身同警卫营长滕树云突出重围，逃离虎口。

①②肖克主编：《南昌起义》，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

③贺锦斋在一师被敌缴械中的态度，尚待进一步考证。

一九二七年十月左右，贺锦斋辗转到上海，寻找党组织。当时的上海，正是阔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帝国主义分子和中国的官僚军阀、富商巨贾，过着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而贫苦工农流落街头，啼饥号寒；加之反革命鹰犬遍布通衢，革命志士惨遭屠戮。看到这些，伫立黄浦江边的贺锦斋不禁悲愤填膺，写作了《浪淘沙》一词，用以抒发他胸中的悲愤和革命决心：“仰望蔚蓝天，与水相连，两岸花柳更鲜妍。可惜一片好风景，被匪摧残。蒋匪太凶顽，作恶多端，屠杀工农血不干。我辈应伸医国手，重整河山。”

一九二七年冬，贺锦斋根据党的指示，从上海经武汉回到荆江地区监利、石首一带开展武装斗争。这时荆江沿岸各县农民群众，在湖北省委派去的黄鳌等人的领导下，举行武装暴动。贺锦斋在黄鳌领导下，很快在藕池一带组织成了一支五、六十人枪的游击队，到处打土豪，夺取团防枪支。他们把夺取的金银，大部分送交湖北省委作活动经费，帮助省委解决了不少困难。但由于贺锦斋刚入党不久^②，缺乏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每到一处，只搞枪支和打土豪，不知道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因此，未能造成更大的政治影响^①。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九日，贺锦斋在监利县的反嘴，同从上海经武汉回到湘鄂西的周逸群和贺龙等会合了。随后，以周逸群、贺龙为首的中共湘西北特委，便把贺锦斋、吴仙洲、萧人谷三支游击队共五百余人、三百多枪编成三个大队，打起了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贺锦斋等部在湘西北特委领导

①参见1961年2月2日贺龙同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写组谈话记录稿。

②贺锦斋入党的具体时间待进一步查证。

下，经过十多天的战斗，攻克了上车湾、朱河、砖桥、长岗庙、调弦口等集镇，消灭了张烟灰、文大哥两股惯匪和许多团防，缴枪百余支；并镇压了一批土豪劣绅，有力地配合了南县、江陵、公安等县的年关暴动。

在这前后，贺锦斋听说毛泽东在湘赣边境组织秋收起义后率部上了井冈山，并听到朱德和陈毅也从粤北到达湘南的重要消息，喜不成眠，又写作《浪淘沙》词一首：“花好正含苞，色胜鲜桃，一遇春风即吐娇，飞遍全球成硕果，自信非遥。反动命难逃，挣扎徒劳。革命巨浪比天高，试看湘南与粤北，滚滚波涛。”

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贺锦斋根据湘西北特委焦山河会议的决定，将部队交给石首中心县委（后来发展成为红六军的一支重要力量），自己随同周逸群、贺龙和石首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李良耀等回湘西建立革命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三月上旬，他们回到了桑植县洪家关老家。远近亲朋，争相传告，纷来探视。贺锦斋心潮激荡，情不能已，写了两首七绝：“大地乌云掩太阳，一朝消散又重光。忽闻各处人喧闹，胡子^①果然转故乡。”“故乡匪势太凶顽，害得人民苦不堪。拔苦须先除暴戾，此身誓把责承担。”

三月下旬，贺锦斋协助贺龙通过各种关系，得到了十多支土著武装的支援，计有贺英、王炳南、钟慎吾、李云清等部，共约三千人，贺龙树起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攻进桑植县城，建立了中共桑植县委，并着手建立革命政权，发动群众，改编部队。但随即遭到敌四十三军龙毓仁旅的进攻。由于工农革命军

①当地群众对贺龙的亲切称呼，因他20岁时就蓄了胡子。

初建，组织松散，战斗力不强，与敌几次交锋之后，大部散失，周逸群转往鄂西，另辟革命根据地。贺锦斋随同贺龙退往桑植、鹤峰边界的红土坪一带，收集散失的部队，继续进行游击战争。在匪军四面包围中，他们在大山里深夜开会，准备反击。贺锦斋写七绝一首：“层层铁网逼周围，夜集深山雪满衣。为党为民何惧死，宝刀应向贼头挥！”生动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到五月间，他们又集中了三四百人枪。六月的一天，乘龙毓仁旅撤回贵州之机，贺锦斋奉贺龙之命，率部在澧水边葫芦壳埋伏。该处地势险要，只能从绝壁上凿出来的一条谷道通过，四周是古木参天的重峦叠嶂，谷底是在悬岩峭壁中奔流的滔滔澧水。当敌军大部已过，后卫进入伏击圈时，贺锦斋率部突起射击，毫无防范的敌军顿时乱作一团，有的饮弹毙命，有的挤坠河中。敌参谋长张策叩头求生，为流弹击毙。是役，工农军获弹药物资甚多，大大鼓舞了士气。贺锦斋吟诗二首记胜，诗曰：“万弩千弓对寇仇，霎时大半变浮鸥。一人怕死真堪笑，跌跪尘埃只叩头。”“万众一心山可排，战场从此向东开。眼前军实皆充备，尽是光头①远送来。”

此后一段时间，工农革命军在澧水策源地的分水岭、庙嘴河一带休整。每当夕照青山，归鸦阵阵的时候，贺锦斋常于操练之余，漫步澧源江岸，看到那翠峰如簇，澄江似练的大好河山，如今被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反动统治弄得疮痍满目，不禁心潮起伏，怒火中烧，因而写作了一首长达九十四句、六百五十八字的《澧源歌》，概述了当地人民惨遭压榨屠戮的情景，

①指蒋介石。

和南昌起义后革命力量发展的过程，指出了“估计不出二十年，定在京沪庆胜利”的光明前途，用以表达他的革命豪情，鼓舞工农革命军的斗志。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成立，贺龙任书记，贺锦斋和陈协平、李良耀、张一鸣等为委员。同时，工农革命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黄鳌任参谋长，下辖第一师，约七八百人，是红四军的主力，由贺锦斋任师长；另有几个支队、大队，全军共约一千五百人。前委决定，一方面整顿改造部队，在连队中建立党组织；另一方面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贺锦斋对立即开展土地革命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加之政策界线不清，恐怕波及他家，因而不同意立即在当地实行，并错误地将宣传土地革命的标语撕掉，受到贺龙和前委的严厉批评。在贺龙的教育下，贺锦斋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作了深刻检讨，并自请处分。为严肃党纪，前委决定撤销其委员职务，给予留党察看处分。^①贺锦斋不但没有因此消沉，而且认为这是党对他的关怀和帮助，革命意志更加坚定起来。

此后不久，中共湖南省委和湘西特委要求红四军到石门一带活动，以配合石门、临澧、常德、桃源等地的革命斗争。在前委率领下，贺锦斋和红四军指战员于八月二十五日进抵石门县北乡磨市，在那里做了几天打土豪分财物的工作，又转至谍阳。九月初，贺锦斋率部一昼夜奔驰一百八十里，袭击澧县大堰垱、王家厂一带的团防武装和税务机关。在王家厂，贺锦斋亲自烧了团防局长的田契，这对于发动当地农民群众起了较大的作用。次日晚，贺锦斋率部返回谍阳。后一日，红四军遭敌第十四军教导师李云杰部及叛徒罗效之等多股团防的包围袭

^①贺龙1928年9月向党中央的报告，本书115页注①。

击，参谋长黄鳌阵亡，遂退往泥沙。

一九二八年九月七日，贺锦斋面对四面敌军的重围，决心拚一死战，向他的弟弟写了最后一封家书：

“吾弟手足：我承党殷勤的培养，常哥多年的教育以至今日，我决心向培养者、教育者贡献全部力量，虽赴汤蹈火而不辞，刀踞鼎镬而不惧。前途怎样，不能预知。总之，死不足惜也。家中之事，我不能兼顾，堂上双亲希吾弟好好孝养，以一身而兼二子之职，使父母安心以增加寿考，则兄感谢多矣！当此虎狼当道，荆棘遍地，吾弟当随时注意善加防患。苟一不慎，即遭灾难。切切，切切。言尽于此，余容后及。

兄绣一九二八年九月七日于泥沙。”

家书中还附有七绝二首：

云遮雾绕路漫漫，一别庭帷欲见难。
吾将吾身交吾党，难能菽水再承欢。

忠孝本来事两行，孝亲事望弟承担。
眼前大敌狰狞甚，誓为人民灭豺狼。

一九二八年九月九日拂晓，贺锦斋率领警卫营和手枪连向敌猛攻，掩护贺龙等突出重围，向离泥沙镇七八里路的丝茅岭方向撤退，贺锦斋自己率部断后，奋不顾身地阻击追赶前来的

敌军，终于壮烈牺牲。时年二十八岁。贺锦斋用自己的生命掩护了贺龙等一大批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实践了他那“吾将吾身交吾党”的钢铁誓言。

一九六三年，中共桑植县委将贺锦斋的忠骨迁回洪家关安葬。在烈士墓前耸立起一个石牌坊，横额上刻有“永垂不朽”四个大字，竖联为：

澧源歌，霞光早已照大地；
浪淘沙，革命巨浪比天高。

张兆丰

张璧珩 李凌宇

张兆丰，名献瑞，字兆丰。河北省磁县彭城镇人，生于一八九〇年一月十二日（清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父亲是陶瓷工匠，后来上升为工场场主。

张兆丰一八九七年入私塾，一九〇五年进磁县第一高小读书，一九〇八年考取保定育德中学。该校是河北省同盟会领导人王励斋、李锡九、江著源创办的，校内民主和革命气氛颇浓。在这里学习期间他接受了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并加入了同盟会。一九一二年夏^①，在该校毕业后考入了北京大学。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无力支持继续深造，他怀着忧郁的心情回到故乡，在磁县第一高小任英语教员。在辛亥革命和以后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革命运动中，他热情拥护并积极支持这些革命斗争。除对学生进行革命宣传教育外，他还到农村发展同盟会员。在反对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斗争中，一九一五年七月他组织当地同盟会员和哥老会、拳术界人物举行起义，夜袭磁县半坡村公安局分驻所，全歼警察，缴获枪械八支。

辛亥革命和“反袁”运动后，张兆丰投笔从戎，考进陕西

^①张兆丰中学毕业的时间烈士碑文上记为1915年；但据烈士的同学张学孔说是1912年，又据董振江说，兆丰1913年介绍他人同盟会时正在磁县第一高小任教。据此，碑文的时间似有误。

督军陈树藩创办的、由同盟会员刘廷森领导的陕西陆军讲武堂学习军事。毕业后到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第四路（司令胡景翼），先后任练习生、排长、副营长、副团长、总司令部参谋处少校参谋等职；后又调到第二路（司令樊钟秀）任教练员。一九一九年初，樊钟秀部脱离靖国军接受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改编，他辞职离开该部，于五四运动的前夕来到天津，在他的同学许志远主办的《河北日报》社当记者。

一九一九年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张兆丰积极投身于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之中，在天津市学生联合会领导下的募捐队工作。由于他积极热情，善宣传鼓动，募捐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六月五日天津市学生联合会发起在南开中学广场召开大会，他带领印刷工人队伍参加。会后游行示威，赴省长公署请愿。队伍出发时，被军警包围，他们冲出重围走上街头；游行途中又遇大批军警阻拦，他走在队伍前列，先与军警进行说理斗争，继而展开搏斗。一个警察扭住他，恐吓道：“你嘴上长了毛（他留八字胡），为什么也跟着青年学生一起胡闹？”他怒目而视，推开警察，继续带领游行队伍前进。

经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张兆丰认识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增强了斗争决心，更加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在这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认真学习《阶级斗争》、《唯物史观评解》以及《辩证法》、《资本论入门》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不久，他参加了于方舟在天津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随后，又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〇年，张兆丰从天津回到保定育德中学，在该校担任教务主任。这期间，他不仅在校内宣传马克思主义，对学生

进行革命教育；还在磁县一些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中组织了人生改进社，利用寒暑假带领进步学生到工厂、农村进行革命宣传。他本人曾在彭城宣讲所^①作过《谁是中国人民的最大仇敌》的讲演，运用大量的实际事例指出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号召大家起来打倒他们。这一年冀南地区大旱灾，民不聊生。他积极活动，团结进步人士，利用上层关系，开展合法斗争，迫使当局救济灾民。同时，他领导农民进行反对粮食出口的要粮运动并取得胜利，使当地广大群众得到不少利益。至今，提到此事，群众还称赞他“和穷人是一家”。同年九月苏联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放弃沙俄在华一切特权，提议在平等基础上缔结中苏友谊条约。他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十分激动，极受鼓舞，当即找校长、国会议员郝仲青建议他在国会提出恢复中苏邦交，并要求在校内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郝仲青断然拒绝了张兆丰的建议，两人发生激烈冲突，使他同以郝为代表的该校保守势力的矛盾日益尖锐。后来郝仲青又参与曹锟贿选总统的卑鄙活动，张兆丰遂与郝彻底决裂，愤而辞职，离开育德中学。不久，他又回到樊钟秀的部队。这时樊已与孙中山取得联系并支持他的革命活动。张兆丰于一九二三年随该部赴广东，并于是年十月进驻广州。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国共合作。张兆丰应邀列席了这次大会，并由出席大会的河北省代表于方舟、李锡九、江著源推荐

^①宣讲所是类似现在文化馆之类的机构。

担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后他们一起回天津组织省党部。一九二四年五月，经于方舟、江著源介绍，张兆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负责河北省的农运工作。他经常到农村，发动农民，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反对封建军阀和反苛捐杂税的斗争。

一九二四年九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等从直系中分化出来，发动“北京政变”，建立了国民军，冯自任总司令。为了在国民军中开展工作，我们党决定派一批党员到该部队中去。张兆丰懂得军事，加之，他在国民军中朋友较多（如第三军军长孙岳、第三混成旅旅长刘廷森等）。于是，党组织委派他于这年十一月到国民军中开展军运工作。临行前，党的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会见了，并对如何在国民军中进行工作做了具体指示。经大钊同志介绍，他还会晤了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与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此后，在工作中，他经常得到党的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他对大钊极为尊敬和关心，曾赠送给大钊一支小手枪。在那些艰苦斗争的年月里，在后来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大钊同志一直把它带在身边，作为应急自卫之用，直到被捕。这支小手枪现在陈列在首都博物馆。

张兆丰到国民军先后担任第三军第三混成旅参谋长和该旅第三团团团长，利用职务之便和与旅长刘廷森的私人关系，积极开展党的工作。他先把第一团团团长孙金宣和第一营营长谢连铎介绍入党，以后又逐步发展了一些党员，并建立了旅支部委员会。北方区委派共产党员李林、王珪、张海如到该旅分别担任一、二、三团的副团长，负责军事训练。他还征得刘廷森的同意，办了随军干部学校，由李林任教育长，党组织还派来苏联教官。该校学员大都是山东、河南、陕西、河北的青年学生和

天津、北京、郑州的失业工人。张兆丰曾亲自从天津带来由组织介绍的几十人到该校学习，在学员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建立了党的支部。这个学校为党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对以后加强党在这个部队中的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张兆丰对地方党也极为关心。部队在驻河北正定期间，他经常对正定七中学生进行革命教育，并在该校学生中发展党员。一九二五年春，部队经过洛阳时，他曾赠送当地党组织现洋三百元，为他们解决困难。

一九二五年夏，方振武脱离奉系，率部加入国民军，编为第五军。为了开展对该部的工作，中共北方区委指示张部与方部合作。张兆丰率第三混成旅的第三团和第五军一起，在晋北地区作战。一九二六年五月在进攻应县等战斗中，他的第三团担任主攻，连克应县、阳高、东井集数城。同年八月第三团编入第五军，张兆丰因战绩卓著，升任第五军第三旅旅长。

一九二六年七月，广东革命政府出师北伐。九月冯玉祥在绥远举行著名的“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发表宣言，声明拥护国共合作，接受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支持和配合北伐战争。冯的部队集体加入国民党，并在军内成立了国民党的最高特别党部，张兆丰被选为最高特别党部执行委员。这为他在该军开展党的工作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占领武汉。为了配合北伐军北上进取中原，冯玉祥率领国民军南下入陕。张兆丰所在的第五军编为援陕第一路军，奉命解除受吴佩孚支持的反动军阀刘镇华部（镇嵩军）对西安的包围。他们以不到半月的时间即击败了刘镇华的部队，解除了对西安长达八个月之久的围困，接着又解除了对三原的包围。随后，进军渭南消灭了那里的敌人。至一

九二七年初，国民军占领了陕西全省。张兆丰在此次援陕作战中屡建战功，又被晋升为第五军第三师师长。

一九二七年四月，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的国民军再次誓师继续北伐。五月初进军至豫南。这时国民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全军改名换旗，分途出关，出师东征，配合北伐军进军中原。张兆丰的第三师编为第一路（司令方振武）受前锋之使命。他们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出潼关，占灵宝，取陕州，克洛阳，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于六月一日与北伐军胜利会师郑州，继而东进攻克开封。为了扫清鄂豫边界的残敌，他们又奉命挥戈南进，张兆丰师仍为前锋。部队经许昌南下，相继消灭了高老谋、李老谋的部队，收编了驻南阳的马文德部。进军至襄阳、樊城时，包围了徐寿椿部。张兆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徐部的情况，决定采取军事威胁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办法，他本人冒着危险，带两名警卫员入樊城，当面向徐寿椿讲明形势，晓以利害，指明出路，终于说服了徐，使之放下武器，接受了改编。

张兆丰领导的第三师在配合北伐军进取中原的援陕、东征、扫南一系列战斗中，一直担任先锋部队，英勇顽强，战功显赫，军威远震，曾两次受到武汉国民政府的传令嘉奖。由于党的领导，张兆丰的努力工作和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模范作用，这支队伍纪律严明，与广大群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受到群众的热情欢迎和支持。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的汉口《民国日报》报道说：该部“士兵犹能忍苦，恪守军纪风纪，不稍逾越。沿途所过，七豨毋警。即乡间农民，视军队如家人，箪食壶浆，沿途慰劳。该军整肃前进，农民均欢呼腾跃。”^①

正当革命胜利发展的时候，隐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了革命。冯玉祥的政治态度也急剧右转。六月十日冯玉祥与汪精卫等举行了郑州会议，计划反共；六月十九日冯又与蒋介石秘密举行徐州会议，策划宁汉合流，反苏反共。这时的形势正如蔡和森一九二七年九月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中分析的那样：“彼时唐生智、汪精卫与我们决裂的阴谋尚未成熟，势力还未完全集中，我们在豫鄂交界的张兆丰同志（属方振武）之一师二旅劲军还未被解决；张发奎（此时与唐甚冲突）、贺龙、叶挺及军事政治学校之军力皆集中武汉，工农民众冤屈愤慨，正是积久待发；……”^①如果此刻我党有正确的领导，能够采取果断措施，党掌握的张兆丰的这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是可以保存下来的。但由于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领导，使我们党无力反击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该师被拱手交了出去。七月十五日汪精卫与共产党决裂，背叛革命；八月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下令撤销张兆丰师长职务。冯玉祥在他的部队中也进行“清党”，下令通缉张兆丰。张兆丰怀着沉痛的心情被迫离开了党多年培植和他本人艰苦经营的部队。

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同志牺牲了，有的消极不干了，也有的叛变了。而张兆丰不失望，不气馁，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就在这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他把自己年仅十六岁的长子张锡珩送进革命队伍，支持他走上革命道路。

这时，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和培养干部，党决定送一批干部到苏联去。一九二七年底，张兆丰离开祖国赴苏。

^①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98—99页。

一九二八年六月至七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张兆丰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大会。会后，根据党的决定，他动身回国参加顺直省委的工作。

北方党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遭到很大破坏，损失很大，问题较多，比较混乱。“六大”前后，党中央委派陈潭秋、刘少奇等为特派员指导北方党的工作。“六大”期间中央研究了北方党的工作；会后，着手整顿北方党组织。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长周恩来受党中央的委托来到天津，与陈潭秋、刘少奇一起主持召开了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六大”精神，纠正当时北方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并改组了省委领导机关。张兆丰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党组织的决定，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并在会上当选为顺直省委（以后改为北方局）^①委员兼军委副书记，不久又担任军委书记。

在党的领导下，张兆丰和其他同志一起，建立和恢复了北方地区的军委工作。他很重视武装工农，在一些地区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武装小组。还在国民党驻华北的各派系军队和军事干部学校里，建立了不少党的秘密组织。如商震在北平所办的军事政治学校，石友三在河南彰德(安阳)、孙殿英在山西晋城、宋哲元在山西汾阳、刘珍年在山东烟台等地所办的军事干部学校内，都有党的秘密组织。在这一时期，北方地区党的军事工作有相当的发展，这与张兆丰艰苦努力地工作是分不开的。

一九三〇年二三月间，张兆丰受党的委派到河北省磁县、武安一带组织暴动。他和直南特委研究决定：“五一”节

^①中共顺直省委（后北方局）负责领导党在北京、天津、山西、山东、陕西、河南、河北、察哈尔、绥远、热河等地区的工作。

首先在磁县岳城发动农民暴动，然后与峰峰煤矿工人武装会合，在磁县建立苏维埃，成立红二十军。他深入党的基层支部和积极分子之中，进行思想和组织发动，传授军事知识，教他们使用武器。在发动工农的基础上，他还在地方党的帮助下，亲自深入当地“天门会”^①内调查了解情况，作会首靳世奎、宋宝玉的工作，还特地到河南林县去说服该会总会首韩欲明，想改造“天门会”，使其与工农武装结合，占据太行山的有利地形，发展壮大革命武装。但由于“天门会”首领们封建思想根深蒂固，难以接受我党的主张和领导，争取的目的没有达到。加之，岳城暴动事先被敌人发觉，敌人逃跑和其他等原因，亦未能实现。

同年八月，张兆丰又到河北博野、蠡县组织农民暴动。他深入党、团基层组织和贫农协会，宣传党的政策，并具体进行组织准备：将参加暴动人员编为大队、中队、小队；积极筹备枪支弹药和医药用品；计划在蠡县县城、大庄和万南村三处同时暴动，然后汇合县城，成立县苏维埃政府，建立红二十二军。这次暴动因大庄提前行动，引起敌人警觉，打乱了原定部署。当时在县城内组织领导暴动的张兆丰，正在乡村师范学校内开会研究工作，得知消息后当即决定暴动暂停，人员立即疏散。他布置好善后事宜，连夜化装出城。这时敌人已经戒严，到处搜捕抓人。张兆丰由一个同志护送，于天亮前来到北城门，敌兵盘问时他机智地回答：“我是刚出城部队的指挥官，要到前方组织作战，天亮前必须赶到现场。”当敌兵要看通行证时，他对护送的同志说：“把陈县长写的条子拿给他看看。”敌兵向前去看条子时，张兆丰乘其不备，用手枪顶住了敌兵的

^①天门会是当地穷苦工农群众的封建迷信组织。

胸膛，迫其就范。出城之后，他们钻进青纱帐，安全地回到保定。

张兆丰组织领导的上述各地暴动，虽然由于当时统治党中央领导机关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均相继失败，但张兆丰在这些斗争中却表现了出色的群众工作和宣传组织工作的才能，也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

一九三〇年九月，中共北方局决定建立平汉北段“兵暴”委员会，张兆丰为委员之一。他被派到河北栾城县具体领导山西军队李生达部第十二师三十四团^①的“兵暴”工作。该部我党秘密党员较多，士兵革命情绪较高。当年春该部驻唐山时，张兆丰就曾前往组织兵变，因敌人预先察觉而未果。此次该部又从前线开到栾城，张兆丰化名王美成来该部，以他出色的组织才能和艰苦细致的工作，在很短时间内就发展了两营革命兵士的组织，革命兵变的空气异常高涨。他们计划在该团开拔时，以索要欠饷及棉衣为名，发动兵变，枪决反动军官，拉出部队，投入红军。但就在举行兵暴的前夜，团部一护兵王某告密，张兆丰不幸于一九三〇年十月十五日被捕，并被送往该师师部刑讯。敌人用尽各种严刑拷打，继而欺骗利诱，企图使他屈服，想从他的口里探出党的秘密来。他坚贞不屈，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就连他的真实姓名也未吐露。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都在他的面前失败了，便穷凶极恶地于十月十六日十二时将张兆丰枪杀于栾城北门外。临刑，兆丰高呼“共产党万岁！”慷慨就义，时年四十一岁。

张兆丰牺牲的消息传来，正值中共北方局扩大会议开幕之

^①一说是36师214团；本文说12师34团，系根据天津《大公报》1930年10月20日刊登杀害张兆丰烈士的消息：《栾城团部枪决共党》。

时，与会的各地代表无不为之泪下。大会作出决议，发出通知纪念张兆丰。通知说：“兆丰同志：忠实勇敢，坚苦耐劳。是北方党的军事领袖，是工农革命红军的将才。”“兆丰同志之死，是党的一个损失，亦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损失。”通知号召北方全党及工农群众追悼这位英雄的战士，并发动募捐，抚慰他的家属。通知要求宣传他的革命历史，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加紧发动群众斗争，以实际行动，回答反动统治阶级的白色恐怖。北方局机关刊物《北方红旗》发表《悼无产阶级的战士张兆丰同志》的文章，回顾了兆丰的革命事迹，指出：“兆丰同志之死是为反抗反动统治而死，兆丰同志之牺牲，是为解放工农劳苦群众而牺牲”，“兆丰同志虽死而他的精神在广大的群众中，已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号召大家“誓死继续先烈奋斗精神，解放工农劳苦群众，消灭军阀统治阶级，为死难烈士复仇！”^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支持、关怀和栾城县群众的帮助下，找到了张兆丰烈士的遗骨，一九六一年由薄一波、林铁、安子文等十三位同志组成张兆丰烈士迁葬委员会，是年七月一日将张兆丰烈士的遗骨迁葬于晋冀鲁豫邯郸烈士陵园。运载烈士遗骨的汽车所经之处，群众冒雨肃立街头，向烈士致哀。各界二千多人参加了烈士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共河北省委为张兆丰烈士建墓立碑。

作者附记：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注明出处者外，还有薄一波、董振江、徐彬如、马凌甫、郝久亭的回忆文章，张锡珩收集整理、少痴编写的《张兆丰烈士生平事略》、少痴编写的《烈士于方舟》和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收藏的有关材料，初稿并经薄一波同志审阅修改。

^① 《北方红旗》第45期，1930年11月11日。

林育南

廖鑫初 李良明

在寻找真理的道路上

林育南于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光绪二十四年冬月初三）出生在湖北省黄州回龙镇林家大湾（现黄冈县回龙公社白羊山生产队）。

林家大湾离黄州约六十里，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山村，有三十多户人家。同祖国的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劳动人民终年辛劳却不得温饱，一遇荒时暴月，许多人鬻儿卖女，外出逃荒。而地主不劳而获，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这种贫富尖锐对立的状况，在林育南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林育南的祖父林志高，靠种田、织布（板带）为生，因家境穷困，年近三十才娶了寡妇龚氏。龚氏是一个贤慧的女子，心灵手巧，勤俭持家，因此他们的生活便渐渐宽裕起来，由于缺少文化，常受人欺侮，他们希望自己的儿孙多读些书，有个远大前程，当林育南喃喃学语时，他们就请左邻右舍有文化的人教他识字读书，望他长大成人，能名登金榜，光耀门楣，荣及乡里。

林育南的父亲林协甫，排行第三，上过几年学，当过学

徒，后筹得股本七八百元，在汉口黄陂街回龙寺十三号开设“林协兴色布行”，为黄州回龙镇一带农民代售布匹，生意还算兴隆。在革命思想的熏陶影响下，林协甫积极支持育南走革命道路，并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大革命时期，刘少奇、李立三等经常出入他的家庭。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以“共匪家属”的罪名，一年之内三次将他抓进牢狱，但他在敌人面前始终没有透露党的任何情况。后被党组织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将他营救出狱。

林育南的生母华氏，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勤劳俭朴，为人忠厚，不幸在生下育南的不几天后，便与世长辞。继母袁昌恒，心地也很善良，对育南爱如亲生。后来，在育南的开导、帮助下，思想进步很快，除积极支持育南革命，还经常为武汉党组织传送情报，掩护革命同志。党组织在她家里开会，她就亲自站岗放哨。

林育南秉性聪慧，从小就热爱学习。一九〇四年，他年仅六岁，便就读于回龙山一所私塾学校。私塾先生李卓侯（李四光的父亲），思想比较进步，知识渊博，富有责任感，是一个颇有声望的启蒙老师。在教书期间，他经常给学生讲述《水浒传》和岳飞、文天祥以及洪秀全的故事，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和反叛精神。林育南很喜欢聆听老师的讲叙，十分崇拜武松、岳飞和洪秀全这些英雄人物，在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反叛”旧社会的根苗。

林育南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李先生曾说：“林育南是我平生最得意的弟子。”

林育南从小热爱劳动，五六岁就参加田间零星农活，帮助祖父种瓜种菜，与同村小孩上山拾柴。他经常帮助穷苦人家的

孩子劳动和学习，甚至还把自己的食物和衣服、鞋子，送给他们吃、穿。

由于渴望更广阔的新天地，林育南于一九一一年考入黄州一所洋学堂。当时，辛亥革命已经爆发，黄州城里也出现过一阵热闹气氛。林育南为革命潮流所鼓舞，断然剪去辫子，并邀约同学，宣传民主共和思想。不久，袁世凯窃国。刚刚呼吸了几天的民主空气又窒息了，中国又重新陷入黑暗的深渊，这使他感到深深的忧虑和惆怅。

为了寻找革命真理，一九一五年，林育南毅然离开古老的黄州城，考入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被编在第三班学习。武昌，这个辛亥革命的策源地，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战斗洗礼，民族意识空前觉醒，民主精神迅速高涨，新文化运动正在兴起；而中华大学，又是新思潮的中心，林育南来到武昌，进入中华大学后，和其它革命青年一样，很快就投入这个时代的洪流。

一九一七年十月八日，武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恽代英，发起组织了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互助社。互助社的成员，一方面加强自我修养，一方面帮助朋友们进步。他们每晚聚会一次，相互报告当日各自的修养心得和为社会、为朋友所做的有益事情，自助助人，相当活跃。有一天，林育南参加了互助社成员的聚会，很受教育。于是，在十月二十四日，便正式参加了互助社，并且很快成为该社最活跃的一员。为了团结更多的进步青年，不久，恽代英又发起组织了仁社，林育南也发起组织了黄社。这些团体，以互助社为中心，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在武汉地区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和反帝爱国的宣传、组织工作。

一九一九年五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卖国的《共同

防敌军事协定》，恽代英、林育南发动武汉学生起来斗争，他们认为，反对帝国主义，首先要从提倡国货入手。于是，当月就组织互助社的成员旅行到谏家矶等地调查国货，编印了国货调查录，并标明国货的名称、产地、性能、用途、价值等，分发给武汉商人。对提倡国货，抵制外货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林育南是《新青年》最热心的读者。因此受到了很深的影响。他曾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象在黑暗的地方见到曙光一样。”^①林育南认为，救国救民，只有少数人的觉悟是不够的，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共同奋斗。他看到还有很多同学，深受封建奴化教育的毒害，昏昏然如在黑暗的地狱里生活，心里非常难过，他想：我既然看了《新青年》，受到了启发，难道可以自私自利，不去帮助别人也尽快觉悟起来么？他决心“不揣愚陋，发一个大愿，做一项自觉觉人的事业。”^②于是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和胡业裕、魏以新、汤济川创办了《新声》半月刊。《新声》是武昌“第一个新文化出版物”，“是全国响应北大新思潮的先驱者”^③，内容虽然浅近，但是它猛烈地抨击封建礼教，反对湖北经心书院包办的黑暗教育，鼓吹新思想，却发挥了战斗的作用。

《新声》问世以后，封建遗老、反动军阀政客，群起而攻之，污蔑《新声》是“过激派”言论，“出辞荒谬，狂悖绝伦”。林育南对这些攻击毫不介意。他认为，中国的事情，不激烈无以成功，并且说：“俗话说得好，‘为人不自在，自在不为人’。我现在既然要‘为人’，还能讲‘自在’吗？”^④他又

^{①②④} 《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19年3月15日出版。

^③ 《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125页。

说：我们办这个《新声》，就是想一方面请人家引导我们往民主科学的道路上走，另一方面希望别人也跟着向这条路上来。

林育南学生时代最壮丽的一幕，就是和恽代英（中华大学附中部主任）等一道，领导了武汉的五四爱国运动。

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武汉，恽代英和林育南等互助社社员便立即发动武汉人民准备斗争。五月六日，汉口《新闻报》报道了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更加激起了他们的革命义愤。当晚，林育南和恽代英商印《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的传单六百份，传单上写着：“有血性的黄帝的子孙，你不应该忘记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现在又是五月七日了，那在四十八点钟内强迫我承认二十一条协约的日本人，现在又在欧洲和会里强夺我们的青岛，强取我们的山东，要我们四万万人的中华民国，做他们的奴隶牛马。”^①传单张贴在武汉三镇大街小巷。第二天，还以开运动会的名义在中华大学运动场举行了“五七”国耻纪念会。这天，他们又收到了北京朋友饶峰叙述北京五四运动的来信，读之泣下，恨不得立刻参加北京学友的战斗行列，林育南当即把这封信贴在中华大学门口的“揭示栏”上，激起了全校师生的爱国热情。因此也引起了林育南与校监余家菊（国家主义派）的一场斗争。林育南后来回忆说：“在五四运动发生的第三日——五月七日——我住武昌中华大学附属中学，接着北京友人的信，报告‘五四’的情形，并请求我们响应，作一致行动。当时我把这封信贴在揭示处以布告同学，余家菊先生以‘校监’的资格和权威，干涉禁止，我和他再三交涉，但最后他竟用强力把这封信扯掉了。他的理由

^①恽代英1919年5月6日日记。

是‘怕官厅干涉，于学校和他的地位有危险！’然而余先生的权威，竟胜不过‘时代的潮流’、‘群众心理’的大力，‘五四’运动终于普遍全国……”^①

在恽代英、林育南等的领导下，武汉五四爱国运动如大海之怒涛，奔腾澎湃。十七日，武汉学生联合会在中华大学正式建立，林育南被选为学联负责人之一。第二天，武汉学生联合会领导全市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林育南走在中华大学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持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林育南等又积极的领导和组织了武汉学生的“六·一”罢课斗争。

六月一日清晨，湖北督军王占元派出大批军警包围各校，严守各校大门，阻止学生外出。包围中华大学和武昌高师的军警各达三百名之多。爱国学生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到达预定的演讲地点，散发传单，宣传提倡国货。王占元命令军警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刺杀开枪，制造了“六·一”血案。六月三日，中华大学等校的学生又举行大规模的游行演讲，复遭军警镇压，中华大学又有九名学生受伤。

面对军阀的血腥镇压，和他们施展的提前放假的毒计，武汉学联于六月四日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继续坚持斗争，“青岛未争回，卖国贼未惩以前，联合会誓不散”，“假满后，目的未达到，决不上课。”^②并领导全市学生在省署门前举行了静坐示威。从察院坡（现武昌新华书店）到司门口和数百米长街（现解放大道），爱国学生手举“争我主权”、“惩

^①林育南：《五四运动与余家菊》，《中国青年》第80期，1925年5月16日出版。

^②《汉口新闻报》，1919年5月6日。

治国贼”、“爱国无罪”、“还我学友”、“惩治凶犯”等标语牌，向王占元、何佩谿（湖北省省长）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斗争。工人市民群众纷纷给学生搭凉棚，送姜汤和各种水果糕点，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

恽代英、林育南在领导武汉学生坚持斗争的同时，又积极号召商界罢市，支持爱国学生。在他们的宣传和发动下，六月十日，汉口开始罢市，十二日，武昌也全体罢市。在罢市的日子，林育南等每天都到市面了解情况，研究斗争动态，肚子饿了，就随便买块烧饼或一碗热干面、粉豆丝充饥。商人罢市和武汉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有力地支持了爱国学生的革命运动，终于迫使王占元释放了被捕学生，并向北京军阀政府和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去电，提出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的要求。

斗争的胜利，使林育南内心充满喜悦。然而他也认识到，中国政治的腐败，不是一次政治运动就能解决的，中国要图根本改革，必须把工商界及整个社会都发动起来，进行不懈的斗争。

六月十六日，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正式建立，不久，全国学联给武汉学联来函，要求加派两名代表，前往工作。武汉学联当即推选林育南等二人前往。行前，林育南参加草拟了《武汉学生联合会意见书》，《意见书》明确指出：全国学生联合会，一可以为政治界之最后有力的援助机关，二可以为学生界道德上、智识上互助之机关，三可以为下级社会承受通俗教育的机关，因此，“学生联合会应当永远成立”^①。《意见书》还对斗争策略、组织原则、工作人员的职责、学生义务、学生报

^① 《武汉学生联合会意见书》，连载于1919年7月15—23日《汉口新闻报》。

的办报目的和经费等问题，都作了详尽的论述。

六月三十日，林育南登上招商轮船，东去上海，投入新的战斗。

五四运动极大地提高了林育南的思想觉悟。恽代英在一九一九年十月一日的日记中写道：“中国若欲不亡，应该靠谁呢？……这千斤重担我们既能够挑，亦应该挑，只有湘浦（林育南）同我看得一样清楚。”这说明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林育南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救国救民的历史重担已落在革命青年的肩上。

一九一九年九月，林育南从上海回到武汉，和互助社的成员创办了另一个新刊物——《向上》，积极从事新思想、新文化的宣传和研究。与此同时，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大胆尝试，勇于实践，兴学校，办书店，建工厂，作为试验“共同生活”的基地，“以谋社会之改造。”林育南首先回到他的家乡，在回龙山八斗湾一座家庙里创办了浚新学校和一所通俗演讲社，“实施思想的教育和宣传农民地位的改造”。后“因经费困难，中途废辍。”^①随后，林育南又与恽代英等筹建利群书社（一九二〇年春正式服务社会，地址设在武昌横街头）。利群书社是“一个营业的机关，是一个文化运动的场所，是一个修养会社的结晶体，是一个社会服务的共同生活的雏形。”^②它是林育南和恽代英等探索革命道路，试验“共同生活”即“新生活”的基地，林育南新生活的思想，在“新声社”成立后就已产生，在《新声》上他曾发表过《新生活计划》一文，

^①林根：《黄冈的乡村教育运动》，见《中国青年》第20期，1924年3月1日出版。

^②《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124页。

提出了共同生活的意见，林育南等互助社成员认为，旧社会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一切恶俗败习，都是由财产的私有制造成的，要改造旧社会，铲除旧社会的“脓瘤”，“建设”新的社会，首先要有一批人试验新生活，培养公有制的观念，锻炼共同生活的习惯。

恽代英、林育南等试图避免用革命手段，推翻剥削者的统治，而希望通过“共同生活”的扩张和发展教育、实业，建设为社会服务的大资本，从而从经济方面压服资产阶级，使全世界变为“社会主义的天国”^①。在这一不切实际的思想指导下，决定了他们创办的书店和工厂必然失败。

林育南为继续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一九二〇年九月，考入了北京医学专校，住在北京前门外孙公园兴胜寺九号。

当时，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正在开展“社会主义论战”，这场论战对热切追求真理的林育南影响尤深。

随着“社会主义论战”的深入，林育南愈益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很快朝着马克思主义方面转变，他经常和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刘仁静（互助社成员）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讨论中国社会的改造等问题。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他在给利群书社朋友的一封信中，汇报了他们在北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在讨论是用“平和运动”（改良主义）还是用“大破坏的激烈运动”（暴力革命）的方法改造社会时，林育南认为“须同时并进，互相为用，不可缺一。”但是，在具体解释时，他又强调：“阶级的利害太冲突了，仅用和平的运动奏效甚难，

^① 《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196页。

而且太慢。”^①由此可见，林育南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已有了一定的认识。

从这以后，林育南便逐步洗刷了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对自己的影响，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年六月，他在给恽代英的信中明确表示不同意“共同生活”的主张，认为共同生活既不可能，也没有实现的必要。并诚恳地批评了恽代英在《未来之梦》一文中的观点，开诚布公地说，靠共同生活的扩张和发展教育、实业来实现社会主义，只能是“空想”，进而十分严肃地指出“我们这种理想是仿佛对的，但审察社会情形和我们的力量，恐怕终久是个‘理想’，终久是个‘梦’啊！”^②

林育南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就再也无心学医了。一九二一年七月，他从北京回到武汉，和恽代英、李书渠、林育英等发起，在黄冈浚新小学召开了受利群书社影响及有联系的各团体代表大会（长沙文化书社派易礼容参加了这次大会。会议着重讨论了建立革命团体问题。有代表提议把即将组织的团体叫“波社”（波尔什维克）。最后大会一致通过决议，成立“波歌维式”的组织，定名“共存社”，确定其宗旨为：“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争斗，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的目的。”^③这个宗旨闪烁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光辉，它公开宣布拥护马克思主义，赞成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然后走向共产主义。

共存社的成立，标志着恽代英、林育南等利群书社的一批

① 《我们的》第5期，1921年5月16日。

② 《我们的》第6期，1921年6月1日。

③ 《我们的》第7期，1921年8月10日。

成员，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转变，林育南已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共存社成立不久，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林育南得悉这一喜讯，心潮澎湃，无比激动，立即申请并加入党的组织，踏上了为工人阶级解放事业而献身的光明大道。

武汉工人运动的先驱

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不久，成立了一个公开领导职工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武汉和北京、湖南等地都设立了分部。林育南满怀战斗豪情，立即参加武汉分部的组织领导工作，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二一年九月和十二月，旗开得胜地领导了粤汉铁路和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的罢工。

粤汉铁路全长一千零九十六公里。一九〇〇年开始兴建，一九一八年，武（昌）长（沙）段铁路草草建成，并与长（沙）株（州）线接轨通车。由于清朝政府借款修路，所以路权操于帝国主义之手，铁路管理则是封建把头制。工人生活极为惨苦。当时普通工人月薪只有六元左右，而局长、高级职员则为数百元之多，洋总管和洋总工程师更高达一千五百元之巨。工人终日劳累，不得温饱。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和工头残酷地剥削工人，还对工人肆意辱骂、殴打、罚款、开除。一九二〇年底该路南段工程部工人因索欠薪和一九二一年三月车务工人因遭军队殴打，先后举行了罢工。这是中国铁路工人最早的罢工斗争，但由于缺乏领导，都失败了。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成立后，十分重视铁路工人

的斗争，曾多次派人到徐家棚等粤汉路北段各站进行考察，接着派林育南和包惠僧等得力骨干来徐家棚开展工作。

林育南等深入工人住区，了解工人的工作生活情况和要求，联系工人的痛苦遭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同时，十分关心工人的疾苦，有时还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救济贫苦工人，尽力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问题。

为了迅速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武装铁路工人的头脑，林育南和施洋、李书渠等在徐家棚创办了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夜校。林育南亲自讲课，找工人促膝谈心，提高他们的觉悟，教育他们认识自己的力量，鼓舞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在林育南等的指导和帮助下，徐家棚铁路工人很快地发动起来，建立了粤汉铁路职工联合会。广大工人团结在联合会周围，为反对压迫，改善生活，积极开展斗争。

一九二一年九月，粤汉铁路小工在联合会的支持下，发表罢工宣言，控诉铁路当局的罪行，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举行了罢工。当时在粤汉铁路任职的洋总管英国人卡墨克尔，看到罢工宣言后，恼羞成怒，暴跳如雷，悍然开除了八十一名罢工工人。粤汉铁路工人闻小工要求增加工钱不准，反被开除，“即大动公愤”，在林育南和施洋的指导下，以职工联合会的名义，立即印发传单，草拟《觉书》，揭露路局压迫剥削工人的罪恶，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为反抗压迫奋起斗争，并呼吁各界同情与声援。在致粤汉铁路当局的《觉书》中严正声明：“若不允许加小工的工钱，凡机车的工人，也得继起罢工”^①；

^① 《劳动周刊》第10号，1921年10月22日出版，见《中国工运史料》1960年第2期。

并郑重宣布：誓作铁路小工的坚强后盾，支持小工把斗争坚持到底。

《觉书》发出后，北洋军阀政府大发雷霆，狂叫“粤汉路如让工人得胜，将来京汉、京奉、津浦、沪宁……各路都象这个样子，那不弄成一个全国总罢工了吗？所以宁可牺牲粤汉路的工人，决不可使他们做全国罢工的模范。”^①并急不可耐地采取高压手段来扑灭罢工火焰。老奸巨滑的洋总管，对工人的正义要求，置之不理，这样更激怒了工人群众。职工联合会代表全路工人于十月十一日，向洋总管理直气壮地提出“改良待遇的十五条件”^②，并限二十四小时答复。洋总管对工人提出的条件，置若罔闻。在林育南的领导下，粤汉铁路工人发出檄电驱逐洋总管，其主要内容如下：

……同人等服务粤汉路，历有年所，虽素感待遇之不平，然犹能降心以从事。概自总管卡墨克尔任事以来，殴打工人，辱骂监工，欺侮员司，克扣抚恤，偿罚兼诸好恶，革除违反常情，盖彼视中国人之人格，恒在水平线以下，而易与之也。同人等为保全中国人格计，为维持个人生活计，为尊重人道计，为发达路务计，于十月十一日向总管提出改良路务，修正待遇等十五条，乃该总管刚愎自用，傲慢成性，竟将同人所提出之十五条完全拒绝，同人等受此痛苦，呼吁无效！固于十月十三日全体辞职，誓于该总管不共复戴，诸公或为社会中坚，或属路工同志，或掌笔政，或同袍泽，务必仗义执言，同伸公理，则不独同人

①② 《劳动周刊》第10号。

之幸，亦中国人格之幸。粤汉铁路机车处全体辞职工人八百三十七人同叩^①。

这个用工人的血泪凝成的通电，激发了工人的斗志，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

在职工联合会的领导下，粤汉铁路职工众志成城，团结战斗，掀起了声震全国的大罢工，“把一个武长铁路，弄到一步也不走”^②。对此，北洋军阀政府惊恐失色，惊叹粤汉工人“团体坚固，不是官威可以制服的。”^③于是立即改变策略，吴佩孚急电肖耀南火速妥为办理，切不可使其断绝交通。十六日，罢工的第三天，肖耀南急派一个姓边的司令前来职工联合会与铁路工人代表接洽，谈判结果，对工人所提出的条件，一概应允。十月十七日，粤汉铁路职工联合会下令复工，历时五天的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次“制胜威赫赫的洋经理”^④的罢工壮举，“在我们劳动界的人听见了，没有哪一个不是手舞足蹈的，欢天喜地哩”^⑤。

在粤汉铁路工人胜利罢工的鼓舞下，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的斗争又呼啸而起。

汉口人力车工人是武汉人数多而且比较集中的行业工人。他们受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重重剥削，生活极其悲惨。当时的《时报》从一个侧面作过以下简要报道：

“……在平时，车行实行包工制，车行包头，专放复利，虐待车夫。其复利并非现资放出，乃车夫租金逐日不能缴金者，如今天欠缴车租一百文，明日须一百二十文，……如此利

①②③④⑤ 《劳动周刊》第10号。

上加利，积日累月，车夫不能缴，则用种种非刑凌虐，车夫中受此痛苦者，十居五六”^①。

汉口人力车工人的生活，是旧中国悲惨的工人生活的一幅真实写照。他们为生存计，曾进行过多次反抗，但都遭到了失败。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底，汉口租界人力车行老板又一次宣布加租，每日每乘车由原来的八百文增加到一千文，理所当然的要遭到工人反对。党派林育南和施洋、郑凯卿直接领导了这次罢工。他们深入汉口租界，召开人力车夫代表的秘密会议，制定罢工计划，组织“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团结广大工人进行反抗加租的斗争。林育南和施洋指导与帮助车夫工会起草《罢工宣言》和《告各界父老兄弟姐妹书》，并向车行老板提出：车夫会成立，不得干涉；取消加租议案；原租价减为六百文等三项要求。十二月一日，汉口租界六、七千人力车工人爆发了大罢工。林育南和施洋起早睡晚，废寝忘食，起草传单，声讨车行主盘剥车夫的罪行；发动武汉各界人士，声援罢工斗争；深入工人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工人党员郑凯卿还化妆成车夫，同人力车工人一道，并肩战斗，给工人增添了夺取罢工胜利的勇气和力量。

为争取各界的声援，扩大社会影响，六日夜，林育南和施洋召开工人代表会议，指导工人组织“车夫讨饭团”，“以乞丐团形式，结队向租界游行”^②。

当游行队伍进入法租界时，租界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实行

① 《汉口通讯》，见《时报》1921年12月12日。

② 《汉口通讯》。

紧急戒严，不准游行队伍通过。工人群众义愤填膺，与军警展开了大搏斗，林育南后来对这次搏斗的悲壮情景作了以下回忆：

“于七日晨邀车夫五六千人，在大智门景家台集合，整队出发，沿途行乞，并游行示威，至汉口总商会，要求救济。返游行租界，经英俄以至法租界，声势浩大，租界戒严。法国巡捕及武装军队出而阻止，车夫奋不顾身，冲锋前进，抢夺法兵枪械，与法兵巡捕战斗二三小时之久，捣毁巡捕房及车行包车和行主法人的住宅。因车夫工人被捕，群众亦掳去法兵二人，并包围法巡捕房及领事馆要求释放，作猛烈之示威，形势严重，如开大战。法领卒屈，释放车夫，而轰轰烈烈的车夫群众得了完全胜利，成为我国对外人交涉中最光荣的运动！”^①

人力车夫的英勇革命行动，震撼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武汉的反动统治；同时，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法帝国主义者和武汉反动当局慑于人力车工人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急忙授意武汉商会出面调解。

经过谈判，车行老板被迫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即法领事向中国官厅道歉，允许车夫工会成立，车租暂行不加，免租钱三日，罢工获得了完全胜利。

林育南和施洋等领导的粤汉铁路和汉口人力车工人的罢工，对湖北以及全国的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邓中夏在评价这次斗争时说：“武汉因铁路工人与人力车工人两大罢工，开了当地一个新纪元，职工运动从此有一个顺利的发

^①林育南：《施伯高传》，见《党史资料》1955年第1期。

展”。他还特别指出：这两次罢工的“主持者为林育南和施洋同志”^①。

为了从法律上确保工人的合法利益，一九二二年秋，邓中夏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拟定了十九条劳动法大纲，发动劳动立法运动。林育南领导武汉各工团立即响应，召开会议，发出通电，要求国会通过劳动法大纲。七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和武汉、上海、湖南、广东以及山东等分部负责人邓中夏、林育南、阮大时、毛泽东、谭平山以及王尽美等联合向众议院议长发出请愿书。劳动立法大纲在国会虽然没有被通过，但劳动立法运动，尤其是书记部提出的十九条大纲都深入工人群众之中，变成了罢工高潮中斗争的纲领。

林育南在领导武汉工团进行劳动立法运动的同时，又胜利地领导了汉阳钢铁厂、汉阳兵工厂的罢工，并积极筹划建立武汉工人的统一组织。一九二二年秋，汉阳钢铁厂工会、人力车夫工会、扬子机器厂工会、江岸铁路分工会、徐家棚铁路分工会等二十多个工会，组成了“武汉工团联合会”。林育南兼任该会的秘书长，总理一切会务。

武汉工团联合会（以下简称武汉工联）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第一个大斗争，便是参加领导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的大罢工。

粤汉路鄂段铁路局长王世埏，阴险狡诈，利用天津同乡关系，拉拢部分人在徐家棚组织“天津同乡会”，排斥外地工人；同时，还物色了一些人充当他的打手。行车监工张恩荣是王的同乡和得力爪牙；翻译苗凤鸣也是王的亲信。张、苗二人

^①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9—20页，1930年6月出版。

互相勾结，倚官仗势，狼狈为奸，肆意虐待工人，经常无故处罚毒打，甚至开除工人。一次他们借故开除工人吴青山，激起了粤汉工人的愤慨。工人们立即电告北京交通部，限三天以内撤办张、苗二人，并警告路局，如不圆满答复，则举行全路总罢工。九月六日，徐家棚、岳州、长沙、株萍四处的工人俱乐部召开联席会议，成立粤汉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准备罢工。九月九日，全路车辆停驶，锅炉熄火，工厂停工，粤汉路工人掀起了罢工怒潮，提出了“张、苗二人革职，吴青山复职”等七条要求，^①并发表宣言，声讨张、苗罪行，呼吁全国各界给予援助，同时明确提出罢工的目如下：“我们为‘解除压迫’、‘维持团体’、‘改良生活’、‘提高人格’，不能不罢工呀！我们完全为我们切身利益而奋斗。我们为生存而奋斗，为人格而奋斗，不达到目的，誓死不止！”^②

为加强对罢工斗争的统一领导，遵照党的指示，在徐家棚设立了罢工指挥总部。由林育南、施洋、郭亮（粤汉路岳州工人俱乐部秘书）和何叔衡（中共湘区委员会负责人之一）等负责罢工的组织领导工作。武汉各工团、京汉路南段俱乐部和湖南新河站工人俱乐部也派专人前来协助工作。

罢工开始后，王世靖施展种种卑鄙伎俩，唆使“工人研究所”，收买工人，与工人俱乐部对抗，欺骗、蒙蔽部分工人接手开车；同时勾结湖北督军肖耀南调动武装军警百多人，来徐家棚进行弹压，妄图以此来分化瓦解工人，破坏罢工斗争。

① <一九二二年秋交通界三大罢工之原委>，原载1922年11月10日湖南出版的《商业杂志》第1卷第1号，转引自《党史资料》1955年第1期。

②转引自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206—207页。

针对王世埏的阴谋，林育南等发动工人开展政治攻势，开导军警不要干涉工人的罢工，劝导“工人研究所”的工人不要再受王世埏的欺骗，回到工人队伍中来。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争取了部分工人，壮大了罢工队伍。

罢工后，火车象死蛇一样，静悄悄地躺在轨道上一动也不动。

十日晚。夜阑人静。铁路当局唆使研究所部分工人接手开车，并派武装押运。霎时，罢工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妇女小孩数百人一齐出动，卧轨阻车。穷凶极恶的王世埏竟然指挥军警进行弹压。与此同时，岳州罢工工人卧轨截车也遭到军警屠杀。这一血案，当时湖南长沙出版的《商业杂志》作了如下报道：

“十日晚十一时，铁路当局又令研究所一部分工人开车，当有罢工工人百余人及工人家属之妇女幼孩等，群卧轨道上，不让车行，乃军警听局长之指挥，竟以惨无人道之手段，横拖直曳，肆行杀伤，儿啼妇哭，惨不忍睹，一时受伤者百余人，投水失踪者十余人，被捕者九人，受重伤者三十余人，受伤命危者八人。同时长沙来车到岳，岳州俱乐部工人，全体横卧铁轨，阻止去路，亦有指挥者调来军队两连，将各工人以刺刀枪托，乱杀乱刺，当时毙命者六人，重伤六十余人，押解来鄂者三十七人，均囚于武昌玻璃厂。综合两处计算，横被军警杀伤者至达二百数十人之多，……”^①

惨案发生后，粤汉路罢工指挥总部，召开紧急会议，向铁路当局提出以下四条：“（一）撤退弹压军队、并惩办行凶军警；（二）革除并惩办王局长；（三）从优抚恤死伤工人及工

^① 《一九二二年秋交通界三大罢工之原委》。

人家属；（四）完全承认工人前次提出的七条件。不达目的，决不上工。”^①并向全国发出快邮代电，请求各界援助。

武汉各工团在林育南等的指导下，于十二日在汉口法租界召开紧急会议，坚决援助罢工工人。在武汉工团联合会发出的宣言中指出：“武汉工团联合会认为这件事，是我们劳动阶级全体的事，不是粤汉工友一部分人的事；是我们劳动阶级全部的耻辱，不是粤汉工友一部分人的耻辱。因此，这个问题要我们劳动阶级全体去解决。武汉工团联合会决定各工团以实力援助这次罢工。粤汉铁路的工友呀！你们要勇敢决绝坚持到底，百折不回，我们誓尽力为你们的后援！”京汉南段工人还派出代表，请京汉路北段、京绥、京奉、津浦、沪宁各站工友，为粤汉后援。武汉各工团也组织了“粤汉罢工后援会”，发动捐款援助罢工工人。武汉工联筹款一千元，京汉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捐款五百元，救济罢工工人。武汉工联和京汉路南段工人俱乐部还作出“三日内如不作圆满解决即全体罢工”的决定，并把这一决定通知湖北督军肖耀南。肖接到这个通知后，惊慌失措，急忙打电话大骂王世埏，不该闯出这样的大祸来，并责令王世埏一手办理。据当时的报纸记载：“王世埏接到这个电话，登时昏绝椅上。汗如雨下。”^②

与此同时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立即动员湖南工人团结各界人士给予有力的声援，并派出得力干部何叔衡来武汉和湖北党组织以及武汉劳动组合书记部林育南等磋商营救被捕的同志和把罢工进行到底的办法。

京汉路长辛店、郑州、信阳及陇海路的洛阳等站工人都纷

①《一九二二年秋交通界三大罢工之原委》。

②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209页。

纷致电路局。坚决表示，三日内如不完满答复粤汉工人的要求，即实行全体铁路工人的同盟罢工。

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浦东纺织工会、劳动组合书记部等十多个工团，作决议，发通电，“要求严办凶手，抚恤杀伤工人及其家属，并致函粤汉罢工工友，加以慰勉。”^①同时组织“粤汉路罢工经济后援会”^②，分途捐款，以作实力援助。声援罢工的浪潮席卷全国。

面对这种情势，北洋军阀惶惶不安，只好派交通次长劳之常来汉，企图平息罢工怒潮。

九月十四日晚，星明气爽，秋风拂拂。京汉、粤汉铁路及武汉各工团二三千人，各执小旗，列队进至刘家庙车站，秩序严整。队前有两面白布大旗，一面写着“撤退弹压军队，惩办行凶军警”等，一面写着徐家棚、岳州血案惨状。这是由林育南等领导、施洋坐镇指挥的一次示威运动。

是日晚七时五十分，火车到站，车厢内钻出一个大鼻子、小眼睛、油头滑脑的中年人，向群众招手致意。此人就是臭名昭著的劳之常。当时工人代表怒形于色，跑步上前，向劳之常递交请愿书，广大工人把施洋、林育南等书写的“杀人者死！”“工人是杀不尽的！”等一幅幅标语，举到劳的面前。狡黠的劳之常见势不妙，便装出一副慈悲相，点头哈腰，假惺惺地向工人赔礼道歉，口里还念念有词地说：“明天解决，明天一定解决！”

① 《工界团体援助武汉工人》，见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9月18日。

② 《各工团援助武汉工界热》，见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9月20日。

十六日，工人们没见到劳之常的答复，便在大智门车站又进行了一次声势更大的示威。当天，车站人山人海，愤怒的口号声，划破楚天长空，震撼武汉三镇。当劳之常与王世埏的小汽车进入车站时，怒气冲天的受伤被捕工人家属和工人群众，蜂涌而上，将小汽车团团围住。王世埏吓得面如土色，浑身直打哆嗦；劳之常急得抓耳搔腮，额上还沁出豆大汗滴，当场被迫同意发给受伤工人每人二十元养伤费，并诺诺连声要把工人提出的要求带回交通部“商量解决”。

打铁必须趁热。十九日，各工团代表在林育南等的领导下，联袂渡江，到粤汉路局提出“以释放被捕工人用专车送回原处为先决条件”等四条新要求，同时向王世埏递交了《最后警告书》。书中历数王世埏破坏工人运动的罪行后，严正指出：“敝工团等本休戚相关之义，抱息事宁人之心，特再三让步，提出最后警告。务望贵局长从速省悟，剋日完全承认，以平众怒，而复路政。否则敝工团等，定率武汉全体工友，以周旋于贵局长左右，前日大智门之包围，恐不难再见于徐家棚也。特别敬告，并颂公祺。武汉工团联合会等”^①。王世埏见代表声色俱厉，警告书措词强硬，被迫答应释放被捕工人，撤退弹压军队，撤办张、苗，从优抚恤死伤工人及赔偿损失等条件。

二十一日，王世埏又否认前言，不同意将张、苗停职。这种出尔反尔的卑鄙行径，更加激怒了工人群众。是日，武汉各工团代表集会于徐家棚粤汉路工人俱乐部，一致署名，不达目的，决不上工。

^① 《一九二二年秋交通界三大罢工之原委》。

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紧接着发表了《告国人书》，沉痛地指出：“全路工人所受的虐待，真是积冤难诉呀！因为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所以一致停工，以求解决。乃本路局长王世埏，阴险狡诈，待我工人，如牛马奴隶之不若。指使他的私人，故与工人冲突，破坏我们的团体，朦请军警，武力枪杀岳州徐家棚工人……并囚禁受伤工人三十二人于玻璃厂，至今十余日，不准工人家属看慰，其因伤、饿寒暑之侵迫，命在垂危者十余人。彼犹以为未足，私发冒名传单，藉以唆使工人，自相残杀，诬陷工人，运动军警，以遂其欲加之罪，种种压迫我们工人的事实，真非一言所能尽述。”^①百数十字，把王世埏的罪恶揭露得淋漓尽致。《告国人书》继而在陈述了罢工原因，最后呼请全国工人阶级和各界人士发扬阶级友爱精神，给予无私的援助。

《告国人书》言简意赅，哀而动人，在全国尤其在铁路工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粤汉路工人俱乐部每天接到全国各地的声援函电不下数十起。各地的援助捐款也源源而来。

二十四日，武汉各工团及京汉、陇海各路工人代表千余人，在江岸扶轮公会开会，群情愤激，决定到二十五日下午八时止，粤汉罢工工人所提出的要求条件尚得不到解决，京汉南段即于二十五日晚举行大罢工，并发表通电。向反动当局提出严重警告。同时，会议还作出决定，准备组织敢死队五百名，以实施罢工后之动作。罢工斗争即将蔓延全国铁路，危及北洋军阀反动统治。因此，北京政府交通部和北洋军阀吴佩孚异常惊恐，于是急电王世埏和肖耀南，火速解决工潮，在全国工

^①《一九二二年秋交通界三大罢工之原委》。

人阶级的强大压力下，经过谈判，于二十五日下午，王世埏被迫接受了罢工工人提出的各项条件。付出了血的代价的粤汉路工人的罢工斗争终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粤汉铁路工人罢工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武汉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斗志，同时也为武汉和湖北的工人运动提供了宝贵经验。在武汉劳动组合书记部和武汉工团联合会的组织领导下，武汉和湖北的工会组织急剧增加，罢工斗争不断高涨。

林育南从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坚持革命团结这是工人阶级夺取罢工胜利的无价之宝。同时清楚地认识到：要加强团结，巩固组织，解决工人群众内部的矛盾和纠纷，必须从教育着手，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工人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明确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人队伍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才能消除分歧，增强团结，巩固发展组织，夺取革命的胜利。

理论、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林育南带领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同志，深入工人群众，找工人个别谈心，开办工人夜校和工人子弟学校，用开会演讲等各种形式，向工人进行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武装工人的头脑，用小局服从大局、个人服从整体等大道理晓喻他们，并在实际斗争中为他们排忧解难。在林育南等的教育下，马列主义的春风吹开了工人眼前的迷雾，促进了他们的觉悟和团结。一九二二年十月十日，湖北各工团联合组成了全省统一的工人组织——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

十月十日那天，武汉数千工人喜笑颜开，欢聚一堂，庆祝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成立。会上，杨德甫（后成为工贼）、陈天、包惠僧、李汉俊等被选为执行委员，施洋被聘请为法律顾

问，林育南被选为秘书主任，负责日常工作。会后，还举行了盛大的游行。从此，湖北工人运动在自己公开的司令部的领导下，更加蓬勃向前发展。

在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成立的当天，为巩固扩大工人运动的成果，进一步加强对工人群众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促进工人的团结与觉悟。林育南、施洋等，在汉口笃安里创办了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机关报《真报》。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郭祖贲、郭寄生（后成工贼）、张子余等人。《真报》公开宣言：“以代表全国被压迫、被蹂躏、被损害之大多数同胞的利益为职志”^①，“以拥护工人及一切无产阶级之利益为天职”^②。它发布工团联合会的指示、命令，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大力报道工人运动和学生、市民的爱国斗争，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资本家压迫工人的罪行，抨击社会弊端，成为武汉和湖北工人的喉舌。林育南除亲自指导编辑人员的工作外，还经常动手撰写文章。该报刊载的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经验的文件和各种评论，大多出自他的手笔。《真报》出版后，武汉工人争相阅读，工会干部莫不人手一份，视为战斗的指南。当时汉口香烟厂曾赠送对联一副：“顺应潮流，维持正义；不畏强暴，力挽狂澜。”扁额一方：“劳动福音”^③。

在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具体领导下，在《真报》的宣传鼓动下湖北工潮波澜壮阔。十月十六日，汉口英国香烟厂因女工遭侮辱，全厂三千多工人愤然出厂，结队游行，举行大罢

① 《汉口真理报被封后之宣言》（第一号），见《二七工仇》，载《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1期。

②③ 《二七工仇》。

工。在林育南、施洋的指导下，工会与工厂主经过反复谈判，签订了条约，并承认工会与工厂主有直接交涉权，罢工取得了胜利。可是，时隔不久，该厂资本家自食前言，撕毁条约，无故开除工人代表。一九二三年一月四日，香烟厂工人举行了第二次大罢工。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出面调停，林育南派律师施洋以仲裁人身份，与资本家在谈判桌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经过施洋的据理抗争，英资本家理屈词穷，被迫于二十二日签订条约，罢工斗争再次取得胜利。

在英国香烟工厂罢工的热潮中，英租界内的棉花厂工人，因一职员侮辱工人代表，发生冲突，英国巡捕非法捕走工人，花厂工人奋起反抗，英租界当局出动海军，在租界内实行戒严，妨碍、干涉工人的行动自由，激起了数千工人的大罢工。经过谈判，棉花厂工人夺取了罢工的胜利。大冶下陆铁矿等许多工厂的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邓中夏对这个时期武汉的工人运动曾作过高度评价。他指出：“在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于武汉方面发现一个令人不可逼视的狂潮，以工业中心城市的罢工潮而论，当时应首推武汉。”^①

在滚滚的罢工浪潮中，工会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先后成立的工会有：大冶钢铁厂工会、汉口棉花厂工会、汉冶萍轮驳工会、汉口英国香烟厂工会和汉冶萍总工会等。武汉工人运动进入“极盛时代”^②。其中汉冶萍总工会，工人总数达三万之多，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一个工团。它的成立为全国各界所瞩目。

一九二二年冬，汉阳钢铁厂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①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31页。

^②林育南：《施伯高传》。

大冶下陆铁矿工人俱乐部、汉冶萍轮驳工会和大冶钢铁厂等五个工会，在武汉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林育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李能郅（立三）、路局主任朱少连以及汉阳钢铁厂工会领导人许白昊等的领导与筹备下，建立了总工会。

十二月十日下午，汉阳三码头老街，红旗招展，人声喧哗，数千工人欢腾雀跃，共庆总工会的成立。

大会主席致词后，林育南兴致勃勃地登上讲台，代表武汉劳工组合书记部作了长篇演讲。他慷慨陈词，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抨击私有制的弊端和资本阶级的罪恶，大声呼吁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紧密地团结起来，“作成阶级斗争坚固的战线，打倒万恶的资本阶级，建立劳动者管理的世界”^①。

林育南遵照列宁关于“要建设共产主义，就必须掌握技术，掌握科学”^②这一教导，语重心长地勉励工人刻苦勤奋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训练掌握生产机关的才能，以便将来我们能够自己管理产业造成一个共产制度的社会”^③。林育南号召工友同志们，认清盛会的意义，为完成工人阶级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努力奋斗！

林育南的演说，为工人阶级指出了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极大地鼓舞了武汉工人阶级的斗志。

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争取成立总工会的自由和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举行了震撼世界的“二七”大罢工。这次罢工是“我们中国工人阶级最初

①③ 《武汉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林郁兰先生演讲词》，存安源革命纪念馆。

②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1920年），《列宁全集》第30卷第419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

对敌人的一次血战”，是“中国工人革命的信号”，和“中国民众自由解放的福音”^①。它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战斗力量，在我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当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秘书主任的林育南，参加领导了这一罢工，并在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九二二年四月九日，京汉铁路工人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具体领导下，为统一全路的工会组织，适应斗争的需要，首先由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发起，在长辛店召开了成立全路总工会的第一次筹备会，同年八月十日，在郑州召开第二次筹备会，成立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杨德甫任主任委员，史文彬、凌楚藩任副主任委员，项德隆（项英）任总干事，负责进行筹备工作。根据党的指示，林育南、许白昊以《劳动》周刊记者的名义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参加和指导筹备处的工作。林育南参加草拟总工会的宣言和章程草案等工作。经过林育南和项德隆、史文彬、施洋等几个月的共同努力，成立总工会的工作筹备就绪。一九二三年一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第三次筹备会，一致决定：“定于二月一日在郑州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遍邀各工团，各界到郑参加典礼”^②。

一月三十日晚，林育南和陈潭秋、施洋、李求实、李汉俊、许白昊等率领武汉各工团——汉冶萍总工会、粤汉铁路总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和粤汉铁路徐家棚分工会等三十多个工团和新闻界学生联合会等单位的代表共一百六十余人，附以军乐队，带着武汉工人阶级的深情厚谊，从江岸车站出发，乘

①林育南：《纪念“二七”流血的战士》，见《群众》周刊1927年第9期。

②《“二七”大屠杀的经过》，见《向导》周报第20期。

车北上参加总工会的成立盛典。

二月一日清晨，阴霾满天。在军阀吴佩孚指使下，郑州全城实行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如临大敌。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气急败坏地一再狂叫：“我黄殿辰在郑州一日，即一日不准工人开会”，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武力恫吓不足为惧。上午八时，工人代表、来宾和郑州铁路工人千多人，手执红旗，直奔普乐园戏院会场，参加总工会成立大会。林育南后来作了如下回忆：

二月一日上午，代表“结队持旗，并携匾额对联，往工会庆祝，音乐队随其后，行至中途，武装军警密布，如临大敌，阻止前进。经代表再三交涉无效，伯高（即施洋）及诸人，愤不可遏，忍无可忍，乃奋不顾身，冲过阵线，拚命前进，拥入会场。群众大呼‘劳工万岁！’‘打倒军阀！’及‘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革命万岁！’并宣布京汉总工会成立。同时场内外军警密布，全副武装，向群众示威，百般恐吓。伯高等犹大声疾呼地演说，群众放声大哭，与军警反抗，至数小时之久，始冲围而出”^①。

是日下午，“代表所驻旅馆，便有兵来监守，不许偶语，总工会在万年春菜馆所定的饭菜，亦不准出售。各代表一时完全丧失自由，饮食不得。各团体所赠的匾额礼物等，也尽被毁遗道旁，不许餽送。总工会会所被重兵占驻，且禁止工人出入，室内一切文件什物，尽被捣毁。”^②“一时狂风惨雾，郑州全市陷于黑暗之中”^③。

^①林育南：《施伯高传》。

^②《二七大屠杀的经过》。

^③《京汉工人流血记》第13页，存郑州二七纪念馆。

当晚，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召集有各分会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当即通过一项决议：“我们为抗争自由起见，议决于四日午刻宣布京汉全路总同盟大罢工，同时为事实上的便利起见，总工会决移江岸办公，……”^①会议还对罢工斗争作了具体部署。林育南以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成员的身份参加了这一重要会议。

会后，武汉方面的代表在林育南、陈潭秋等的率领下乘火车南下。在列车上，林育南和项德隆、施洋等总工会的负责人一起，研究起草文件，部署罢工的具体事宜。武汉三十多个工团代表经过热烈讨论，决定回汉后立即发动工人，全力以赴地支援罢工斗争，誓作京汉铁路工人的坚强后盾。

林育南和总工会来汉的负责人以及武汉各工团代表回汉后，立即宣传与组织群众，起草文件，夜以继日地为罢工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

武汉各工团代表一下车，就在江岸分工会召开大会，向工人群众报告在郑州开会的经过。“江岸工人闻之，切齿顿足，愤恨万分”^②。武汉各工团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十八个工团联名致电京汉铁路总工会及各分工会，以实力声援他们的正义斗争。电文在揭露军阀破坏总工会成立的罪行后指出：

“我等代表全体湖北各工团，誓以全力为诸君后援，即赴汤蹈火，拚一死命，亦所不惜！”^③

林育南在领导武汉工人阶级为援助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

① 《二七大屠杀的经过》，见《向导》周报第20期。

② 林育南：《施伯高传》。

③ 《二七工仇》。

加紧进行战斗准备的同时，又积极参加领导与协助京汉铁路总工会临时办事处（设汉口江岸分工会）的工作。林育南和总工会的负责人奋笔疾书起草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全体工人罢工宣言》和《敬告本路员司》、《敬告旅客》等传单。宣言理直气壮地指出，我们京汉的铁路工人本着国家约法上所赋予的自由，和保障自身利益的宗旨，组织工会，完全是正大光明的，是工人阶级的正当权利。并无情地揭露反动军阀破坏总工会成立大会的罪行，号召工人阶级向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军阀猛烈开火。宣言最后郑重宣告：从本月四日正午起，京汉路全体一律罢工。

罢工前，这些宣言、传单张贴在武汉的工厂、码头、街头巷尾，为大罢工鸣锣开道。

二月四日上午九时，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坚决执行总工会的决定，下达了罢工命令。“二七”老工人黄正兴回忆了当年罢工的生动情景：

“一九二三年二月四日上午九时，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下达了罢工命令，我带着阶级重托，心中满腔怒火，使尽力气，拉响了江岸大罢工的汽笛。阵阵笛声划破长空，武汉三镇震得天摇地动！工人们听到笛声，象听到进军鼓，立刻行动，关上电门，剪断电线，机器停转，锅炉灭火，水泵拆开，机件隐藏，一场震惊中外的大罢工开始了。”^①京汉铁路其他各站也相继罢工。

罢工开始后，林育南的工作更加繁忙。罢工当天，湖北全省工团联合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办法。会

^①黄正兴：《新春寄语》，见《湖北日报》1980年2月9日。

议作出如下决定：第一步发布宣言，以作声援；第二步作一致行动，同情罢工^①。为贯彻会议精神，会后，林育南深入工厂、学校，发动武汉各界起而援助罢工工人斗争；领导《真报》并联络武汉各报编出罢工“号外”，起草各种文告，大造声势。二月五日，林育南组织草拟了《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宣言》，严正指出：“我们不打倒军阀，我们是没有生路的，现在希望我们劳苦的同胞，一致向我们共同的仇人，军阀及其爪牙反抗呀！援助我们京汉路的劳苦同胞，即是为我们全国同胞争生存争自由，即是打倒我们共同的仇人，解除我们共同的压迫，求得我们共同的幸福呵。”宣言斩钉截铁地指出：“我们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已全体议决用实力援助京汉路的工友，到紧急时，我们全体（湖北全省各工团）决定取一致行动，宣告总同盟罢工，必要达到完全目的才罢。”宣言最后号召：“工友们，全国被压迫的同胞呀！生死关头，时机紧迫，大家一致起来拚命的向军阀决斗呀！”^②在林育南等的领导与鼓动下，武汉地区掀起了声援京汉工人罢工的狂潮激浪。

六日上午，刘家庙旗帜飘扬，人声鼎沸。武汉各工团各界群众代表组成的慰问队，高举“支援京汉铁路工人兄弟”的大旗，云集在江岸举行慰问大会。林育南和施洋、汉冶萍总工会代表许白昊以及其他各界代表在会上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会后，万余人结队游行。林育南和施洋、项英、林祥谦等工团领导人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纠察队员高举着工会和纠察

^①林育南：《施伯高传》。

^②《京汉工人流血记》第97页。

队的旗帜，威武雄壮；敢死队员佩带徽章，手持齐眉棍，走在队伍的两边；游行群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声势相当浩大。“由江岸经过租界以抵华界，历二小时许，沿途加入三千余人，所过商民多高呼欢迎，巡捕警无敢阻拦者，此种情形实为仅见。”^①

这次声势空前的罢工和游行，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惊恐和仇恨，就在当天下午，英国等外国总领事和肖耀南的代表麇集在英国领事馆进行密谋策划，一场腥风血雨即将袭击武汉和京汉铁路。

二月七日下午，武汉上空乌云翻滚，北风哀号。吴佩孚、肖耀南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派出两营全副武装的军队，包围江岸分工会和工人住宅区，进行血腥屠杀。一时枪声大作，弹雨纷飞，有三十七人倒在血泊中（被逼投江溺死和被害的家属未计算在内），二百多人中弹受伤。晚上，京汉铁路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被绑缚在车站的电杆上，敌人威逼他下令复工，林祥谦宁死不屈，壮烈牺牲。

惨案发生的当晚，汉口各帝国主义租界，添岗加哨，架起洋枪洋炮，戒备森严。双手沾满工人鲜血的剑子手肖耀南又把悬赏通缉林育南等工会领导人的布告，遍贴通衢，刺耳的警车、张牙舞爪的军警，四处捕人。当晚拘捕的工会代表就有数十人，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也不幸被捕入狱。湖北全省总工团联合会被封闭，工会什物、匾额被毁劫一空。白色恐怖笼罩武汉三镇。

悲愤化为千钧力。林育南坚定沉着，冒着生命危险，奔走

^① 《向导》周报第20期。

呼号，连夜秘密召开湖北各工团代表会议，决定举行总同盟大罢工，反抗吴佩孚、肖耀南一伙的血腥镇压。从二月八日起，粤汉铁路、汉阳钢铁厂、汉冶萍轮驳、丹水池和扬子机器厂等工人举行罢工，坚决为京汉铁路工人的后援。

八日晨，反动军警封闭了武汉工人阶级的言论机关——《真报》馆。接着，武汉各工团相继遭到封闭，工人夜校和工人子弟学校一律被勒令停办，二千二百二十四名工人被开除出厂，流落街头。

敌人的倒行逆施，不但没有吓倒征服武汉的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反而激起了更强烈的仇恨与反抗。惨案后，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发出“紧急代电”，把军阀屠杀工友，封闭工团的血腥罪行通告全国，“伏望全国同胞，主持正义，一致声援，俾惨遭屠杀之数万工友，得以伸雪；被捕工友，得以自由；并恢复京汉总工会与敝工团联合会。”^①二月十日，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又发出“紧急通知”，再次声讨军阀的滔天罪行，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与我们是势不两立的仇人，如果他们还存在，我们是永远被他们残杀的。……我们只同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要求或请愿，是等于与虎谋皮；唯一的方法，只有用我们的力量，打倒他们呀！”通知呼吁工人牢记这不共戴天之仇，服从工团联合会的命令：“团结一致，奋斗到底”，“准有一天，万恶的敌人是要被我们打倒的”^②。

林育南还和郭祖贲等《真报》编辑人员，发表宣言痛斥军阀惨杀同胞，封闭报馆的罪恶行径，严正指出：“值兹生死一

^{①②}《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紧急代电》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紧急通知》，均见《二七工仇》。

刻，肉搏拚命之时，启全国同胞共同集合于打倒吴佩孚、肖耀南的旗帜之下而外，别无良策。”^①呼吁武汉和全国同胞行动起来，给吴、肖以迎头痛击。

林育南在发动群众，坚持斗争的同时，还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加紧进行安葬死者、抚恤伤亡，慰问与营救在狱工友，救济失业工友等善后工作。

二月十五日清晨，施洋英勇就义于洪山脚下。当时反动派曾下令不准收尸。林育南等当晚就派人将烈士遗体收敛在武昌城外的江神庙中。二月二十日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为进一步揭露军阀的罪行，扩大社会影响，争取各界同情与支援，林育南又联络钟海澄、刘功辅等武汉各界进步人士二十三人，发起募捐运动。林育南怀着对烈士崇敬、真挚的感情，亲笔撰写了《为施伯高烈士家属募捐启》一文，高度赞扬“鄂中英俊”施洋为“社会国家而牺牲，为劳动群众而流血，义勇精诚，昭然万世”的崇高品德，无情抨击反动军阀的累累罪行，勉励工人和劳动群众，踏着烈士的血迹努力奋斗，完成“烈士的未竟之业，未成之功”。

“二·七”惨案后，全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尤其是“吴、肖高压之下的鄂、豫、直，此时已全然没有我们公开活动的机会了！”^②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部分领导人，为继续进行战斗，在上海设立了驻沪办事处，其任务是：

“一、宣布军阀压迫惨杀工人的真相；二、联合各界同胞向军阀总攻击。”^③

^{①②} 《汉口真理报被封后之宣言》（第一号），见《二七工仇》。

^③ 《京汉铁路总工会及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驻沪办事处宣言》，转引自《二七工仇》。

在林育南和项德隆等同志的主持下，驻沪办事处进行了种种活动，编写了用陈天、杨德甫署名的《二七工仇》一书。该书记载了“二七”大罢工的英雄史实，辑录了当时罢工的各种文告和照片，讴歌了“二七”烈士至高无上的革命气节，鞭笞了反动军阀的滔天罪行，并谆谆教导工人阶级牢记血海深仇，把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进行到底。

一九二三年六月，林育南受武汉党组织的派遣，奔赴广州，出席了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八月，又出席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被选为团中央委员。会后，为贯彻党团决议，扬鞭策马驰骋在新的战场上。

在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

一九二四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与建议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林育南任国民党汉口执行部青年部干事，继而任《中国青年》的编辑、主编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等职，积极从事青年运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建立，促进了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

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震惊世界的“五卅”罢工风暴。五月三十一日，上海总工会成立，林育南在文牍股任职，负责宣传工作，推进革命运动向前发展。为了总结经验，制定新形势下的斗争方针，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林育南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激昂慷慨的演说。大会后，北伐军出师北伐，一九二六年秋，攻占了汉阳、汉口，兵临武昌城下。在隆隆的炮声中，林育南带着党和工人阶级的重

托，风尘仆仆地来到武汉，参加领导湖北的工人运动。

九月十七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建立了汉口办事处，负责领导湖北、安徽、四川和河南等省的工人运动。九月二十日，召开武汉各工会代表会议，决定筹备湖北全省总工会。

十月十日凌晨，以叶挺劲旅为主力的北伐军与北洋军阀干将刘玉春、陈嘉谟所指挥的军队，在武昌城内展开短兵相接的激烈搏斗。就在这天上午，武汉工人敲锣打鼓，喜气洋洋，齐集在汉口公会堂举行湖北全省总工会成立盛典。武昌解放的喜讯传来，整个会场顿时沸腾起来，脱帽、摇旗、挥拳、鼓掌、高呼，湖北全省总工会就在这欢声中诞生了。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也来到武汉，参加领导湖北的工人运动。

在党的领导下，刘少奇、林育南、李立三等深入工厂、矿山，发动工人恢复发展生产；主办“工人运动讲习所”，培训工人运动骨干；领导恢复发展工人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到十二月底，全省工会发展到三百四十多个（北伐军来到之前只有十二个），工会会员激增到三十万。从一九二六年十月到一九二七年春，工人罢工达三百多次，工人运动风起云涌。

为了把工人运动推向高潮，组织和检阅自己队伍的力量，制定新形势下的斗争策略。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在汉口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会前，林育南主持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在“血花世界”（现“民众乐园”）召开了预备会，由李立三报告召开这次大会的意义，林育南报告大会的筹备经过。会议通过了大会主席团、秘书厅和提案审查委员会的名单以及大会议事日程和规则等；选出李立三、刘少奇、许

白昊、朱菊和和朱宝庭等二十一人为主席，林育南为大会秘书长。秘书厅下设文书科（主任成柱周）、庶务科（主任汪士安）、宣传科（主任李昌荣）、纠察队（主任袁大时）；还选出了许白昊、李立三、刘光福、陈寿昌、张厚安五人组成提案审查委员会，负责大会的一切事宜。

一九二七年元旦，大会正式揭幕。到会代表五百八十八人，代表工会三百二十个，会员三十万。中国共产党湖北区委、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汉口特别市党部以及各军政机关、人民团体都派代表参加了开幕式，并发表“极诚恳的演说^①”。

在这次大会上，李立三作了政治报告，刘少奇作了组织工作和修改章程的报告，林育南作了宣传教育问题和童工及女工问题的报告，项英作了职工运动报告，向忠发作了会务报告，许白昊作了经济争议问题报告，袁大时作了纠察报告，苏联顾问鲍罗廷到会作了演讲。根据各项报告内容，大会通过了《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发表了《为反对英水兵惨杀同胞通电》，制定了《湖北全省总工会章程》，并作出了《执行委员会会务报告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工会经济问题决议案》、《女工童工问题决议案》和《对于纠察队决议案》等二十六个决议案。这些代表全省工人利益和愿望的重要文献，多数是林育南亲自起草的。

根据林育南的宣传教育报告所作的《宣传及教育问题决议案》中，对工会的性质和任务作了明确规定。

^①《总工会代表大会经过概要》，见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8日。

决议指出：工会是“工人群众的组织，是代表工人群众利益的组织”，“又是领导工人群众作改善自身生活及参加政治运动的斗争机关”，“又是教育工人的学校”^①。据此，规定了工会的任务。决议案指出：“目前湖北的工会除了统一组织，巩固基础之外，宣传教育是最紧要的工作！而且要统一组织及巩固基础，也非加强教育宣传的工作不可”。^②因此，宣传教育必须切实对工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切实训练工人成为真正的战士”；办好《工人导报》、《工人画报》；继续开办工人运动讲习所，训练工会工作人材等七项工作。

根据林育南所作的女工童工问题的报告作出的《女工童工问题决议案》，指出“女工童工是我们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痛苦的一部分”，其所受的痛苦与一般工人比较，“更是加倍厉害”。决议中还明文规定“工作时间每周不得过四十八小时”等十一条最低要求条件。^③

最后，大会选出了林育南和刘少奇、李立三、许白昊以及项英等工人领袖为省工会负责人，林育南任宣传主任。一月十日，大会胜利闭幕。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后，武汉便成了全国革命的中心。帝国主义对此惴惴不安，于是便逐步联合起来进行干涉和破坏。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武汉的领事团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取缔工人运动。十分明

①转引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411—412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②《宣传及教育问题决议案》，见上书第413—414页。

③《女工童工问题决议案》见上书第419—420页。

显，这是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干涉中国革命的信号。工人运动的发展也引起了国内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他们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咒骂武汉工人运动是“破坏运动”，诡称“资产阶级的痛苦倍于他人”^①。十二月三日，汉口总商会召开所谓商民大会，要求政府限制工人增加工资的要求和限制工人纠察队，有的反动资本家还狂叫要取消纠察队，并以罢市相威胁。

为了回击帝国主义和一切反革命派的进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十二月二十六日，湖北全省总工会与汉口学联会、妇女协会，汉口总商会等团体，在汉口济生三马路召开了二十万人的反英市民大会。号召全国“实行对英经济绝交，要求政府立即收回妨害革命工作的租界”^②。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上午，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之前，全体代表在刘少奇、林育南等的率领下，参加了北伐战争胜利和国民政府北迁的庆祝大会。这次大会声势空前，大长了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革命派的威风。

一月三日，武汉工人和群众十多万人在汉口举行反英反奉示威大会。通过了以下决议案：“一、反对奉鲁军南下，一致赞助苏、皖、浙三省自治；二、反抗英政府秘密借债与奉天军阀，助长中国内乱；三、实行对英经济绝交，由民众团体自动检查入口英货；四、反对汉口英租界无故派水兵登陆，扰乱武汉国民政府首都秩序”^③。会后举行了浩大的游行。各宣传队

^①转引自李新等 1962 年编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 1 卷第 287 页。

^{②③}原载 1927 年 1 月 10 日广州《民国日报》，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 384—385 页。

也分散到大街小巷进行宣传。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宣传队在汉口英租界江汉关附近的广场上进行演讲，控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干涉中国革命的罪行。英租界当局，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出动铁甲车和大批水兵向我听讲群众发动突然袭击。造成了“一·三”惨案。

帝国主义惨无人道地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汉口各团体的代表义愤填膺，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参加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会的代表，怒不可遏，召开声讨会，林育南带头发言，痛诉惨案经过，怒斥英帝国主义暴行，并领导大会秘书处草拟《为反对英水兵惨杀同胞通电》，提出六项条件五项办法，檄电全国。

六项条件主要内容有：一、请政府自动收回英租界；二、要求英租界当局立即撤销电网沙包各军事上的准备；三、要求立即撤退在华军舰，在租界内永远不得有外国武装军警驻扎；四、要求赔偿死伤损失；五、要求英政府向我政府道歉；六、要求将凶手立即移交我政府惩办。

为达到上列条件其办法是：一、立即实行抵制英货，对英经济绝交；二、准备封锁英租界及对英总罢工；三、请政府立即严重交涉，本代表大会率三十万工友誓死为政府后盾；四、请农工商学联合会，立即召集代表大会及市民大会，群起共同奋斗；五、全省各工会全体工友，应听从全省总工会命令，一致行动^①。

通电还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奋起，以最大的努力，扑灭此人类公敌世界恶魔之英帝国主义”^②。这篇慷慨激昂、脍炙人

①②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6日。

口的通电给湖北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指明了斗争方向，为夺回汉口英租界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五日中午，汉口济生三马路人山人海，喧声雷动，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协同各人民团体，举行“追悼一·三死难同胞暨反英示威运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四十万人，一致通过了湖北全省总工会等各团体代表草拟的八项条件和通电。然后，出席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率领群众冒雨游行。游行队伍刚踏入英租界，又遭巡捕阻拦，再起冲突。怒气冲天的工人和群众理直气壮地驱逐了租界巡捕，占领了英租界。

湖北全省总工会在刘少奇、林育南等领导下，立即组织慰问队敲锣打鼓前往租界进行慰问，同时派出纠察队三百名进驻租界。武汉国民政府支持群众的正义行动，成立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同时又加派军队同原来入驻租界维持秩序的军警正式接管租界。

一月六日，九江工人也英勇地占领了九江英租界。

汉口、九江英租界的夺回，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伟大创举，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林育南和刘少奇、李立三等在这一斗争中所建立的历史功绩，将永远彪炳史册，光照后人。

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标志着湖北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担任省总工会宣传主任的林育南，从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要把工人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就必须培养造就一批有一定理论修养和文化水平的工人干部。代表大会之后，林育南根据大会决议的精神，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宣传班子，加强与成立了工人运动训

练班、宣传训练班、农工通讯社、《工人导报》、宣传总队、出版处和教育委员会等机构，并选派能力强、经验多的干部去加强各部门的领导工作，采取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强对工会干部的培训和对工人群众的教育。

首先，继续主办工人运动讲习所，培训工会骨干。

一九二六年冬“工讲所”第一期学员毕业后，林育南等又主办了“工讲所”速成班，从第一期毕业生中选留了六七十名学员进入速成班继续深造。翌年一月二十一日，速成班开学后，聘请刘少奇讲授工会组织法、工会经济问题等课程，董必武讲授国民党农工政策，李立三讲授劳工运动史，恽代英讲授国际政治经济状况，林育南讲授工会应用文等课程。林育南熟谙马列，学识宏富，讲课时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理论联系实际，博得了学员的夸奖。他还经常深入学员宿舍，帮助学员学习，与他们促膝谈心，深得学员的衷心爱戴。

林育南等十分重视学员的革命理论和工人运动基本知识的学习，同时还注意对学员进行集会讲演、作文习字技术的练习和军事训练。为使学员在毕业后能够担负指导工人纠察队的工作，“工讲所”还呈请国民政府发给枪支弹药，进行实际训练。

二月二十四日，速成班学员毕业后，湖北全省总工会将他们派往武汉各工会及附近各县担任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这些学员在斗争中发挥了骨干作用，“成绩斐然”^①。

其次，大办工人学校，努力发展教育事业。林育南十分关心和重视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早在武昌解放时，他目睹武汉的教育事业横遭北洋军阀破坏，就向国民政府与武汉各界大

^①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16日。

声呼吁立即恢复发展教育事业。他在《恢复教育运动》一文中指出：“教育人材为民族根本大计”，应“极力恢复教育”。同时认为“教育是社会公共的事业，政府固应负责，……社会具有财力及人力之人民团体亦应起而共同担负责任”，“协助政府兴学”，“应尽最大的努力促进及帮助恢复教育事业”。他旗帜鲜明地倡导“革命的民众的教育”，坚决反对“顽固的守旧派的反动教育和少数分子结党营私把持地盘的饭桶教育”。为解决校舍问题，他呼吁“在一个月之内，政府应将各军队机关占领之学校完全退出，有毁坏者应即修补完备”。还积极主张“筹划并确定教育经费，核定各校教职员、各种学科课程，并议定教育宗旨及计划，积极准备开学”^①。

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林育南亲自领导总工会教育委员会的工作。三月六日，教育委员会召开了武汉三镇的教职员会议，请刘少奇、项英、许白昊等作关于职工运动方面的报告，林育南亲自讲授工会的宣传教育工作。这些报告对于提高教职员的思想教学水平起了促进作用。与此同时，林育南还主持制定了《湖北全省总工会发展工人教育的宣传大纲》。

《大纲》深刻阐明了为什么要发展教育和我们工人阶级要求的是什么教育等问题。它强调指出：“我们要求的是无产阶级教育”，其内容“是启发工友们（阶级觉悟）的教育”，“是为我们无产阶级创造斗争武器的教育”，“是要实地应用的教育，我们日常生活需要的知识技能，如识字、看书报、写信、记帐及其他日用常识等等”。《大纲》还指出：“我们无产阶级教育是急待我们去努力创造的。”^②

^① 《群众》周刊第1期，1928年11月1日出版。

^②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10日。

在林育南等的领导下，工人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五月份，在武汉各工会中建立的工校有五十三所，教员一百七十五人，学生七千七百多人。

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省总工会宣传部将原来的教育委员会扩充为教育局（五月八日在“血花世界”举行了开幕典礼），制定了新的教育计划，在第一期（4月至6月）计划中，准备把工校扩充到一百五十九所，招收学生二万八千二百六十人，以后各期逐步增加招生名额，此外还拟办劳工教育讲习所，第一期招生二百名。

第三、出版通俗书报，武装工人头脑。省总工会宣传部出版了五日刊《工人导报》（6月11日改为《工人日报》）、《工人画报》、《工人教育旬刊》等报刊。林育南除指导编辑人员的工作外，还亲自审定各种稿件，经常撰写指导如何开展工人运动的文章。与此同时宣传部还出版了大量的通俗读物。如刘少奇撰写的《工会经济问题》、《工会基本组织》、《工会代表会》和《工会组织法讲义》等书出版后，工人群众争相购读。这些出版物对于全省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和工人战斗力的提高，起了指导作用。

第四、加强对宣传队的领导与训练，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宣传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据不完全统计，到六月份为止，各级工会组织中已建立宣传队三百多个，有宣传员一千三百多人。宣传队为发展大好革命形势，阻止时局逆转，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活动和政治鼓动工作，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战斗作用。为提高宣传队的质量，林育南主持的宣传部还经常主办宣传员训练班，从各工会的宣传队中，“挑选进步分子，加以深切的

训练，俾养成干部宣传人材。”^①

在这段时间，林育南奋笔疾书，在湖北区委主办的理论刊物《群众》周刊上，发表了《革命发展与投机事业》、《公安局长之桑梓情关》、《反革命之一幕》、《纪念“二七”流血战士》和《全国总工会迁鄂的意义及湖北工人的责任》等文章，揭露鞭笞反动派，讴歌悼念革命者。这些文章气势磅礴，激励广大人民向旧世界勇猛搏击。

在林育南等领导下，省总工会工作有很大发展。从第一次代表大会到六月初，不到半年时间，湖北全省工会会员就发展到五十一万多人，湖北成为全国工人运动最高涨的省分之一。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泛太平洋劳动大会在汉口胜利召开。

一九二六年二月，在澳洲雪梨埠召开的预备会议上，议决由澳洲工联会发起于同年七月一日在雪梨埠召开太平洋劳动大会，邀请中国、日本、苏联、印度、南非、爪哇（今印度尼西亚）、太平洋各岛以及南美、加拿大、美国 and 英国等国家的工会参加会议。后因路途遥远，加上各国政府的干涉和阻挠，致使许多国家的工会代表不能如期到会。经与会代表的磋商，遂改为第二次预备会议，同时作出如下决议：“一、将大会改期至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在广州开会”；“二、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大会共同筹备开会事宜”^②。

一九二七年四月，在帝国主义的指使和帮助下，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四月十五日，广东军阀

^①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6日。

^②转引自《泛太平洋劳动大会》，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540页。

在北伐根据地也揭起叛旗，血雨腥风笼罩广州全城。因此，泛太平洋劳动大会只好改在武汉举行。

一九二七年五月初，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设立了太平洋劳动大会秘书厅，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根据党的决定，秘书长一职，由党的五届候补中央委员林育南担任。林育南任职后，张榜招贤，罗织人材，组建秘书厅，设立翻译、宣传、庶务以及文书等科，积极进行筹备工作，五月十二日，林育南主持召开秘书厅全体职员会议，翻译科主任肖子璋、宣传科主任刘义、庶务科主任郑复他、文书科主任李人甲以及各科职员数十人参加了会议，“讨论各科办事细则及大会中的一切布置”^①，在林育南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大会一切工作筹备就绪。五月二十日泛太平洋劳动大会正式开幕。

出席大会的有日本、朝鲜、法国、苏联、美国、英国、爪哇和中国的代表共三十多人。中华全国总工会派苏兆征、李立三、刘少奇和林育南等出席了大会。到会代表全系共产党员，代表一千四百五十多万有组织的工人。二十日那天，在中央党部礼堂举行的开幕式上，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武汉国民政府、赤色职工国际以及武汉各人民团体都派了代表参加。二十一日起，与会代表开始会商世界各重要问题，中国、苏联、朝鲜、爪哇等国代表报告了本国工人运动情况，赤色职工国际委员长罗佐夫斯基作了《世界职工运动与中国革命》的报告。刘少奇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作了长篇演讲。大会根据各国代表的报告，拟定和通过了抗议北京搜检俄大使馆及伦敦搜检俄商社

^① 《太平洋劳动大会定期开幕》，见1927年5月13日汉口《民国日报》。

案，反对英、日、美等帝国主义者酝酿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赞助中国革命事业，并祝其早日成功等十二项提案。

泛太平洋劳动大会是国际工人组织在中国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大会的开幕词和各种决议案，代表全世界尤其是太平洋沿岸各国工人阶级的利益与愿望，它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光辉。这次会议加强了太平洋沿岸各国工人的团结和友谊，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林育南主持大会的筹备工作，亲自起草开幕词和其他决议案，为国际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九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国内外政治形势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召开的”。当时的武汉处在内外夹击、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斗中，中国革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为了阻止革命的逆转，挽救十分危急中的中国革命，在林育南和邓中夏、李立三、刘少奇、苏兆征等同志的领导下，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了这次全国劳动大会。新任全总秘书长的林育南^①担任了这次大会的筹备主任。

六月一日，林育南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建立了总务、文书和宣传等工作班子。

六月十八日，在“血花世界”召开的预备会上，李立三报告了大会的意义，林育南报告了筹备经过。他提纲挈领地讲：

“本会原定五一节开幕，俟因太平洋会议之故，改为五卅进行，后又因他事延至现在始得开幕。此次大会职员多系全国各

^①1927年5月16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会上作出“秘书长刘少奇，因省工会职务重大，故改林育南担任”的决定。

省两总工会职员，事务纷忙，缺点必多，望各代表随时指示。”^①

六月十九日——省港罢工纪念日，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正式开幕。这天下午，汉口中央人民俱乐部张灯结彩、红旗飘扬，大会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武汉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赤色职工国际和英、苏、法、美、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代表及来宾共三千多人，济济一堂，共庆大会胜利开幕。

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经济斗争决议案》、《反对法西斯主义及对法西斯工会斗争决议案》、《女工童工问题决议案》、《湖北工会运动决议案》、《湖南工会运动决议案》和《四川、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西等省的工会运动决议案》等，并发布了《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

大会通过的宣言及其决议案是工人阶级在革命紧急时期的行动纲领，并为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林育南主持大会宣言和政治决议案以及教育宣传决议案的起草工作。

六月二十九日大会闭幕前，选出了李立三、邓中夏、林育南、刘少奇、项英、苏兆征、许白昊、王荷波和郭亮等三十五人为全总执行委员，张昆弟、陈为人等二十五人为候补执行委员。

六月三十日，全国总工会第四届新执委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苏兆征为委员长，李立三、林育南、王荷波、邓中夏、郑复他、向忠发、罗珠、陈寿昌九人为常委，刘少奇、董锄平、杨人杞、马超凡、黄钊五人为候补常委。紧接着又举行了第二次常务委员会会议，林育南被选为秘书长，仍主持全总

^①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19日。

会务。他与苏兆征、李立三、邓中夏等亲密合作，为挽救危急中的中国革命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斗争。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但在党的领导下，林育南、苏兆征、李立三、邓中夏和刘少奇等具体领导全国工人阶级英勇斗争，促进世界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革命业绩则永载革命史册。

“七·一五”后，武汉地区进行了反革命的大屠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在这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林育南和罗亦农、向警予等共产党人，根据党的指示，转入地下，成立了湖北新省委。林育南担任常委兼宣传部长，并代理过省委书记一职。林育南不顾敌人通缉的危险，秘密地深入工厂、学校和街道，发动群众，坚持斗争，先后领导黄松龄、向警予等出版秘密刊物《长江》，指导湖北革命人民继续战斗。八月三日，林育南列席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常委会，讨论“八七”紧急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八七”会议后，他参加领导湖北的秋收暴动。一九二七年年底，林育南在党的召唤下，借别武汉，顺江东下又重新战斗在浦江两岸。

在极端艰苦的斗争岁月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上海，特务密布，陷阱纵横，犹如虎穴狼窝。在这种险恶的环境里进行活动，随时都要准备付出代价。林育南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不顾个人安危，与项英、李立三等，并肩战斗，领导全国工人运动。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至十一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

秘密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

这次大会是在“极严重的政治局势之下”、中国革命开始复兴的新时期召开的。林育南是这次大会的秘书长，具体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全国总工会的代表，有铁路、海员、矿山、五金、纺织及上海、天津、满州（东北）；山东、河南、福建、香港的代表，还有闽西红色区域总工会的代表共三十多人。“这些代表都是在业工人经过各业、各地的工人选举出来，并且都是群众斗争中最勇敢战士”^①。

大会开幕后，林育南受党中央的委托，宣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祝词^②。祝词深刻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明确指出了工人阶级和革命工会在当前的斗争任务，祝词说：“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以后，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建立了封建势力联合的南京政府，镇压工农革命是他们共同的政纲，于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完全成了白色恐怖的旗帜。”“工人农民与共产党的战士，遭受他们惨杀的将近几十万人，就是古代的专制魔君也没有这样残忍！”祝词最后庄严地宣告：“中国共产党始终是站在革命的前面，始终要执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使命，而与本阶级密切联络的向一切敌人进攻，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奋斗！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奋斗！为世界共产主义的伟大前途而奋斗！”^③党中央的祝词为工人阶级规定了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

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工人斗争纲领》和《工会组织问

①见《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一）第354页。

②张文秋：《虎口里的斗争》，见《中国工人》1957年第22期。

③转引自《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第241～248页。

题决议案》，还发布了《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反对国民党军阀混战宣言》、《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通电》、《告红军将士书》、《告全国士兵书》、《告全国农民书》等。

这次大会“确定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任务，规定了全国工人斗争的纲领，决定了一切斗争策略和方针。”^①

最后，大会选出了第五届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邓中夏、史文彬和林福等二十七人为执行委员，张金妹等十八人为候补执行委员。在第一次执委会上，江俊（项英）被推举为总工会委员长，周基础为秘书长，林育南为总工会编辑委员会主任，旋即又代理总工会秘书长一职。

一九二九年冬，林育南根据党的指示，化妆成一个从南洋新加坡回国经商的华侨，化名李敬塘，与刚从济南一监狱脱险来沪工作的张文秋（化名李丽娟），结成假夫妻。林育南身穿西装革履，活象一个年轻英俊的阔老板；张文秋身着华丽服装，打扮得花枝招展，恰似一个风流潇洒的年轻少妇。他们在繁华市区英租界卡德路（现名石门二路）和爱文义路（现名北京西路）的交叉口，用高价（每月房租白银60两）租赁了两栋宽敞的三层楼房（现北京西路六百九十号至六百九十六号）作为住宅。这两栋房子，两面临街（一面是卡德路，一面是爱文义路），都有大门出入，闹中取静，很适合进行党的秘密工作。按照秘密工作的需要，他们把这两栋房子的里里外外，布置得俨然象一个家藏万金的大资本家的豪华住宅，还“雇”有“厨师”、“佣人”，进出都乘坐小汽车。

林育南、张文秋等在此活动近一年之久，反动军警也不敢

^① 《全国第五次劳动大会的总结与精神》，见《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第358页。

贸然上门问津。而且还在这里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等重要会议。

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闭幕不久，中共中央倡议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党中央和全国总工会委派罗章龙为筹备会主任，林育南为秘书长，张文秋、彭砚耕等为秘书，共同筹备这次大会。

林育南等首先大造革命舆论，宣传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意义以及如何以实际行动迎接大会的召开。在罗章龙，林育南主编的全国总工会的机关刊物《劳动》上，林育南等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发起召集苏维埃区代表大会》、《为什么召集苏维埃区代表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五一”纪念宣言》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拥护苏维埃区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章，同时还开辟了“拥护苏维埃大会”、“红军发展消息”等专栏，积极宣传苏区情况和红军的战绩。林育南还以“根”的笔名，先后撰写了《中国苏维埃区域的工人运动》、《苏兆征与中国苏维埃》和《拥护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等文章，热情讴歌苏区和红军所建树的丰功伟绩。

在林育南、罗章龙等的积极筹划下，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正式召开了。这是一次秘密举行的会议，“参加大会的代表不仅有各苏维埃区域的工农战士和红军兵士，并且有全国各主要省区，产业中心的工、农、兵、贫民、革命青年以及革命组织的代表。”^①共三十八人。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派滕代远、何长工参加了大会；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派柔石等出席了大会。

^① 《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见《劳动》周刊，第34期，1930年6月7日出版。

经过一个星期以上的会议，通过许多主要决议案（苏维埃政府政纲、劳动保护法、土地法、扩大红军决议案等）；^①还发表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

在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精神的鼓舞下，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急剧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工人的示威运动和罢工斗争彼伏此起，城市斗争也方兴未艾，全国革命呈现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据统计，到一九三〇年秋，党在全国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包括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和闽浙赣等）和鄂豫皖、左、右江、洪湖、湘鄂西等大小十五块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十余万人，转战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浙江与陕西等十多个省的三百多个县的广大地区。

与此同时，党在白区的工作也有恢复和发展。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时工会会员只有三万多，到一九三〇年九月激增到十一万五千三百五十一人。在上海、武汉、天津、哈尔滨、厦门等地恢复了地方总工会，领导工人群众进行了许多胜利的罢工斗争。此外，学生运动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运动，也有所发展。

由上可知，“伟大的中国革命，已经重新起来，动摇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这种新形势下，“建立中央苏维埃政权，已经是全国工人阶级与革命民众的当前任务了。”^②

在党中央的领导和总工会的积极支持下，“全国苏维埃中

①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作及其活动》，见《中国工会历史文献》（3）第54页。

② 《中华全国总工会拥护“中共时局宣言”书》，见《中国工会历史文献》（3）第123页。

央准备委员会”（简称“苏准会”）正式成立，由林育南担任秘书长，李星月（李平心）、张文秋、彭砚耕、胡毓秀，还有冯铿等为秘书处的工作人员，租上海愚园路庆云里（静安寺百乐商场附近）31号（现15号）为秘密办公地点。

为迷惑敌人，掩护革命，他们把组成的机关以家庭的面目出现。林育南化妆成从南洋归国的湖北皮货商人，叫李敬塘，是一家之长。李星月和胡毓秀夫妇与林育南爱人李林贞^①以姑嫂相称，实现“机关家庭化”。

原武汉军校学生，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女兵，在“苏准会”期间担任交通的胡毓秀老人，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有一次恽（代英）老师用商量的口吻对我说：‘党中央要成立一个机关，名叫苏维埃准备委员会，由林育南负责，并决定派李星月同志担任秘书，你担任交通工作，不知你们能否接受这个政治任务？’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当时在座的林育南同志笑容可掬地对我说：‘今后，我们的关系是这样：我是机关的主人，是你们的大哥，你们是我的家属，这样称呼对应付环境有利。’”^②

胡毓秀老人还说：“苏准会机关是一幢三层楼的房子，楼下是客厅，中间摆着两张四方红木桌子，还供了一尊观音菩萨；两边摆了八把红木靠背椅子，墙壁上挂满了名人字画，俨然象个书香人家。二楼是林育南的寝室，三楼是我们的宿舍。”^③“苏准会”机关完全按照一个旧式有钱人的排场来进

^①李林贞，原是上海恒丰纱厂工人，是五卅运动中出名的女将。1925年10月与林育南结婚，1967年在武汉病逝。

^{②③}胡毓秀：《在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工作时期》，存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

行布置的，它对瞒过外人的耳目起了作用。

在“苏准会”这个秘密机关里，党中央、全总及其他部门的负责人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任弼时、恽代英、王稼祥、罗章龙、李求实、张金保，还有向忠发、徐锡根等，经常前来指导、商谈工作，参加讨论起草文件。作为秘书长的林育南，更是殚精竭思，废寝忘食。胡毓秀老人回忆说：

“当育南同志知道我原来是武汉军校的学生后，他兴致勃勃地讲述武汉时代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事迹，真是绘声绘色，如数家珍。他说话的时候，喜欢踱着方步，双手反叉在背后，从他的谈吐里，我初步观察到他对革命工作是那么热情奔放，他的性格是那样豪迈开朗。他的独立思考能力很强，是个有魄力的革命家。”育南同志“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很多。他的原则性很强，有独立见解，对别人的意见不随便苟同，办事精明能干，对我们的关怀和培养真是无微不至。我们生活在他身边，随时随刻都可以得到教育和锻炼。”^①

在“苏准会”工作期间，林育南有时化妆成蓬头垢面的流浪汉，有时化妆成衣衫褴褛的工人，有时化妆成衣冠楚楚的名流学者，经常变换脸谱，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地区。无论白色恐怖如何严重，形势怎样险恶，他总是横眉冷对，英勇无畏，机智沉着。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真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曾和林育南在一起战斗过的同志，现在回忆这段斗争生活，还啧啧称羨，敬佩不已。

在周恩来等的领导下，经过林育南等不疲倦地忘我工作，“苏准会”秘书处草拟了《宪法》、《劳动法》、《土地法》

^①胡毓秀：《在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工作时期》，存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

和经济政策、外交政策、肃反政策以及联合农民士兵群众的策略等决议草案^①，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准备就绪，“苏准会”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林育南又接受党的重托，前往中央苏区筹备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

十二月初，林育南由一个湖北皮货商人募地又变成了广告商人，化名李少堂，肩负历史重任，离开上海，向中央苏区进发。他夜宿晓行，水陆兼程。十六日弥留于杭州，二十三到达浙江边陲重镇衢州。其时，蒋介石纠集了七个师共十万兵力，准备向赣南闽西我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反革命围剿。二十四日，林育南在衢州写（署名：铁峦）给他的朋友陆若冰^②的信中说：“昨到衢州，暂住客栈。闻路上不靖，交通或有隔断之虞，现在正设法打听，大约数日后，即可决定行期也，我是极想很快的到达我的目的地，得个安身之所。倘若不能如愿，没有办法的话，那么也只有暂时回家，而我们也许能够在短期内相见，究竟如何只有天晓得呵！”^③

林育南在衢州稍事休息又迅速西行到达浙江通往赣东北的咽喉——江山。这时候，国民党的大军压境，关卡林立，戒备森严，控制了一切交通工具，封锁了通往江西的一切道路。二十七日，风云突变，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开始了。林育南向中央苏区前进不得，只好踏上归途，重返上海，投入了反对王明左倾错误领导的斗争。

^①参看《中华全国总工会通告》第27号，载《中国工会历史文献》（3）第152页。

^②陆若冰，湖北黄冈人，在林育南教育、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1929年至1930年春，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③《林育南烈士书简（9件）》，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期。

坚持正确原则，同危害革命的错误倾向作斗争，是林育南的一个显著特点。还在他去中央苏区以前的一九三〇年，他就同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作过斗争。这一年的三月下旬，李立三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错误地估计了中国革命的形势，认为“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职工运动的中心任务是“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农民运动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地方暴动”；士兵运动的“中心问题就是要坚决的组织兵变，反对逃跑主义”^①等等。

林育南和张浩（林育英）、张昆弟、罗章龙等当时许多工运领导骨干，不赞成李立三的错误观点，认为大革命失败后形成的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形势，还没有根本改变；国内还处在“资产阶级稳定时期”，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但“革命高潮不可避免要到来”。在这种形势下，党的任务是利用合法斗争，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不应该组织那些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暴动和同盟罢工”；要“纠正强迫罢工”，肃清组织政治罢工中的“委派制度”和“命令主义”。

林育南、张浩等这些正确的意见，不仅没有被李立三等接受，反而遭到了批判。一九三〇年六月，在李立三主持下，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冒险主义统治了党中央领导机关。林育南对由此而给革命事业带来的损失非常痛心。他挺身而出，同李立三的冒险主义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明确指出：搞飞行集会，搞暴动，“这不是一个好办法”^②。他领导“苏准会”秘书处的全体

^①李立三：《政治报告》；见《中国工会历史文献》（二）第505—528页。

^②吴化之1979年8月11日的回忆。

同志，积极开展反对和抵制冒险主义的活动；还联络何孟雄、李求实、龙大道和罗章龙等党和工会的一批领导骨干，用口头或书面等形式，多次向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反映意见，揭发李立三等脱离群众，不顾主客观条件一味蛮干，实行冒险政策，到处搞暴动，是泛暴动主义^①。九月八日，何孟雄起草了《政治意见书》，向党中央系统陈述了自己反对李立三冒险主义错误的意见。林育南是何孟雄这一行动最坚决的支持者。但李立三等却错误地给何孟雄以撤销工作的处分。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随后，中央政治局又正式作出了《关于何孟雄问题的决议》，撤销了对何孟雄的错误处分。这一切使林育南喜不能寐。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些时的生活，真是难写。因为校务改革^②的奋斗，用尽了我一切的力量才得到了相当的成效。”他在信中还总结自己在这次斗争中的经验：“在最近校务改革的奋斗中发现了过去的缺点，此后我更当造成‘山’一般的稳定，‘铁’一般的顽强……就以此自励，以后就叫我‘铁峦’吧。铁峦呵！好自好之！”^③从此，林育南便将“铁峦”作为自己的笔名，激励自己，要做一个立场稳如泰山、意志坚如钢铁的革命战士。

一九三〇年冬，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到中国，与王明沆瀣一气，起劲地鼓噪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党中央犯了调和主义错误。林育南在奔赴中央苏区之前，对此已有察觉。他在写给当时担任北京市委秘书长的吴化之的信中，曾经尖锐地

①罗章龙1978年7月31日的回忆。

②“校务改革”或“校务”，是当时党内斗争的代称。

③《林育南烈士书简（9件）》。

指出：中国革命如果让这一伙“挂羊头，卖狗肉”的人来领导，前途将不堪设想^①。当他一九三一年一月初返回上海的时候，王明的野心已暴露无遗。他不顾旅途劳累，当即投入反王明的战斗。他写信时对友人说：“现在校务很有新的发展，正有待吾人之努力者更切。因此，这些时我更要尽力参加。”^②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米夫采取欺骗和突然袭击的办法，一手操纵召开了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王明等人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对此，何孟雄等江苏省委的代表和全总、海总、铁总、纺总的代表曾集体退席，表示强烈反对。林育南被剥夺了参加这次中央全会的资格。四中全会后，他和何孟雄、李求实、龙大道、欧阳立安、张金保以及罗章龙等工会和江苏省委机关负责人立即开会，反对四中全会的选举，并发表声明反对王明破坏党的纪律及破坏党的民主，反对四中全会^③。

反对王明左倾错误领导的斗争，十分激烈。林育南在这场斗争中，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鲜明的原则立场。他在一月十日 and 十五日两次写给陆若冰的信中，如实地记述了当时的情况。他写道：“我这些时真是忙呵！每天总是到处跑，个人的许多事都放着，为的是要将校务彻底改造一番。虽然我们的努力有相当的成功，然去（距）我们的期望尚远得很！这是要长期的努力奋斗，当然不是马上可以成功的。”“我太忙了，几乎‘废寝忘餐’……敌人与朋友之分者‘几希’，这比拿着枪在阵地上开火还要残酷，‘阶级的生活’，决定了我如此。”

①吴化之1979年8月11日的回忆。

②《林育南烈士书简（9件）》。

③张金保1969年8月13日的回忆。

就在反对王明错误领导的热潮中，林育南等三十多位同志，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

大节不辱 浩气长存

林育南被捕的时间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地点在上海三马路二二二号（今汉口路六六六号）东方旅社。

东方旅社是我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一月十七日那天，林育南等七位同志正在这个旅社的三十一号房间开会，研究反对王明左倾错误领导问题。午后一时四十分，公共租界捕房探捕与国民党市警察局联合组成的行动队，突然包围了东方旅社，林育南等连会议文件也没来得及处理，就全部被捕了。那些天，敌人在东方旅社、中山旅社等处，还捕去了何孟雄、李求实、欧阳立安、龙大道、柔石、冯铿、胡也频、殷夫等，共三十六人。

林育南等被捕后，先拘禁于老闸捕房。一月十九日，又由北浙江路的公共租界特别法庭，引渡给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总公安局。当天，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便迫不及待地开庭审讯。这些革命志士大义凛然，迎接着新的战斗考验。

林育南被列为第三号被告。审讯他时，审判长宋源满脸堆笑，奸狡地问：

“你自己犯了什么罪吗？”

“我没有什么罪！”林育南昂首挺胸，坚定有力地回答道。

“别开玩笑，先生，还是老实交待吧！”

“我没有什么可交待的。”

“你的姓名、年龄、籍贯总该知道吧？”

“姓名——李少堂，年龄——三十三岁，籍贯——湖北人！”

“你到东方旅社干什么？开的什么会？”

“我去找朋友，不是开会。”

“胡说！”宋源收起奸笑，恼羞成怒，但又毫无办法，只好宣布退堂①。

敌人从林育南等的口里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遂于一月二十三日，将他们解送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这是一座人间魔窟。林育南和他的难友们，在这里同敌人展开了新的斗争。

上海国民党反动当局，很快侦知林育南等是一批共产党的“要犯”。他们把这一“重大收获”向南京报告以后，南京也派来要员会同审理此案。在一次新的审讯中，林育南仍以“李少堂，广告商人”作答。敌人无可奈何，只好摊牌：

“你不叫李少堂，是林育南，‘苏准会’的秘书长！”

林育南见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便轻蔑地答道：“你们既然知道，还问干什么？！”

敌人想拉拢林育南，强装笑脸讨好地说：“你们反李立三，我们也反李立三，咱们联合起来……”

“反对李立三的错误，是我们共产党内部的事情，你们有什么资格？！”林育南怒火中烧，没等敌人讲完，便厉声痛斥，“我们反对李立三，是由于他没有很好地领导人民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包括你们这些走狗，明白吗！”

难友们获知这一情况，深受鼓舞，异口同声称赞林育南

①参看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 1931 年 1 月 19 日《审判笔录》。

“骂得好！”

敌人见林育南不吃软的，便动用酷刑，妄图使林育南屈服。但任凭鞭打电触，烟熏火灸，林育南坚如钢铁，宁死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气节。

身陷囹圄的林育南，心里想着党，想着党的事业。入狱不久，他便写了一封简要的信，向党组织报告被捕后的情况，并渴望得到党组织的指示，信的全文如下：

若冰女士：

十七日被累，二十三日转龙华司令部，现在生活平安，请勿念。戚妹如要见他，可于星期三十二点至三点，以亲戚名义到龙华司令部看守所，要求会晤湖北黄陂人李少堂（广告商人）即可。如第一次不准见，送来之物（他要小说书）定可收到，且第二次必可接见也。事关政治，女戚接见较便。请戚友放心可也，知注特闻。

这封信没有落款，没有日期，显系秘密写好，由狱中党支部设法寄出来的。

在狱中，林育南和李求实还给党中央写了一份很长的报告，详细地汇报了他们被捕的经过和狱中的斗争情况^①。

党组织十分关心林育南等同志，经常派人以“李少堂”家属的名义，前来探监；互济会也给他们送来了衣被、药品和金钱。这一切都使林育南激动不已，更坚定了他那钢铁般的革命意志。他把精力花在做同室难友的思想工作上，向他们揭露国

^①黄理文：〈回忆欧阳立安的就义〉，〈人民日报〉1949年12月6日。

民党的累累罪行，给他们指明斗争的方向，鼓励他们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斗争。

随着被捕同志身份的暴露，林育南等深知，生命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反动派的屠刀随时都有向他们砍来的可能。对于死，这些革命志士早已置之度外。他们唯一牵挂的，就是他们为之奋斗、现在尚未成功的主义和事业。为了表达自己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对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坚强信念，他们在监狱的墙壁上，画了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然后将各自的名字，工工整整的写在上面。

果然不出所料。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国民党反动派下了毒手！

这天深夜，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的数重铁门被打开，看守长带着大批武装士兵，打着手电窜进牢房。林育南和何孟雄、李求实、欧阳立安、龙大道、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等，共二十四人，被押解出看守所的弄堂，来到预先挖好的一个深坑旁。

林育南等拖着沉重的铁镣，昂然挺立，视死如归。就义前，他们齐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林育南和他的战友们，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

附：本文资料来源除注明出处者外，还先后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龙华革命烈士陵园、中共“一大”纪念馆、郑州“二七”纪念堂、广州中山图书馆、广州市革命博物馆、韶山纪念馆、清水塘纪念馆、安源纪念馆、武汉市文管处、江岸“二七”纪念馆、湖北省总工会资料室和湖北省档案馆等单位，查阅了有关的历史文献、档案材料和访问记录；在北京、上海、郑州、武汉等地访问了烈士生前的同学、战友罗章龙、刘仁静、吴化之、张金保、张纪恩、魏以新、胡毓秀、郑南宣、胡治熙和烈士的亲属林肖硖、魏清澄、林光秀等同志。

杨 匏 安

李 坚 曾庆榴

杨匏安，原名锦焘，笔名匏庵，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六日（旧历十月初二）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北山乡（现属珠海市）。

香山县地濒海滨，盛产稻米鱼虾，且是有名的华侨之乡。北山乡位于它的南端，与澳门一水之隔，风景秀美。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陆秀夫，曾在这一带领兵抗元，至死不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诞生在距北山乡数十里的翠亨村。他的革命事迹，在这一带也流传已久，妇孺皆知。

杨匏安的祖父是北山乡的大地主，生下十三个儿女。匏安的父亲富祥，排行居长，到他当家时，家业已经破落。富祥为了养活一家，往返于福州、澳门之间，贩运茶叶瓷器出口，本小利微，勉强度日。他在匏安童年时代就去世了。匏安的母亲陈智，出身于华侨富商宦宦之家，受过旧式教育，爱好诗词文学，能写一笔好字，而且工于针黹。富祥去世后，孤儿寡妇，一家数口，主要靠她的手工维持生活。匏安还有个庶母关秀英，原是他母亲陪嫁的婢女，负责一家里里外外的粗活。家庭的变故，使匏安深感世态炎凉，对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逐渐产生不满的心理。

杨匏安从小就在他母亲的膝上，跟着她背诵诗词古文。他聪敏好学，教过几次，便能琅琅上口。许多名篇佳作，从小就

背得娴熟。杨匏安后来自称“幼时颇有诗癖”^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他母亲的影响。

杨匏安在本乡恭都小学堂读书时，是一个性格沉静、勤学好问的学生。他对各门功课都有兴趣，总爱寻根究底，特别爱好文学、历史。他最崇敬文天祥、岳飞式的英雄人物。文天祥兵败被俘，宁死不屈，过北山附近的伶仃洋，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这是杨匏安最爱吟诵的诗篇。他学习成绩优异，在诗文方面的才华，这时已有所流露，经常受到师友们的夸奖。他后来在《诗选自序》中也说，少年时“谬以诗古文词见称朋旧”。可见他的诗词文章，很早就有点名气了。

杨匏安念完小学后，尽管家庭生活已很困难，他的母亲却不忍心自己的独子少年失学，不惜变卖了家里仅有的三亩多地，托亲戚带他到广州设法升学。杨匏安终于考上了两广高等学堂的附设中学。

两广高等学堂的前身，是清朝洋务派首领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这是华南有名的学府，不但藏书丰富，人文荟萃；而且小桥流水，茂林修竹，风景秀美，环境清幽。它位于广州西村，辛亥革命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即今广雅中学），由著名的国学家、诗人吴道镛、黄节先后任校长。杨匏安在这里有名师指导，每日浏览古今中外的图书，进步很快，不仅对旧文学打下了更深广的基础，同时也接触了张之洞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和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派的改良思潮。

^① 匏庵：《诗选自序》，《广东中华新报》1918年4月29—30日。

杨匏安在广州读书几年，家里已经把田地卖尽，再也无法弄到钱供他继续上学。本来杨家祖尝有一部分助学款，但给管公尝的叔祖把持着，欺负杨匏安家是孤儿寡妇，怎么说也不肯供给他的上学费用，杨匏安只得辍学回乡。

一九一一年十月，爆发了辛亥革命。那时，杨匏安的家乡香洲、前山一带，驻扎着一营清政府的新军。在同盟会党人的策动下，这营新军宣布起义，光复了香山县城。但辛亥革命的果实，却被军阀袁世凯篡夺了。接着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又告失败。袁世凯的走狗、云南军阀龙济光占据了广东。他的土匪队伍“济军”，进驻香山，到处贩烟开赌，加捐增税，奸淫虏掠，无恶不作。辛亥革命时逃往港澳的反动豪绅又跑回来，勾结“济军”，封报馆，捉记者，捕拿革命党人，……封建复辟的恐怖，弥漫着香山城乡。血气方刚、智力渐长的杨匏安，目击着一幕幕政治风云的激变，想到有数千年文明史的祖国，水秀山媚的家乡，依然是豺狼当道，虎豹横行；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失败了；张之洞们的洋务运动失败了；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人苦心缔造的民主共和国也名存实亡了。“霸气已沉文物改，云流垂尽管弦凄”^①。他不禁心绪低沉，徘徊苦思，祖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包括自己在内的年青一代的出路在哪里？怎样才能洗刷百数十年来外国侵略者加在中华民族头上的耻辱和灾难？他搔首彷徨，辗转反侧，却找不到明确的答案。

杨匏安回乡不久，在恭都小学堂任教。当时，学校和政府机关一样腐败。恭都学堂的校长刘希明，原是同盟会会员，在

^①匏庵：《泛舟》，《广东中华新报》1918年5月28日。

辛亥革命期间，参与过策动民军起义。但他和那些民军首领一样，借助同伴的鲜血，捞到一官半职之后，就与军阀官僚豪绅恶霸，同流合污了。他在学校里贪污学款，拖欠教师工薪，引起师生们的极大愤慨。杨匏安与两位教师挺身而出，当众揭露刘希明的贪污行为，要求当局查办。哪曾料到刘希明却暗中勾结豪绅，贿通官府，反将杨匏安和一位姓吴的教师逮捕，扣上“图谋不轨”的罪名，关进监狱。事情发生后，急得杨匏安的母亲到处求人说情，费了好大的周折，才把他保释出来。

“吃一堑，长一智。”经历过这一回冤狱，杨匏安更看清了社会的黑暗。这样的世道，哪里有什么公理！哪里有什么正义！他痛恨那些贪赃枉法、残民以逞的军阀官僚；更痛恨那些出卖灵魂、蜕化变节的假革命党人。就在那一年，他从祖尝的助学款中争得一笔旅费，抱着必须去除人间腐恶的决心，与比他大两岁的堂叔杨章甫等，漂舟东渡，赴日本游学。他们到了横滨，最初打算通过同行吴老师的一位亲戚介绍职业。不料这位在洋行当买办的“亲戚”，听说他们是在家乡坐过牢出来的，不但不表同情，反而责怪他们少年好事，惹是生非，冷漠地将他们拒之门外。他们找不到固定的职业，又无钱进学校，只好寄居在一位华侨家里。主人姓康，是康有为的亲属。他的女儿康景昭后来与匏安一同回国，任广州道根女校校长，是匏安毕生过从甚密的朋友之一。

杨匏安在横滨的生活是十分清苦的。衣物典尽了，连出国时带去的书籍也卖完了，打零工，干粗活，受歧视，饿肚子，是这些日子中常有的事。“避债怕闻梯得得”——据说他曾用这样的句子来描述他自己当时的处境。但就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他也没有放松过学习。最初一段时间，他自学日文，由于

专心一意，刻苦认真，几个月后，就能读能写，并开始从事翻译了。他经常跑书店，或整天泡在图书馆里，埋头钻研有关政治、经济、哲学、美学和文艺等方面的书籍，认真探究西方各种流派的新学说和社会思潮。他后来在国内发表过大量的译著，就是靠这期间勤攻苦读打下的基础。尽管身处异国，生活艰难，杨匏安却以读书为乐，怡然自得，但他的心境，毕竟也有不平静的时候。他想念亲人，萦怀祖国，曾经写下许多旧体诗，来描述异国情趣和游子思乡之情。归国后，他把过去的诗作集成一厚本，题名《寒灰集》。取义不止于唐人诗句“心事若寒灰”，更在于“起烟于寒灰之上，生华于已枯之木”。可惜这本诗集已经丢失了。

一九一六年，杨匏安从日本回到家乡。在他的母亲主持下，和翠薇村的一个姑娘吴佩琪结了婚。婚后不久，他就到澳门，在一个印刷铺老板家里当家庭教师。当时，在广州、澳门等地，有钱人家还盛行设家塾，延塾师，教子弟的风气。学生只有三、五个或七、八个，教学内容是主人指定的，无非幼学琼林、增广贤文、唐诗、古文、四书五经之类。杨匏安把一个幼年丧失父母的堂弟也带去附读。

一九一八年初，杨匏安举家迁到广州，寄居在司后街杨家祠（原址在现省民政局长东边）。这是北山乡杨氏家族出资兴建的祠堂。杨匏安全家在那里一直住了好几年。起初，他在时敏中学任教。时敏中学是一所私立学校，位于西关荔枝湾附近。他担任国文课，还当过一段时间的教务主任。道根女校的负责人康景昭、黎演荪夫妇，也邀他去该校讲授诗词。他教学生写诗作文，提出关于诗文内容与形式的两项标准：“义取敦本务实，辞唯绝俗清高”。又说：“诗文一道，首贵无俗气。”

……然欲诗文之无俗气者，必其人先无俗气；外欲其人之无俗气者，则举凡流俗所趋之事，非斥去不可。”^①在他的教导下，学生进步很快。两校学生都积极参与了当时广州学联的反日爱国活动，有的学生还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诗作。

当时，中学教员的薪水是不高的。特别是时敏中学，除了学费收入外，没有其他固定的经费来源，经常拖欠教职员工的薪水。这时，鲍安已有了孩子，连少孤的堂弟和独身的姑母，一家七口，生活非常窘迫；入不敷出，典当借贷一类苦恼事，总是无法摆脱。正当这个时候，广州警察局的一位官僚，请他去当幕僚。对这个许多人都求之不得的“肥缺”，鲍安却决然拒绝了。他宁可清贫度日，也决不寻官问爵，趋炎附势。他写过一首题为《钓》^②的诗：

收拾诗篇理钓竿，
潺湲秋水辨微寒。
居夷有此宁为陋，
合辙于今倍觉难。
霜叶争霞明水际，
风帆向晚走云端。
单襦皂帽萧条甚，
老却天涯管幼安。

在诗中，鲍安以东汉末年鄙夷荣华富贵、不愿做官的管宁

①鲍庵：《诗词自序》，《广东中华新报》1918年4月29—30日。

②载《广东中华新报》1918年3月11日。

（幼安）自喻，表达自己在恶浊的社会环境中，决不随波逐流、同流合污，而宁愿安贫乐道、淡泊自甘的高洁志趣。由于生活困难，杨安不得不兼以卖文为活。他在教学之余，便写些稿子投到《广东中华新报》和《东方杂志》，借此换点稿费，弥补家用的不足。后来还兼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这时，他开始用杨庵作笔名。孔子曰：“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这大概就是他取名杨庵的由来吧。杨安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发表的文章，多属西方寓言、杂文、随笔、小品文之类，也有一些旧诗和小说。他对写作，态度严肃，认为写小说应“删除浮艳，外质而中膏，毋佻毋纤，恒存肃穆之气。”^①因此，他在这时期发表的作品如《窃疾可治》、《智妇》、《波斯老人》等，皆行文雅洁，了无俗笔。

然而，杨安这时的心情，却是沉闷而忧郁的。这除了生活的坎坷，成为他的心头重压之外，国事的暗淡，也使他感到窒息。这两年间，中国政局又演出一幕一幕的闹剧。先是一九一七年的夏天，辫帅张勋率领辫子军进京复辟；虽然不过是为时十一天的插曲，但在中国人民的心头，却留下了很深的暗影。同年九月，孙中山带领海军南下护法，在广州成立军政府，不到一年，又被西南军阀逼走上海。南北军阀连年混战，只苦了老百姓，长年陷于火海血泊之中。缅怀家国，千丝万绪，夜气如磐，何时始旦？杨安一时找不到正确的出路。他那时的作品，除了介绍一些西方的时人轶事，民间趣闻，为人们茶余饭后提供谈屑资料之外，积极的思想内容不多。他的诗除了以

^① 《广东中华新报》1918年3月11日。

清高自期为基调外，也流露不少“逃心空寂”的避世心情。例如他的《消夏》^①一诗：

春衣典尽觉身轻，
日日江头着屐行。
不作词人妨感喟，
偶同渔父话虚盈。
人闲只合看云坐，
世乱聊为带雨耕。
我已无心问哀乐，
残蝉何事倚高鸣？！

诗中流露了“我已无心问哀乐”、“世乱聊为带雨耕”一类的由愤世到避世的空虚思想，这同他当时还找不到革命的出路是有关的。

但是，杨匏安毕竟是一个不愿自我消沉、不甘长此颓唐的人。他不会在祖国陆沉、人民受难的时候，真的袖手旁观。因此后来他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此，他的诗也含有积极向上，向往斗争生活的因素。如《秋夜同无庵闲步》^②：

拂面西风病乍苏，
柳堤行尽屐声孤，
大江潮涌初圆月，

①载《广东中华新报》1918年3月11日。

②载《广东中华新报》1918年9月15日。

浅渚秋惊熟睡鳧。
借次清霜坚傲骨，
拼将浊酒斗孱躯。
多时不作还乡梦，
旧种黄花尚有无？

在这首诗中，他通过“借次清霜坚傲骨”，赞美秋菊冬梅斗霜傲雪的精神，表达他自己不畏强暴，投身斗争的信念和决心。

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四日至二十二日，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了一篇文言小说《王呆子》。这篇小说描写了一个名叫王呆子的少年为父姐复仇的故事。王呆子的父亲和姐姐被一个姓郑的恶霸迫害致死，他却自愿到郑家为佣，侍候主人唯恐不周。邻居都不齿于他的为人。恶霸郑某也以他愚驽可欺，不加防备。第二年清明扫墓，王呆子随主人往，乘主人跪拜之际，骤然举起锄头，将恶霸击晕在地，并取怀中利刃，将仇人心肝剐出，拜祭父姐，然后入山为盗。匏安在小说的结尾写道：

论曰：豫让吞炭，渐离击筑，悲且壮矣！然兹二人，国士也，其为此固宜。若王呆子者，阉茸猥琐，未尝闻古义，乃驱于天性，激于怨毒，忍死舍垢，卒推刃仇家，其“愚”宁可及哉！郑氏多行不义，丧身竖子之手，其货财妾媵，后且皆不保。君子于此，窃有感焉！

杨匏安借这篇小说，尽情地抒发了他对被剥削被压迫者的

同情和对旧社会封建势力积郁已久的愤懑。但他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斗争道路，他只能把伸张正义，为民除害的愿望，寄托在被污辱被迫害的青年一代贫苦农民个人的复仇行动上。这也许是“起烟于寒灰之上”的一种含义吧。

一九一九年，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我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在五四革命风潮的激荡下，杨匏安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他曾经接受过西方和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也有较多的了解。他兼职的《广东中华新报》，曾经比较客观地报道过一系列有关十月革命的消息，认为“露西亚（俄国）之有李宁（列宁），而历史上顿增一种异彩”^①。俄国布尔什维克“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②。帝国主义宰割战败国、瓜分世界的巴黎和会和五四爱国运动，加深了杨匏安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一方面他从五四风暴中深切体会到人民力量的伟大，从而坚定了投身群众革命运动的决心；另一方面，他又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李大钊的文章中，学习到初步用马克思主义观察祖国命运的方法。这就大大地推动了他清除过去思想中消沉的因素，而大步地朝着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方向前进。

《广东中华新报》是广州当时一家规模较大、影响较著的政学系报纸。在北方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和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这家报纸从一九一九年六月起，创设《通俗大学校》副刊，以介绍科学知识，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杨匏安这时不再写过去那种《世说新语》式的笔记小品和“逃心空寂”的旧体诗，而开始在这副刊上热情地向读者大量介绍社会科学

① 《呜呼！李宁》，《广东中华新报》1918年9月14日。

② 《李宁胜利之原因》，《广东中华新报》1917年12月28日。

知识。

他先是于六、七月间，以《美学拾零》为总标题，发表了两万多字的文章，分别介绍了西方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等人的美学思想。在这之前，除蔡元培零星介绍过少数西方学者的美学思想外，杨匏安是我国最早系统地介绍西方美学思想的人。从七月十二日起，他又以《世界学说》为题，发表了两万多字的译述文章。《广东中华新报》社长容伯挺给他作序说：

吾国人输入欧美学术之心至怠。是以海通至今，行一世纪，而欧美学术思想为国人所晓者，尚百不逮一。甚至各科之普通学说、术语名词之粗浅概念，即在号称学者士夫，亦莫能举其似焉。嗟乎，国耻莫大于是矣！……鄙人窃尝恻之，爰于报业之末，思尽其力，以稍弥其憾。用就精神科学自然科学中，遴选诸家学说二百数十余条，请社友杨君抄译而演述之，以餍吾国志学之士。

在这个专题下，杨匏安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说，其中包括唯物论、唯心论、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实证论、实用主义、机械论，以及马克思主义、讲坛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等。内容所及，几乎包括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和各种流派，其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在当时的环境中，他这类译述，有助于人们开拓眼界，了解各种思潮、学说的来龙去脉和基本要点，进而加以比较分析，作出选择。

那时，在国内思想界，李大钊与胡适正展开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胡适大肆鼓吹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主张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用以反对马克思主义。他的谬论受到李大钊的有力驳斥。八月初，鲍安在简介《实用主义》时，作了这样的评价：“主张是说者亦非新建，盖古义而翻用耳。”“于实用主义，真理实为一种之手段而已。”并明确指出，这种主义“乃一种调和说，又曰改良说”。他直率地道破了实用主义的市侩哲学真面目，实际上是支持了李大钊对胡适兜售实用主义的回击。

十月间，杨鲍安发表了《社会主义》一文。文中简要地介绍了欧文、圣西门、傅立叶、普鲁东和马克思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在谈到马克思时，他赞扬《资本论》“为社会主义圣经”，并指出“近代生产事业，虽以资本制度而益形发达，然今日贫富之悬隔，及社会上各种罪恶，莫不由是而生。然则现在之社会状态，实劳动者奋起革命，以求改造之时期也。”这些观点表明，杨鲍安在这时已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的实践意义了。

杨鲍安当时在《世界学说》专栏发表的四十多篇译述文章中，篇幅最长也最重要的一篇，是《马克思主义》。该文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二月四日，共刊登了十九天次，与李大钊的著名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半篇（刊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差不多同时问世。这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开头说：

自马克思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且去来查尔（拉萨尔）而归于马氏。在近世社会党中，其为最有势力者，无疑矣！马氏以唯物的

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也。由发表《共产党宣言》书之一八四八年，至刊行《资本论》第一卷之一八六七年，此二十年间，马克思主义之潮流达于最高，其学说亦于此时大成。

这里，杨匏安热情地赞颂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伟大贡献，高度评价了它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也表达了自己对这个学说的无比敬仰。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杨匏安明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阐述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必须相适应的原理。一方面，肯定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也肯定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但是任何理想，都不能离开物质世界而独立存在，也不成为社会变迁的最终原因。“是故社会制度之改革，必不能恃其社会之理想，而必由于阶级之战争。盖阶级战争者，经济现象的结果也。”杨匏安进而分析了近代社会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认为“近世的经济，乃合力共作，为社会式的经济也。然而现行法律，犹本于古代独作自享的经济（个人式者）而立，其与近代社会相冲突，抑亦明矣。法律与其经济既不相称，以唯物的历史观论之，法律终必让步，随经济而转移；而私有财产之制度，又基于古代经济的法律而立，今日尤无存在之理。”从而鲜明地指出必须废除现行法律，废除私有财产制度。

杨匏安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了高度的赞扬。他说：“自马克思唯物的历史观既出，其于社会科学的意义，固在于指示社会生活的规则，比其所以为极有用之史学方法，又为空前之社会哲学欤！”

关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杨匏安写道：“马克思所谓阶级竞争之所由起，因土地共有制度既坏之后，经济的构造，皆建在阶级对立之上。所谓阶级，即经济上利害相反之阶级。其分别，则一方为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之手段者，一方则为无土地或资本等生产之手段者；一方肆其压服掠夺，而一方则受压服掠夺者也。此两种阶级，在种种时代，以种种形式而表现；若亚细亚者，若欧洲古代者，若封建者，若现代资本家者。是等生产方法出现之次第，可作经济组织之进化阶段。而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在社会生产方法中，乃采对敌形式之最后者。阶级竞争亦将随此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同时告终矣。”

杨匏安还以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了马克思的“余工余值”说（即剩余价值学说）。他阐述了马克思关于“不变资本”、“可变资本”的涵义，以及资本家掠夺工人剩余价值的诸种方法，揭露了资产阶级的罪恶。杨匏安还指出，资本家的剥削愈重，工人的反抗必愈烈。“一旦群起而取得国家之权力，改一切生产工具为国有，脱去资本之羁绊，恢复各人之经济自由，此为解决社会经济的矛盾之唯一方法，亦即近代社会经济制度所必有之结果，是固循社会演进的程序而自然发生者也。”

杨匏安的文章最后断言：“马氏之言验矣！今日欧美诸国已悟布尔塞维克之不能以武力扫除矣！”

《马克思主义》一文的发表，标志着杨匏安已从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开始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作为

南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的宣传活动，不但对当时正在深入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而且为其后广东共产党组织的成立，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文章难免还有缺点。例如，他的《共产主义》一文，对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高形态缺乏正确的理解，把柏拉图的“理想国”，摩菜里、巴贝夫、卡贝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周代的井田制，都与共产主义混为一谈。尽管如此，但作为南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他的译著，毕竟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不朽的丰碑。

五四运动后，革命更加深入发展了。一九二〇年夏天，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小组在上海诞生。一九二一年春，广东正式成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就在这一年的春夏间，杨匏安加入了共产党，成为继谭平山数人之后，广东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当年五、六月间，已在上海加入党组织的林伯渠来到广州，和杨匏安、谭平山、陈公博等，进行了两次座谈^①。杨匏安入党后，他的住家——杨家祠，成了党的活动据点。党的许多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党组织成员创办的注音字母教导团，也一度设在这里。

那时，杨匏安已经离开了时敏中学和《广东中华新报》，由报界同人著名律师陈大年（陈萝生）介绍，转到南武中学任教。后来又在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任兼职教员。当时，南武和“甲工”的学生运动都非常活跃。特别是“甲工”，一直是学生运动的支柱。后来成为著名共产党人的阮啸仙、周其鉴、刘

^①林伯渠：《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载《“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尔崧、张善铭、周文雍等，都出自这个学校。周文雍还是杨匏安教过的学生。

杨匏安入党时，广东思想界还很混乱。如社会主义青年团还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团内不仅无政府主义思潮占着优势，其他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也很有市场。为此，广东党组织十分注重宣传马克思主义。杨匏安带着比以往更高的热情，继续开展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

一九二二年春，杨匏安发表了《马克思主义浅说》。这篇文章是专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支部的刊物《青年周刊》写的，用注音字母“友么马”的署名，在该刊第三期起连续登载。这篇文章用白话文通俗地、系统地向青年读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学说三个组成部分。比一九一九年那篇《马克思主义》写得更加准确鲜明，深入浅出，也更富有说服力。其中一部分还参考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堺利彦的著作。当时，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经进行了改组，明确规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广东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性也高涨起来。他们以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为骨干，组织了广东社会主义讨论会。以“专讨论马克思主义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各种问题，以至如何应用于中国为宗旨。”匏安这篇文章，适应了青年们学习的需要，受到了广大青年的欢迎。

不久，杨匏安在《珠江评论》上，又发表了《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一文，分析和阐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时，广东军阀陈炯明已经抛弃同情社会主义的伪装，公开背叛孙中山，逮捕廖仲恺，迫害革命进步人士。党、团刊

物，皆被封闭。宣传员养成所、注音字母教导团等机构，也遭取缔。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给团中央的一封信中提到：“现在不似从前，只能秘密进行，珠评（即《珠江评论》）已被查禁，团址因被监视，已迁。六月未接中央一钱接济……”；区团委书记阮啸仙被迫转移；由杨匏安代理区团委书记^①。次年五月，粤区团委改选，杨匏安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②。在党、团活动陷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斗争并没有停止。团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就是在这时积极筹备，于一九二三年六月正式建立起来的，社址就在司后街杨家祠附近。杨匏安经常参加它的活动。

这一时期，杨匏安开始从事工人运动。他先是和杨殷一起，深入到石井兵工厂，同该厂工人罗珠，陈日长、郑煜等，结成一个工人秘密团体——“十人团”，团内有团规、旗号、暗号，入团时经过宣誓。这个组织，是石井兵工厂党支部的前身。通过“十人团”，他们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提高工人觉悟，组织工人开展斗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准备，兵工厂工人爆发了一场反对厂长马超俊的斗争。他们揭露了马超俊贪污渎职，虐待工人的罪行，迫使当局撤销了他的厂长职务。

其后，杨匏安经杨殷介绍，担任粤汉铁路局广州分局编辑主任。他利用这一合法身份，深入到广三、广九和粤汉铁路工人中活动，广泛接触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他启发工友：“为什么你们终年劳碌，不得温饱；而军阀、官僚、地主和资本家不耕不作，却穷奢极欲，花天酒地？”然后他指出，这都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工人、农民只

^① 《致秀松信》（1922年10月23日），复制件存广东省档案馆。

^② 《啸仙致存统信》（1923年5月19日），复制件存广东省档案馆。

有起来推翻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才能得到翻身解放。他还告诉大家，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要在全中国和全世界消灭剥削，建立平等富足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不仅是人类美好的理想，而且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杨匏安不但善于利用各种日常生活问题启发工人觉悟，而且还经常同工人们讨论、研究如何组织工会、如何开展斗争的问题，引导大家注意方法步骤，讲究斗争策略。他提出当时应从经济入手，适当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这样才能争取更多群众的支持，获得社会普遍的同情。杨匏安相貌清瘦，态度和蔼，谈论问题，深入浅出，戴着一副深度的近眼视镜，说话带着浓重的香山口音，很得工人的喜欢和爱戴。杨家祠内，几乎天天晚上都挤满了工人。

杨匏安还十分注意从工人中发现积极分子，形成斗争核心。他和杨殷、潘兆銓相继培养、吸收了铁路工人陆枝、李甫、李连入党，建立黄沙地段党支部，由杨匏安担任支部书记。为了便于党的活动，一九二三年底，他又出面在广州黄沙海傍街开办了一间北江商运局，承运货物，利用滇军押运。经营范围，及于清远、韶关一带。这既掩护了党在粤汉铁路工人中的革命工作，也为党筹措了一笔活动经费。

经过他们深入细致的发动和组织，广州铁路系统的工人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工人们曾发起一系列的斗争，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订立劳动保险条例，改善卫生安全设备等等。这些条件，大部分都在斗争中得到实现。工人们受到很大的鼓舞，更加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后来，逐步建立了广三、广九和粤汉三铁路的党支部。这都为日后发动铁路工人配合革命军东征和讨伐杨、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正式决定国共合作。这年秋，党决定派谭平山参加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其后以谭平山、杨匏安两人为我党在国民党的党团书记，以统一出席国民党会议的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思想和意见。从此杨匏安主要转为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战斗在特殊的岗位上。

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下，国民党的改组以广州市党部为试点。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以谭平山为书记兼组织委员^①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分广州为十二区，重新登记党员，成立区分部。杨匏安和许多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都积极投入这一工作，动员大批革命工人和青年学生参加国民党。十一月十一日，国民党召开广州市党员大会。会后，各区分部相继成立。杨匏安当选为第十区分部执行委员兼秘书。阮啸仙、杨殷、刘尔崧、张瑞成、潘兆銮等共产党人，分别被选为各区分部执行委员，有的还兼任秘书^②。国民党改组之初，组织形式采取苏俄的民主集中制的委员会制。委员会不设固定主席，秘书就是委员会日常事务的实际负责人。

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推举谭平山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杨匏安为组织部秘书。中央组织部的职责，不仅要遴选人员，派往全国各大区、省、市，负责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而且要掌管军队、机关、学校、企业、海外、以及广东省党部成立之前

① <会务汇记·临时中央第一次会议>；<国民党周刊>第1期，1923年11月25日广州出版。

② <粤区团委给团中央报告>（1923年12月30日），复制件存广东省档案馆。

广东各县市的党务工作。因此，中央组织部是国民党中央各部中工作最繁忙的一个部。当时，谭平山还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经常要处理各个方面的大事。组织部的工作，实际上主要由杨匏安负责。

国民党“一大”之后，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已全面铺开。当时，国民党中央在北京、上海、汉口建立地方执行部。李大钊在北京，林伯渠在汉口，分别担任当地执行部组织部长；毛泽东在上海，担任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同时，还派出方舟、韩麟符、夏曦、刘伯垂、赵干等，分别担任直隶、热河、湖南、湖北、江西等十四省国民党改组筹备员。在广东，组织部也陆续派员奔赴各地，重新登记党员，建立和发展国民党的地方党部。第一次东征时（一九二五年二月），委派东征军黄埔军校前方政治部代行重建东江、潮梅各县的国民党组织；任周恩来为这个地区国民党的组织主任，鲁易、杨石魂等为组织特派员，方临川（方方）为普宁、揭阳组织特派员。但是，国民党的改组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阻挠和破坏。首先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南北军阀，造谣攻击，说国民党改组是“赤化”，是实行“共产公妻”，借此蛊惑人心；其次是国民党右派，极力反对国共合作，污蔑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阴谋”，是为了“篡夺”国民党。他们反对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口号，说这将使国民党“蒙受国际之仇恨”，“在国内断绝实力派之协助”；同时他们勾结地方军阀、土豪劣绅，力图把持国民党各地党部，抗拒改组，甚至不惜大打出手，殴伤和杀害组织部派出的党务人员。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还造谣说，中央组织部“对于各地党部之筹备

员，有共产派者派之，无共产派者竟不派。”^① 攻击污蔑谭平山、杨匏安操纵国民党组织。此外，国民党地方党部的改组工作，还受到各县行政官员的阻挠。如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国民党老右派古应芬派出的县长，大多是腐朽分子，视做官为发财捷径，将地方财政收入当作私人钱包。他们不肯拨交县党部的经费，甚至攻击县党部开展工农运动，斗争土豪劣绅，是“干涉地方行政”，借辞保护反动分子。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斗争中，杨匏安坚持原则，办事机敏。他认真贯彻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国民党“一大”制定的方针，干净利落而又审慎地处理了许多党内的矛盾纠纷，使国民党内两派之间，地方党部与地方行政之间的不少争执案件，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有一次，五华县党部弹劾该县县长胡某摧残党务、贪赃枉法。杨匏安主持省党部执委会会议，经过调查研究，认为这个弹劾案有充分理由，立即函请省政府将该县长撤职，扣留查办，并促古大存等回县努力工作。杨匏安主持的这次会议，还决定函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省政府开省务会议时由省党部派代表出席，以讨论制止各地顽固分子破坏国民党改组的问题^②。在匏安等人的努力下，揭露、打击了敌人和右派的破坏活动，维护了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发展了革命统一战线。

杨匏安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时，还很注意同国民党进步人士的共事合作。他在日本游学时，就已经认识廖仲恺，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又一起工作。他们都具有艰苦朴素，为革命孜孜不息的高尚品质，因此两人很合得来。廖仲恺也常到杨

^①转引自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商务印书馆1938年7月版。

^②《广东省执委会第39次会议纪录》，载《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日报》第6期，1926年8月出版。

家祠，同他商量工作，切磋问题。杨匏安对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十分敬重。而孙中山对他这位香山同乡以及对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等也很赏识，认为这些年青的共产党员才是他真正的革命同志。在国民党“一大”期间，共产党员提出不当国民党中央的部长，只当各部的秘书。孙中山十分赞赏这种只知为革命工作，而不追求做官的精神；但他还是与廖仲恺分别提出林伯渠、谭平山担任中央部长，杨匏安等为各部秘书。他认为要挽救“正在堕落中死亡”的国民党，就要注入新血液；吸收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就是为“加强和恢复它的血液的流动。”国民党右派一再反对国共合作。孙中山“曾多次宣称，除非国民党有一个真正革命的纲领，否则他就要和这批人分手，并解散国民党。他宣布他将组织一个新党，或者他本人加入共产党”^①。一九二四年十月，孙中山为镇压商团叛乱组织革命委员会，不要胡汉民、汪精卫参加，而特派廖仲恺、谭平山为全权委员。杨匏安也参加了该会的工作。

一九二四年秋，中共广东区委成立，杨匏安任区委监察委员，与陈延年、周恩来等一同工作。陈延年、周恩来等，经常到杨家祠开会，研究问题。陈延年还和杨匏安以及他的孩子到郊外打雀，以练习射击。当时，杨匏安身居要职，自然有些亲戚朋友找上门来，求取一差半职，有的还送来礼物。但他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从不徇私滥任，对送来的礼物，一律叫家人退回去。他廉洁奉公，一丝不苟。有一次省港罢工委员会在杨家祠分发一笔捐款给罢工工人，麻袋里遗落一个两毛钱的银币，被孩子们拣来玩耍。杨匏安发觉后，立即严肃地批评教育

^①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载《宋庆龄选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孩子说：这是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拿来玩。叫他们立即送回罢工委员会去。周恩来对杨匏安“为官廉洁，家境清贫”十分赞赏，直到多年后还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①。

同年十一月，谭平山因出席国际会议，离职几个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决定，由杨匏安代理中央组织部长。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的努力发动下，全国各地人民普遍举行了沉痛追悼孙中山先生的群众大会。三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在广州以杨匏安、黄居仁等十六人为筹备员，召开有一万多党员参加的追悼会。会上宣布全国五十万党员誓为继承孙中山的革命遗志奋斗到底。通过各地追悼会的宣传，使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纲领和三大政策，更加深入全国人心。

同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五卅”爱国运动。这时，盘踞广州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勾结香港英帝国主义者和北洋军阀，阴谋叛乱。六月十二日，广东革命政府在铁路工人的配合下，以武力迅速扑灭了这场叛乱。杨匏安在参与平叛后的第二天，即以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长和国民党中央农工部长廖仲恺代表的身份，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邓中夏一起，前往香港会同苏兆征、杨殷等，共同策划发动香港工人罢工，以响应上海的“五卅”运动。

当时，香港共有一百三十多个工会，派别很多，情况复杂。一部分被帮会的头子操纵着；一部分过去与孙中山的关系较密切，而受我党影响的工会还不多。杨匏安、邓中夏到香港

^①杨明：〈最亲切的回忆〉，未刊稿。

后，首先召开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会议，并印发传单到各工厂、码头分发，进行广泛宣传发动工作；然后，以请客的方式为掩护，举行全港工团会议，报告“五卅”惨案的经过和各地声援的情况，号召各工会工人罢工回省。当时，许多工会领袖虽不反对罢工，但担心罢工后会影响到他们的收入，有些工人也担心回广州后会流落街头，食宿无着。杨匏安即以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代表的身份，保证罢工工人回省后，由政府负责解决交通食宿问题，有效地解除了工人们的顾虑。于是通过了罢工决议，各工会相继发布了罢工的命令。六月十九日，工人们开始罢工离港。二十三日，广州发生帝国主义者开枪扫射我游行队伍的沙基惨案，更加激起了香港工人的爱国义愤。当时，香港英帝国主义宣布施行战时戒严令，海军陆战队全体登陆警戒，军舰巡逻海面，妄图禁止工人罢工，阻挠工人离开香港。但大批工人还是突破了重重封锁，步行到深圳或绕道澳门、前山、三水河口，陆续回到广州。

港英当局为了破坏罢工，派出警探四处搜捕罢工“煽动者”。七月一日晚十时，正当杨匏安和胡荫在海员工人戴卓民家商量罢工问题的时候，被警探逮捕了。警方把他们投进狱中。杨匏安被捕后的第三天，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号，发布了《杨长官被捕》的消息。二十多万罢工工人闻讯无比激愤，更加增添了斗志。工人纠察队严密封锁了港口、通道，禁止粮食、肉类、蔬菜运往香港。致使香港缺水断电，垃圾粪便成堆，变成饿港、死港、臭港，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者。杨匏安等在狱中，足足被关了五十天，警方始终无法找到他们煽动工潮的证据，只得将他们释放并“驱逐出境”。

八月二十日，《工人之路》特号刊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李森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杨匏安先生为这次罢工很出力的人……现被押出境，已由澳门转赴前山，一、二日内便可来省，我们加入这位有力的助手，更容易操胜算了。”二十四日，该报用三号大字加框，发布《欢迎杨匏安先生出狱》的特别新闻，说杨匏安已到省，大家对这一消息“必有无限愉快”。二十五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省教育会举行大会，欢迎苏俄全国总工会代表来华和杨匏安、胡荫出狱。门口用榕叶鲜花搭起牌楼，场面极其隆重。但那天杨匏安却没有到会。他认为这样隆重地欢迎国际友人是应该的，至于自己，为革命尽力甚至作出牺牲，乃是共产党员的本分，虽出于工人们的热诚，也不应该接受；何况廖仲恺被刺，真凶未获，二十多万工人生活费用还需筹措，许多工作都急需处理呢！直到八月二十七日，杨匏安才出席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八百多名工人代表，纷纷向前慰问。主席宣布开会时，全体代表一致起立向他行一鞠躬礼。杨匏安在会上讲话，绝口不提他被捕后在狱中的苦难遭遇，而只强调“今天不是空谈的时候，我们唯有实行奋斗！”他坦率地批评了香港罢工过程中存在的种种缺点，如工团领袖脱离群众，工团之间意见分歧，行动迟缓，等等；恳切要求各工会学习欧洲赤色职工会团结一致，行动迅速的优点，以提高今后的战斗力。他在讲话中，对廖仲恺被害，表示无比悲痛，要求罢工工人继承廖先生的反帝遗志，斗争到底。九月六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一致通过聘请杨匏安为顾问。不久又请他担任香港罢工工团宣传学校名誉校长。

廖仲恺是在杨匏安出狱的同一天（八月二十日），在广州被反革命买凶刺杀的。他闻讯后无比悲恸，一到广州，就和刚

由湖南来广州不久的何叔衡，到廖仲恺灵前抚棺痛哭。为了审查廖案真相，惩办凶犯，革命政府成立了有周恩来等人参加的廖案特别委员会，并成立特别法庭，由杨匏安、李章达等任审判员，执行审讯案犯工作。虽然受到国民党右派和假左派的阻挠、破坏，但杨匏安还是为查清廖案做了大量工作。最后，国民政府把右派头子胡汉民遣送出国，并解除了许崇智的军权。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正式成立了省党部。杨匏安当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其时，国民政府已统一了广东全省。广东省党部在杨匏安主持和建议下，委派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任东江各属党务组织主任，指导惠、潮、梅各县的党务工作和重建国民党汕头市党部。同时，在广东省党部下相继建立了潮梅、南路、惠属、琼崖四特别委员会。派彭湃、邓颖超、赖先声等为潮梅特委委员，潘兆璠、林丛郁（增华）、谭竹山等为南路特委委员，萧鹏魂（隽英）、冯明光等为惠属特委委员，罗汉、张难先、陈公仁、王文明等为琼崖特委委员。由于杨匏安等人的积极努力，广东省国民党的党务工作，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省党部成立前，广东各县、市已成立党部的，只有中山、顺德等十三处，共有党员一万五千多人。从省党部成立至一九二六年一月，不到两个月，党员人数已增加到四万八千多人。到同年十二月国民党广东省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县、市党部已发展到九十七处，另有十一个筹备处，党员人数激增至二十万人。党员成分，农民占百分之四十，工人、学生各占百分之二十五，商民不足百分之十，其余军、警、自由职业和其他人员，只占百分之几，从而改变了国民党过去以华侨为主的社会基础。杨匏安当时曾说：“本党基础已坚固建筑在民众之上”，“本党组织

已由城市发展及于乡村”^①。国民党经过改组，已基本上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二百五十六人，约五分之三是共产党员。杨匏安作为广州市代表，出席了大会，与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等，担任提案审查委员，并与谭平山、林祖涵（伯渠）、李大钊、吴玉章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杨匏安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九个常务委员之一，与另外两个常委谭平山、林祖涵共同组成秘书处，处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日常工作。这时，杨匏安仍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广东省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长，是在国民党组织部门内任职最多的人之一。至国民党“二大”时，全国已有十二个省建立了国民党省党部，八个省建立了党部筹备处，四个市建立了特别党部，并建立了军队、机关、学校、企业以及海外的若干特别党部，约有党员五十万人。国民党改组所以取得这样大的成效，与广大共产党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其中杨匏安就贡献了全副精神和心血。

正当革命形势深入发展的时候，披着“左派”外衣的蒋介石，于三月二十日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强迫共产党人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五月十五日又提出所谓“党务整理案”，进一步排斥、打击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等曾主张给蒋介石以坚决的回击。杨匏安对蒋介石也是有警觉的，很早就曾说过“蒋介石是滑头仔！”针对蒋介石破坏统一战线的罪恶行径，杨匏安在五月间以中共广东区委委员的身份，召集出席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的共产党员开会，分析斗争形势，提出

^① 《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一年来的工作报告》（1926年12月），复制件存广东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

在农民运动中，应注意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对右派的破坏，必须作坚决的斗争^①。但右倾投降主义者陈独秀派了张国焘代表执行右倾退让政策。谭平山因此被迫辞去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杨匏安也离开了中央组织部。

一九二六年下半年，杨匏安继续留在广州，主持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工作。十月中旬，他和吴玉章、毛泽东、邓颖超等共产党人以及宋庆龄、何香凝等，参加了国民党执、监委员暨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了国民政府的发展问题，制订了国民党最近政纲，通过了发扬民主，反对独裁，“二五减租”等提案以及全国人民团体联合会纲领。十二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广东省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开幕。二十九日，杨匏安在会上作《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组织部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和补充说明。他指出：广东省党部成立之后，虽然党员数量增加，组织扩大，民众运动发展了；但党务工作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党员虽多而教育训练不够；党内纪律松弛，监察委员起不了督促、整饬党纪的作用；党内派别多，纠纷不已等等；提请大家详细考虑，提出补救办法。在这次大会上，杨匏安仍当选为省党部常务委员。

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革命政府北迁武汉，广东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留守广东的广西军阀李济深等，暗中与蒋介石勾结，利用战时体制，压制党内民主，扩张军事权力。一九二七年初，他们采取圈定办法，改组了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杨匏安虽仍挂名为九个常委之一，实际上新右派和假左派已在省党部占了压倒优势。

^① 《古大存同志回忆录》（1964年6月），罗尚贤整理，未刊稿。

一九二七年三月底，杨匏安与谭平山、罗易（国际工人代表团代表）等一起离开广州，于四月三日到达武汉^①。

当时，聚集武汉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正在进行着一场反对蒋介石阴谋以武力挟制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篡夺革命果实的斗争。三月间，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在左派占优势的情况下，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等决议案，改选了中央常委和政治委员，在一定程度上剥夺和限制了蒋介石的一些权力。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反革命政变。四月二十二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中央委员联名讨蒋》的通电，指出蒋介石已由反抗中央进而自立中央，号召全国民众“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蠹贼”。杨匏安在通电上签了名。

四月下旬至五月初，杨匏安出席了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②。

五月中旬，杨匏安与江董琴（武汉公安局长）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在汉口铭新街洪春里六号成立闽粤桂三省党部驻汉办事处，负责接待福建、两广因反动派压迫而流亡至武汉的革命同志^③。杨匏安等以办事处名义向外界大力揭露南方各地反动派摧残工农运动，屠杀革命人民的反革命暴行，号召各界同志为解除人民的痛苦而努力倒蒋。六月十三日，办事

①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4日。

②据肖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称：杨匏安“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另据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党史陈列资料称：1927年杨匏安以“监察委员”身份参与八七会议。因此，杨在中国共产党“五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监察委员，尚待进一步考证。

③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3日。

处发表宣言，痛斥蒋介石的叛逆行为及其一伙对武汉革命政府的造谣、毁谤，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最近公布的各项训令与政策^①。

在汉期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还指定杨匏安和吴玉章组织“被难同志救恤委员会”，并被推选为常委。他为调查各地被难同志事迹，组织救恤，做了许多工作。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为了挽救革命，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这一天，南昌《民国日报》发布了由宋庆龄等二十二人署名的痛斥蒋介石、汪精卫反革命罪行的《中央委员会宣言》，杨匏安是署名者之一。八月七日，在瞿秋白、李维汉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杨匏安以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参加了这次著名的会议。

八七会议后，杨匏安接受党的指示，离开武汉，经上海回到香港和澳门，以协助广东党组织接应八一起义南下部队，和向第四军张发奎做统战工作。但和张的谈判没有成功。不久，爆发了广州起义。

一九二七年底，瞿秋白为首的中央犯了左倾错误，实行惩办主义，处分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大批同志，杨匏安被取消了中央监委的资格^②。当时谭平山因涉及与邓演达等组织第三党问题，被开除了党籍。传闻他们在组织第三党时，把杨匏安列为发起人之一。为此，杨匏安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在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第十七期，发表了《所谓第三党》一文，澄清了事实的真相，批评了谭平山等人的错误。

^①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14日。

^②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6日。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说：“据说近来广东有所谓第三党的组织，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之外另树一帜的第三党。他的名称叫做‘大同党’。这倒是一个国粹名字。我其初以为是康有为的徒子徒孙玩的把戏，因为康有为著过一本《大同书》；但是孙中山也录写过一篇《礼运·大同》的墨宝，那么与国民党又似乎不无关系，大概是辛亥俱乐部的变相罢。谁知都不是，传闻内部竟有‘共产分子’在那里主持，而且我也被推为发起人之一。这真令我惭愧到无地自容，承他们错爱，把黄袍加在我身上，然而我等于无妄天灾。”这说明，他同“第三党”是毫无关系的。接着，他分析了“第三党”产生的原因：蒋介石、汪精卫叛变之后，“当时尚有一点革命意志的国民党所谓左派们，如邓演达等，看见国民党已陷于沦亡，而共产党的政策又未免‘过激’，他们在歧路上彷徨着，‘第三党’、‘第三党’的幻像自然会起来。他们脑子里盘旋着这样的主张：共产党与国民党都不好，要另外创造一个不激不随的第三党来。在共产党方面，也有些富于妥协性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在这个机会主义发皇张大的时候，突然与国民党翻脸，未免有点眷恋不舍，并且怀疑到本党的政策过于左倾，于是第三党的鬼魂也乘机而进。”因此，他断定：“第三党完全是徘徊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游魂”。他还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不是豪绅资产阶级投降了帝国主义，变相的国际共管的形式统治中国，就是工农直接革命，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其间没有回旋余地。第三党的鼓吹者想另外替中国革命找条生路，其实这条路只在知识分子的脑子里存在着，实际上是没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或说他们可以代表小资产阶级，实在也何尝可以。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潮流中，是随波上下的，革命高涨

时，他可以跟着革命跑，反革命势盛时，他也必然跟反革命跑，那个势大，他就受那个支配，他是没有独立性的。……党名虽号大同，却混沌得可怜呵！”

这篇文章，体现了杨匏安在大革命失败，并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排斥、打击之后，仍然对党坚贞不渝。他对谭平山等搞“第三党”的错误的分析批判，既严肃又实事求是，不象当时犯左倾错误的人那样，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

一九二八年春天，蒋光慈、钱杏邨（阿英）等在上海组织革命文艺团体“太阳社”，杨匏安与瞿秋白等参加了成立大会，并用笔名为“太阳社”写过小说。其后，他被派赴南洋，在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开展革命活动，做党的工作。当时，他曾寄回两首诗，被亲友保存下来。其一题为《十一月既望泊舟星架坡^①港》，诗云：“故乡回首战云深，漏刃投荒万里临。馀日可消行坐卧，感怀休问去来今。江南有梦迷蛮瘴，海外何人辨雅音？自笑身闲心独苦，当头皓月伴微吟。”另一首题为《寄小梅》：“去国六千里，心随云水长。逃生来绝域，问禁入危邦。归意能无动？公忠不可忘。相思凭梦寄，月色满枕榔。”^②在“漏刃投荒”，流亡异国的时候，杨匏安仍念念于“公忠不可忘”，充分表现了他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他的一家，则先后移居澳门、香港和上海，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作为地下机关，掩护党的活动。

一九二九年，杨匏安回到上海，在中央机关工作，并参加编辑党的刊物。他家的成员，则分散住在党的印刷、出版机关

①星架坡，即新加坡。

②两首诗的亲笔原件是杨匏安烈士的亲属霍志鹏保存下来的，现存上海烈士陵园。

或交通机关。不久，由于印刷所遭破坏，杨匏安被捕。这时，周恩来时常冒着白色恐怖，去看望杨匏安的母亲和家人，并大力组织营救。杨匏安幸因没有暴露身份，在提篮桥监狱关禁八个月后，即获释放。出狱后，仍留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一九三〇年，杨匏安和阮啸仙一起，以中国互济会名义开办政治训练班，培养、训练党的各级干部。每期学员有三、四十人，参加学习的多是从各省党的机关和各根据地调来的中层干部。

杨匏安在上海极其艰难和危险的环境中，还进行编译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九三〇年七月，他用“王纯一”的笔名，翻译了拉比杜斯的《地租论》。这本书不但阐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地租学说，而且对十月革命后苏联农村消灭封建地主，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无限期、无代价地将土地转给农民使用，以及限制在农业中雇佣劳动的情况和做法，做了具体的介绍。而这一些，对于当时国内各革命根据地深入进行的土地革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当时，杨匏安还用同一个笔名，编译了一本三十多万字的《西洋史要》，系统地叙述了西欧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生平和主要著作，以及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情况，一一作了介绍和评论。这是一本较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作的西洋史著作，也是在当时颇为难得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参考书。杨匏安编译的这两本书，都由共产党员林伯修（杜国庠）主持的上海南强书局出版；其中《西洋史要》一书，杨匏安牺牲之后，仍在刊行，到一九三六年五月，已再版五次。

当时，党的经费十分困难。杨匏安一家人口多，生活异常

艰苦。七个孩子有两个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他自己患有肺病，妻子因生育多，营养不足，身体也很不好。为了弥补家用，他在夜晚除了加紧写作和翻译外，还要帮助家人推磨做米糍，让他的母亲和小孩上街叫卖。他的一家，老人小孩，经常为党传递消息、放哨，个个都为革命努力工作。

一九三一年春，担任党中央宣传部长的罗绮园因行为不检，被人告密，累及杨匏安等十多人一起被捕。杨匏安在狱中，立场坚定，忠贞不屈。蒋介石连写两封劝降信，都被他撕毁；蒋又直接打电话到狱中向他劝降，也被他摔掉话筒。他在狱中托人带出了一封给亲属的信，信中说，他的处境很危险，难免要为革命而牺牲，告诫家人不要接受任何不认识的人的任何财物或资助，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生活，就回老家去。信中特别嘱咐，千万不要把家中的缝纫机变卖了，那是全家今后的活命工具。当时，党组织曾通过宋庆龄、何香凝出面营救，但没有结果。周恩来还策划武装营救，准备一旦敌人将他解往南京或苏州时，就在半途劫夺囚车。但狡猾凶残的蒋介石，却下达了就地秘密枪决的命令。

杨匏安与罗绮园共事多年，关系密切。他在狱中，已觉察到罗绮园经不起敌人的利诱威迫，有动摇变节的可能。为了教育、争取罗绮园，他在就义之前，作《死前一夕作·示难友》^①一诗，给罗绮园并告别难友。诗曰：

^①这首诗是杨匏安烈士的儿子杨明、杨志提供的，并与他们1945年1月3日在邓颖超同志处抄回的原件校对过。诗中文字与肖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许涤新《百年心声》两书收入的《狱中诗》，稍有不同。

慷慨登车去， 相期一节全。
残生无可恋， 大敌正当前。
知止穷张俭， 迟行笑褚渊。
从兹分手别， 对视莫潸然！

诗中所说的张俭，是东汉人，被人诬告出走，认识他的人皆不恤破家相容，终于无路可逃。褚渊，南北朝人。宋明帝很信任他，尝谓：“褚渊迟行缓步，便得宰相矣。”宋明帝临死，封之为中书令，使与袁粲共理国事。不料褚渊却出卖袁粲，助齐篡宋。人们讥刺说：“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杨匏安这首诗，意在教育罗绮园，勉励难友，坚持斗争，保全气节，不可象出卖灵魂的叛徒褚渊那样，永为世人耻笑。这首绝命诗，充分表现了杨匏安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革命崇高气节。周恩来抗战时在重庆，曾经用这首诗，教育同志们在复杂困难的环境中，要象杨匏安那样，对党忠贞不渝，为革命勇于献身。

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①，杨匏安遇害于上海龙华伪警备司令部，年仅三十六岁。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共产主义壮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革命事迹和不朽诗文，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激励革命人民继往开来，勇往直前！

^①杨匏安遇害时间未见文字记载，烈士堂弟杨青山回忆是1931年暑假7月；烈士之子杨明兄弟回忆是1931年初秋；具体日期尚待进一步考证。

许 继 慎

翁德清 林世良

在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英勇奋斗的光辉历史上，许继慎是早年为党为国捐躯的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之一。他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的组建者和领导人，在人民军队的建设、鄂豫皖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

许继慎，原名许绍周，字谨生。一九〇一年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县土门店的一户普通农民家庭。

许继慎少年时代，正直、勇敢、聪明、活泼；在本村私塾读书时，文思敏捷，善谈、好友，得到教师的称赞和喜爱。一九二〇年，考入安庆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不久，转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他常和爱国进步青年相会，抨击黑暗时政，探讨改革社会良策，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一九二一年四月，许继慎和舒传贤、杨溥泉、王步文、周新民、皮言智、彭干臣等四十多人在安庆第一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北洋军阀爪牙倪嗣冲任安徽督军以后，鱼肉人民，无恶不

作。在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下，安徽教育事业极端落后。一九二一年安徽省议会编制预算时，安徽省学校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和省教育会三个团体，多次呼吁增加教育经费。省议会拒不采纳，反而将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克扣的七十七万元教育经费作为“特别预备费”，充作第三届省议会贿选之用。军阀政府摧残教育的行为激起了全省教育界的无比愤怒。当省议员要去蚌埠参加倪嗣冲生祠落成典礼的消息传出后，安庆市广大师生群情激愤。各校学生代表于六月二日晚到省议会请愿，要求立即开会通过增加教育经费案。那些军阀及御用的议员们，对学生代表的要求不仅置若罔闻，而且指使卫队辱骂和毒打学生代表。以许继慎等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为骨干的安徽学联闻讯后，立即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安庆各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结队前往省议会请愿。当学生队伍前往省议会时，军阀倪道烺（倪嗣冲的胞侄）、马联甲（皖南镇守使兼安徽军务帮办）和省议会，如临大敌，全市戒严，指挥大队军警向数百名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进行血腥镇压，受伤者近五十人，学生姜高崎、周肇基二人因重伤而先后死亡，造成“六·二”惨案。许继慎积极参加了这次请愿斗争。“六·二”惨案发生后，为了揭露军阀的罪行，许继慎等夜以继日奔走呼号，多方联络。六月三日，安庆市各校学生一律罢课，许继慎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贴标语，散发传单，组织讲演队进行宣传。工人、商人也罢工、罢市，支援学生斗争。安徽反动政府在群众的压力下，终于被迫将教育经费由原来的七十多万元增加到一百五十多万元，答应省会议员永远不得兼任校长。“六·二”运动取得了胜利。

“六·二”运动之后，安徽学生联合会为了加强领导，以团组织为核心进行了改组和扩大。改选后，舒传贤任会长，周

骏（周新民）任副会长，许继慎任常务委员兼联络部长。此后，许继慎积极参与了领导反对三届省议会贿选、驱逐省长李兆珍、驱逐六安县长骆通与反对曹琨贿选等一系列革命活动。

安徽省反动军阀对学生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非常害怕与恼恨，遂下令通缉王步文等三十四名进步学生。许继慎也为反动当局所注意。于是，他和一些进步学生逃到上海，寻找争取民族解放的出路。

（二）

一九二四年五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创立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培养革命军队的骨干。许继慎经党的推荐，当年考入黄埔军校，为第一期学生，实现了他向往已久的投笔从戎的志愿。

许继慎在军校期间，除了刻苦学习军事科目，积极参加操练外，还努力学习革命理论，阅读过《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他热情开朗，善于交际，入校不久，便结识了很多进步同学。在共产党员蒋先云的帮助下，政治觉悟有了显著提高，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十一月，许继慎在军校毕业，被留校任教，分配在新编教导团第二团担任排长。

一九二五年二月，许继慎参加了广东革命政府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在淡水战役中，他因功升为连的党代表。棉湖战役时，教导团第二团遇到敌军主力林虎部一师兵力的顽抗，战斗非常激烈。许继慎和连长率领战士坚守前沿阵地，狠狠打击敌人，不使敌人前进一步。在第一团的曹石泉（连长）、曹渊（连党代表）率领全连的增援下，经过数小时的战斗，终

于把敌人击退。许继慎、曹渊在这次战役中都因作战勇敢，调任连长。

一九二五年七月，黄埔军校教导团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十月，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十一月中旬，在兴宁战役中，三师某团遇到陈炯明部一个师的抵抗，败退下来，某团长慌张得脱去军服，骑马奔逃，他的部队也落荒四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已任第七团党代表办公室少校干事的许继慎，率第七团两个连赶来增援。许继慎骑马奋力追上该团长，劝他穿上军服，重回前线。敌军看到革命军增援部队汇集，某团长又回到前线指挥，顿时惊慌失措，终于被击溃。某团长因此次作战转败为胜，升为少将。许继慎不但不谈战功，更缄口不讲说服某团长返回前线一事。但真相却在第七团传开，蒋先云据实向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在党内表扬了许继慎的机智、勇敢和谦虚^①。

许继慎不仅军事上智勇双全，而且政治上坚定敏锐。在黄埔军校学习和工作时期，他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和负责人之一，经常同国民党右派分子进行尖锐斗争。有一次，国民党右派分子散布戴季陶的谬论，反对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反对共产主义。许继慎怒气冲冲地指着那些家伙的脸说：“你们想以上海流氓绑票的方法，把孙中山押进文庙，孙中山先生死在地下也要起来向你们作斗争”^②。当时军校内部，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发展大大超过孙文主义学会，蒋介石感到害怕，力图加以限制。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蒋介石在潮州西湖公

^①胡允恭：《回忆许继慎同志》，见《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②周士第：《许继慎同志几件事迹》。

园，召集连以上的军政人员联席会。右派分子缪斌、贺衷寒等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在会上大肆贩卖戴季陶主义，公开制造分裂，排挤、打击共产党，诬蔑共产党员不忠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许继慎等先后在会上发言，据理驳斥了右派的谬论。许继慎在发言中运用作战是否勇敢的实例，来说明军人对革命的忠实和不忠实。他当场指着蒋先云说：在第一次东征时，他两次受伤，伤痕犹在，人所共睹。又说：共产党员唐同德营长，冲锋在前，壮烈牺牲。共产党员的连、排长牺牲的更属常见。即以我本人来说，攻惠州时，我不但立于城下指挥，而且亲自爬城。但是攻城指挥官某团长却在敌人猛烈炮火下，从阵前逃走。这不仅是勇敢不勇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革命忠实不忠实的问题。他的发言博得了热烈的掌声。事后，周恩来在汕头召集第一军少校以上的共产党员会议，指出潮州会议是分裂的预兆，表扬了蒋先云和许继慎等人，指出他们不仅作战勇敢，也善于说理斗争。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许继慎被调到政治干部训练班第二中队担任队长。这个训练班的班主任就是周恩来同志。

（三）

一九二六年七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组织下，广东国民政府正式举行北伐。由我党直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队，早在五月已挺进湖南。独立团在七月十二日占领湖南浏阳后，部队得到补充，党从广州派许继慎等三十多名营、连、排干部去加强独立团的工作，许继慎被任命为第二营营长。

许继慎到独立团后，第一次参加的战役是强渡汨罗江，攻打平江城。守平江的敌军指挥，是吴佩孚的得力战将陆运。他在平江城南场至鲁肃山一带构筑了坚固工事，遍布地雷。十九日晨，在叶挺的指挥下，独立团迅速强渡汨罗江，旋即组织攻城。由于官兵奋勇冲杀，加上当地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敌人的坚固城防立即崩溃，敌军被全部歼灭，守将陆运被迫自杀。战役结束后，许继慎写了《平江战记》一文，认为官兵的勇敢是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他说，自己在东征的几次战役中，还没有真正知道什么是战争，这次战争是团长和全团官兵替他上了一次战斗课，真正懂得了“两军对峙，勇者为胜”的真理^①。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开始攻打通向武昌的交通要道汀泗桥。吴佩孚纠集了主力部队在这里死守，以大刀队督战，并用火力封锁铁路桥，两军遂成隔河对峙局面。二十七日，独立团从敌人右翼，走小路，翻高山，绕到敌人背后打击敌人，敌军纷纷向咸宁城溃逃。独立团立即乘胜追击，许继慎率领第二营为前卫，走在前面。他看到敌人在咸宁城外山上和铁路桥头筑工事，来来往往，极为混乱。当时又正是大水泛滥，在一片汪洋中，只有一条铁路线可以通行。许继慎立即向叶挺报告，提出一个勇猛奇袭的方案：“咸宁敌人甚为混乱，铁路线可以通过，请速令机关枪连来掩护职营过去”^②。叶挺亲往观察后，当机立断，命令机关枪连掩护第二营冲锋。许继慎接到命令后，立即对全营进行了战前政治动员，说明任务的重要性，鼓励战士一直向前冲，占领对岸敌人

①胡允恭：《回忆许继慎同志》，见《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②周士第：《北伐先锋》。

阵地。接着，他亲自率领全营战士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向前冲去。当冲上铁路桥时，遭到敌人交叉火力的射击，但战士们毫不畏惧，继续前进，终于占领了桥头阵地，打得敌军向贺胜桥溃退。二十七日上午，独立团攻下咸宁城，并乘胜向贺胜桥进击。

在攻取贺胜桥的战斗中，独立团承担桃林铺以南沿铁路东西两侧向贺胜桥攻击的战斗任务。独立团党支部认为，贺胜桥之战是带有关键性的战役，于是召开干部会讨论，决定对策。会后，许继慎召开本营党小组会进行传达，强调攻克贺胜桥的重要性，分析了敌我双方情况以及此战役的特点，要求党员一定要完成党交给的战斗任务。接着他又召开全营军人大会，进行战前动员。战士们纷纷表示：不怕牺牲，坚决服从命令，攻取贺胜桥，打垮吴佩孚。

八月二十九日晚，独立团第二营和第三营分别沿着铁路东西两侧，隐蔽地向敌阵地前进，准备攻击。部队进至距敌人阵地仅有百余米远的地方，许继慎同连、排长一起到前沿阵地侦察敌情和进攻的路线。三十日早四时许，敌军不断向我射击。许继慎从实际出发，决定提前行动，立即指挥并带领第二营全体战士向敌人发起冲锋。战士们一鼓作气冲进敌人阵地，敌人纷纷放下武器，举手投降。独立团二、三营占领了桃林铺一带后，继续向纵深扩展，许继慎果断勇敢地带领部队向前猛攻吴佩孚的指挥阵地。此时，吴佩孚着了慌，即令刘玉春率领第八师进行反扑，将第二营包围，战斗异常激烈。在这紧要关头，许继慎胸部负重伤，但他仍然坚持指挥战斗，对四面之敌进行苦战。后在第一营的增援下，粉碎了敌人的包围。三十日十一点多，独立团占领了贺胜桥，打开了通往武汉的最后一道大门。吴佩孚仓惶乘车向武汉逃去。

一九二六年冬，许继慎伤愈归队，正逢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进行扩建，叶挺任新建第二十五师副师长，独立团改编为该师第七十三团。党派许继慎任七十三团参谋长。一九二七年春，叶挺调任第十一军副军长、第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二十四师辖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三个团。许继慎被调到第二十四师任七十二团团长的。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夏斗寅乘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武汉空虚的机会，发动叛变，从驻地宜昌进袭武汉，打到了纸坊、土地塘一带，武汉危急。在这个紧急关头，我党迅速动员一切力量来打退叛军，保卫武汉，派叶挺率领七十二、七十五团和中央独立师开往纸坊一带进击敌人。叶挺接受任务后，赶到七十二团，对团长许继慎、副团长廖运泽说：夏斗寅被蒋介石收买叛变，时间很紧迫，你们团为先头部队，立即紧急集合，投入战斗。七十二团在许继慎的坚强指挥下，向叛敌发动了勇猛攻击，攻占了纸坊车站和纸坊镇，与敌相持了一夜。第二天拂晓，敌人集中兵力反扑过来，有一部分已经包围了七十二团团部，战斗非常激烈。许继慎当即发出命令说：“现在已处在生死关头，必须死里求生，一定要击败敌军！”^①接着许继慎身先士卒，手执团旗，率领步兵连、机关枪连、特务连以及团部工作人员、勤杂人员向敌人猛烈冲杀，顿时把敌人包围冲散。激战数小时，敌军动摇，有溃退迹象。许继慎即令吹紧急冲锋号，带领部队跑步追击。不幸他先后两次被敌弹击中左右肋，负了重伤。但他仍坚守岗位，指挥战斗。后由副团长廖运泽率领部队继续攻击，并在其他兄弟部队猛追穷打之下，夏斗

^①访问廖运泽谈话记录。

寅叛军终被击退，武汉保卫战取得了胜利。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之后失败了。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遭到疯狂的屠杀。党为了挽救革命，决定举行南昌起义。许继慎闻讯后，尽管重伤未愈，仍毅然奔赴起义前线。起义前夕，前委书记周恩来决定，负伤人员一律不参加。许继慎遵照指示乘车离开南昌，经九江转赴上海养伤。以后他一直把没有能参加南昌起义，引为憾事。

许继慎身在上海，却时刻盼望能尽快回到部队，投入战斗。不久，他接到叶挺来电，要他火速归队。许继慎喜出望外，就同刚到上海的徐石麟（原第十师二十八团参谋长）一起乘船去汕头追赶南进的起义部队。船到汕头，该地已被反动派占领，他们无法登岸，只好随船抵达香港^①。以后，许继慎又几经辗转，于一九二八年夏回到了上海。

许继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居住近两年。他虽然暂时远离了多年熟悉的跃马扬刀的战场，但是，并没有停止革命斗争。他在党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以个人交友的方式，利用乡土关系，对安徽留居上海的名流人士及北伐时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做统战工作。他通过很有社会声望的革命前辈朱蕴山，同这些人发生联系；帮助他们认清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促使他们倾向革命或抛弃拥蒋反共态度。当时，国民党企图拉拢他，第三党也争取过他，但许继慎立场坚定，不为所动。那时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他的任务，议论他交游过广，不分敌我。他对这种误解，从不放在心上，继续坚持工作^②。

^①徐石林（即徐石麟）：《八一南昌起义片断》，见《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0页。

^②胡允恭：《回忆许继慎同志》。

(四)

一九三〇年春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进一步发展，新军阀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混战即将爆发。在这有利形势下，出现了大别山区三支红军和三块革命根据地统一领导的客观要求和条件。这一年的二月底，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在上海召集郭述申、许继慎、熊受暄等人开会，宣布了党中央的两项决定和任命：一是将一九二七年以来在黄麻、商南、皖西创建的三个根据地划为特别区，建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别委员会；二是以红三十一师、三十二师和三十三师为基础，组建红一军；任命郭述申为特委书记，许继慎为红一军军长，徐向前为副军长，曹大骏为政治委员，熊受暄为军政治部主任。

许继慎在奔赴鄂豫皖边区之前，周恩来又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他又一次受到周恩来的教诲，深感自己的任务光荣，责任重大。当几个同志为他饯行时，他想到蒋、汪反动派对党和革命的疯狂摧残，想到根据地人民遭受反动派的种种残害，想到自己的弟弟许希孟在皖西独山慷慨就义，被反动派杀头示众，老母亲又被迫离乡，不知去向，心头充满了悲愤。他说：“此去必为党、为革命、为死难受害的人民，同蒋介石国民党做决战”^①。

一九三〇年四月初，许继慎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就立即和郭述申一起，迅速开展建立党的统一领导和组建红一军的工作。四月中旬，在湖北黄安箭厂河召开了鄂豫皖根据地党和红军领

^①胡允恭：《回忆许继慎同志》。

导干部会议，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了中央鄂豫皖边特区委员会和红一军前敌委员会，许继慎为特委委员和前委委员。会后，许继慎和曹大骏、徐向前等迅速对部队进行整编，制订各种制度。先将红三十一师改编为红一军第一师，副军长徐向前兼任师长，李荣桂任政委。第一师整编刚一结束，许继慎即率领军部人员东进，很快地在南溪、金家寨两地先后将红三十二师和三十三师改编为红一军的第二师和第三师。任命漆德伟、王培吾为第二师师长和政委，周维炯、姜镜堂为第三师师长和政委。随后，又根据实际情况，相继增建了一个独立旅和两个归地方领导的独立师。组建红一军的工作，仅一个多月就胜利完成了，全军辖三个师，一个独立旅，共二千三百余人。红一军的建成，是鄂豫皖边区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开始了一个新的局面。

一九三〇年六月中旬，许继慎和徐向前抓住蒋、冯、阎混战、根据地周围敌人守备减弱的有利时机，分别指挥部队大举出击，驰骋于淮河上游、皖西、京汉铁路南段等地，获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许继慎亲自率领第二、三师向六安、霍山西部发动进攻，头两仗攻克了流波碇、麻埠等地，第三仗打下了霍山城，歼灭地方反动武装千余人；接着又迎头痛击了六安驻敌潘善斋的新编第五旅的反扑，毙俘敌副旅长以下七百多人。战后就地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休整和补充部队。此时，整个霍山县几乎全部为革命势力所控制，皖西的革命斗争出现了进一步发展的局面。七月初，他又挥师南下，向盘据在英山地区之敌出击，经过一天的激战，获得了鄂豫皖红军首次歼敌一个整旅的空前大捷。罗田敌人闻风丧胆，不战而溃。正当徐向前指挥的第一师在商南四姑墩与反扑而来的敌军戴民权部激

战时，许继慎率领二、三两师由皖西赶到，协同作战，连续出击，在四姑墩地区先后击溃敌人两个旅，歼灭其中两个团和一个营。红一军全军在这里首次胜利会师。

在许继慎英勇机智、迅速果断地指挥下，红一军大显身手，在短短的三个月中，获得了巨大战果。从六月到八月，先后攻克了皖西和京汉铁路南段许多城镇，共毙俘敌军七千多人。红一军由两千三百多人发展到五千多人，战斗力大大提高，威震江淮。红一军的胜利和壮大，有力地推动了鄂豫皖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许多地方相继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

在全国红军的不断胜利、壮大和革命根据地相继发展的形势下，党中央又被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所统治。李立三等人制定了以夺取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总暴动的行动计划，要求各地红军集中，全力去攻打大城市。这个错误决定从六月底到八月逐渐传达到鄂豫皖根据地。长江总行动委员会指令红一军的发展方向是“帮助鄂中及京汉路的暴动，切断京汉路以进迫武汉”，并准备同红二、六军联合起来进攻武汉。八月中旬，红一军前敌委员会同鄂豫皖边区党的特委合并，组成“京汉行动委员会”，要求地方上“一支枪也要集中到红军中去”，把各种武装力量编成红军补充军队；号召实现鄂豫皖特委提出的“打到武汉过中秋”的口号。九月中旬，许继慎等率领红一军离开革命根据地，沿京汉路东侧北上，进攻中心城市。在袭击广水，进攻信阳两次攻坚战斗中，连续失利，部队伤亡不少。许继慎鉴于这种情况，觉得继续在铁路沿线作战十分不利，敌强我弱，又远离根据地，很难取胜。他为了避免更大损失，达到消灭敌人，壮大自己的目的，没有盲目机械地执行上级的命令，死死地纠缠在京汉铁路沿线，而是从实际出发，机动灵活

地指挥部队向南，返回根据地附近作战。一路上，选择弱敌，乘其不备，歼灭了几股反动地方武装，帮助地方建立游击队，部队也得到了扩充。

十月中旬，在红一军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不仅没有根据几个月来的军事行动实践评价许继慎的功过，反而按照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要求检查军部的工作，错误地批评军部领导在京汉线上“作战不力”，是一种消极的“右倾机会主义”，并且在改选红一军前敌委员会时，把许继慎排斥在外，还把其他一些贯彻立三错误决定“不力”的领导干部如漆德伟等，调离部队或降职使用。

蒋、冯、阎混战结束不久，蒋介石就组织重兵，从十一月上旬开始，进驻鄂豫皖根据地四周。在敌军调动布署的同时，许继慎、徐向前等率领红一军一、二师积极作战，主动进攻，连克姚家集、黄安、谢店、新州，全歼敌军一个营和一个混成旅，从而给予正在“围剿”的敌人以迎头痛击，打乱了敌人的原定部署，为鄂豫皖根据地军民赢得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时间。特别是新州一战，全歼敌军一个整旅，大大震动了武汉的敌人。这实际上已揭开了第一次反“围剿”的序幕。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为了纠正这一错误，党中央派曾中生任鄂豫皖边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底，曾中生到达之时，各路“围剿”敌军正在向鄂豫皖根据地中心推进。他当机立断，组织地方游击队和广大群众对各路来敌开展广泛的阻击、骚扰，打击小股敌人和反动民团。同时，以红十五军为主力在外线奔袭，突击分散薄弱之敌，使“围剿”鄂豫边苏区之敌陷于内外夹击之中，到处挨打，疲于奔命，被迫逐渐退入少数据点固守。十二月初，红

一军在但店传达了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许继慎等考虑到：如果继续执行中央“威逼武汉”的指示，向东深入沿江一带的白区，远离根据地，就不利机动作战；另一方面红一军到敌占区转战之时，皖西根据地大部分已被敌侵占，二百多名干部和万余群众惨遭杀害。许继慎怀念根据地人民，认为决不能再让苏区遭受敌人蹂躏，决定回师皖西，收复根据地。许继慎率军离开但店进入皖西后，采取连续奔袭，突然包围，速战速决，出奇制胜的打法，打得敌军措手不及，我军连连获胜。在收复金家寨战斗中，他指挥全军于十二月十三日晚急速隐蔽地运动到了家埠。月光下，他在大河的沙滩上向全军指战员和群众万余人，作了战前动员报告。他声音洪亮、坚决有力地说：“同志们，今天要打金家寨了……一定要全部歼灭，不能让他们跑掉一个！”时过半夜，全军分三路急行军，一下子把金家寨包围得水泄不通。拂晓前打响，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全歼守敌一个营和民团土匪共千余人。当天晚上，金家寨人民召开了庆祝红一军第三次打下金家寨的胜利大会。许继慎和乡亲们亲切交谈，举杯共饮，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第二天，他和徐向前指挥部队，乘胜东进，连续奔袭。四天之内接连收复麻埠、独山、叶家集、苏家埠等地，一度包围六安县城，威逼霍山县城。为了巩固收复地区，部队在独山一带一面休整，一面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抗债等斗争，重新组织了地方游击队，扩大了红军。至此，因贯彻立三左的错误而丢失数月之久的皖西苏区，遂告收复。十二月底，许继慎率部对来自六、霍、商城合围之敌，在香火岭地区给予毁灭性打击。随后，又乘胜追击，在商城四姑墩歼灭逃敌一个团，残敌夺路溃逃。至此，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被完全粉碎。

许继慎在率领红一军驰骋于鄂豫皖边江淮河汉之间半年多的战斗中，不断总结经验，军事辩证法思想和作战指挥艺术大有提高，在战略战术上有颇多建树。他指挥的很多战斗，都有独特的打法。根据敌我态势的具体情况，出奇制胜。其中以皖西的英山之战和香火岭战斗尤为突出。一九三〇年七月上旬的英山之战，是红一军首次南下出击的重大战役。敌韩杰旅分驻在英山县城和城北金家铺两处，兵力和我军大体相等。许继慎采取了攻点打援，把敌人驱赶出阵地，在运动中加以分割围歼的战术。他机智地选择了处于两地驻敌之间的狮子坳作为歼灭敌人的战场，在那里埋伏了拦截逃敌和阻击援敌之兵力。先对金家铺驻敌发起突然猛攻，迫使敌（一个团）逃到狮子坳，在我军两面夹击下，给予全歼；然后又迅速围歼英山来援之敌两个团。这次战役表明，红一军已由小规模游击战，发展到能调动大股敌人于运动中加以歼灭。著名的香火岭战斗，是红一军以少胜多，在运动中大量歼敌的一次成功的战例。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底，许继慎、徐向前等率领的红一军收复皖西苏区后，皖西、豫南的敌军一个师和三个旅又组织对红一军新的合围。许继慎等鉴于敌强我弱，决定主动撤离城镇，诱敌深入，相继在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将敌人各个歼灭。二十九日，敌军分三路向红一军军部驻地麻埠围来。许继慎等随即布置兵力，在麻埠以东的东、西香火岭（今金家寨的鲜花岭）埋伏，于三十日将来犯之敌分割包围。经过一天激战，全歼敌人三个团，击溃二个团，毙俘敌团长以下三千余人。这次战斗的胜利，充分表现了许继慎的军事才能，为我军创造了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变劣势为优势，变防御为进攻，以少胜多，战胜强大之敌的宝贵经验；体现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敌酋陈调元

在关于香火岭战败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红军由两翼包抄，如潮涌而来，同时后方各村炮声轰起，风声鹤唳，遍地皆兵。”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旬，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在商南的长竹园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由党中央派来邝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许继慎改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许继慎并没有因为职务的变动，减弱革命的责任心，降低工作的积极性。他始终以革命为重，积极贯彻特委的正确作战方针。三月下旬，许继慎、周维炯率领第十一师向信阳以南方向出击，在全军首先采用“飘忽战略”。三月一日，获悉敌人兵车一列向信阳南开，许继慎派三十三团深夜奔袭占领李家寨车站，将车站所有人员控制起来，拆除站南路轨，布置了伏兵。二日清晨，敌军兵车刚一站，红军突然发动猛攻。敌军一个旅未及还手就被全歼，旅长侯镇华当场被击毙。接着许继慎师和蔡申熙率领的第十师协同，对进驻双桥镇地区的敌军岳维峻师实施突然奔袭包围，全歼该师，并活捉了敌师长岳维峻。这两次胜利，对粉碎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起了决定性作用，赢得了红军的迅猛发展与鄂豫皖苏区的巩固和扩大。

（五）

一九三一年初，王明夺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张国焘抛出《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文，无耻地吹捧王明，因而得到宠爱和信任，被作为中央代表派到鄂豫皖根据地，“改造”根据地的党和红军。张国焘全盘否定鄂豫皖的党和红军，宣称：“这里的中共组织简直不象共

产党”^①，硬说“红军中没有真正的党，红军在立三路线时期遭到了完全的失败”；提出首先要“改组领导机构”^②。五月十二日，张国焘在新集召开特委会议，宣布撤销鄂豫皖特委，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新的军事委员会，由他担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同时又改组了红四军的领导机构，将特委书记曾中生调任红四军政治委员，许继慎改任第十二师师长兼新增设的鄂豫皖军委会皖西分会主席。

中央分局一成立，张国焘为使红军和根据地实现“彻底转变”，极力推行左倾的“新政策”，大搞宗派主义，对待不同意见的人动辄就给扣上“立三路线”、“军阀土匪作风”、“反中央分局分子”、“反党”等大帽子，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借口“尊重和加强党的领导”，滥用职权，建立个人统治，从而引起了很多同志不满和抵制，形成了日益尖锐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关于军事行动方针的争论。许继慎则是这场斗争中的关键人物和遭到张国焘等打击迫害的主要对象。

张国焘早就认识许继慎，知道许“是一个才华毕露的人，爱谈政治”，“对鄂豫皖边区军事上有过很大贡献”；也知道在军事问题上，原特委和红四军的负责人都很重视许继慎的意见，在红四军的几个师长中，“以许继慎为最能干”^③。他看到金家寨一带买卖兴旺，粮食也不缺乏，知道这也与许继慎的努力分不开。因此，他起初想拉拢许继慎，曾多次找他谈心。但许继慎直率地谈了自己的意见，“批评中央一意巩固苏区的政策”，“带有保守的色彩”，批评沈泽民对苏区原来干部

①②③张国焘：《我的回忆》。

“采取打击态度”的宗派主义，并且主张红军主力应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向外进攻，消灭敌人。对于这些意见，张国焘不但没有接受，反而“觉得许继慎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倾向”，“非予以纠正不可。”^①

五月底，粉碎了敌人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后，红四军的一些领导干部，在最迫切的军事行动方针问题上同张国焘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当时，蒋介石已调集几十万兵力，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而对鄂豫皖暂取守势。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曾中生、许继慎等多次建议，应抓住这个良好时机积极向外发展；在敌军对鄂豫皖新的“围剿”尚未到来之前，留下一部分红军与地方游击队结合，肃清根据地内的反动武装，而以主力南下作战，收复岷（春）、黄（梅）、广（济）地区。这样可以扩大根据地，进而威逼长江，牵制敌人，配合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同时可以解决经济和粮食问题，以利减轻苏区人民的负担。张国焘却指责这一正确的主张为“立三路线的残余”，坚持所谓“巩固根据地”的方针，极力主张红军要集中全力肃清根据地内部的反动武装。他毫无根据地讲，红军向外进攻“将会招致敌人再来进攻根据地的危险。”在激烈的争论中，许继慎态度坚决，意见尖锐，得到了很多干部的支持。张国焘竟因此对许继慎十分嫉恨。

张国焘在各方面的所谓“改革”，特别在军事行动方针上的一意孤行，使红军丧失了向外发展的有利时机，并造成根据地粮食的困难，因而引起了红四军和地方上广大干部的不满和反对。但张国焘丝毫没有悔悟的表现。为了坚持王明的左倾政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

策，强化自己的权威，他于六月二十八日在新集召开了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开展所谓反对“立三路线残余”、“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对坚持正确意见的干部进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批判和斗争。批判许继慎“是这次大会最紧张的一幕”。张国焘撇开分歧和争论的主要问题，抓住许继慎的某些缺点，片面夸大，无限上纲，甚至捕风捉影，歪曲事实，搞人身攻击，指责许继慎“在多方面保有军阀土匪的习气”。张国焘等人还从对许的“批判”，煽起一股打击和排除异己的狂热，指责曾中生和余笃三对许的错误“难逃纵容之责”^①，不少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遭到批判、斗争，有的被撤销职务，甚至开除党籍。

许继慎尽管受到张国焘的打击，却没有为张国焘的淫威所屈服。在军事上，他为了苏区人民的利益，为了革命的发展，仍然从实际出发，从全局出发，继续和曾中生等坚持南下进攻的正确方针。在激烈的争论中，他从各个方面阐明南下作战的正确性，再次获得了与会多数人的支持，使张国焘不得不勉强放弃他的错误主张。会后，为了纠正张国焘的错误，许继慎又和曾中生一起找张国焘交换意见，进一步全面地陈述了他们的看法，再一次对分局领导人动辄给人扣帽子和对待干部的宗派主义行为，提出尖锐的批评。曾中生不畏强权，又一次为许继慎鸣不平。

红军和地方的广大党员对新集会议极为不满，认为会议是“利用一些枝枝节节的问题，来打击老干部”。而张国焘等几个分局领导人则把这些正确的批评和抵制，看成是“一种反中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

央局领导的暗流”，并认为这种暗流“是许继慎播弄起来的。”^①从而把许继慎的问题从“军阀土匪习气”，上升到“反中央分局”和“反党”。张国焘为了巩固他的封建家长式统治，决心寻找机会对许继慎和他的支持者进行残酷的打击和迫害。

七月初，军委召开会议。在讨论红四军向外进攻的方向和兵力使用问题上，曾中生、许继慎等又和张国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们坚持红军主力南下，收复圻、黄、广地区，从而使红军有阵地的向外发展；认为对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支援主要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以牵制敌人，而不在于攻打中心城市。张国焘无理拒绝了这一正确主张，从原来反对向外作战，又一变而为冒险主义，限令在一个月內攻下英山，然后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震动南京。他不顾大家的反对，强行作了部队东进、攻打安庆的错误决定。八月一日，红四军攻下英山县城后，徐向前、曾中生和许继慎等军师领导干部，再次讨论行动方向。他们详细地分析、比较了两种作战方向的利弊，认为向安庆进击，要经过四百多里的白区，无论从敌情、地形，特别是群众条件来看，都远不如南下浠水、黄梅、广济有利。而且收复这一地区后，可以和黄麻、皖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便于巩固。于是，红四军的领导一面将意见向中央分局报告，一面举兵南下。仅一个多月时间，就歼敌七个多团，生俘五千余人，连克浠水、广济、罗田等四个县城，前锋威逼黄梅、武穴，使九江、武汉之敌大为震惊，牵制了原拟开往江西的敌军部分兵力，从而有效地支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

援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同时，恢复了这一带的根据地，组建了八百余人的地方武装；部队的装备和经济困难也得到了解决。但是，张国焘接到改变作战计划报告后，完全不顾事实，连续写信给曾中生、徐向前，指责他们改变东进计划是“抗拒分局指示”，“放弃援助中央根据地的任务”，“重复立三路线”等等，并强令部队立即返回。鉴于和张国焘斗争的严重发展，曾中生和徐向前向党中央写了报告，申明南下和东进的曲直是非。在红四军北返途中，许继慎等又积极提议召开大会讨论，辨明是非，明确红四军的行动方向。军部于九月四日在英山县鸡鸣河召开全军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干部活动分子会议，总结南下以来的行动和讨论张国焘的来信。会上大多数人不同意张国焘的指责，一致通过《申明书》，上报中央分局，并呈报中央军委。《申明书》据实说明了部队东进的不利和南进作战的正确性，指出张国焘强迫撤军北返的错误。

红四军领导向中央军委报告同张国焘的分歧和召开鸡鸣河会议，这本是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表现。而且事实证明红四军领导是正确的。可是，张国焘对此却十分恼恨。他歪曲事实，蛊惑人心地宣布鸡鸣河会议是“改组派”“起了伟大作用”的反党活动。在张国焘把持下，中央分局和军委会举行了紧急联席会议，认定“现在曾、许竟到了公开反抗的地步，那是他们的执迷不悟”^①。会议作出错误决定：撤换曾中生的红四军政委职务；派陈昌浩为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全权代表，迅速赶往前线，处理这一事件。军委会又发出命令，由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委，许继慎“由陈昌浩相机处理”。与此同时，张国焘又以鄂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

豫皖中央分局的名义，于九月八日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严厉镇压反动是党在目前斗争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任务”。要求红军和地方各级党组织应当“动员一切同志，一切革命的群众参加肃反的工作”。十分明显，这两项决定是张国焘实现他早就定下的“彻底改造”根据地和红军的两把刀子。

张国焘为了借“肃反”之机，大肆翦除异己，不惜利用敌人陷害、离间的信件作依据，来陷害党和军队干部。一九三一年八月初收复英山时，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头子曾扩情利用和许继慎在黄埔军校的同学关系，派遣特务钟俊和钟梅桥到英山找许继慎。这两个特务带着曾扩情写的一封离间信，信中诡称由他转交的所谓许继慎投降蒋介石的计划，蒋已批示“照办”，蒋对许“乃复来归，虽犹千里，心实欢喜”等等。许继慎一眼看穿了敌人的阴谋诡计。他立场坚定，光明磊落，当即下令将两名特务逮捕，连人带信送交军部。军长徐向前和政委曾中生立即对特务进行了审讯，戳穿了敌人施展的反间计。徐、曾根据许继慎的一贯表现，马上写出军部的意见，明确指出：许不会有问题，这封信完全是敌人利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的一个险恶手段；然后又将两个特务连同“信件”和军部的意见一并送到中央分局处理。可是，久想除掉许继慎的张国焘，根本不顾事实真象，不理军部的意见。他把敌人信中捏造的情节和两个特务编造的口供作为“证据”，非法逮捕了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等人，严刑逼供，从而炮制出一个所谓“许继慎为首的反革命阴谋案”。

陈昌浩奉张国焘之命，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三日，火急赶到麻埠军部，立即宣布撤销曾中生职务，由他接任政治委员，在红四军进行“肃反”。这次“肃反”中，许多红军干部是在

同敌人进行浴血战斗过程中被抓起来的。在余子店（今河南省商城县境内），陈昌浩带领保卫局的一些人突然将许继慎等逮捕，先行押送到白雀园。

九月底，红四军全部移住到白雀园地区后，早就在这里等待的张国焘，亲自主持了“全力肃清四军中之反革命和整顿四军”的工作，在红四军中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所谓“肃反”运动。张国焘等耸人听闻地宣布：在红四军中破获了以许继慎为首的“反革命阴谋案件”。对许继慎和其他许多人搞严刑逼供。许继慎虽遭非法逮捕和严刑拷打，但心怀坦然，意志坚强地同张国焘进行坚决斗争。他据实说明情况，驳斥了各种诬加给他的罪名。他始终声明：既“没有做出反革命的行为”，也从来“没有叛变的意见！”^①可是张国焘等却蓄意陷害许继慎。他们用一些人在严刑逼讯下“交代”出来的完全没有根据的“口供”，以至荒诞离奇的编造，给许继慎加上许多罪名：什么“改组派、AB团、第三党在红军中……组织了一个领导机关，反革命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共九人，……主席是许继慎”；什么许继慎等“确有准备把部队拖到长江边投降蒋介石”的计划，力主红军主力南下作战，是“他们的策略阴谋诡计”；什么许继慎、周维炯等策划了一个暴动计划，在部队北返途中，“决定九月十五日在武穴暴动”^②，等等，不一而足。

另外，张国焘等为了欺骗群众，煽动对许继慎的仇恨，竟然无耻之极地诽谤许继慎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他们指使一些人，在城镇街头张贴许继慎一手拿着大刀、一手拎着鲜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

^②陈昌浩在鄂豫皖苏区彭扬军事政治学校作关于此次肃反详情之报告（1931年11月22日）。

血直滴的人头漫画；到处用墨汁涂写“打倒第三党分子许继慎”等标语。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伪造历史，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一九三一年十月，许继慎受到种种非人待遇之后，坚强不屈，在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被张国焘杀害了。年仅三十岁的红军杰出将领许继慎含冤离开了人间！

张国焘等制造的以许继慎为首的“反革命阴谋案件”，使整个鄂豫皖苏区的军民为之惊愕！这是我们党和红军史上一个罕见的大冤案！张国焘利用这个冤案在红四军中煽动起“肃反的狂热”，在根据地进行大清洗。他们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随便捉人，动用各种刑具逼供，供了再捉，反复株连。凡是和许继慎有过联系，特别是支持许继慎正确意见或对张国焘的倒行逆施不满的人，几乎都遭到了逮捕和杀害。

许继慎这个英勇善战，才华出众，功勋卓著的红军将领，没有壮烈牺牲在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沙场上，却惨死在党内窃据了高位的野心家张国焘的屠刀之下，这是多么惨痛的历史教训啊！

许继慎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民族解放和祖国强盛而英勇献身，为坚持真理而宁死不屈。许继慎这种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征途上奋进！

刘伯坚

秦燕士 刘虎生 刘豹生
郑文 章克昌

刘伯坚，四川省平昌县龙岗寺人。一八九五年一月九日生，一九二一年冬参与发起和组织旅法中国少年共产党，一九二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英勇牺牲于江西大庾。

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片断

刘伯坚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家庭。原名刘永福，又名刘永固，后用名刘铸、刘铁侠，在国外时曾用名刘大冶、毅伯等。家里从祖上就没有田产，以在龙岗寺小集镇上开栈房为业。父亲刘贵显、母亲苟继显，均为人慈善，忠厚朴实，他们对刘伯坚热爱劳苦大众、为人正直等好品德，均有一定的影响。

刘伯坚自幼勤奋好学，六岁时开始读书。初就读于龙岗寺刘贵义私塾，后又就读于龙岗寺街上文昌宫易子仪国民小学，十岁时到附近的金山苟家坪舅父苟俊生书馆读书。苟俊生是清末的秀才，学问很好，教刘伯坚读了许多古书，使他打下了古汉语的坚实基础。这对他后来在参加革命活动时，善于写文章和长于诗词，有很大的帮助。一九一二年左右，刘伯坚进入岳家寺金山寨高等小学（现金山中学）学习。这时他已初露才华，写一

手好字，文章也写得出色，得到师友的称赞。高小毕业后，刘伯坚去巴中县投考中学。当时报考中学需要持有田地契约。刘伯坚家无田产，只好四出借贷，设法买了几亩薄田，取得田契，才得以参加巴中的升学考试，对此刘伯坚异常不满。考取巴中县立中学后，他更加勤奋读书，因成绩特殊优异，提前毕业，升入万县川东高等师范。川东高师毕业后，又进成都高等师范学堂（今四川大学）继续深造。

在求学期间，刘伯坚很注意锻炼身体。他每天鸡鸣即起，跑到山坡上去练习气功和拳术，坚持不懈，练就了一副强健的身体。一次他到舅父家去作客，表兄要试一试他的气功，用铁火钳夹他的脖子。结果，铁火钳都夹弯了，他仍安然挺立，若无其事。他的力气很大，能两只手各提一桶水、嘴巴再衔一桶水跑很远一段路。健壮而结实的身體，为他后来从事繁忙的革命工作，历尽千辛万苦，仍然精力过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刘伯坚青少年时代就关心劳动群众的疾苦，他经常说：“一个人不要欺穷，不要看不起人家吃得不好、穿得烂。人穷不由命，一定要尊重穷人，尊老爱幼。”龙岗公社的张朝元年已八旬，至今犹能忆起，刘伯坚少年时助人为乐的故事。一次在龙寺街上，刘伯坚遇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娘沿街讨钱，哭诉家里有两个重病人无钱医治。他身上没有带钱，当即向别人借了两块银元送给老大娘，要她赶快去找医生抢救病人。又有一次，刘伯坚路过高友光的家，进去讨水喝，发现这个七口之家已经断了炊，便跑回家背了一背青玉米和两升大米送给高友光。他十分痛恨当时的反动统治，当他在家乡看到当地团防局及其头子，对贫苦农民假公营私、敲诈勒索的恶劣行径，便白天打着灯笼上街，故意在团防局门口停留。别人问他为什么白

天打灯笼？他说：这个社会白天如同黑夜，太黑暗了，只有打着灯笼才能有点光明。他还对周围的人预言，这样的社会，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灭亡。正因为如此，周围的乡亲都称赞他，说他一不起假（不摆架子），二不欺贫，三能尊重他人。刘伯坚在青年时期的这些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优秀的品质与作风，正是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基础。

川北高原交通不便，比较闭塞。刘伯坚有一个时期曾经在保宁府道尹陈秉坤处当秘书。他才思敏捷，文章出众，颇得陈秉坤的器重，给他月薪大洋一百二十元，并准备任命他为苍溪县县长。别人赞美刘伯坚“少年得志”，而刘伯坚却志不在此。面对着满目疮痍、军阀混战的旧中国，他想的是如何拯救多难的祖国和痛苦的人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毅然辞官不做，离开了偏僻的川北，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

一九一九年，震撼世界的“五·四”运动爆发了。这一运动很快席卷全国，四川的首府成都，也掀起了轩然巨波。刘伯坚就读的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在运动中起领头作用。在如火如荼的青年运动中，刘伯坚走出学校，奔走于学生与士兵之间，演讲、写文章，积极宣传革命的新思想。“五·四”运动的新思潮，进一步坚定了刘伯坚追求真理、解救祖国的信心。他和志同道合的朋友相约，决定到法国去，到欧洲去，去寻找革命的真理。

在欧洲勤工俭学、建党时期的革命活动

到欧洲去勤工俭学的活动，始于一九一二年，四川吴玉章是发起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去法国等地勤工俭学的不

多；大战之后，发展甚为迅速，建立了法华教育会等组织，主持留法勤工俭学事宜，四川省也建立了分会。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去法国等地的勤工俭学运动形成了一个高潮。全国各地赴欧洲勤工俭学的青年达一千六百余人，以湖南、四川、广东三省为最多，仅四川省就有三百多人，刘伯坚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于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和朋友们一道，首途上海，乘轮船离开祖国，到法国去勤工俭学。

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多月。八月四日，刘伯坚一行到达了法国的马赛港。刘伯坚先到比利时沙洛王劳动大学半工半读，又在比利时的霞洛瓦做过一个时期工。当时，同在比利时的还有聂荣臻、何长工、江泽民等同志。后来刘伯坚又去法国巴黎等地，一边做工，一边学习。

一九二〇年前后的欧洲，革命风暴此起彼伏，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对靠近苏联的欧洲各国，影响很大。东欧的德、奥、捷克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汹涌澎湃。法国是一个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国家，由法共领导的各种政治斗争、罢工运动不断开展。各种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及介绍十月革命的报纸杂志，大量公开出版发行。这一切深深地吸引住了追求真理、矢志救国的刘伯坚。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以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认真地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当时和他一起在沙洛王劳动大学学习的江泽民（原名江克明）回忆说：“沙洛王大学是一所工科学校，是学理工的”，但刘伯坚并没有花多大时间学工，“他主要的时间与精力是学习马列主义和搞政治活动。”

由于十月革命与欧洲工人运动的熏陶，由于对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的研究，刘伯坚扩大了眼界，确立了自己的信仰。他在对真理的探求中，终于找到了科学的共产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真理，确立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强信念。他认为：“欲使祖国富强，当从世界改革史中求之”；要拯救苦难的中国，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九二一年前后，刘伯坚由一个满腔热血但不知怎样救国的青年，开始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此后，他坚信共产主义是中国光辉的未来。这一人生观一经确立，他至死信守不渝。

刘伯坚在旅欧勤工俭学过程中，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一批以马克思主义者为核心的中国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和在欧洲工作的华工，曾经多次掀起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如一九二一年二月，以争取“三权”——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为主要内容的“二·二八运动”，一九二一年七月的“抗拒中法大借款”运动；以及一九二一年九月的“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等斗争，刘伯坚都是积极的组织者和参加者。据四川省政协委员夏育群（原名夏时颐）回忆，在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敢死队中，刘伯坚和赵世炎、李立三等三人冲在最前边，当时全部学生均被法国当局拘禁。后来，刘伯坚、赵世炎等几个人，由去兵营探亲的代表设法夹带出来，才免于被法国政府武装押送出境。

这期间，在近三千名中国留学生和众多的华工中，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也有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泛滥，出现了许多派别，如无政府主义者鼓吹无政府主义；特别是曾琦、李璜的国家主义派，经常利用他们出版的刊物，散布实业救国的改良主义，对青年有较大的影响。刘伯坚经常深入到华工和留学生聚居的地方发表演说，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批判国家

主义派媚日反人民的真面目，开展对无政府主义以及其他各种反动流派的斗争。由于刘伯坚平日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造诣颇深，因而他的演讲和辩论有理论有实际，生动具体，很有说服力，常常博得听众的热烈掌声，在留学生和华工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通过上述这些斗争，在旅法、旅德、旅比的华人中，开始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并且建立了一些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团体。激烈的斗争又进一步提出了加强内部团结、组织起来的要求，迫切要把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联合起来，建立一个能领导斗争的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于是，建党的要求便提到了斗争的日程上来了。刘伯坚参加了在旅欧留学生和华工中的建党工作。

早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巴黎已经成立了共产党的小组，参加者有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刘清扬（女）和陈公培。从那时起，赵世炎就与周恩来为筹建在欧洲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进行积极的活动。赵世炎和在比利时做工的刘伯坚保持经常联系，并同时与李维汉、王若飞、傅钟等有往来。一九二一年的五、六月，赵世炎与蔡和森等一起，就建立统一的旅欧共产主义组织问题交换意见。赵世炎和李立三提出党组织的名称为“共产主义同盟会”，蔡和森主张定名为“少年共产党”。赵世炎复信表示在名称上不计较。这样，关于建立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的问题，便在两个主要地区的领导人之间统一了思想。但由于这一年夏秋频繁的政治斗争，暂时推迟了建立统一党组织的工作。同年冬，由赵世炎、周恩来发起，邀请部分团体代表参加，在巴黎共同商讨组织旅欧“少年共产党”的事宜。代表们就纲领、组织等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并达成了

协议。会后，赵世炎、李维汉等在法国，周恩来在柏林，刘伯坚、聂荣臻在比利时，分别建立和发展了“少共”的基层组织。

一九二二年六月下旬，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个小平场上，召开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十八人，其中有周恩来、赵世炎、刘伯坚、陈延年、李富春、李维汉、聂荣臻、王若飞、萧朴生、傅钟、高风、毛羽顺等，周恩来是旅德支部的代表；李富春、高风、毛羽顺是旅法支部的代表；刘伯坚、聂荣臻是旅比支部的代表。这十八个人代表了约四十名党员。赵世炎向卖茶水的法国老太太租了十八张椅子，在小广场上围成一个圆圈，没有任何装饰，代表大会就这样简单地在露天里开始了。周恩来风趣地指着一圈椅子对大家说：如果有人来了，我们不说话，谁也不知道我们在这儿干什么。会议一共开了三天，第一天通过党纲和党章，确定了党的名称；第二天选举了党的总支部领导成员，赵世炎为总支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第三天讨论了各项具体工作。

一九二二年八月，根据国内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不久发展成为中共旅欧总支部；参加“少共”的共产党员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聂荣臻回忆这一段活动时说：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在法国组织了“少年共产党”，年底派罗迈（即李维汉）回国到南京和中国党联系。“少共”的党员在一九二二年夏天全部转成中国共产党党员。刘伯坚是比利时党的支部书记。

一九二三年二月，“少共”又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按国内党中央和团中央指示，将“少共”改名为“旅欧共产主

义青年团”，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新团章，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周恩来为书记，刘伯坚、萧朴生等为委员，中共旅欧支部和中国共青团旅欧支部^①都设在巴黎南部周恩来住地——意大利广场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的一家旅馆内；党和团的机关是合在一起的，领导机构也是统一的。当时，党组织是秘密的，而团的组织则是半公开的。一般发表声明、宣言以及参加各种活动，都是用共青团的名义。

中共旅欧总支部下辖三个支部：旅法支部、旅德支部、旅比支部。旅比支部设在刘伯坚做工的比利时工业城市霞洛瓦。中共旅欧总支部第一届书记是赵世炎，第二届书记是周恩来，第三届书记是刘伯坚，第四届书记是李富春，第五届书记是傅钟。刘伯坚先是主要负责旅比支部工作，后来到了巴黎，专门从事总支部的领导工作。

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以后，把旅欧勤工俭学运动与旅欧华人的斗争推向了新的阶段。当时，在理论宣传方面，创办了油印刊物《少年》，后改名为《赤光》，有力地推动了对当时流传在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广泛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共旅欧总支部的建立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培养了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刘伯坚从一开始就积极响应并参加了建立旅欧支部的建党工作，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如蔡畅等同志就是在这一时期由刘伯坚介绍入党的。

为了培养党的骨干，中共旅欧总支部还有计划地选送了一

^①党和团的旅欧支部以后都发展成为总支部，法、德、比等国成立支部。

批同志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去学习。一九二三年三月，赵世炎率领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余立亚、高风、熊雄等十三人，第一批由法国去莫斯科。同年十一月选送了第二批，其中有刘伯坚、李合林等十余人，一九二四年又选送了第三批，其中有聂荣臻、蔡畅、郭隆真、李卓然等。以后，旅欧总支部还陆续输送了几批党团骨干到莫斯科去。这些同志在苏联学习一段时间后，都相继回到了祖国，积极地投入了国内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

赵世炎和刘伯坚先后被派赴苏联学习时，周恩来都亲自赶到柏林，帮助他们办理去莫斯科的手续，战友的亲切关怀，更加激励了刘伯坚去苏联学习十月革命经验，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信心和决心。

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旅莫支部的工作

莫斯科东大的全称叫“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一所党校性质的学校，按国家和民族分班，中国同志组成了中国班，刘伯坚于一九二三年底入东大学习。

最早到东大学习的中国同志，是一九二一年由国内党组织派去的，其中有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王一飞等。为了更好的组织学员们的学习和利用好课余时间，中国班成立了党支部，当时叫干事会，刘少奇任第一任干事长（即支部书记）。这个党支部以后发展为中共旅莫支部，共有二百多名党员，直属中共中央，党员分别在东大和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二二年刘少奇等回国，旅莫支部暂时由彭述之、罗亦农短期负过一段责任。一九二三年底，从欧洲派了大批同志来东大学习，刘伯坚也在

其列。刘伯坚工作积极热情，认真负责，待人和蔼可亲，工作能力也强，深得中国学员拥护，不久便被公推为旅莫支部干事会负责人，连任旅莫支部书记达三年之久。既使在一九二六年旅莫支部被迫解散之后，由于许多党员并未转入苏联党，各方面都还存在许多困难，刘伯坚仍然积极努力工作，为大家服务和解决问题，实际上仍起着负责人的作用。

刘伯坚负责的旅莫支部，当年在苏联学习和生活过的人，印象都特别深刻。因为这个党支部什么都管，不但负责管理中国留学生的的工作，也承担旅苏华侨的事务；不但管莫斯科的事，甚至莫斯科以外各地区留学生和华侨的事他们都管。所以，人们亲切地称旅莫支部是“党内的驻苏大使馆”。例如，国内或旅欧的党组织要派留学生到苏联去学习，就先打电报告知刘伯坚；去的人再带一封介绍信，刘伯坚就负责安排他们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并派专人接待。其中尤以接待冯玉祥和安排西北军派去的几百名官兵最为突出。刘伯坚和他领导的旅莫支部，曾为此作了大量的工作。

刘伯坚在东大期间，学习非常努力，生活也非常刻苦。初到莫斯科时，正逢苏联战后经济恢复时期，他们白天到工厂做工，晚上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后来实行了新经济政策，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学生可以整日学习不作工了，早上还有白面包吃，但仍然是比较艰苦的。一般学员经过短期学习后，即回国参加革命斗争，他因负责支部工作，一直留在东大。刘伯坚非常珍视这几年的学习生活，在列宁的故国，有机会系统地学习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著作，悉心研究苏联十月革命经验，是一个革命战士最重要的思想准备，这对他回国后长于做政治工作和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刘伯坚学习

马列主义理论，注意结合国内的阶级斗争实际，他经常认真阅读国内的报章杂志和党刊团刊，分析研究国内政治情况。当时曾在东大学习的曾涌泉回忆说：刘伯坚学习理论很注意联系实际。他经常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结合着中国情况来进行研究。他不但自己坚持这样学习，还组织其他同学这样做。凡是国内到莫斯科开会的同志，他总是及时地请他们到东大来给学员做国内形势报告，或召开座谈会，讨论国内形势及开展斗争的方法和方向等问题。

一九二五年十月，王明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一来就挑起了一场斗争。当时，旅莫支部向中国留学生提出了“无产阶级化和纪律化”的口号，针对部分留学生中的散漫习气，把留学生组织起来加强学习；反对一些不健康的思想倾向，如组织学生讨论反对“杯水主义”（即青年男女不郑重的恋爱、同居现象），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道德及修养方面的教育。王明则反对这种完全必要的政治思想工作，他攻击中共旅莫支部的同志象一群和尚，清规戒律太多，是一群清教徒。非但如此，王明还就中共旅莫支部是否应当存在，以及在苏联的中共党员是由苏联党还是中国党来领导等问题，挑起了争论。王明还纠合了一部分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宗派小集团，反对中共旅莫支部。刘伯坚坚决反对王明的错误意见，坚持旅莫支部应当存在，留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也必须加强，同王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为了更好地组织大家学习和交流各地情况，一九二六年初，刘伯坚和旅莫支部负责青年团工作的曾涌泉、法文翻译王仁达等，创办了《前进报》。王仁达的职业是翻译，有工资收入，刘伯坚和曾涌泉只有很少的生活费，他们把这些钱凑起来

买纸张什物，办起了这份报纸。刘伯坚是《前进报》的主要撰稿人。他所撰写的稿子，有政论时评，有学习心得，有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还有国内新闻的报道，都写得生动活泼，很有见地；加上曾涌泉精通英文，经常翻译一些共产国际机关报的理论性文章，王仁达则翻译一些法文方面的文章，使《前进报》办得丰富多彩，受到旅居国外的中国同学和侨胞的欢迎。报纸除在莫斯科和苏联各地，包括西伯利亚和海参崴在内的远东地区发行外，还远销到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地，影响相当广泛。

接待冯玉祥，争取西北军

一九二五年，国内爆发了“五·卅”运动，全国形成罢工运动高潮。旅莫支部决定全部中国留学生，分期分批回国。由于要把大家先送走，有许多工作和手续要办，干事会的同志安排在最后一批回国。恰在这时，旅欧勤工俭学的邓小平、欧阳钦、李大章等三十余同志，因抗议帝国主义残酷屠杀中国人民，在法国举行示威游行，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又转到苏联来学习。刘伯坚等旅莫支部的成员，为了接待和安排这些同志，回国的行期被拖延下来而最终没有走成。

继续留在莫斯科的刘伯坚，除了自己继续刻苦钻研马列主义理论，研究苏联的革命经验及国内革命斗争情况；与曾涌泉、王仁达一起创办《前进报》和从事党的其他工作以外，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占据了他的主要精力，那就是做接待冯玉祥和争取西北军的工作。

冯玉祥统率的西北军原属直系。一九二四年在第二次直奉

战争中，冯玉祥倒戈反直，发动北京政变，改称国民军。后来，冯玉祥因军事失败进一步倾向革命。一九二五年秋末冬初，冯玉祥委派了鹿钟麟等一批国民军高级将领到苏联参观学习，中共旅莫支部刘伯坚、曾涌泉等，组织东大一批积极分子负责接待工作，帮助他们找住的地方，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并引导他们去参观。冯玉祥当时为了扩充势力，还收集了一批失业失学的知识青年，组成了一个“学兵团”，也送到苏联学习，仍然是刘伯坚组织人接待的。这些人都是去学习军事的，一部分入了莫斯科军事院校，另一部分分配到基辅、列宁格勒等地的军事院校，分别学习步兵、炮兵、空军……等。刘伯坚又派了东大的李一特（后为四方面军参谋长）、赵秀峰和曾涌泉等，到各地军校做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例如，当时学空军是在列宁格勒，刘伯坚先派曾涌泉到列宁格勒军校，后来曾涌泉调回莫斯科，刘伯坚又改派刘鼎去接替曾。这批共产党人在这些学兵中作了大量革命的政治工作，对后来西北军有更多人倾向革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九二六年春，冯玉祥在国内军事上完全失败，他随即通电下野，携家眷取道外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赴苏联“考察”，并要求援助。趁冯玉祥来苏联考察的机会，共产国际决定争取冯玉祥，并委派刘伯坚参加这一工作。一九二六年五月九日晨，冯玉祥将军全家到达莫斯科，住在当时莫斯科最高级的旅馆——欧洲旅馆。五月十七日午后，刘伯坚和曾涌泉、武胡景以《前进报》记者身份，到欧洲旅馆去拜访冯玉祥，并赠送冯玉祥一套《前进报》。刘伯坚向冯玉祥畅谈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并对国内政局的发展进行精辟、透彻的分析，给冯玉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刘伯坚就利用和冯玉祥接触的机会，向

冯玉祥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分析如何才能彻底解放工农劳苦大众，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富强的新中国；阐述必须积极推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冯玉祥去东大参观时，刘伯坚组织东大的中国留学生热烈欢迎他。应当特别提到的是，刘伯坚除了做好冯玉祥等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还注意在冯玉祥的部属中发展和加强党的力量。例如，冯玉祥有一个亲信副官叫张振亚，就是在这一时期由刘伯坚与曾涌泉介绍入党的。后来，冯玉祥离开革命，张振亚仍带领一个旅潜伏在冯部；抗日战争爆发后，张率领全旅战士到晋察冀参加了八路军，并在晋察冀担任了敌工部部长的职务。

经过苏联政府领导人、共产国际负责人和在莫斯科的刘伯坚等的谈话和争取，冯玉祥表示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要向苏联共产党学习，军队要改组，要向苏联红军学习，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好，西北军中也要设立政治部。在第三国际的积极推动下，苏联无偿的援助了冯玉祥一批武器，主要是轻武器和弹药。此外还派了军事顾问乌斯曼诺夫（原任苏联红军第三军团长）、翻译可尔夫去帮助冯军工作。冯玉祥很器重刘伯坚。他向共产国际提出，要求派刘伯坚和他一道回国去主持政治部的工作。共产国际同意了他的请求。一九二六年八月，刘伯坚遂与冯玉祥以及苏联顾问等一起回国。

改造西北军，在陕甘宁地区传播革命火种

改造西北军是一件很艰巨的工作，因为这支军队自从南口撤退之后，已经陷于土崩瓦解、走投无路的困境，全军退居于张家口、察绥一带，给养困难，士气低落，军心涣散。加上冯

玉祥离开部队，中上层军官终日彷徨，不知今后怎么办。其中石友三、韩复榘等投靠了绥军商震，其他人等也在伺机另谋出路。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六日，冯玉祥、刘伯坚以及苏联顾问等一行人，从苏联回到绥远省的五原县。当天，冯玉祥向全国发出了由刘伯坚起草的参加国民革命的宣言。九月十七日，在五原县的大校场上，召开誓师授旗典礼，冯玉祥、刘伯坚发表了演说，公开宣布全军集体加入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中国国民党，接受国共合作的纲领，接受“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提出要打倒北洋军阀政府，配合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刘伯坚的演讲深入浅出地宣传了革命道理，指出了今后斗争的方向与前途，大大鼓舞了全体官兵的士气，雷鸣般的掌声不绝于耳。当场还举行了易旗仪式，将原西北军的五色旗更换成青天白日旗，刘伯坚亲自高举大旗威立阵前，由冯玉祥郑重宣布，改西北国民军为国民军联军。冯玉祥自任总司令、刘伯坚任政治部副部长，全场群情激奋，欢声雷动。

西北军自打起国民军联军的大旗之后，军威大振，来归者甚众，原已投靠商震的石、韩两军也重返冯部，部队很快发展到二十余万人。革命形势发展很快。由于包头位处交通枢纽，北可以保证通往苏联的国际交通线，东可以直接取得党的北方区委的领导，对革命事业的发展极为有利。因此，刘伯坚提议将总部迁往战略重地包头。

总部迁往包头后，开始了对部队的整顿和改造的工作。为了把这一支军阀队伍改造成为名符其实的革命军队，刘伯坚主要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建立各级政治工作机构；另一方面是举办各种干部训练班或军政干校，培养军队的骨

干。他深入基层，奔走各军，日以继夜，废寝忘食，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终于以他那卓越的组织工作才能，出色的完成了这一任务。

刘伯坚在政治部内设立组织处、宣传处、总务处三大机构。在联军政治部以下又设立了军、师、旅、团、营各级政治部。由于严重缺乏政治工作人员，他分别写信给党中央、北方区委和粤区党委，要求支援和输送干部。党中央和北方区委、粤区党委先后输送了二百多名干部到国民军联军工作，其中著名的有刘志丹（景桂）、安子文、宣侠父、方仲如、曾晓渊、贾午（丽南）、李联珍等。他们分别担任了军、师一级的政治部长及其他机构的负责人。如刘志丹任马鸿逵部军政治部主任，宣侠父任孙连仲部军政治部主任，方仲如任石友三部政治部主任。从而加强了党对国民军联军的领导。

刘伯坚非常重视宣传工作，自“五原誓师”后，即将原西北军的机关报《西包头日报》改为《中山日报》，社长由党的北方区委派来的贾丽南担任，刘贯一、贾一中任记者。同时，各军、师都办有自己的小报，有油印的，也有铅印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宣传革命思想的宣传网。

刘伯坚是由第三国际派回国的。他一回国立即与党的北方区委取得联系，经常向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区委汇报工作，接受北方区委的领导，并和在南方的党的领导人谭平山、在上海的党中央陈独秀取得联系。《中山日报》就是刘伯坚与北方区委联系的枢纽。刘贯一讲他经常看见刘伯坚用显影药水，在方绢上写报告送北方区委，并向北方区委请示报告工作。

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在刘伯坚主持下建立起各级政治机构以后，除传播马列主义，提高官兵觉悟之外，还废除了打骂士兵

等旧军队中的不良制度，实行了官兵平等，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为了提高部队的素质，刘伯坚在五原、包头、银川、兰州、西安等地办了多处军政干部学校，招收进步青年学生、下层军官和有文化的士兵入学，经过短期训练，输送给部队。这些学校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其中不少人发展成为共产党员。例如后来在宁都兵暴中，二十六路军中的党支部组织委员、冒险到苏区去找寻刘伯坚的袁血卒，就是西安军事政治学校培养出来的学员。为了办好军政干校，刘伯坚每期都要亲自去讲课。他讲授的课程有：《社会主义概论》、《劳工神圣》、《共产主义 A B C》、《国家与革命》，以及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刘伯坚讲课很生动，深入浅出，一般下层的军官和士兵大部听得懂，因此很受欢迎。每逢刘伯坚讲课，全场总是鸦雀无声。当时武汉汪精卫政府也派来一个教员讲三民主义，他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讲的全是唯心主义，使听讲的人都昏昏欲睡，与刘伯坚的讲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外，刘伯坚还挤时间组织学员办墙报和唱革命歌曲，活跃学员的课外生活。军政干校成了培养革命者的熔炉。

刘伯坚还利用一切时机向部队进行政治教育。他提出“军队政治化”、“军队与民众相结合”、“辅助工农运动”等口号。每逢部队有重大集会，他都去演讲，向广大官兵宣传马列主义，灌输革命思想。军队等级森严，刘伯坚身为联军政治部领导人，却毫无高级军官的架子，经常深入连队和广大士兵及下层军官打成一片，象普通战士一样找他们一起散步谈心，教唱革命歌曲。因此，他对部队的思想状况了如指掌。他演讲不用

讲稿，娓娓而谈，密切结合部队实际，有的放矢进行思想教育，从而博得了官兵的爱戴，在国民军联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部队驻在地瘠民贫的西北高原，筹饷很困难，有时几个月发不下饷银。针对这种情况，刘伯坚深入到士兵中去做工作。他通过各种集会大讲革命形势，指出困难是暂时的，革命的前景是光明的，鼓励大家克服困难，保持旺盛的斗志。当时，国民军联军中流传着这样两句话：“听过刘伯坚演一次讲，当得关了三个月的饷。”

刘伯坚十分重视军队与民众相结合的建军原则。他不仅致力于对旧西北军的改造工作，为了唤起民众积极开展革命斗争，还领导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开展地方工作。大军每到一地，都深入发动群众，在陕、甘、宁广大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一九二六年秋末，国民军联军为了援陕，转战到了宁夏，总部在银川驻扎了几个月。当时的宁夏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封建势力甚浓。为了打开局面，刘伯坚经常到各种群众集会上去发表演讲，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为了培养地方的革命骨干，刘伯坚还主持举办马列主义训练班。这是马列主义在宁夏最早的传播，刘伯坚是宁夏地区马列主义最早的传播者，刘伯坚在这里培养和发展了宁夏最早的几名共产党员。在刘伯坚领导和组织下，还成立了第一个在宁夏的国民党党部，银川街头那雄伟秀丽的鼓楼，就是当年县党部的办公所在地，随军而来的政治部副部长、共产党员萧明，调任县党部的主要负责人，共产党员马云堃，就住在鼓楼西北角上那间房子里，负责处理县党部的日常事务。这里成了当时宁夏地方宣传和组织革命的中心。

一九二六年冬，刘伯坚和冯玉祥一起在银川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刘伯坚在会上讲话，明确支持群众的革命活动。会后，陆续成立了宁夏地区的学生联合会、农民协会、商会等革命群众组织。在以刘伯坚为首的一批共产党人的领导下，针对宁夏地区沉闷的封建气氛，发动了一场“五·四”式的革命群众运动，使宁夏地区出现了一派革命新景象。华丽壮观的银川玉皇阁，是《中山日报》所在地。《中山日报》是宁夏有史以来第一份进步报纸。它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科学、进步，尖锐地抨击封建迷信和专制主义，为宁夏的落后而大声疾呼。政治部的宣传人员，在刘伯坚领导下，经常组织群众集会，宣传打倒列强，铲除军阀，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倡讲卫生、扫街道；实行男女平等，教育妇女放足、男人剪辫子等等。此外，还严惩了几个把持水利，盘剥农民的大恶霸。通过这一系列活动，传播了革命道理，培养了一批先进分子，为宁夏人民尔后的革命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国民军联军解除了直系军阀刘镇华部对西安的包围。年底，总部移往西安。行军途中，每到一处，背包刚放下，顾不上喝一口水，刘伯坚就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发表演说，宣传革命。军队走到哪里，宣传工作就作到哪里，革命标语就张贴到哪里；每打下一座县城，都砸牢开监，释放狱中的受苦人和政治犯。所以，军队深得群众拥护，沿途的老百姓，争相支援这一支革命的部队。

刘伯坚很注意上层军官的统一战线工作，经常向他们进行新三民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他不仅深得冯玉祥的信任和器重，也和其他一些高级将领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邓宝珊、杨虎城、吉鸿昌、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对他都很敬慕。

原西北军高级将领之间时有摩擦，发生纠纷时，都愿找刘伯坚评理，并乐意接受刘伯坚的调解。

一九二七年四月，刘伯坚与王叔振在西安结婚。王叔振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女同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牺牲于福建。

总部在西安时期，筹划了部队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为了配合南方北伐军继续北上，国民军联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提出“出兵潼关，会师中原”的建议。

就在这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东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杀害。消息传来，冯玉祥开始发生动摇。刘伯坚和西安党组织一起，立即发动陕西省和西安市各级群众组织以及各家报纸，掀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运动，用发通电、发社论、开大会等形式，声讨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西安市八十多个团体六万多人，召开了“拥护革命军肃清后方，会师中原大会”，会后整队游行示威，向国民军联军总部请愿。刘伯坚代表总部接见了他们并作了政治报告，对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表示坚决的支持和拥护。五月一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在西安红城（今新城）举行总司令就职宣誓式，刘伯坚代表最高特别党部陕西省党部、西安市党部讲了话。五月五日，在党的领导下又于红城举行了纪念“五一”、“五五”声讨蒋介石反革命罪行大会，刘伯坚、刘含初等都在大会上讲了话。当天，冯玉祥发布命令，率师响应北伐实行东征，刘伯坚随军东去，西安市不少共产党员亦参军随军东征。中共西安市执行委员、妇女部长秦德君率领的女子宣传队，也随师东征。

这时的第二集团军经过一年来的政治工作和训练，已经由一支濒于瓦解的旧军阀军队，变成一支军威大振深受群众拥护的革命军队，全军上下士气旺盛，斗志昂扬。因此，在挥师东征中，一路节节胜利，势如破竹。五月八日占领陕州，十五日攻克洛阳，三十日克复郑州，六月一日占领开封，与南方的第一集团军唐生智部胜利会师，实现了“会师中原”的战略计划。

第二集团军“会师中原”的迅速胜利，是以刘伯坚、邓小平为首的大批共产党员积极努力工作的结果，刘伯坚领导的政治部和各级政治组织，对全军进行的强有力的革命教育是这支军队得以起死回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根本保证。

一九二七年六月，正当革命处于紧急关头的时候，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动摇，阴谋叛变。本来就已经动摇的冯玉祥，参加了六月十日汪精卫为准备叛变而召开的“郑州会议”和六月十九日蒋介石召开的“徐州会议”。至此，冯玉祥公然投靠了蒋介石，在河南也开始了反共的“清党”活动。他勒令苏联顾问回国，扣押了军中近百名担任过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进行“审查”，下令封闭各县所有农民协会，电令所属各部进行反共“清党”，使西北战场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遭到夭折。

但是，冯玉祥慑于刘伯坚等共产党人在西北军广大官兵中的崇高威望，他没有敢采取“杀”的办法，而是将扣押的共产党员一律武装押送出境。对于象刘伯坚这样的高级领导人，则采取了“客气的礼送”，实际是驱逐出境。刘伯坚闻讯后立即采取主动，把公开的共产党员安全撤到武汉。他对冯玉祥公然投靠蒋介石及其反共行径非常气愤，也很快去了武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虽然失败了，可是，刘伯坚等在陕、

甘、宁广大地区播下的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他们在西北军中传播的马列主义真理，也没有消失。刘伯坚通过自己的艰苦工作，为党在西北军树立了崇高的威望；他以自己的行动，树立了一个共产党人一心为劳苦大众的光辉形象，这些都给西北军广大官兵及一部分上层将领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在苏区的革命斗争，策划宁都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刘伯坚从武汉到上海做了一个短时期的秘密工作。一九二八年，党又派他去苏联，先后在莫斯科军政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同年，在莫斯科出席了党的六大。据当时和他一起学习的刘伯承回忆，刘伯坚学习很用功，也学得很好。有一次刘伯承邀他去打球，他说：“我的功课还没做完，现在不能玩。”这个小小的例子，很生动地说明，刘伯坚为了回国后参加武装斗争，是如何争分夺秒地刻苦学习着。

一九三〇年下半年，刘伯坚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生活。回国后从上海转道江西，到中央苏区工作，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刘伯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担任苏区工农红军学校的政治部主任（何长工是校长）。苏区工农红军学校先后培训了军事干部近五、六千人。周恩来来校视察后认为比黄埔军校还办得好。这个学校后来改称红军军事学院。

在苏区工作时期，刘伯坚是王明路线的受害者。一九三〇年王明等人相继回国。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等人借助共产国

际的力量，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执行“左”倾错误领导，刘伯坚对此十分不满。又由于他在莫斯科时就曾与王明进行过斗争，因此被左倾领导人视为眼中钉，一有机会就对他实行排斥和打击。据何长工回忆，在苏区红军学校工作时，一天刚开完斗争会，晚上刘伯坚曾和他谈到党内斗争情况。刘伯坚心情很苦恼，谈话时声泪俱下。何长工安慰他说：“党内的问题总会弄清楚的。”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宁都兵暴”以后，刘伯坚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的政治部主任。

“宁都兵暴”是一次震撼中外的起义。当时人们很难理解，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为什么会在“围剿”共产党的国民党军队中，出现这样大规模的全军起义行动。当然这次起义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是刘伯坚在这次起义中，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在宁都举行全军起义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前身是冯玉祥的西北军的一部。这支队伍在大革命时期接受过革命的洗礼，参加过北伐战争。刘伯坚和许多共产党员在这个部队做过很多革命的政治工作，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革命精神，在该部广大官兵中有深刻的影响。国共分裂，冯玉祥投靠蒋介石，一部分爱国将领表示反对，下级官兵则更是如此。他们中的一部分，就曾经参加过陕西清涧、渭华一带的农民武装起义。

一九三一年三月，蒋介石调孙连仲部二十六路军参加第二次“围剿”，到江西去进攻红军。二十六路军一到江西就被红军歼灭了一个旅，士气极为低落，官兵普遍厌战。进入江西后孙连仲患病去上海就医，部队由参谋长赵博生带领。“九·一八”事变后，二十六路军将领曾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回

北方打日本。队伍曾一度离开宁都，企图脱离内战战场江西，但没有走多远就被国民党驻广昌的嫡系部队堵了回来。这样一来，官兵士气更是一蹶不振，军官们经常聚在一起发牢骚。一次，一个叫黄仲岳的团长忿忿地说：“在这里逗留真没意思，我不如带人上山去。”另一个叫李振庭的团长接着说：“我要带我的人当红军去。”至于士兵们则更是如此。他们指着宁都城外小山上一排排士兵的坟丘说：“在这里呆下去，我们迟早都要到那儿去站队。”不少的人怀念他们的老政治部长刘伯坚，希望能找到他来重新挽救这支队伍，给他们领路。

当军官们在一起发牢骚时，其中有一个有心人，那就是七十四旅第一团中校团副苏进。他和董振堂很熟，也知道董的思想进步，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很不满意。有一次，董振堂正在发疟疾，刚退烧躺在床上，苏进去看望他，把黄、李二人的牢骚话告诉董振堂。董听说这事非常兴奋，突然起身坐到躺椅上，说：“我们去找刘伯坚好吗？”苏进说：“听说刘伯坚在上海。”董振堂说：“要干就快干，不能等待。”接着，董振堂就以请假治病为名，带着七十三旅上尉参谋刘振亚一同到了南昌。刘振亚是当时二十六路军中唯一与上级党有联系的共产党员。董振堂在南昌批准他“回家探亲”，实际上是派遣他到上海去找党。董振堂对刘振亚说：“一定要找到刘伯坚。”

刘振亚到了上海，见到中央军委负责军运的朱瑞，又碰上原在西北军的王超、袁汉澄（即袁血卒）、李肃等三人，他们都是秘密的共产党员。中央军委决定王、袁、李三人也到二十六路军去工作，并告诉刘振亚说刘伯坚现在苏区，有事可以直接到苏区联系。于是，四人结伴回到二十六路军，成立了秘密党支部，刘振亚任书记，袁汉澄任组织委员，王铭伍任宣传委

员；刘振亚到七十三旅，李肃到七十四旅，袁汉澄到七十九旅，王超到总指挥部工作。从此，党在二十六路军中开始进行工作，很快就分别发展了二十多个党员。

党支部研究了赵博生的情况：从历史上看，大革命时期他倾向左派；国民党分共他不满意，曾企图率部队上山；与西北军中顽固派意见不和，曾想弃官务农；自进入江西后仍同情革命，凡抓来的“赤匪”嫌疑犯送往总部，他都设法释放；他还公开抨击过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说应该“外御其侮”，有进步的思想倾向。于是决定做他的工作，以党的特支名义给赵写了一封信，指出二十六路军的唯一出路和光明前途是举行武装起义参加红军。这封信由总指挥部译电主任、新发展的共产党员罗亚平，在送电文时放在赵的桌上。赵博生见信后，立即找罗亚平谈心。赵说：“我知道信是你送来的，信上的观点我完全同意。我早就派人到上海去找过刘伯坚同志，但是没有找到，后来又派李参谋到上海去找过刘部长（即刘伯坚），也没有达到目的；既然这里有共产党的组织，就让我也参加吧！党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不久，党组织就批准了赵博生入党的要求。

在筹划起义过程中，一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南昌的一个交通站遭到敌人破坏，搜走了二十六路军内党的两个重要材料，党支部暴露了。蒋介石南昌行营拍来了十万火急的电报：“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伍三名共产党员，星夜送南昌行营惩处。”接着，又派专机送来蒋介石妄图一网打尽二十六路军中共党员的“手令”。“急电”和“手令”都落在主持全军工作的总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手里。事不宜迟必须马上采取行动，尽快举行起义。党支部研究后决

定，一方面由赵博生发出“遵令即办”的电报，敷衍南昌行营；一方面立即派与刘伯坚比较熟悉的袁汉澄星夜赶往苏区找寻刘伯坚，争取党和红军的协助，尽快举行起义。

一天夜里，袁汉澄以执法队的名义化装成便衣，混过了赤白交界的封锁线来到苏区，见到了彭湃县县委书记何步青，由何用牲口又送到瑞金叶坪的中央军委所在地。接待的同志让袁坐在一间大屋子里等候会见刘伯坚。他后来回忆说：“那天，在一个大屋子里等候时，看见一个壮年军人在打绑腿，他很和蔼地问我，‘你找那一个？’我说：‘我找刘伯坚。’他说：‘你是不是认识他？’我说：‘认识，你是谁？’他说：‘我是朱德。’我一听说是朱德，不禁愕然失惊：我们的红军总司令，竟象伙夫一样简单朴素！比起国民党的将官真是有天渊之别。接着朱总司令对我说：‘你再等一会，刘伯坚同志会来接见你的。’袁汉澄很快见到了刘伯坚，向他报告了全部情况。刘伯坚立即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中央军委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对二十六路军的策反方案。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朱德、叶剑英、刘伯坚、左权、王稼祥等，袁汉澄也应邀列席。会议研究的方案是：争取全部暴动，如全部暴动不成则局部暴动；局部暴动以董振堂的七十三旅为主；用外出攻打红军为名，把部队拉到苏区去，已暴露了的共产党员则随军到苏区，没有暴露的党员继续留在没有参加暴动的队伍里；二十六路军起义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六军。

会后，中央军委指派刘伯坚、左权、王稼祥和袁汉澄一起，携带无线电台到彭湃县县府所在地（今固厚镇）具体联系指挥。由于刘伯坚熟悉原西北军情况，决定由他负责起义的具体指挥工作，此外，还派了红四军配合行动。暴动时间原定为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因等待棉衣和军饷，需要推迟一天。同时，七十四旅提出：起义后改编为十六军名号太小。于是，各旅都派代表一人，随袁汉澄到彭湃县与刘伯坚协商。刘伯坚等研究后，批准暴动推迟一天，并决定暴动成功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暴动顺利成功了。二十六路军总部和两个师部、六个旅部、十一个团（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听见枪响后，带了驻在宁都四十里地以外的一个团逃跑了），还有几个独立营和直属部队，全部参加了兵暴，共一万七千多人，浩浩荡荡开进苏区。刘伯坚带着一批少先队员，打着红旗和火把，代表中央军委前来迎接。队伍中有好多人认识刘伯坚，大家兴奋地喊着说：“我们的刘部长来接我们了。”刘伯坚见到暴动的领导人时，亲切地说：“昨天晚上，我一夜都没睡着觉，我真替你们担心。列宁讲过，暴动的时机成熟了，一分钟也不能延误，现在我们胜利了！”第二天早晨，部队出发前，刘伯坚代表中央军委讲话，宣读了将起义队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命令，任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红五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仲岳为十五军军长，颁发了有毛泽东和朱德亲笔签名的委任状。这一天，还通过电台向全国发出了由刘伯坚起草的《原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于宁都起义后加入红军宣言、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刘伯坚策划指挥这次起义有功，被任命为该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受到广大官兵的热烈欢迎。

接着，部队开到石城县的秋溪、龙岗、横江一带整编。刘伯坚在部队中实施革命的政治教育和多方面的政治工作，使这一支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在以后苏区的反“围剿”战斗中和长

征的道路上，曾不畏艰险，屡立战功。

原国民党二十六路军由一支人心涣散的白军，被改造成一支英勇善战的红军，是和刘伯坚坚持党的原则，辛勤努力工作分不开的。刘伯坚进行政治工作的特点是善于教育和团结人。黄镇回忆说：我和姬鹏飞、王幼平、李达、李雪山等，都是宁都兵暴过来的，都在红五军团工作。后来我们这些人一提到刘伯坚，都非常敬重和思念他。他象我们的亲兄长，又是革命的启蒙师。他勤奋好学，诲人不倦，待人和蔼，平易近人，生活艰苦朴素。那时正是王明左倾错误领导时期，有些人对待起义部队提出“要兵不要官”的错误口号，要不是刘伯坚善于做团结人的工作，一定有许多起义军官离开红军。黄镇还说：刘伯坚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他非常重视部队的宣传鼓动和文娱工作，在他领导过的红军部队中，宣传鼓动和文娱工作都很活跃。红五军团就创办了《猛进报》和猛进剧团等文化工作单位。士兵和群众从这些活动中得到很多鼓舞和教育。他亲自审看和帮助修改我们的剧本。红五军团政治部还举办过文化娱乐训练班，培养了许多文娱活动的骨干分子，每个连队都建立了俱乐部组织，以活跃部队生活。每到一地，刚摘下门板铺上稻草，刘伯坚就带领政工人员去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散发打土豪的胜利果实，教育群众拥护革命；还派出政工人员拎着石灰桶到处刷大标语。在他领导下的红五军团政治部，团结协作斗志昂扬，打起仗来；政治部的工作人员都争先恐后上前线英勇战斗，身先士卒，深为士兵群众所称颂。

宋任穷也回忆说：刘伯坚为人正直，是非分明，平易近人，平时他对所有同志都很关心，我自己就亲身感受过他的关怀。我当时担任红五军团十三师的政治委员，王明左倾错误领

导无故撤了我的职务，调任红五军团政治部的民运部长，连警卫员也给撤掉了。有一次派我下农村扩大红军，因为我骑马把手腕摔坏了，拿东西都很困难，刘伯坚就把他的两个警卫员派了一个，陪我去农村。回来后，他还坚持要把警卫员让给我，当时他自己也是受到王明机会主义者排斥的。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主力被迫退出苏区，名震世界的“长征”开始了，在左倾错误领导的排斥和打击下，刘伯坚没有能够跟随红五军团长征，而是离开了红五军团，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武装斗争。

以身殉主义，英名垂史册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刘伯坚被派往赣南军区任政治部主任，同时也在中央分局军委工作，坚持敌后斗争。在这严峻的考验面前，刘伯坚没有因为革命遭受到暂时挫折而悲观。也没有因为在党内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排斥而消极。他一如既往，仍然精神抖擞的投入新的战斗。当时，赣南军区政治部驻扎在于都附近的黎板桥，为了护送主力红军渡过于都河，他们担负了大河的架桥任务。刘伯坚每天都到架桥工地指挥架桥和组织各种后勤工作，支援主力红军。赣南十月，正是桂子飘香的季节，于都河边却弥漫着一片凝重悲壮的借别气氛。不时可以看到留下的同志和远征的战友挥手互道珍重，苏区群众洒泪牵衣送别亲人的情景。刘伯坚站在于都河边和战友们一一握手告别，他豪情满怀地鼓励战友们说：“为了革命的需要和革命的发展，同志们要开始远征了。但是，这个时间不会长，胜利后我们会重相见的！”谁知这次分别竟成永诀。一九六二

年的八月一日，叶剑英曾赋诗《建军纪念日怀战烈》五首，其中第一首就是怀念刘伯坚当年于都河边送别时的依恋之情：

“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鄞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这首诗，再现了当年于都河边刘伯坚叮咛相送的动人情景，也表达了诗人对战友的深切怀念。

红军主力长征后，贺昌、刘伯坚等几个政工干部将《火星报》与《战斗报》的人员和设备合并，继续坚持办《红色中华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红色中华报》坚持出版到一九三五年二月。刘伯坚为报纸写了不少社论，时而也写一点诗词，鼓舞部队和群众的斗志。

刘伯坚行军从来不骑牲口，一直坚持和政治部及文工队的小鬼们一起步行。他爬山爬得很快，一路有说有笑，经常站在山坡上给大家鼓劲加油。部队驻下来，就立刻开展工作，动员群众支援前线，做好坚壁清野和粮食贮存。一开始群众情绪也还安定，军民斗志都很高昂，还有不少人来参军。以后环境就艰苦了。文工队有一些小演员还不够十岁，行军打仗很困难。但是，刘伯坚很关心他们，总舍不得把他们丢下。他说这些小鬼在部队上既可得到锻炼，又能得到保护，丢给地方危险性更大。于是孩子们走不动时战士们就轮流背着他们走，没有让一个孩子掉队。

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几个月后，由于当时苏区主要负责人项英不接受陈毅等的建议，不改变斗争方式，不肯分散作战，致使在敌人的围攻下，苏区和留下坚持斗争的部队进一步遭到严重损失。苏区越来越小，斗争越来越艰苦。直到一九三五年二月，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和赣南省级机关、部队，在仁风地区陷入敌人重围，才不得不采纳陈毅等的建议，实行分路突

围，但时机已经错过。

刘伯坚在接到分路突围的命令后，立刻组织地方干部和群众建立游击队，由县长兼游击大队长，区长兼游击队长，各乡普遍组织游击小组，儿童团也分配了具体的任务。男女老幼动员起来，武装保卫家乡。二月中旬开始，军政机关、部队开始分五路突围，刘伯坚随后一批行动。三月三日午后，最后突围的机关部队出发了，准备突围后向粤赣边游击根据地转移。当时的领导分工是：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和少共书记陈丕显率领前卫部队先突围，省委书记阮啸仙和刘伯坚在后随机前进。这次突围战斗打得艰苦激烈。由于敌众我寡，苦战了一天一夜，蔡会文等同志与一部分部队冲出了重围，阮啸仙壮烈牺牲。三月四日的上午，刘伯坚在战斗中身中数弹，左腿负伤，不幸落入敌人魔掌。

刘伯坚先被押在信丰（原登贤县）国民党广东军阀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此前，蒋介石为了一网打尽我党留下坚持斗争的军政领导，曾以五万光洋悬赏缉拿在案，并将陈毅、刘伯坚等的照片发至官兵手中。因此，刘伯坚被俘后，立即被敌人认出身份。敌团长劝刘伯坚要顺应“潮流”，“识时务者为俊杰”；说什么以他这样的才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他暂时办个脱党手续，便可得到“自由”和“重用”，不必去为共产主义犯这么大危险，作“无谓的牺牲”。刘伯坚大义凛然地向敌团长阐述了当时国内外的革命形势和一个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他说：“我干革命就是顺应历史潮流，要干革命就得犯危险。没有危险就没有革命，没有牺牲就没有工农大众的解放……！”这个粤军团长后来对人说：“刘伯坚这个人，真不愧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刘伯坚

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劝降活动后，三月九日被解往粤军第一军军部大庾（今大余县），囚禁在大庾监狱。

刘伯坚在大庾监狱和绥署候审室关押了十二天。在这短短的十二天铁窗生活中，他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并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气吞山河、光照日月的珍贵遗墨。这些遗墨是“西安事变”时，刘伯坚夫人王叔振的嫂嫂凤笙，将刘虎生与这些遗墨一并送交给周恩来保留下来的。六十年代周恩来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向外宾介绍这些遗墨时，曾说：“这些遗作，是我们党在战争年代里流血牺牲的烈士给他的亲人的最完整的遗书。”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一日，敌人将刘伯坚由大庾县监狱移到绥靖公署候审室。在移狱的路上，敌人故意押着带镣的刘伯坚从一条繁华的大街——青菜街（现名建国路）走过，企图借此显示反共战功，威吓群众，并从精神上瓦解刘伯坚的斗志。刘伯坚正气凛然的接受了敌人的挑战。他镇静自若，气宇轩昂地拖着沉重的脚镣，昂起不屈的头，从容地走过大街。他双目如剑，刺穿了色厉内荏的敌人的心窝；他环顾道旁，向含泪伫立的乡亲们深情的致意。他那首脍炙人口的抒怀诗《带镣行》，忠实地记录了这次转监途中的情景，诗曰：

带镣长街行 踽踽复踽踽
市人争瞩目 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 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 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 志气愈轩昂
拚作阶下囚 工农齐解放

当天，敌人对刘伯坚进行了审讯。下面，是从敌人档案里查到的这次审讯的记录：

问：你为什么加入共产党？

答：我看你们国民党毫无治国救民的办法，故加入共产党，致力于土地革命。

问：你们共产党有办法，为什么弄得现在一败涂地？

答：胜败乃兵家常事，古人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革命火种不熄，燎原之火必然将漫天燃起。

问：你们的野战军西奔川黔的意图是什么？

答：此次红军野战军出动川黔之意图是，要扩大苏维埃运动到全国范围去，建立苏维埃更大的新根据地。同时，号召和团结千百万群众实行民族革命战争。

铿锵壮语，跃然纸上。刘伯坚把敌人的法庭变成了宣传抗日救国的讲坛。敌人惧怕真理声音的传播，审讯往往无法进行下去，只好中途停止。他们把我党被俘的同志押送到庭，逼刘伯坚供认。刘伯坚的回答总是一句话：“我不认识他。”因此，许多同志被当成普通战士和群众给释放了。

刘伯坚不仅是一个坚强勇敢的共产主义战士，同时也是一个才华洋溢的革命诗人。三月十三日清晨，他写下这首满怀激情的长诗《移狱》，充分揭穿了敌人监狱的黑暗，抒发了自己对祖国的热爱和对革命战友的思念之情。

大庾狱中将两日 移来绥署候审室

室长八尺宽四尺	一榻填满剩门隙
五副脚镣响银铛	匍匐膝行上下床
狱门咫尺隔万里	守者持枪长相望
狱中静寂日如年	囚伴等吃饭两餐
都说欲睡睡不得	白日睡多夜难眠
檐角瓦雀鸣啾啾	镇日啼跃不肯休
瓦雀生意何盎然	我为中国作禁囚
夜来五人共小被	脚镣颠倒声清脆
饥鼠跳梁声啧啧	门灯如豆生阴翳
夜雨阵阵过瓦檐	风送计可到梅关
南国春事不须问	万里芳信无由传

大庾县附近的梅岭和梅关，是赣粤边的一个游击区，陈毅等突围就是要到那一带去。刘伯坚在狱中所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安危和荣辱，而是突围的战友是否胜利地到达梅关，重新打起了革命的红旗；长征远去的战友，是否一路顺利？三月十九日夜，月明风清，牢门深锁，狱中只透进一抹苍白的月色。面对着这月色，刘伯坚想起自己再不能与突围到梅关的同志们会合一起并肩战斗了。他慨然命笔，写了一首七绝《狱中月夜》，诗曰：

空负梅关团圆月	囚门深锁窥不得
夜半皎皎上东墙	反映铁窗皆虚白

刘伯坚被捕后自知定死无疑，在狱中连续写了几封感人肺腑的家书，谆谆嘱咐亲人要继承他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

充分表达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的革命情操和坚定的信念。

第一封信是一九三五年三月初，被俘不久发出的，并附有绝命词及给孩子们遗嘱。可惜这份有价值的历史文献没有保留下来。

第二封信是三月十六日写的，全文如下：

笙大嫂并转五六诸兄嫂：

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信、绝命词及给虎豹熊诸幼儿的遗嘱，由大庾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弟不意尚在人间，被押在大庾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

现有两事须要告诉你们，请注意！

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恸异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须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珊兄来营救我，于、邓虽然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叔振在沪时还承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须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须要把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至要至嘱（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

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芷溪黄荫胡家，豹

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雩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支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二十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五十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贱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照娣，他们一家人都很爱豹儿，故我寄交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着还不致于饿死。

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

诸儿受高小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作工，非到有自给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

叔振仍在闽，已两月余不通信了，祝诸兄嫂近好！

弟 伯坚

三月十六于江西大庾

由这封信中可以看到，刘伯坚为了维护党的声誉，希望亲友们不要把他被捕的事，告诉某些国民党上层人士、原西北军高级将领冯玉祥、于右任、邓宝珊等人，更不要找他们来营救，这集中反映了刘伯坚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的性格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的崇高品质。

三月二十一日，敌人终于对刘伯坚下毒手了，临刑前敌人

问他还有什么后事要办。刘伯坚说：“有！第一，我要写封家信，交代我的子孙后代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第二，我死之后要把我葬在梅关。”“为什么要葬在梅关？”“葬在梅关站得高望得远，使我死后也能看到革命的烈火到处燃烧！”敌人摇头叹气道：“刘伯坚这个人，死到临头还这么硬。”只好给了他纸和笔，刘伯坚写下了临刑前这两封动人心魄的家书。一封是给凤笙大嫂的：

凤笙大嫂并转五六诸兄嫂：

弟于三月四日在江西信丰县唐村被粤军俘虏，押解大庾粤军第一军部，三月二十二日要在大庾〔被〕牺牲了。

弟在唐村被俘时，就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族）解放流血，曾有遗嘱及绝命词寄给你们，不知收到没有？

弟为中国革命牺牲毫无遗憾，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弟的热血不是空流了的。

虎、豹、熊三幼儿将来的教养，全赖诸兄嫂。豹儿在江西，今年阳历二月间寄养到江西瑞金武阳围的船户赖宏达（四五十岁）老板，他的船经常往来于瑞金、会昌、零都、赣州之间，他的老板娘名叫郭贱姑，媳妇名叫梁照娣，儿子三十岁左右，名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另有吉安人罗高，二十四五岁随行，是个裁缝，罗高很忠实很爱豹儿，他无论如何都同豹儿一起，你们在今年内可派人去找，伙食费只能维持四五个月。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连城属之新泉区芷溪乡黄荫胡家中，黄业中药铺，其弟已为革命牺牲，弟媳名菊满，扶养熊儿，称熊儿为子，爱

如己出，因他无子。

熊豹两儿均请设法收回教养。

诸幼儿在十八岁前可受学校教育，十八岁后即入工厂作工为工人。他们结婚更不要早，迟至三十岁左右再结婚亦不迟，以免早婚多儿女累，不能成就事业。

最重要的，诸儿要继续我的志向，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事业。

这封信须要给叔振同志一阅，她可能已到沪了。

此 致

最后的亲爱的敬礼

弟 刘伯坚

三月二十日^①于大庾

我已要求粤军枪毙我后葬在大庾梅关附近。

刘伯坚就义前的第二封信是给他夫人王叔振的，要求凤笙大嫂转交。

叔振同志：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凤笙大嫂及五六诸兄嫂。

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事业。

^①刘伯坚牺牲的日期是1935年3月21日。这封信和下面一封给王叔振的信所写的“3月20日”，可能是烈士临刑前记错了日子。

我葬在大庾梅关附近。

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革命的敬礼

刘 伯 坚

三月二十日于大庾

由现在还保存的原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信件，文笔流畅，字迹潇洒，正气凛然。正如我们访问宋任穷时他所指出的：“刘伯坚这个人真了不起，快要上杀场了，还是那样镇定自若的写家书，信上的字迹和笔划，跟平时工作时的字迹和笔划一模一样，一点都没有变。”这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高风亮节。

信写完了，刘伯坚昂起不屈的头，拖着沉重的铁镣走向监狱大门。大街上挤满了围观的群众。当时在大庾“莫同珍饭店”当伙计的谢松林奉命给刘伯坚送就义前的“长生饭”和“永别酒”，目睹了这壮烈的一幕。他追忆说：刘伯坚趁跨上囚车的机会，面向群众昂首高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人群震动，反动派惊慌万状，急忙开动囚车奔赴刑场。

刘伯坚英勇地牺牲了，他毕生致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将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刘伯坚的一生，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一生。作为一个无私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刘伯坚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里！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访问刘伯承、聂荣臻、宋任穷、何长工、黄镇、曾涌泉、秦德君、袁血卒、方仲如、刘贯一、石联星、曾三、谢有才、苏进、夏时硕以及烈士原籍亲属的谈话纪录。
2. 四川《支部生活》和江西大余县刊登、编写的《刘伯坚传》。
3. 张洪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1980年8月22日《人民日报》。
4. 冯玉祥：《我的生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 李可牧、何新宇：《荆卿豪气渐离情——马列主义在宁夏的最早传播者刘伯坚烈士》。
6.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7. 袁血卒：《红五军团诞生》，《星火燎原》（选编之二），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
8. 袁血卒：《撤出中央根据地以后》，《星火燎原》1980年第1辑。
9. 李毅：《宁都起义的经过》，《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0. 谢松林：《回忆刘伯坚烈士就义情况》（手稿）。
11. 国民党驻赣第六绥靖区公报：《死刑执行枪决经过附判决书请核备文》（复制件）。
12. 上海《申报》有关报道。

杨靖宇

陈瑞云 张留学
王保源

学生年代

杨靖宇原姓马，名尚德，又名顺清，字骥生。杨靖宇、张贯一、乃超等名字，都是他在东北工作期间用的化名或笔名。

一九〇五年二月十三日^①，杨靖宇生于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一个农民家庭。五岁丧父，七岁时，依靠叔父的帮助，进入本村一所私塾读书。他懂得读书机会的难得，入学后，勤学苦读。十二岁时，投考高小未被录取，因而更加勤奋、刻苦自学，第二年，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确山县第一高小。杨靖宇学习认真，注意学习方法。他曾撰写《与友人论修学方法书》，说“学问之道，理深义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故要“详细考察”，“不耻下问”，才能取得好成绩。

随着年龄和学识的增长，杨靖宇对社会的不平产生了反抗情绪。杨靖宇在高小读书的第二年，县教育局一个职员丢了几件衣服，诬赖高小的伙夫老李头偷去，勾结兵差到学校把老李头

^①关于杨靖宇的出生日期，有2月16日、2月26日之说。据杨靖宇
婶母说，他是“阴历正月初十生”，即阳历2月13日。

吊在树上，一边逼问，一边拷打。老李头边哭边喊冤。大家看见了都很生气。杨靖宇不顾一切，挺身而出，质问兵差：“你们太无理，仗势欺人。说偷了你们的东西有啥证据？”兵差们不理，继续拷打。杨靖宇对小伙伴们说：“咱们不能让这些坏东西作威作福，冤枉好人，不如大家起来把他们赶出去！”同学们一拥而上，把兵差赶跑了。晚上，一伙兵差前来报复。杨靖宇拿着一盒火柴爬到教室的屋梁上，警告兵差说：“你们赶快离开，否则我就点火烧房子，那时你们就别想找便宜了。”兵差们怕事情闹大了，无法收场，只好撤走了。老师很为杨靖宇担心。杨靖宇却镇静地对老师说：“我这是主持公道，出了啥事我自己承担。”^①学校初时怕得罪教育局，声言要开除杨靖宇。杨靖宇据理力争，学校也就不了了之。

一九一九年的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掀起了大规模的爱国运动。确山县城的学生也纷纷响应举行罢课，开展一系列爱国活动。杨靖宇率领十几名同学上街贴标语，发表演说，检查和焚毁日货。通过这场爱国斗争，使杨靖宇的思想认识有很大提高。他撰写了一篇题为《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的文章，抒发了自己忧国忧民的心情。文中通过描写一个到处流浪，无家可归的老人的遭遇，揭露了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他愤然写道：“烽火连天，战声交耳，穷兵黩武之风，莫此为甚”，“万民感受其荼苦”，“长此不息，则中国土崩瓦解之祸不远矣！”

一九二三年秋，杨靖宇考入开封纺织工业学校。入学考试时，他写了一篇关于“劳工神圣”的作文，深得主考老师的赏

^①参见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编：《杨靖宇将军的家庭情况与童年学生时代》（1951年8月24日），王祖善的回忆，均系未刊稿。

识，录取时名列前茅。

开封不但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著名古都，而且是当时河南省政治、文化中心。在这里，杨靖宇有机会游览名胜古迹。校园内宋代古迹点将台和藏兵洞，也深深地吸引着他。据传说，杨家将和岳飞曾先后在此点将调兵，抗击异族入侵中原。杨靖宇经常会同友人登台，畅谈古今，朗诵古人名诗。杨靖宇最欣赏的诗词是岳飞的《满江红》和于谦的《石灰吟》，经常背诵，借以鞭策自己。他壮志满怀，常常表露出要作保卫祖国的“民族新英雄”的远大抱负^①。

杨靖宇在校学习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已经秘密地在学校开展工作，发展组织。杨靖宇经常接近贺光吾、杨清庵（共产党员）等思想进步的教师，向他们求教自然科学以及社会革命的道理，寻求救国之道。平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向导》等刊物以及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受到很大教益，开拓了眼界。

一九二五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消息传来，开封全市沸腾。六月一日清晨，开封大中学校师生在公共运动场集会，示威游行，高呼：“取消外国领事裁判权”、“收回租界”、“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惩办杀人凶手”等口号。各校学生还走上街头，检查英货，向群众宣传反帝爱国思想。杨靖宇也参加了这些活动。他在南关通向火车站的街口上，用洪亮的声音进行演讲：“我们再不能这样忍受下去了，我们再不能任凭那些帝国主义刽子手们任意枪杀和逮捕我们的同

^①姚建宇：《回忆杨靖宇将军》（未刊稿）。

胞”，“我们祖国的土地还在遭受着野兽们的践踏……起来吧，同胞们！全中国人民都站起来，举起铁拳，拯救我们的祖国，拯救自己的命运。”^①他的慷慨激昂的讲演，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群众，人群中不断地发出：“收回租界！”“打倒帝国主义！”的吼声。

杨靖宇经过一系列革命斗争的锻炼，思想觉悟一天天提高。他立志走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革命道路。一九二五年的秋天，他参加了河南共青团外围组织青年协社。“杨靖宇对于组织非常爱护，并能积极学习马列主义和努力宣传新文化”^②。一九二六年暑期开学后，他由张耀昶、姚建宇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确山农民武装斗争的先驱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十月占领武昌，十一月逼近河南信阳。河南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当湖南、湖北被国民革命军占领之后，河南便成了北洋军阀统治的南部屏障。于是，北洋军阀政府急调奉鲁军南下，集结在郑、汴一带，以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上。军阀武装还勾结土豪劣绅，疯狂地镇压河南人民的革命运动，阻止革命人民响应北伐军。

与此同时，中共河南省委积极组织力量到各地去开展工农革命运动，准备配合和迎接北伐军进军河南。一九二六年深冬，杨靖宇接受党的派遣，和同学张耀昶一起，离开开封，回到家乡确山从事农民运动。

^①郭肇庆：《杨靖宇将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②姚建宇：《回忆杨靖宇将军》（未刊稿）。

当时，确山驻扎着军阀武装魏益山第八军的一个旅，旅长李荣亨。这支军阀武装勾结确山的魏承典、楚本固、何鸣一、田裴卿等“四大劣绅”，镇压革命，残害人民。他们拉伕派差，滥印纸券，滥发捐条，还强行“预借”公粮十年。确山农民忍无可忍，纷纷组织起红枪会、绿枪会、黄枪会等组织，力图反抗。

杨靖宇回到确山时，中共驻马店（属确山县）特别支部已经成立，张家铎任书记。杨靖宇在特支领导下，深入驻马店、洪沟庙一带发动农民抗捐，组织农民协会。到一九二七年初，确山全县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一万余人。二月十五日，由张家铎和杨靖宇主持，召开了全县第一次农民协会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农民协会组织章程，提出了农民协会的三项战斗任务：团结广大农民，维护农民利益；推翻封建军阀统治，打倒土豪劣绅；支持北伐军。会议选举杨靖宇为县农民协会会长。

为了实现农民协会的战斗任务，杨靖宇努力筹建农民武装。当时，农民们只有大刀长矛，没有新式枪支。有一天，杨靖宇买了些花生，到八里叉找到军阀部队一个士兵，请他教操法。杨靖宇扛着那个士兵的枪在前面走，士兵边吃花生边在后面喊口令：“一、二、一”。杨靖宇快到城门时，士兵下令：“向后转！”杨靖宇说：“朋友，我不向后转，要回家了。”说着，扛枪跑出城门。士兵在后面追，追到城外，杨靖宇掏出两块银元放在地上，说：“这是你的路费，拿着回家吧！”士兵拾起银元，径直往回家的路上走去。杨靖宇得到的这支枪，就是确山农民武装的第一支枪^①。此后，通过打击土豪劣绅，

^①孔繁性：《回忆大革命时期的确山农民运动》（未刊稿）。

筹集经费，又买了一批枪支弹药。这样，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确山农军渐渐武装起来了。

三月中旬，由张家铎主持，在县城召开确山县农民亮牌（即示威）大会预备会议。杨靖宇、张耀昶、王泽显、李则青等人出席了会议。会上决定以打倒“四大劣绅”为斗争的直接目标。

四月四日（农历三月初三），举行全县农民“亮牌”大会。确山城外东大操场上，竖起第一面镶嵌着犁头图案的大红旗。三万多农民，手持武器，高举红旗，从四面八方走来。农民协会领导人杨靖宇，身着粗布短衫，手提大刀，英姿勃勃地出现在农军的行列里。在方圆五、六里地的会场上，红旗招展，“打倒四大劣绅！”“取消苛捐杂税！”口号声震天动地。

确山农民“亮牌”日期，正选在军阀旅长率主力开往信阳，“留确营底薄弱”^①之际。留守军阀部队慑于农军威力，不敢驻在城外，连守车站的一连人也龟缩到城内去了。

“亮牌”大会时，县长王少渠被迫来到会场，听取并回答农民协会的要求。杨靖宇代表农民协会在会上作报告，历数“四大劣绅”、反动军阀的罪行，强烈要求王少渠交出“四大劣绅”；并提出清算帐目，免除苛捐杂税，打倒贪官污吏，反对拉伕派差，释放狱中关押的穷苦农民等十余项具体要求。他的讲话，博得了全场农民的热烈拥护。与会群众一致要求王少渠当面回答上述要求。王少渠避而不答，并企图借故逃走。杨靖宇当众戳穿他的阴谋，高声问群众：“县长不答应我们的条

^① 《确山县志》第3册，1929年内部铅印本。

件，能放他走吗？”群众立即蜂拥而上，把王少渠团团围住，并捣毁了他的轿子。王少渠被农军押送到铁路西的火神庙内（“亮牌”指挥部所在地），被迫表示全部接受各项条件，交出“四大劣绅”。

但是，老奸巨猾的王少渠回到城里，却放跑了“四大劣绅”，并关闭城门，严密布防。王少渠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农军的极大愤慨，个个摩拳擦掌，要求攻打县城。

在杨靖宇和张家铎等共同组织指挥下，当晚，农军开始攻城。农军先控制了火车站，割断电线，截住南来北往的列车，切断了敌人的增援线，并把整个确山城围得水泄不通。接着，用九节雷、土炮猛烈轰城。次日，汝南、遂平、信阳等地农军闻讯纷纷前来增援。顿时，声势大增，围城农军号称十万。各乡农民做了蒸馍、烙饼等食物，送往前线，慰劳农军。

确山守敌招架不住，请求与农军谈判，作为缓兵之计。杨靖宇等洞察其奸，坚决攻城。四月八日夜，大部分守敌趁天黑雾大，弃城西逃。农军攻进城内，消灭军阀部队二百余人，镇压了一些土豪劣绅，活捉了王少渠，并抄了“四大劣绅”的家产。九日黎明，一面犁头大红旗插上了确山城。

确山农民暴动是在党领导下，河南最早的一次农民暴动。暴动成功后，确山党组织派代表去柳林镇迎接北伐军进确山城。武汉政府特派员于树德（共产党员）接见了确山代表，代表武汉政府赠给确山“革命先锋”红缎锦旗一面。

四月底，于树德到确山主持召开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七人组成的县临时维持治安委员会，杨靖宇为委员。县临时维持治安委员会接管了县政权，向全县宣布没收“四大劣绅”的全部财产，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免征公粮，开仓赈济灾

民；全部释放在押的贫苦农民。在确山人民欢庆胜利的日子里，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由李则青介绍，杨靖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各地反动势力抬头。七月初，确山反动的地主武装勾结军阀势力卷土重来，向确山革命力量反扑。农军在杨靖宇等指挥下，英勇抵抗，给敌人以打击。但因敌众我寡，为保存力量，农军于七月四日下午全部撤出县城，深入刘店、洪沟庙一带农村，坚持革命斗争。

一九二七年七月，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中共确山县委（书记张家铎）根据“八七会议”精神，整顿了农军，准备举行刘店秋收暴动。十月二十四日晚，杨靖宇在刘店以北的吴庄召开了由五百多农民协会会员参加的秋收暴动预备会议，对暴动作了周密而具体的安排。

刘店秋收暴动于十月二十六日拂晓开始。暴动打击的主要目标是以大恶霸、还乡团头子李广化为首的地方民团。杨靖宇率领农军占领了刘店敌人的岗楼，包围了李广化的住宅。战斗仅进行了一个小时便胜利结束。李广化逃走，少数顽固分子被打死，其余民团缴枪投降。

次日，中共确山县委在刘店举行扩大会议，正式建立确山农民革命军（后改名为豫南工农红军游击大队，以下总称红军游击队），杨靖宇任总指挥，李鸣歧任党代表。

刘店秋收暴动和红军游击队的诞生，大长了豫南人民的志气，也引起了敌人的仇恨和震惊。驻确山的军阀张德枢旅，派遣千余人的兵力对刘店进行反革命“围剿”。杨靖宇、李鸣歧

等选择有利地形，伏击来攻之敌，然后转移，南下留庄、独山、明港、张板桥一带，扩大游击战争，相继消灭了李文相、戴文甫两支地主武装，除掉了罪大恶极的确山民团头子周宪斌、任店恶霸徐二头、新安店恶霸武二毛、李新店恶霸杨静修、刘庄恶霸刘元泰，刘店恶霸李广化、张振东等。红军游击队所到之处，开仓放粮，救济贫民，人心为之大振。

此时红军游击活动区以刘店为中心，南至确山县张板桥、杨店和信阳县境的明港；北迄水屯、洪沟庙；东接汝南边境的马乡、大申庄；西达周庄，方圆数百里。红军发展到四个中队、二百多支枪；地方赤卫队亦发展到一万余人。

十一月初，确山县委在张板桥召开县委扩大会议，研究革命进一步发展问题。会议通过决议指出：“必须找一个形势好，可占可守的根据地作为经常斗争的中心”；“必须设法与信阳四望山打通一条直接联系的道路。”^①这个决议表明，杨靖宇及县委其他领导同志已经初步具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要求。

十二月上旬，河南省反动政府、河南“剿匪”总司令部命令确山县长高子元、驻确山军阀旅长张德枢，限三日内“肃清”红军游击队。高、张等人调集反动武装共一千五百多人，向红军游击区进行猖狂“围剿”。红军游击队正在汝南王楼一带活动，突然遭受敌人袭击，而且敌五倍于我，形势十分紧急。杨靖宇、李鸣岐、张家铎等沉着地指挥红军游击队进行反击。他们身先士卒，整日不离前沿阵地。战士们英勇奋战，终于打退了来犯之敌。杨靖宇在战斗中负伤，被送往驻马店普济医院治

^①确山县委1927年11月的会议决议，原件存河南省档案馆。

疗。

王楼战斗后，红军游击队在李鸣歧、张家铎率领下转移至小乐山，进行整顿。不久，部队与王伯鲁领导的信阳工农革命军会合，于冯家庄合编为豫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张振纲（绰号张胡子）任总队长，李鸣歧任政委。豫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是鄂豫皖工农红军的先驱部队之一。尔后，挺进四望山，开辟了四望山游击根据地。

奔赴东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一九二八年春，杨靖宇受伤尚未痊愈，就到确山、信阳等地工作。不久，党调他去河南开封、洛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其间他曾三次被捕。脱险后，一九二八年底，党组织派他去上海党中央学习。

杨靖宇最后一次离别家乡李湾村，是一九二八年四月。他十七岁时就结了婚，这时已有一子一女，子马崇云，女马锦云。他走后不久，家被国民党反动派抄了。杨靖宇的妻子郭莲带着两个孩子，无依无靠，生活十分艰难，自己耕种二、三亩地，不能糊口，每年都得向亲友讨借。在这种动荡不安和贫病交加的生活折磨下，杨靖宇的老母亲和妻子先后死去。

一九二九年春，杨靖宇调到东北工作。他乍到东北，人地两生，开展工作遇到很多困难。中共满洲省委派他去抚顺担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抚顺是东北四个主要工业中心之一。抚顺煤矿及其附属企业都控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手里。一九二八年，抚顺党组织被破坏。他接受任务后，改名张贯一，立即深入抚顺煤矿，在工人中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会的工

作。他善于联系群众，没有多久就和许多矿工交上了朋友。抚顺矿工中山东人居多。杨靖宇自报是山东省曹州府曹县李庄人。矿工们觉得他为人耿直老实，主持正义，都亲切地叫他“山东张”，把他当作自家人、“主心骨”，家里没有米下锅找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找他。大家都愿意听听他的意见。

有一天，一个矿工含着眼泪找“山东张”，说被无理裁减，请他帮忙。杨靖宇一面安慰他，一面召集几个工人商量，决定举行一次反对无理裁减工人的罢工。他对大家说：“我们工人的力量大，不能小瞧自己。我们每天刨出来的煤，日本鬼子用它来开工厂、造机器，否则鬼子的火车、轮船都寸步难行。那些把头、大肚子是刨不了煤的。我们矿工这两只手是能够卡住日本鬼子的命根子的。”矿工们听了，心里亮堂堂的，说：“老张，你指挥吧，我们以后听你的！”^①

杨靖宇在罢工前做了一系列细致的安排。罢工以当天十二点钟所鸣汽笛为开始的信号，汽笛一响，煤道上车斗横躺竖卧，道岔子被工人扳上了死线。矿工们成群结队地奔向矿务局办公的地方，要求答应将裁减的工人找回来作工；不准加班加点；增加工资等等。当天，煤矿当局拒不答复。工人们继续坚持斗争，集合到矿务局办公的地方不断呼口号。经过多天的斗争，终于迫使煤矿当局接受了工人提出的条件。

在杨靖宇领导下，抚顺工人运动恢复得很快。据当时日本人调查记载：一九二八年，共产党在东北连续遭受镇压，几乎没有活动的余地。一九二九年，共产党的活动“又始抬头”，抚顺、沈阳发现有共产党员散发传单事件；六月抚顺窑业会社

^①参见《松柏常青》，吉林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罢工，参加者一百九十人，继续十一天；十二月，抚顺煤矿机械厂罢工，二百零六人参加，为时一天^①。

杨靖宇在领导工人运动过程中，积累了一套经验，他在向满洲省委报告工作时说：“在白区作工人运动，不能在工人之外，必须职业化在工人之中，和工人同寝，同食，同做，同息，才能很好的了解工人要求，领导工人斗争，组织与教育工人，自己也才能得到最好的掩护。”^②

抚顺工人斗争的发展，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注意，他们认为共产党要以抚顺为“赤化”整个东北的基地，于是急忙出动警察、特务，到处侦察，搜捕。八月下旬，抚顺党组织被破坏。三十日杨靖宇被捕。由于叛徒出卖，日本特务断定他是“头目”^③，对他施以酷刑，灌辣椒水，灌煤油，灌马尿，上大挂，坐老虎凳，一连折磨了五、六个昼夜。杨靖宇始终不泄露党组织机密，冷静、沉着地应付敌人使用的各种伎俩。叛徒当面对质，他拒不相认；敌人摆出从他住处查出的文件等物，他说那是别人给他送药时丢下的，他原不知是些什么东西。他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十月七日，抚顺日本警察署以“治安维持法违反犯”罪名，将杨靖宇引渡给抚顺中国法院。中国法院审讯时，杨靖宇以法庭当战场，用自己被日本警察署刑讯致伤的事实，谴责中国军阀政府不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反而替日本作爪牙，残害自己同胞的罪行。他还质问堂上的法

①译自满铁调查课编：《满蒙要览》，1930年出版；永野贺诚，《满洲事情十六讲》，大连新天地社1930年6月出版。

②杨一辰：《民族英雄模范共产党员——杨靖宇同志》，载《河南日报》1951年7月1日。

③译自《奉天每日新闻》，1929年9月11日。

官：有没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法官们张口结舌，无言可对，后将他解送到沈阳。沈阳军阀当局，判处杨靖宇徒刑一年半。

在狱中，杨靖宇自觉地为党工作，向狱卒、难友宣传革命道理。在他的教育帮助下，一些人先后参加了革命。

一九三一年春，杨靖宇刑满被释放。出狱后，他马上找党组织。当时中共满洲省委机关在沈阳。在省委工作的何成湘接待了他。后来他回忆同杨靖宇这次会面时的情景说：“一天，有一个人来找我，这人瘦高个儿，四方脸。因为衣服的破烂，加上那一头蓬乱的不肯驯服的头发，使人感到生活把这个青年人折磨得不轻。那风尘仆仆的模样象是经过长途跋涉而来的。可是，他那双浓眉下面的大眼，却炯炯有光，这眼光，给人一种坚强不屈的感觉。这就是刚刚从狱中出来的靖宇同志。”“见面后，关于狱中的情况，他只简单地谈了谈，立刻就要求工作”^①。组织上打算派他去哈尔滨工作。可是出狱的第三天，互济会的一位同志被捕，在这位同志的笔记本上有他的住址，因而他又被捕入狱。直到“九·一八”事变后，党用两千元钱买通日本法官，才把他和陈潭秋等一起从监狱里营救出来。

两年多狱中生活的折磨，使杨靖宇的身体极其虚弱，肺部经常疼痛，鼻子不断地流出清水。但他没有考虑自己的健康，出狱后，立即从沈阳到哈尔滨，找到中共满洲省委（省委由沈阳迁到了哈尔滨），要求参加工作。最初党派他担任东北反日总会的领导工作，后来又调任中共哈尔滨道外区委书记。中共哈尔滨市委成立时，他是第一任市委书记，同时又是省委委

^①何成湘：《和杨靖宇同志三次会见》，载《红旗飘飘》第5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员。经过杨靖宇的努力，哈尔滨党组织逐渐发展起来，市内许多工厂、学校、街道，甚至伪警备部队中都成立了党的支部或小组。工会、反日会也有较大发展，他们进行了大量的抗日救国宣传工作，团结了广大群众，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活动。

杨靖宇曾对人说，他上过两个大学，一个是“社会大学”，一个是“监狱大学”。在四年多的白区工作中，五次被捕坐牢，使杨靖宇经受了严峻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从而在政治上更加成熟，更加坚强起来。

组建南满抗日武装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党中央任命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罗登贤兼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指示满洲省委派共产党员到农村、到抗日部队去发动和组织抗日游击战争。在党的领导下，相继在南满、东满、北满的一些山区农村中发动农民建立了游击队。一部分东北军的爱国官兵，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的感召和影响，公然违抗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组成义勇军，对日作战。一九三二年，东北各种抗日武装风起云涌，参加人数达三十余万。

为了适应抗日武装斗争的新形势，中共满洲省委先后调杨林、杨佐青、周保中等得力干部主持省委军委的工作。一九三二年四月初，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周保中去吉林东部工作，由杨靖宇代军委书记职务。

十一月间，杨靖宇以省委代表身份，赴南满伊通、盘石、桦甸、海龙、金川、双阳各地巡视工作，整顿各县党组织，游击队和反日会等。

盘石游击队是党在东北最早创建的抗日武装之一。盘石是朝、汉民族杂居地区。中共盘石中心县委（领导盘石、双阳、伊通、东丰、海龙、辉南、桦甸等县和吉林市党组织）于“九·一八”事变后，在这里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建立了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反日会等群众组织，还建立了一支小规模抗日武装，叫“打狗队”。“打狗队”队长是朝鲜族抗日英雄李红光。满洲省委很重视盘石人民的抗日斗争，一九三二年初，派杨佐青到盘石，以“打狗队”为基础，进一步扩大武装力量，建立了“工农反日游击队”，即盘石游击队。在蛤蟆河子还有一小块抗日根据地。这支游击队诞生不久，遭受日伪军和汉奸地主武装的不断袭击和破坏，损失较大，盘石中心县委书记全光及其他主要领导干部因而产生动摇情绪，以“游击队无法独立活动”为借口，取消了游击队原来的名称，把队伍并入了报号“常占”的山林队^①。中心县委的干部也跑到部队里去，放弃了党的全面工作，实际上放弃了党的领导。后“常占”头目图谋反叛，原中心县委的干部又拉出一百二十人，组成一支队伍，报山头字号“五洋”，打算经桦甸去东满，环境再恶化就去苏联避难。满洲省委派杨靖宇去盘石巡视，实际上是为了加强党对盘石一带抗日斗争的领导。

杨靖宇先到了吉林市，了解了这里党的工作情况。他认为吉林市党支部隶属于盘石中心县委，既不利于吉林市党的工作开展，也不便于城市工作对农村抗日武装斗争的配合。他向省委建议，把吉林市党支部改为特支，由省委直接领导；并指示

^①山林队，当地人民称之为“胡子”，多数由贫苦破产农民组成。东北沦陷后，多数山林队进行过程度不同的抗日斗争。

吉林市特支要注意大力配合盘石游击队的斗争。

十二月，杨靖宇到了盘石。他领导召开了县党员代表大会。会上，纠正了原中心县委上述错误，整顿和改组了中心县委领导机构，恢复了党的正常工作。之后，他又整建了吉海（吉林至海龙）铁路工人的党组织和工会、反日会组织，使工人的反日斗争迅速发展起来。

杨靖宇来到了正处于动荡与涣散状况的盘石游击队。他召开各种会议，并逐个地找党团员谈心，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教育大家要树立信心，坚持战斗，克服悲观和逃跑主义思想。在大多数人赞成的情况下，取消了山头字号，整顿了游击队，正式命名这支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孟洁民为总队长，王兆兰为副总队长，初相臣为政委，李红光为参谋长。

当时，这支队伍在桦甸县境蜜蜂顶子一带活动。为了把他们带回到群众基础好的盘石、伊通地区去，建立根据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杨靖宇又在干部战士中耐心地进行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教育。一次，他指着灯对大队长李文成说：“你看这盏灯，没有碗就盛不住油，光有碗没有油，灯就点不着。咱们的游击队还不是这样？没有根据地就象没有家。我们是盘石的子弟兵，在那里土生土长，那里山深林密，便于建立根据地，我们为什么要远离盘石，做没有油的灯芯？”^①

经过杨靖宇耐心说服，大家意见渐渐一致。很快，游击队便回到盘石、伊通地区了。

盘石工作有了头绪，杨靖宇又去海龙巡视，整顿了海龙县

^①参见《松柏常青》，吉林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委和游击队，把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七军海龙游击队。

一九三三年初，由于南满游击队的主要领导干部相继牺牲，一时无人接任，杨靖宇暂时担任了政治委员。春节前夕，杨靖宇率队攻打蛤蟆河子地主武装，缴获了几十支枪，逮捕了五个恶霸地主，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和粮食、财产，分给贫苦农民。之后，又在老爷岭截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铁甲车。二月至五月，日伪前后四次“讨伐”南满游击队，每次出动武装部队五千左右。南满游击队在杨靖宇指挥下，英勇奋战，不仅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而且扩大了队伍，全队人数达到二百五十余人，还建立了以红石砬子为中心、方圆数十里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根据地里普遍建立了农会、自卫队、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农民群众积极参军参战，以人力、物力支援南满游击队。他们说：红军是真正救国救民的军队，只有拥护红军，才能把日本鬼子打出去。

由于杨靖宇的正确领导和辛勤努力，盘石游击队终于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盘石党和地方群众工作的面貌也焕然一新。这样，在南满地区进一步联合各种抗日武装力量，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就有了良好的基础。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来《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以下简称《一·二六指示信》），要求在东北建立党领导下的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要求以党领导的游击队为骨干，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共同进行抗日斗争。三月间，满洲省委接到了《一·二六指示信》，决定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统一干部思想，实行策略上的转变。省委通知杨靖宇回哈尔滨参加讨论贯彻《一·二六指示信》的会议。五

月，杨靖宇回到哈尔滨，住在省委工作人员姜椿芳家里。姜家有老人，便于掩护，会议也是在姜家开的。会议分析了东北各种抗日武装的性质和动向，决定根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联合一切抗日武装力量，联合各民族、各阶层群众，争取伪满士兵，共同进行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为了便于各阶层的人们理解和接受，会议还决定将红军名称改为人民革命军。会议期间杨靖宇向省委汇报了南满形势及抗日游击战争情况，还利用会议空闲时间贪婪地阅读各种报纸和书籍，弥补半年来紧张的戎马生活所带来的欠缺。他很喜欢《国际歌》，但不会唱，就请姜椿芳教。姜椿芳和另一青年同志热情地教他，直到学会为止。

杨靖宇在盘石指导工作期间，受到了盘石游击队干部、战士的衷心拥护和爱戴。一位原盘石游击队的同志后来回忆说：

“杨靖宇受中国共产党的指派，来到我们队伍上。我们初次见着他，就感觉到他是一个庄严的政治家，他的态度很沉静，待人接物和藹可亲，而观察事理又深刻锐敏，因此大家爱戴杨靖宇，推举他为我们的司令员。”^①盘石中心县委请求省委，正式调杨靖宇到盘石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省委批准了县委的请求，派杨靖宇去盘石工作。

杨靖宇又来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八月十五日，他在盘石玻璃河套召开了南满游击区和游击队代表会议，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会后，经过一番筹备，在“九·一八”两周年纪念日那天，以南满游击队、海龙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又称司

^①松五等著、夏行编辑：《东北抗日联军游击实录》，上海杂志公司1937年12月5日出版。

令员) 兼政治委员。全师三百余人。一年以后, 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 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 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全军共一千余人。为了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和军事工作, 一军成立后, 先后颁布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参加人民革命军暂行条例》、《人民革命军士兵优待条例》、《东北人民革命军暂行奖惩条例》、《第一军战斗员作战奖励条例》等。这些条例贯彻执行结果, 对一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的加强和战斗力的提高, 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在一军战斗的南满地区, 有一批自发性质的抗日武装, 其中包括东北军余部、各种名目的抗日军、山林队等, 人数不下一万。这些自发抗日武装, 反对日本侵略者, 进行抗日斗争, 但又缺乏严格的纪律, 常常危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他们从各自的私利出发, 往往互相火并, 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也持某种对立态度。盘石游击队建立之初, 由于政策水平不高, 不善于团结、教育他们, 曾同他们发生过冲突。杨靖宇在盘石巡视期间, 作了一些联合自发抗日武装的工作; 在哈尔滨开完会回到盘石以后, 他又进一步根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 陆续派干部到自发抗日武装部队中去工作, 争取实现南满地区一切抗日武装的联合, 并用部队的实际行动影响他们, 使他们愿意和一军联合抗日。

盘石一带有两支自发抗日的东北军余部。他们自编为旅, 并以旅长的姓氏作为部队称号, 一支叫赵旅, 一支叫马旅。有一次, 赵旅和马旅在玻璃河套北板凳沟地方遭到敌伪靖安军重兵包围。因寡不敌众, 从早晨打到中午, 几次组织突围, 都没成功, 部队损失很大, 处境十分危险。因为过去他们对游击

队不友好，曾想缴游击队的枪支，因而不敢向游击队求援。但杨靖宇不念旧怨，以大局为重，立即组织力量增援他们。当时杨靖宇身边只有两个分队二十多人，只好先派人通过敌人封锁线给赵、马二旅送信，让他们暂时坚持，等待援兵。接着，他把玻璃河套的赤卫队、儿童团等集合起来，连同身边的战士共五十多人，携带步枪、土炮、爆竹等，向敌人后路抄去。敌人正得意忘形，忽听背后漫山遍野响起了“枪声”，一时摸不着头脑，以为对方主力增援部队来了，便转过头来盲目打枪。赵、马二旅乘敌军混乱之际，发起冲锋。敌人腹背挨揍，只好丢下了几十具尸体，狼狈而逃。战斗结束后，赵旅长紧紧握着杨靖宇的手，激动地说：“我非常惭愧，过去很对不起弟兄们，这一回我算知道了谁是我的朋友。以后我姓赵的如果再有三心二意，对不起盘石父老，天理良心不容。”杨靖宇说：“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啦。只要我们能够紧紧地依靠群众，团结起来，枪口一致对外，胜利终归是我们的！”^①后来，杨靖宇和赵、马二旅等联合作战，攻打了盘石大兴川、伊通营城子、吉林七区和呼兰集场等地的敌人，获得很大胜利。

自发性质的抗日武装从实践中对人民革命军了解越来越多，越来越信赖，不仅纷纷前来找杨靖宇接头，表示愿意联合抗日，而且有的要求改编为人民革命军，或要求给他们派政委去，甚至有的打听什么人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四年春，南满地区抗日武装联合的局面已经形成，建立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的条件业已成熟。四月一日，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和其他十六支抗日队伍的领导人举行联合会议。两千

^①郭肇庆：《杨靖宇将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多人民群众高呼“联合抗日”口号，前来欢迎和祝贺。杨靖宇代表满洲省委讲话，他分析了东北的形势，阐明了党的抗日主张，指出：“斗争是长期的，今日联合，万不可遇难而退。”^①各抗日军首领纷纷表示，愿意跟着共产党抗日到底。会上一致通过以《东北人民革命军斗争纲领》为共同纲领，还通过了联合作战条例，成立了南满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会议郑重投票选举总指挥部领导人，杨靖宇被选为总指挥，老常青为副指挥，李红光为参谋长，下属共四千多人，分编为八个支队。

至此，在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和影响下，以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为骨干，南满的各种抗日武装力量基本上联合起来了。

挺 进 江 南

一九三三年冬，杨靖宇率领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主力南跨辉发江（今辉发河），驰向濛江、桦甸、辉南、金川、通化、柳河、清源一带活动，扩大抗日游击区。十月二十七日晚间，杨靖宇率部从黑石过江时，天刚刚下过一场雪，西北风还没停，江面上已结了一层薄冰，渡口没有桥也没有船。杨靖宇带领队伍来到江边，向大家说明了渡江南下，扩大抗日游击区的意义，动员大家鼓起勇气战胜面前渡河的困难，他说：“同志们！江，咱们一定要过去。我们连枪炮都不怕，能叫江水把我们吓住吗？”话毕，他把自己的马让给个子矮小的同志，第一个纵身跳到江里。全军指战员跟着杨靖宇，涉过冰冷刺骨的江

^①韩光：《山河欲裂征马鸣》，载《星火燎原》第4集。

水，继续前进，没有一个掉队的。

江南的人民听说杨靖宇带领队伍过江来了，都忙着杀猪买酒前往慰劳，纷纷请求部队留在当地活动。杨靖宇组织部队到各村开展群众工作。他亲自来到一个叫蛤蟆河的小屯召集群众开会，亲切地对大家说：救国是大家的事，抗日军队打日本当然是救国；你们在家里种地，把剩下的高粱、苞米接济我们，也是救国；我们的衣服破了，大娘大嫂给我们补一补，也是救国；我们需要日用品，大爷们给我们进城去买来，也是救国。我们这个军队只有依靠大家才能救国。我们不怕吃苦，不怕死，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把日本鬼子赶出国境，使大家过好日子。希望不愿做亡国奴的人，都起来帮助我们。群众听后，纷纷表示拥护和响应。

江南人民最恨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邵本良，要求除掉这个祸害。邵本良是个惯匪头子，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团长，残害百姓，无恶不作。“九·一八”以后，更认贼作父，效忠日伪，当上伪东边道（今吉林省通化一带）少将“剿匪”总司令。十一月十五日，一军在赴柳河的途中，就曾遭到邵本良部的袭击，牺牲了四位同志。虽然一军指战员奋起还击，打退了敌军，但此战不足以教训邵本良，也不能够鼓舞抗日军民。

十二月下旬，杨靖宇用调虎离山计，把驻守三源浦的邵本良第六团调出去，敌人在镇里只留下一个连和一个警察队。我军二百多人乘虚而入，击败守敌，捣毁伪铁路工程局和警察署，烧掉伪军营房数十间，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及军装等物资；没收了日伪汉奸走狗的财产，解决了部队冬季给养和群众吃盐问题。

这一仗给盘踞江南的日本侵略者及邵本良当头一棒。江南

人民无比振奋。三源浦是邵本良的重要兵站，梅集线上的重要据点，地势险要，敌人戒备森严。一军打下三源浦后，秋毫不犯，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拥护。商人也高悬红旗，表示欢迎。杨靖宇率队撤离三源浦时，“街里之商户均杀猪设酒买面送给我军以热烈欢送”^①。自此以后，南满地区的人民，更加拥戴和信赖杨靖宇和他领导的人民革命军第一军。

但是，邵本良并不甘心失败，扬言：“一定要叫杨靖宇知道我的厉害！”他勾结日本侵略者调动两千多日军，连同他的全部兵马，在柳河大小荒沟一带形成对杨靖宇部的包围之势。那里的地势险要，易守不易攻，日军山道不熟，不敢轻易往山林深处打。诡计多端的邵本良于是虚发一信，假称东部有他的重兵，又故意让一军抓住他的送信人，把信落在杨靖宇的手里。

杨靖宇看过这封信，经过分析，断定信里所讲情况是假的，是邵本良的一个圈套，企图引我们向西钻进他的口袋里。杨靖宇决定将计就计，也发一封假信件，表明要从西部突围。并让敌人把这一信件得去。及至深夜，杨靖宇领着队伍急行军，向邵本良所谓重兵把守的东部突围而去。次日上午，又向北走三十里，乘虚打下邵本良的后勤基地——金川县凉水河子，缴获许多军用物资。邵本良受我打击后，哀叹：“我邵本良就够鬼的了，可是杨靖宇比我还鬼。”^②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军指挥部住在珍珠门。邵本良带兵前来围攻，杨靖宇立即带着大家上了山。敌人三面包围，利用山上蒿草茂密和春天的干旱，放火烧山。一时浓烟翻滚，烈火冲

^①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小孟关于盘石巡视报告（1934年4月）。

^②据李光回忆资料（未刊稿）。

天。杨靖宇从容不迫，下令就地点火，把跟前的草烧光。等山下的火烧到山上时，柴草已尽，火自然熄灭了。杨靖宇又乘敌人没有防备之机，组织冲锋。敌人乱了阵势，只得仓皇逃走了。

杨靖宇率部挺进江南半年以后，一军成了南满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游击活动区域扩展到二十多个县的范围。在此基础上，逐步在桦甸、辉南、抚松、通化、临江、集安、长白、柳河、濛江、海龙、桓仁各县的山区农村，建立起小块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根据地里，除普遍建立起农会、自卫队、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外，并着手建立区、县和南满特区的人民革命政权。各县党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

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何成湘作为东北地区的代表参加了大会。杨靖宇虽未参加会议，但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同年夏，何成湘从瑞金回来。杨靖宇接满洲省委通知，去哈尔滨听取何成湘关于会议精神及党中央对东北工作指示的传达，并向省委汇报工作。杨靖宇仅在哈尔滨停留了三天，就赶回自己战斗的岗位上。十一月五日，在临江县境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南满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他代表满洲省委作报告，传达了党中央和满洲省委的指示。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南满临时特委，杨靖宇为特委常委。

将近两年的时间，杨靖宇指挥着一军不断和邵本良的伪军作战，部队越战越强，队伍发展到三个师，武器装备大为改善，全军百分之八十换上了三八式步枪；游击区的人民也进一步发动起来了。

一九三五年七月，杨靖宇集中兵力准备歼灭柳河邵部的老七团。当部队开始向柳河调动时，我方的部署被邵本良发现。邵

本良马上从三源浦向柳河增兵。杨靖宇闻讯后当机立断，改变作战方案，留一支小部队佯攻柳河，主力则埋伏在柳河与三源浦之间的黑山嘴。邵本良援救老七团心切，命令二百多人的增援部队直奔柳河，在黑山嘴中了杨靖宇的埋伏，被全部消灭了。

一九三六年初，杨靖宇接到做地方工作的同志几次情报，说敌人要由日本关东军南满少将司令三木亲自指挥，对一军进行“大讨伐”。杨靖宇乃于三月中旬召开军党委员会，研究反“讨伐”方针。这时部队情绪正高，要求狠揍敌人。杨靖宇说：“不光是揍他一顿，还要揍得他再也爬不起来。”鉴于敌人兵力占优势，又急于寻我主力决战的情况，军党委决定采取“走”和“拖”的办法和敌人周旋，待时机成熟时，狠狠地还击。

五月下旬，一军在龙岗山西麓三道崴子歼灭了敌奉天骑兵一部二百余人之后，邵本良的主力部队跟了上来。敌军刚靠近，我军却不见了。敌军见我军只走不打，便设法引诱，用日军一个旅和两个团，向老秃顶子地区的一军部队进行包围，诱惑杨靖宇率主力出援。杨靖宇果然挥戈北上，冒着倾盆大雨向老秃顶子急进。敌人以为杨靖宇中了计，随后猛追。杨靖宇率部绕老秃顶子转了一圈，巧妙地把被围部队接了出来，结果敌人又扑了空。

六月中旬，杨靖宇率部从老秃顶子南十五里的四平街地区西行。一天，刚住下吃完饭，邵本良的兵追赶上来。杨靖宇让战士们丢弃一些衣服、饭菜，制造一种疲惫不堪，慌忙逃走的假象。敌人中计，在报上发表了杨靖宇“溃不成军”的消息。

六月下旬，杨靖宇率部来到本溪赛马集山区。一天上午，杨靖宇集合部队做战斗动员说：“咱们走了一个月零三天，这

回不走了。”他还说：“我老早给大家说过，咱们有四不打。第一，地形不利不打；第二，不击中敌人要害，不能缴获武器不打；第三，要我们付出很大的代价不打；第四，对当地人民损害大不打。现在的情况是高山隘路，居民不多，敌人疲惫，打的时机成熟了！”^①接着，他对这次战斗作了周详的部署。

第二天，邵本良和他的日本顾问英俊率领一个先头主力团，一个炮兵中队，匆匆赶来，陷入了杨靖宇布置的“口袋”。激战四小时，邵本良部一千多人全部被歼。他的十二个台柱（炮头）被打死了十一个。日本顾问英俊也被打死，邵本良本人受伤逃往沈阳。

战斗结束后，杨靖宇察看了战场。敌人的迫击炮还驮在马背上，电台里不时发出吱吱哇哇的呼叫声；英俊尸体旁还扔着一张军用地图。杨靖宇与战士们看到敌人这一狼狈情景，不禁会心地笑了起来^②。

领导抗日联军第一路军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组成统一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不分党派、阶级和信仰，停止内战，抗日救国。

根据“八一宣言”精神，满洲省委决定，以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合军和游击队为基础，联合东北其他抗日武装，统一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一九三六年“一·二八”纪念

^{①②}王传胜：《痛歼邵本良》，载《星火燎原》第4集。

日，在黑龙江省汤原县境举行了有各抗日部队代表百余人、民众团体代表七十余人参加的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东北抗日联军，通过了抗日联军政治纲领，决定将东北人民革命军一、二、三军，东北反日联合军四、五、六军，均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联军先后共成立了十一个军，“七七”事变前后发展到四万五千人。

这次会后不久，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下辖一、二、三师，全军共二千人。一九三六年六月，东满党组织负责人、抗联第二军政治委员魏拯民率二军主力一部，历尽艰辛，长途跋涉到达南满，在金川县河里地方会见了杨靖宇。接着一、二军和东、南满党的主要领导干部在金川河里举行了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为统一指挥东、南满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决定第一、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杨靖宇为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王德泰为副司令；东、南满党组织合组为南满（即东南满）省委，魏拯民为书记，杨靖宇为委员。第一路军下辖第一、第二两个军，每个军辖三个师，基本队伍六七千人，另有接受指挥的其他抗日武装约万人。它是活跃在东、南满的一股强劲的铁流。

杨靖宇亲自创作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歌》：

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合军，
创造出联合军的第一路军。
乒乓的冲锋杀敌缴械声，
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证。

正确的革命信条应遵守，

官长士兵待遇都是平等。
铁般的军纪风纪要服从，
锻炼成无敌的革命铁军。

亲爱的同志们团结起，
从敌人精锐的枪刀下，
夺回来失去的我国土，
解放亡国奴的牛马生活！

英勇的同志们前进呀！
赶走日寇推翻“满洲国”。
这一次的民族革命战争，
要完成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

高悬在我们的天空中，
普照着胜利军旗的红光。
冲锋呀，我们的第一路军！
冲锋呀，我们的第一路军！^①

第一路军成立后，为了发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大好形势，同关内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打通联系，互相配合作战，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总指挥部决定第一路军主力进行西征。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杨靖宇组织第一军的一师和二师向热河方向西征。西征部队突破了敌人道道封锁线，到达本溪、沈阳

^①选自《东北人民抗日诗词选》，辽宁、吉林、黑龙江、延边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附近，在梨树甸子一带袭击敌“讨伐军”，取得了胜利，缴获了一批武装；在本溪、凤城间的摩天岭，与敌军金田部队约千人激战，毙金田以下四百余人，其余都成为我军俘虏。

杨靖宇为西征取得的辉煌战果所振奋，曾挥笔写了《西征胜利歌》：

.....

同志们，快来高高举起胜利的红旗！
拼着热血，誓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铁骑纵横，满洲境内，已有十六军。
万众蜂起，勇敢杀敌，祖国恢复矣！^①

西征部队曾经到达辽河附近，后因敌人重兵阻击，抗日联军寡不敌众，未能渡过辽河。在西征途中，由于群众还未充分发动起来，部队得不到及时支援，加之对当地情况不熟悉，部队长途行军，疲劳过度，又患疾病，掉队失散的很多。再加上作战中伤亡，因此使西征部队大幅度减员，第三师只剩下五十余人。这样，西征不能继续进行，余部只好又返还原游击区。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摆在东北抗日联军面前的中心任务，是全力牵制东北敌军，扰乱敌人后方，配合关内抗战，以便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杨靖宇为了使全军明确抗联当前任务，经常向大家进行思想教育。他指出，东北是日军侵略华北的后方基地，又是内地抗战的前哨；东北抗日联军的每个忠诚的战士必须贡献

^①选自《东北人民抗日诗词选》。

出自己的力量，打击和消灭敌人，长期坚持斗争，迎接最后胜利的到来。

此时，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到最高潮。第一路军基本队伍达到一万五六千人，在杨靖宇率领下更加积极主动在南满和东满地区打击侵略者。一九三七年中，杨靖宇指挥司令部直属队攻打宽甸四平街，毙日军水击大队长以下五十余人；桓仁大清沟一战，歼敌三十余名；本溪同沟战斗中，又打死日军牛岛队长以下六十多人。其他如南营房、西南岔、劈砬子等战斗，都给予敌人以重大杀伤。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杨靖宇又率领五百人，在集安县境十二道沟南方老岭山，出敌不意，袭击了敌人正修筑中的通集线隧道，毙伤俘日伪军一百零四名，烧毁其工程建筑物十二栋，缴获白面八百袋及其他物资若干。此战意义重大。通集线是日伪掠夺通化地区资源、“讨伐”第一路军和镇压朝鲜抗日斗争的一条重要交通线。敌人对老岭隧道工程极为重视，强征中国工人千余名，在日军角田部队及满铁警备队、山林警察队监护下施工。山洞已打通，工程接近收尾，由于受到杨靖宇部的袭击，不得不推迟隧道竣工日期。伪通化省官厅资料中称之为“东边道肃正史上最巨大的一章”^①。

老岭事件后，敌人调伪蒙军索旅到集安，声称要包打杨靖宇。索旅不同于一般伪军，班长以上全由日人充任，日军捧它为“皇军剿匪之花”。

一路军研究了对策，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五月，先

^①转引自纪云龙著：《杨靖宇和抗联第一路军》，东北书店1946年版。

由魏拯民副司令（王德泰牺牲后，魏接王职）带一个师，打下了蚊子沟警察所，目的是吸引索旅前来支援。杨靖宇带五、六百人埋伏在蚊子沟口，等待集安方面敌人援军出动。三天过去了，还不见敌人来。第四天晚上，杨靖宇派人窃听敌人电话，得知索旅三十二团已从另一条路到了蚊子沟，正向集安要给养；集安方面敌人答应用汽车送白面饼。此时，魏拯民部已按计划转移了。于是杨靖宇派一个连星夜赶到小青沟盘山公路边，截击敌人送饼的汽车。那一个连顺利完成了任务，把截来的白面饼发给部队作“晚餐”，并有意放走了一个押车的警察，让他去给索旅“报信”。天亮时，敌人果然赶到。双方战斗进行了半个多小时，即将索旅三十二团三、四百人全部消灭。索旅长闻讯，气急败坏地出城追击杨靖宇部队。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杨靖宇带上部队早已转移到集安老岭地方休整去了。

五月十一日至六月一日，第一路军和南满省委召开领导干部会议，讨论配合全国抗战的方针问题。由于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叛变投敌，我军编制等情况已被敌人掌握，会后乃将第一路军下属的第一军和第二军改编为一、二、三方面军和一个警卫旅。接着，杨靖宇率领一方面军和警卫旅，在集安西北土口子袭击了修筑集梅铁路江桥的日本警察队，俘虏了日人工程师小林竹内，吸收了修江桥的一百多中国工人参军；日人福健也自愿参加抗联第一路军，和中国人民一起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七月五日，杨靖宇率队在通化地区七道沟伏击日本矿山调查组，打死敌人十八名；同月，又在集安长岗消灭索旅四十二团。

据敌人方面统计，一九三六年在南满地区，通化日军被袭击一千二百六十三次，安东（今丹东）日军被袭击五千五百四

十九次，奉天（今沈阳）日军被袭击五千四百六十九次。在抗联处境已极困难的一九三九年，一路军与敌交战仍不下于六百次。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关东军只有一万余人，以后逐年增加，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为四十万人，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为五十万人，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为七十万人，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增加到百万人^①。日本在东北增兵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反对苏联和支撑全面侵华战争，而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也是关东军增加的原因之一。东北的十数万伪军更为抗日联军所牵制。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侵略军官兵被东北义勇军和抗日联军毙、伤、俘者约二十万人左右。对于弱小的抗日联军来说，这一辉煌战绩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另一方面，由于东北党和抗日联军领导对全国抗战形势的估计偏于乐观，缺乏持久抗战的思想准备，不注意保存实力，因此，一九三九年后，部队损失也很大。

为革命捐躯

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后，全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正面相持的局面出现，敌后斗争的局面就要紧张”^②。在东北，日伪军加紧“讨伐”抗日联军，企图消除其“心腹之患”，巩固占领要地。与军事“讨伐”的同时，敌人还在抗日联军活动地区，普遍实行“集家并屯”和“保甲连坐”法，千方百计地分割人民群众和抗日联军的联系。除此之外，还以高官厚禄

^①周保中：《彻底粉碎二满洲》，载《晋察冀日报》1947年9月20日。

^②《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547页。

为诱饵，向抗联人员进行诱降活动。

第一路军是日伪“讨伐”的重点。一九三八年秋天，在民族败类程斌配合下，日军司令三木亲自指挥，调动了几个军管区和三个日本关东军支队，总计两万人的兵力，设置里外十多层帐篷网，把杨靖宇部队包围在临江岔沟。杨靖宇率领全军浴血奋战一整天，虽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但仍无法突破敌军的包围圈。敌人断定杨靖宇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出他们的手心了，天黑以后，停止了攻击，准备第二天上午一网打尽被包围的杨靖宇部。当晚，杨靖宇在夜幕掩护下，悄悄地把队伍带到西北方向敌军阵地附近，朝鲜族同志走在前面，和敌人岗哨答话，说是“自己人”。接着，大部队边打边往外冲。敌人分不清彼此，盲目射击起来。天亮之后，三木乘飞机视察，杨靖宇部队已冲出包围圈，无踪无影了。

临江突围虽然成功了，但从全局来看，第一路军处境仍相当困难，不能从根本上粉碎日伪军的这次大“讨伐”。在敌人多方面的残酷进攻下，南满抗日游击根据地全部被破坏了，抗联在原游击区无法立足。当年冬天，杨靖宇率领第一路军一部一千四百多人，告别了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父老乡亲，进入长白山密林中去。他们从集安错草沟根据地出发时，根据地群众随队送行，依依不舍。

抗日联军进入深山老林以后，必须重新创造生存和战斗的条件。他们伐木建造“密营”，把医院、被服厂、武器修配厂、仓库等后勤单位全部迁入“密营”或山洞。作战部队有时到“密营”休整，但多数情况下是在山沟里、树丛下席地而坐，围火而眠。人民群众仍然不避艰险地给抗联送粮食、衣物和药品，但已极不方便。抗联的全部军需品主要依靠用战斗从

敌人手里缴获。由于衣食不足，他们往往挨饿受冻，又不得不象山中野人一样，打猎为食，以草根树皮果腹。

尽管环境极其艰苦，杨靖宇仍然指挥着第一路军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战斗。一九三九年春节后，我军攻打桦甸县境木箕河上游敌人木场，消灭森林警察队队长杨某以下二百四十多人，木场很多工人参加了抗日联军。不久，又打敦化南敌人军事重镇大蒲柴河，消灭伪警察二百人，烧毁了敌野战仓库，缴获了很多弹药军需。

日伪曾经向杨靖宇诱降，在临江、集安一带散布风声：如果杨靖宇肯与日军“合作”，可以割让东边道归抗联管辖，杨靖宇可任都督。杨靖宇对同志们说：“为民族解放事业，头颅不惜抛掉，鲜血可以喷洒，而忠贞不二的意志是不会动摇的。”连敌人对于杨靖宇和他的战友们的坚强不屈，也不得不表示惊叹。有一次，杨靖宇处决了一个前来说降的朝鲜籍贯的坏家伙。临刑前，这个家伙说：“我看到这样多的中国人和朝鲜人，为拯救祖国，表现这么坚定，我发现日本人和我一样愚蠢，他们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永远不知道屈服的人。今天的情形告诉我，将来的中国和朝鲜一定是属于你们的。”^①

杨靖宇一贯严于律己，和干部、战士同甘共苦。一九三五年冬，部队还有半数人没穿上棉衣，杨靖宇也只穿一身夹衣。每次作好棉衣，他都命令先发给伤病号、战士穿。柳河县作地方工作的同志主动给杨靖宇做了一件皮大衣送来。他接过大衣看了看，两道浓眉皱成一个疙瘩，严肃地说：“有做这件衣服的成本，可以做三套或四套棉衣，那就可以解决三、四个同志

^①据周而复：《杨靖宇将军传略》，载华应申编《中国共产党烈士传》第203页。

的困难，你们为什么要特别为我做件皮大衣呢？我经常和你们说，官兵应一视同仁，一律平等，你们这次又违犯了！”那位同志承认自己不对，杨靖宇又安慰他一番，鼓励他继续给部队解决棉衣。而那件皮大衣，杨靖宇一天也没穿，给一位体弱的同志穿了。在这最艰苦的岁月，杨靖宇倍加爱护战士和下级，使指战员在冷雪寒风中感受到党的温暖和关怀。当数日不见粒米时，炊事员给他送来一把炒黄豆、一张饼，他也让送给伤员，说：“革命是大伙干的，我个人算得了什么。这些东西就送给伤员同志吃吧，他们为革命受了伤，流了血。”^①通讯员小聂看着司令员那突起的颧骨，塌陷的眼窝，心里十分难受。他走到一条河沟旁边，用刺刀凿开冰窟窿，抠出十来个喇蛄和五只蛤蟆，化点雪水用茶缸把它们煮熟送给杨靖宇。杨靖宇端起茶缸闻了闻那鲜香的味道，问明来历，握着小聂的手说：“小家伙，谢谢你，现在大伙都饿着肚子，不要先照顾我。麻烦你把它送给伤病员同志们吃。”小聂执拗不过，只好从命。可是伤员们都不肯吃，小聂又端了回来，杨靖宇接过茶缸，亲自送到伤员住的地方，一进门就高声大噪地说：“同志们，咋不识敬呀！这样的好东西还不吃？东三省不是有三宗宝吗？咱再加上喇蛄蛤蟆两宝。你们尝尝，这物满香哩！”伤员说：“留着杨司令吃吧！”杨靖宇听了哈哈大笑说：“吃东西我可不落。你看，一大茶缸我呛了一半，这一半大家尝尝鲜。快，趁热乎吃，晚了可进我肚子里了。”他一边哄着，一边不由分说地把喇蛄和蛤蟆塞在伤员手里，又恳切地说：“同志们，你们吃了吧。你们吃了，我心里才熨贴，这比我吃顿大酒大肉还高兴。”伤员们十分感动，下决心一定跟着杨司令抗日到底。

^①据《松柏常青》，吉林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一九三九年冬，形势进一步恶化，敌人增兵，抗联减员，敌我力量对比更加悬殊。日伪军对第一路军部队进行了全面包围和封锁。鉴于这种情况，第一路军司令部决定采取分散游击的办法，以粉碎敌人“聚而歼之”的阴谋。魏拯民和三方面军去吉敦地区；二方面军依长白山区，进出鸭绿江上游；杨靖宇率一方面军及直属部队在抚松、濛江、金川、辉南、通化一带，并指导各部队互相呼应，配合作战。十一月间，杨靖宇率领司令部直属部队七百余入由金川一带去濛江东，指导各部队作战，并找军需处长全光，解决部队过冬的粮食和棉衣问题。

在濛江县境，杨靖宇部受到敌人重兵层层包围，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完全被切断了。十一月二十三日，一场血战，部队伤亡很大，失散的也很多。突围后，杨靖宇组织司令部的同志们安置伤员，集合队伍，并尽一切努力筹集部队过冬衣食。为此，杨靖宇身着破旧的棉衣，足踏一双朝鲜草鞋，顶着风雪严寒，奔走于濛江县境。队伍渐渐集合起来了，十二月二十四日，杨靖宇身边的队伍有四百多人。但敌人的围追堵截有加无已，又由于在濛江耽搁时间太长，敌人已在东去的路上布下重兵，而且部队供给问题仍未解决。根据这种情况，次年一月，杨靖宇把部队化整为零，主力北上，他亲自带领五、六十人的小部队东进。

就在这时，司令部警卫旅第一团参谋丁守龙叛变投敌。这个民族败类把杨靖宇的全盘计划出卖给敌人。于是，杨靖宇率领的这支小部队又陷入敌人层层包围之中，他们昼夜行军作战，不得休整。杨靖宇和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伊俊山分头率部突围。他向伊俊山交待了突围后的任务、联络地点、接头信号后，就带领一部分同志继续同敌军周旋，从中寻求突围的途径。

二月上旬，杨靖宇带着十四、五名战士来到一个伐木厂附

近的山沟住下。这个厂子有四、五千工人，山道上行人多，山上炊烟不断，住在这里不易引起敌人注意。杨靖宇正患重感冒，警卫员黄生发用罐头盒给他煮了一点苞米汤。他喝了苞米汤就心满意足地睡在火堆旁的树枝上。黄生发因为疲乏过度，也睡了，一觉醒来，只见杨靖宇正用一根小麻绳缝补身上的棉裤。原来，那堆火烧了杨靖宇身下的树枝，把棉裤也烧了两个大洞。多少天来，连续打仗，第二路军派来的一位交通员，一直没有和杨靖宇汇报工作的机会，这时才能坐下来与杨靖宇交谈。杨靖宇掏出铅笔，聚精会神地在本子上记着，不时地抬头询问几句，或者发出欢快的笑声，情绪十分乐观。这期间，他们的粮食已完全断绝，便从敌人的伐木队拉来一匹骡子杀了，用火烤熟来吃。有时也向中国伐木工人要点干粮对付一顿饭。有一次，只有一块苞米面干粮了，黄生发掰了一半递给杨靖宇。杨靖宇说：“就这一点干粮，为什么给我吃呢？你搞碎煮点汤大家喝吧！”黄生发熟悉司令的脾气，只得照办。很快，敌人又追击上来了。这支饥饿、疲惫的小部队被迫同敌人大部队一次又一次交战，几位同志又牺牲了。杨靖宇感到情况十分严重，决定由黄生发带着三个伤员往回走，去找第一路军的另一支小部队。他带着两名战士按原先的约会同伊俊山联系。“这时候，往回走是比较安全的，敌人的兵力都往前集中了”^①。黄生发等不肯离去，要和杨靖宇在一起。杨靖宇亲切而严肃地说：“多活一个人就是一份革命力量”，“为了革命，我们要坚持到底。就是死，也不能泄露党的秘密，也不能向敌人屈服。革命总是会胜利的。”^②黄生发等四人恋恋不舍地去了，

^{①②}黄生发：《永不屈服的人——忆杨靖宇将军》；载《松柏常青》，吉林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他们在大森林里爬了两天两夜，终于突围出来。

二月十八日，杨靖宇身边的两名战士在濛江大东沟屯附近向群众买粮食和便衣，被敌人发现，不幸牺牲了。敌人从他们身上搜出杨靖宇的一颗印鉴，断定杨靖宇就在附近山林中，于是加紧封锁和搜查。

二月二十三日下午，杨靖宇只身一人来到濛江县保安村附近的三道崴子。他至少五、六天没吃到粮食了，脸上带着冻伤，衣服、鞋子都很破旧。他在这里见到几个打柴的，就同他们攀谈起来，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并拿出钱请他们帮助买些粮食和衣服、棉鞋。一个打柴人劝杨靖宇向伪满投降，杨靖宇回答说：“我有我的信念，我不能投降。”^①打柴人答应给杨靖宇拿来粮食和衣物。但他们当中有一个是伪牌长，回村后，立即向敌人告密了。不大功夫，敌人“讨伐队”开来，把杨靖宇包围在三道崴子树林中。关于战斗情况，日本侵略者曾留下了这样的记录：“讨伐队已经向他迫近到百米、五十米，完全包围了他。讨伐队劝他投降，可是，他连答应的神色也没有，依然用手枪向讨伐队射击。因此，讨伐队认为生擒困难，遂猛烈地向他开火。交战二十分钟，首先一弹命中敌人的左腕，巴答！手枪落在地上。但是，他继续用右边的手枪应战。终于，第二弹贯穿了他的胸部，就连他这样的人，这一弹也成了致命伤，被打倒而绝命。”“这个顽强的敌人”，“正是杨靖宇。”^②这就是杨靖宇最后的战斗。他为党、为人民、为中华民族献出了最后一滴血！

腐朽、残暴的日本侵略者无法理解这位英雄的一切。他们

^{①②}译自森崎实：《东边道》，春秋社1940年10月出版发行。

尤其不明白杨靖宇在长时间被围在冰天雪地里，完全断绝了食粮的情况下，究竟是什么力量支配着他顽强地进行战斗。他们剖开了杨靖宇的遗体，看到在杨靖宇的“胃里连粒饭都没有”^①，只有野草、树皮和棉絮！

杨靖宇牺牲时才三十五岁。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十几年如一日，对党对人民对中华民族无限忠诚。在他的革命生涯中，突出地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思想品德和无产阶级党性，体现了一位伟大战士的革命情操与英勇献身精神。他以对党的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以及坚强不屈、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为他自己的历史写下了光彩夺目的篇章！

作者附记 本文除脚注外，还参考了下列资料，

1. 原中共满洲省委 1923——1940 年有关文件；
2. 周保中、冯仲云、杨佐青、姜椿芳、尹俊山、黄生发、王传胜、吕英俊、朴春日等的回忆材料；
3. 东北烈士纪念馆、河南确山文化馆、吉林通化靖宇陵园所存的有关资料；
4. 吉林大学 1958 年、1977 年在盘石、通化等地调查的抗日联军斗争史资料；
5. 冈部善修：《满洲国治安小史》（伪满洲国警察协会 1944 年 5 月日文版）等日伪图书、档案资料。

^①译自满铁社员会编《协和》263 号，1940 年 4 月 15 日刊本。

陈翰章

陈瑞云

“小才子”

陈翰章于一九一三年六月十四日（农历五月初十）出生在吉林省敦化县半截河屯。祖父陈宝珠，父亲陈海，都是农民。家有土地十几垧，自种自食，生活还算富裕。陈翰章五岁那年，母亲宫氏病故；七、八岁时，父亲续娶陈氏；几年后，祖父去世，家境逐渐贫穷。

陈翰章九岁入本屯私塾读书，次年转入县城南关私塾，十二岁时又就读于县城宣化小学。幼年时期的陈翰章性情刚毅，头脑聪颖，求知欲强，在学校学习努力，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受到老师和同学的称赞。

一九二七年春节前，敦化县教育局主持招考私塾教员，陈翰章参加了这次考试。全县参加考试的三十七人中，陈翰章年纪最小，不足十四岁，而且是个未毕业的小学生。考试成绩揭晓，陈翰章名列第四。这件事引起了全城的轰动，人们称誉他是敦化的“小才子”^①。

^①访问陈翰章的老师桑志学先生记录，未刊稿。

投身抗日洪流

陈翰章被录取后，并没去当教师，而是继续读书。一九二七年夏，他进入敖东中学。敖东中学是当时全县的“最高学府”，主要招收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入学。陈翰章因为有点小名气，学校没经考试也招收他入了学。

敖东中学校长是一位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他为了办好中学，从外地招聘了一些进步教师来校任教。有的教师在师生中传播革命思想，介绍新书报。陈翰章把这些进步教师看作自己的良师益友，向他们学习文化知识，从他们那里接受反帝爱国思想。他对新书报很感兴趣，常在夜深人静时，悄然点燃油灯，聚精会神地阅读，从中吸取新的思想营养。

陈翰章是敖东中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之一，并主编校刊《敖中》。他在《敖中》上发表过宣传爱国思想的文章。

一九二八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推行“大陆政策”，加紧了在我国东北的筑路活动。其中它所要接通的吉会路（当时吉敦段已筑成），从吉林经敦化、图们到朝鲜的会宁，是一条具有战略性质的铁路，不仅损害我东北的领土主权，而且威胁着关内的安全。同年六月，中共满洲省委号召东北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筑路。为保卫筑路权，哈尔滨、长春、吉林、延边的群众，高呼着“路权自主”口号，举行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军阀的集会和示威游行。一九二九年“五卅”纪念日前夕，敖东中学学生自治会接到吉林学联关于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修筑吉会路的宣传活动的通知后，陈翰章和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立即组织同学参加这项活动。他们选

出二十几名高年级同学，分成四个小组到乡下宣传。陈翰章带领一个小组到城西各村去。他们走进村子，先发动小学生到各家通知开会，又请看庙的老人敲大钟。农民们听到钟声陆续集合到庙前。陈翰章作了激昂慷慨的讲演：

“乡亲们！兄弟姐妹们！

“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要把日本人欺侮咱们的一些事情讲给大家听。”①

他讲述了四年前上海的“五卅”惨案及日本修筑吉会路的险恶用心，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最后，他号召大家抱成团，反对日本侵略中国。

农民听了他们讲的抗日道理很开脑筋，而且觉得这些小青年很可爱，白天请他们到家里吃饭，夜里留他们挤在自己的炕上休息。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陈翰章初中毕业。在毕业典礼会上，他的讲话充满了壮志豪情，他说：“我立志从事教育事业，目的是为了培养优秀人才，改造国家，使他独立富强。但是帝国主义却不让我们这样做，想把我们变成他们的附属国！”

“同学们，假如我的理想因为被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打破的话，我将毫不可惜。为了祖国，我一定投笔从戎，用我手中的枪和我的鲜血、生命来赶走敌人！”②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武装占领我国东北三省的侵略战争。敦化县城也被日军占领。不屈的敦化人民，立即举起刀枪，英勇抗日。不久，驻在延吉与敦化交界

①②温野、臧秀编著：《抗日英雄陈翰章》，辽宁、吉林、黑龙江、延边人民出版社1959年联合版第10、13页。

哈尔巴岭的东北军王德林部，不受汉奸熙洽的调遣^①，组成吉林救国军，举起义旗，抗击日本侵略军。农村秘密团体红枪会等也杀向抗日战场。学校的爱国师生利用各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

这时，正在县立民众教育馆当讲演员的陈翰章，把民众教育馆作为阵地，宣传抗日救国。他每周举办一至两次讲演会，宣讲国内外大事，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罪行。来馆听讲和看书报的青年与日俱增。他们组织秘密反日会，经常到街上去张贴抗日标语，散发抗日传单。吉林救国军一九三二年元宵节和端午节攻打敦化县城时，反日会做了不少支援工作。

有一天，陈翰章把讲演题目：“赶走恶狼”四个醒目的大字写在揭示板上，并挂在教育馆大门外，以此扩大宣传范围，动员更多的人起来抗日。这时，有个姓渡边的日本人，名义上是商人，实际是特务。他早已在暗中监视着陈翰章的行动。陈翰章的讲演题刚一写出，就传来激烈而异常的敲门声。陈翰章悄悄地从门缝往外看，发现大门外站了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他敏捷地翻过院墙逃出了险境。

当时，日本侵略军的魔爪还没伸到乡下，陈翰章在家躲了一段时间，总结了宣传抗日的经验教训，决心寻找一条新的道路。村中有人劝他说：“政府那么多军队都不抗日，撤退下去，你能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不愿意在家种地，就找个学堂教书吧。”他坚定地回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家都该想办法，出力气，不然国就亡了。”他和青年朋友一谈起抗日的事，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悲愤。他常说：“国破家安在？

^①熙洽原为东北边防军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代理省军政大权，“九·一八事变”后投降日本。

堂堂男子岂能甘做异族奴隶！”^①

原驻敦化的一支东北军，人们称之为“张团”^②。日军侵占敦化县城时，他们一枪不放，撤到城西后和日军勾勾搭搭，并准备投降。当时，“张团”缺文书，于是找到陈翰章的门下。他们许愿说：当文书是暂时的，用不了多久就可高升。陈翰章斩钉截铁地说：“我不行，干不了。”以后，他们还三天两头来到陈家纠缠。有一天，“张团”的几个官还带着酒肉鸡鸭到陈家请客，企图用酒席来征服这个“读书人”。这是一九三二年夏天的事。陈翰章事先未来得及走脱，“张团”派来的几个人喜形于色，以为大功即将告成。陈翰章趁屋里只剩下他一个人的那一瞬间，迅速地从后窗跃出，钻进了树林。

天黑以后，丘八们酒残饭饱，滚回了营房。陈翰章回到家里，气愤地说：“我决不当亡国奴！也不吃亡国奴的饭。”^③

这时，人们传说，救国军前方司令部来了一位参谋长，抗日坚决，爱护士兵，看样子是个有作为的人物，自从救国军有了这位参谋长，接连打了几次胜仗。秋天，救国军从安图向敦化进军，前方司令部设在敦化城南太平山，准备中秋节第三次攻打敦化城。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三日晨，天下着蒙蒙小雨。陈翰章如同往常进城一样，身穿干净的旧长衫，手拿雨布，告别父亲、继母和妻子邹氏，前去投奔救国军。陈翰章中学同学范广明的父亲范子丹，是救国军前方司令吴义成的好友。范家父子陪同陈翰

①陈翰章纪念碑碑文。该碑立于敦化县城内。

②据说因其团长姓张而得名。

③“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群众骂伪军为“亡国奴”。它与通常所指的因亡国而处于被奴役地位的“亡国奴”含义不同。

章前往救国军前方司令部驻地太平山。陈翰章参加救国军的第三天，就投入了攻打敦化县城的战斗。

参加中国共产党

王德林率部起义组织救国军时，中共东满特委曾派了十几名共产党员参加鼓动与计划起义的工作。起义后，共产党员周保中任救国军总部参议和前方司令部参谋长等职务。在救国军里，以周保中为首，秘密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贯彻执行党的团结抗日主张。

在救国军前方司令部担任秘书职务的陈翰章，很快就结识了周保中。吴义成在抗日初期，积极性较高，但由于他把抗日胜利的希望寄托於南京国民政府，所以当看到南京国民政府无意出兵收复东北时，抗日情绪就消沉了；而且常吞并抗日民众武装，扩大自己的势力。周保中不同意吴义成的作法，苦口婆心地进行说服工作，有时二人发生争吵，激烈时，吴义成竟用枪杀相威胁。周保中不顾自身安危，不计较个人恩怨，仍尽力争取吴义成等继续抗日。陈翰章赞成周保中的主张，并敬佩他的为人，常主动上门求教。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日，救国军联合抗日山林队^①攻打宁安城。陈翰章入伍才一个多月，就担任了这次战斗的战地鼓动队长。

深夜十一点钟总攻开始。陈翰章率领队员跟随一支突击队

^①山林队，通常被称为“胡子”。“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不同程度地参加了抗日斗争。

去执行炸毁敌人军火库的任务。突击队冲到宁安城下，被滔滔牡丹江水所阻。为了战斗胜利，必须立即徒步涉水过江。

“勇士们冲过去！”陈翰章带头第一个跳进江里。突击队员紧跟着也跳下去。枪弹如雨，冰水透骨，他们不顾一切地奋力涉渡，很快到达彼岸。

周保中亲自率领敢死队攻城，一小时后，坚城即被攻破。

陈翰章和鼓动队员们随着突击队冲向军火库。

敌人用火力封锁了军火库正面路口。突击队冲到军火库附近就无法再前进。大家焦急地寻找接近和爆炸军火库的办法。就在这紧急时刻，突击队长不幸饮弹而亡。队伍失去了指挥者，开始混乱起来。

“弟兄们！不要乱，现在我来代理队长，大家暂时听我指挥！”^①

陈翰章没指挥过战斗。但眼前的形势很紧急，倘若部队混乱下去，作战计划就要落空。因此，他自告奋勇挑起了突击队长这副重担。他马上指挥一部分队伍从正面进攻，吸引敌人的火力；另一部分则向敌之侧翼迂回。当侧翼部队靠近军火库墙根时，陈翰章命令向库里扔手榴弹。顿时，火光冲天，军火库爆炸了，他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宁安城内的十字街心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陈翰章带着突击队来到这里。但此时大部队正在向城外撤退。原来是因为山林队不听指挥，进城后乱抢乱窜，打乱了作战部署。陈翰章见此情景，主动和突击队留下来，掩护大部队撤退。黎明时，救国军主力撤退完毕，他才领着队员们出城。

^①温野、臧秀编著：《抗日英雄陈翰章》第24页。

烈火炼真金。经过战斗的考验，在攻打宁安之后，陈翰章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在紧张、复杂的战斗环境中，青年人成长得格外迅速。陈翰章入党几个月后便成为救国军中秘密党组织的基层负责人之一，是周保中的得力助手。

一九三三年初，东北自发抗日的旧军队纷纷瓦解，救国军首领王德林等退往关内。我党努力稳住了吴义成的前方司令部及其所辖部队，整编为新的东北国民救国军，由吴义成任总司令，周保中任总参谋长，继续坚持吉林东部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同年夏，救国军攻下安图后，吴义成率司令部去东宁，周保中以总参谋长的名义在安图组织救国军边区留守处。党鉴于吴义成抗日消极，反共的倾向严重，救国军各部亦呈现分化状态，决定由周保中到宁安组建吉东反日同盟军。周保中到宁安后，以党直接领导的工农抗日义务队等武装为主力，联合救国军柴世荣等部，并争取各抗日山林队，建立了反日同盟军，周保中担任同盟军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党委书记。但对外，周保中仍以救国军总参谋长的名义领导反日同盟军。

陈翰章继续留在吴义成部队作党的秘密工作。陈翰章能文能武，吴义成一直把他视为自己的心腹。年仅二十岁的陈翰章被提升为总司令部秘书长。他就利用这种特殊关系，在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进行党的工作。

有一次，吴义成逮捕了党领导下的绥芬反日会会长和东满游击队的一名战士，并密谋收缴东满各县游击队的武装。陈翰章得知内情，和地方党组织、游击队的领导同志周密研究后，作好了应变的准备。同时，他还出面向吴义成陈明利害。终于平息了事端，使吴义成释放了我被捕同志。

一九三四年初，吴义成派陈翰章到关内找王德林等原救国军首领，探听国民党政府对抗日问题的真实意图，要求经济援助。

陈翰章先到宁安天桥岭向周保中汇报了上述情况。经党组织研究，同意陈翰章去关内，指示他到关内后要多宣传东北抗日情况及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并加强同有关组织与人员的联系。

陈翰章以东北国民救国军总司令部特派代表名义到达北平。在北平救国会会长朱庆澜召集的东北援助问题座谈会上，陈翰章介绍了东北抗日武装艰苦卓绝斗争的事迹，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政府不抵抗日本侵略的罪行，用原自卫军、救国军瓦解后新的游击队崛起、各种抗日武装联合抗日的事实，说明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积极作用。他还谴责了在关内的某些投机分子以援助东北抗日为名，搞政治投机和发国难财的无耻行径，呼吁关内人民以人力物力直接支援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陈翰章还向流亡平津的东北同乡青年知识分子宣传了东北武装抗日的事迹，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抗日救国热忱。

同年五月，陈翰章在天津见到了王德林。这位救国军的老将领，虽然远离了抗日前线，但仍有一颗爱国心。鉴于华北政治情况复杂，日本正策划分裂中国的阴谋，陈翰章劝王德林提高警惕，坚持抗日立场。王德林告诉陈翰章，在关内的自卫军和救国军的有些首领，借东北抗战之名，募捐肥私，只把募款的百分之几汇到东北去；在东北的自卫军、救国军首领，有的收到关内寄去的捐款又寄回关内存入私囊。陈翰章听后，非常气愤。王德林亲手把关内人民捐助东北抗日武装的八千元大洋交给了陈翰章，希望他分发给抗日前线的指战员。

五月下旬，陈翰章头戴礼帽，身着长衫，扮作商人，启程北归。途经长春时，他见到了正在伪满中央文教部教师讲习所学习的范广明，兴致勃勃地向这位老同学讲述两年来的战斗生活和这次赴平、津的观感。范广明听说他带回几千元钱一事，就建议说：“你回去跟吴傻子说说，用这笔钱送咱俩去日本留学吧。”陈翰章断然拒绝了范广明的建议^①。

陈翰章回到宁安，向周保中汇报了三个月的活动情况，并把从关内带回的捐款交给反日同盟军军委。军委当即在牡丹江、宁安、敦化一带各抗日部队中召开大会，发放关内人民的捐款，“近者每人一元，远者慰问”^②。同时，由陈翰章报告关内人民热烈支持东北抗日的情形，揭露某些国民党官僚政客、自卫军、救国军首领贪污关内人民捐款的丑行。他指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武装斗争，才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③。这一工作对于扩大党的影响，扭转救国军余部某些动摇、悲观情绪，起了积极作用。

遵照党组织的指示，陈翰章向吴义成报告了在平、津活动经过，如实说明关内捐款发放情况。吴义成妄图私吞捐款落了空，对陈翰章恨之入骨。但陈翰章的做法光明正大，深得广大抗日战士的拥护，吴义成也无可奈何。

粉碎敌人的劝降诡计

一九三四年六月，陈翰章到宁安工农抗日义务队担任政治

^①访问范广明记录，未刊稿。又，吴傻子是吴义成的绰号。

^{②③}周保中：《陈翰章同志生平事迹历史背景及问题的补充材料》，未刊稿。

指导员。后来，这支队伍发展为吉东抗日游击队，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后又改称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周保中任军长，陈翰章任该军第二师参谋长兼中共师党委书记。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陈翰章带领的部队在创建初期，就给敦化、宁安日军以沉重打击，据统计，在宁安、额穆、敦化、蛟河等地共歼敌千余人。

敦化日本宪兵队在陈翰章的家乡刺探了一些有关陈翰章的情况。陈翰章在家时是个孝子，对父亲“百依百顺”。他的妻子邹氏，婚后没生子女，常为此烦闷不乐。于是日本宪兵队就想施展由亲人出面劝降的诡计。

一九三五年，日本宪兵逮捕了陈翰章的父亲和妻子，在审讯时，桌上摆一瓶酒、一把战刀，阴阳怪气地说：陈翰章有才干，回来可以升官发财；不回来，全家人都别想活下去^①。他们逼迫这翁媳二人把陈翰章找回来。秋，陈海被逼无奈，只得带着儿媳长途跋涉去宁安，在斗沟子附近的一个小山庄里找到了陈翰章。

陈翰章离家已三载，见到亲人分外高兴。他知道父亲远道而来必有缘由。经他询问，父亲把实情告诉了他。敌人卑鄙的伎俩引起陈翰章无比的愤恨，他果断地说：“我抗日到底！即使日本鬼子把全家都杀了我也不回去。”他耐心地向亲人解释抗日救国道理，告诉父亲：回去后要设法对付那些侵略强盗，就说找不到儿子；等抗日胜利了我再回去看望父母和乡亲。他劝妻子不要等他，可以择人另嫁^②。

陈海和邹氏回去后，敌人并没有杀掉他们，而是三天两头

①②访问陈翰章家乡亲友记录，未刊稿。

传讯拷打陈海，有时把他吊在村外山坡的树上，有时把他装在麻袋里踢着满街滚。他们的险恶用心是想把这些情况张扬出去，从精神上折磨陈翰章；也是为了继续逼迫陈海去找回他的儿子。陈海牢记儿子的话，宁肯皮肉受苦，也不违背儿子的意志行事。他默默地期待着和儿子胜利团聚的一天。陈翰章的妻子，没理解丈夫的心情，丢下年迈的公婆改嫁了。而陈翰章却处之泰然。

一九三六年春，陈翰章调到抗联二军，在二师（后改称五师）先后担任参谋长、代理师长、师长，并兼任师党委书记。六月，一军和二军合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东满、南满党组织合并，成立中共南满省委，陈翰章被选为省委委员。不久，中共道（中东路）南特委成立，陈翰章又被选为特委委员。这期间，他率部在宁安、穆稜、东宁、汪清、敦化和额穆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同年夏，他指挥部队袭击林口的龙爪沟、庙岭、刁翎、三道通等地的敌人，取得很大的胜利。由于抗联声威大震和对敌军政治攻势的加强，伪军不断发生哗变，加入抗联队伍，有的日军也自愿支持和要求参加抗联。宁安县曾有七、八名日军请唐头沟农民廖长发帮助联系，要求加入陈翰章部队，由于中途迷路，没找到陈翰章，又转回宁安。这些日军有的遭到日本宪兵逮捕杀害，有的自杀了。

陈翰章的活动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注意。他们在加紧对陈翰章部队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又开展政治诱降活动。一九三六年夏，日本政治浪人雄谷求见。经上级批准，陈翰章在宁安唐头沟东山与雄谷见面。雄谷西服革履，道貌岸然，对陈翰章十分谦恭客气。但话一转入正题，就暴露出其丑恶嘴脸。他说：抗日联军力不胜任长期抗日游击战争，只能破坏社会物质基

础；不如依靠日军帮助，建设“满洲国”，改变社会面貌，谋求进步。他还阴险地提出：抗日联军如果不愿与日军合作，可以转到三江地区，以便“保存力量，等待时机”^①。

陈翰章听完雄谷的说教，哈哈大笑。几年来，陈翰章征战疆场，但并没有忽视政治文化学习。凡是能收集到的书籍、报纸，他都认真阅读。一有时间，他就和同志们研究党的指示精神、敌人动态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他不仅一眼看穿了雄谷的真面目，而且针锋相对批驳了雄谷。他滔滔不绝地历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强占东北，蹂躏中国人民的罪行之后，指出：驱逐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地，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他满怀信心地说：“中国人民将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②

雄谷的假面具被戳穿了，还不甘心，想替自己辩护。陈翰章警告他说：你不要替日本军国主义作鹰犬！这次宽恕你带着脑袋回去，下次再来杀勿赦^③。雄谷不敢再争辩，灰溜溜地滚下山去。

三年后，也许敌人忘记了陈翰章的警告，又派人来劝降。那是一九三九年夏天，杨靖宇率第一路军袭击敦化县大蒲柴河镇时，陈翰章部队十三团抓了一个叫李景文的人。李景文的哥哥李相文是伪敦化县警务科的密探。李相文为了救弟弟，给十三团送了很多粮食、盐、罐头、衣服和胶鞋等。伪敦化县警务科首席指导官永田和伪吉林省警务厅警备科驻敦化治安工作班

①周保中：《陈翰章同志生平事迹历史背景及问题的补充材料》，未刊稿。又，三江，即今黑龙江省佳木斯一带。

②周保中：《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将军传略》，未刊稿。

③周保中：《陈翰章同志生平事迹历史背景及问题的补充材料》，未刊稿。

的福田得知此事，认为是一个向陈翰章部队劝降的好机会，决定亲自进山劝降。这时，伪吉林省警务厅警备科长西濑户秀夫到敦化巡视工作，他和伪敦化县日本人副县长三岛笃也要同往。他们都知道解决陈翰章部队的重要性，因为上司早有告示，用五千元的悬赏捉拿陈翰章。还有所谓“一两肉一两银，一两骨头一两金”之说。如能使陈翰章投降，无疑可立一大“功”。

十三团当时正在安图、敦化交界的牛心顶子活动。西濑户秀夫等人进山劝降的头一天，陈翰章才从另外的地方来到牛心顶子。他听了十三团的汇报，马上召集干部会议，决定将计就计，严惩劝降者。

六月二十四日晨，利令智昏的西濑户、三岛、福田和永田带着李相文和一个姓杨的翻译，一行六人，驱车前往牛心顶子。他们身穿便衣，携带着“慰问品”，俨然似“和平使者”，但腰间却暗藏手枪。牛心顶子外的日伪军作了应变准备。

陈翰章周密地安排了这场斗争。头天晚上，他把队伍部署好，把岗哨一直放到山口外。同时还研究决定，对前来劝降者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

西濑户等来到牛心顶子下面，山外第一道抗联的岗哨把“慰劳品”留下，安排被迫来搬运“慰劳品”的民夫进山休息，招待他们吃饭。

当西濑户等六人进山走到高丽帽子屯附近的密林时，预先埋伏在那里的几位朝鲜族战士突然从丛林中跃出，用手枪对准敌人，用日语喝问：

“什么人？站住！”

不等敌人伸手摸枪，丛林中又闪出几个战士，飞奔上前，扭住他们的胳膊，搜出枪枝，把他们捆绑起来带到山上。

陈翰章逐一审问来劝降的敌人，了解敌方军情之后，就地召开审判大会。战士们把周围的大树剥掉树皮，在露出青白色的树干上写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向日寇讨还血债！”“抗日到底，誓死不投降！”等标语。西濑户、三岛、福田和永田被分别绑在四棵大树上。

陈翰章主持大会。

“同志们！老乡们！”

“你们看，绑在树上的四个日本官，他们竟想让我们投降。可是他们的梦做错了。抗日联军是人民的队伍，不赶走日本强盗永远也不能放下武器！我已经警告过他们几次了，可是他们还不死心。

“敌人杀害了我们多少同胞啊！血债要用血来还！我们对敌人绝不留情！”

“现在我代表中国人民宣布判处他们死刑。”^①

陈翰章的话音刚落，几个威武的战士一涌而上。他们仇恨满腔，把锋利的刺刀刺向四个日本劝降者的胸膛。

陪绑的李相文和杨翻译，闭着眼睛，耷拉着头，吓得魂不附体。陈翰章教训他们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今后不许再当汉奸，否则定不饶恕。”^②李、杨二人连连点头称是。随后，将李景文同民伙一起带下山去。

陈翰章立即集合队伍，从林海深处安全地向东转移。敌人的劝降阴谋破产了。

^①参见温野、臧秀编著：《抗日英雄陈翰章》第42页。

^②访问抗日联军老同志吕英俊、朴春日记录，未刊稿。

奋战在故乡的土地上

陈翰章根据党的统一部署，一直率部奋战在他的家乡镜泊湖地区。

一九三七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北抗日联军的中心任务是打击敌人后方，配合关内抗战。抗联各军积极开展斗争，“在东满，沿镜泊湖岸及汪清、延吉、敦化间第二军陈翰章部队，予敌人打击尤重”^①。镜泊湖是日本帝国主义特别注目的一个地方。它地处吉、黑两省东部交通要道，物产、资源丰富，是个战略要地。日军侵占吉、黑两省后，在这里就开始筹建以军工为重点的各种工程。其中镜泊湖水电站工程，是日伪五年计划中一个重要项目，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开工。施工期间，日军守备队防守森严^②。同年八月，陈翰章率领二军五师在宁安县横道河子与日军“讨伐队”展开激战。他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打得日军丢盔卸甲。这一战共消灭敌人四百多。陈翰章纵观全局，决定乘胜进击，直捣日伪修建中的镜泊湖水电站工地。战士们抱着再立战功的决心，勇猛地向日军守备队驻地冲去。前不久的横道河子一战，使该守备队闻风丧胆，这次又突然遭到袭击，便不战而逃了。当时，敌人营房里乱七八糟地丢着被服和粮食。陈翰章指挥战士们搬运缴获的粮食、被服和枪枝弹药。接着焚烧了敌营房和工程事务所，解放了在工

①关寄晨：《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略》，东北书店1946年6月印行，第13页。

②伪满洲事情案内所编《东满事情》，1941年5月日文版，第116页。

地服苦役的中国工人^①。

这一战，使日本殖民主义者经营的镜泊湖水电站工程被迫中途停工。陈翰章率部进军途中，还破坏了安宁至图们的铁路和宁安至敦化的公路，使敌人交通运输一度陷于停顿。对镜泊湖地区敌人的袭击，牵制了敌人力量。

早在一九三八年五月，抗联第一路军就决定将下属两个军改编为三个方面军。一九三九年秋，第三方面军正式成立，陈翰章任指挥。八月下旬，三方面军在魏拯民^②和陈翰章的共同指挥下，进行了大沙河之战。八月二十三日，指挥部在安图县大沙河西山上集中队伍，并按“攻城打援”作战方针部署了兵力。安图县城（旧城）和明月沟是日伪军事重地，经常驻着几百名日伪军。大沙河一战就是为了消灭这股敌人。为此，陈翰章带领二百余人，正面作战，主攻大沙河，以便吸引安图和明月沟之敌来援。魏拯民率领三百多人到大沙河以北、大酱缸以南的南沟里，埋伏在公路旁的玉米地和土岗上，伏击明月沟方面来援之敌。三方面军副指挥侯国忠率领二百余人到大沙河南边的小沙河，阻击来自安图县城方面的敌援军。

大沙河是个“集团部落”^③，周围筑有高墙，四角设有炮台。部落里的伪警察署有三十多个警察，几十名自卫团丁。此外，还有一个中队的伪军经常到部落来。其城防比较坚固。

根据这种情况，陈翰章最初不想硬攻。这个“集团部落”里

①于天放：《发电厂战迹》、《横道河子战斗》等；载《送“北大荒”》，北方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

②中共南满省委书记兼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总指挥。

③日伪为了割断人民群众和抗日联军的联系，把分散的小村合为大村，驻兵设防，监视居民，这样的大村叫“集团部落”。

没有水井，每天早晨打开城门后，居民出城挑水。陈翰章计划利用这一条件智取该城。二十三日夜，他把队伍开到大沙河的西门外和北门外的菜地里，埋伏下来；并组织了便衣队，扮作挑水的老百姓，准备随挑水的居民进城，然后来个里应外合消灭敌人。可是，二十四日拂晓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一个日本侵略者，不知为什么突然出北城门来到菜地。他发现埋伏在这里的抗日联军，一边叫一边往城里跑。北门外的抗联战士开枪把他打死。因此，打乱了原定的攻城计划。

陈翰章当机立断，立即带领部队硬冲进城。敌人的火力很猛烈，为了减少伤亡，陈翰章把队伍分成若干小股，凭借墙壁作掩护，一边打一边冲向警察署。警察署大院两个炮台的机枪猖狂地向外扫射，封锁了警察署附近的街道，许多同志中弹倒下。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陈翰章的警卫员、朝鲜族战士明基，抱着一挺机枪爬上一家商店的屋顶，从侧面向敌炮台射击，其他机枪一起配合。决死队乘势迂回前进，接近敌人炮台，向枪眼里投进集束手榴弹。一阵巨响，敌炮台的机枪哑了。战士们呐喊着冲进警察署，解除敌人武装，攻占了大沙河。

陈翰章留下一部分兵力暂守大沙河，亲自带领其余的队伍急奔小沙河。由于从安图开来的日军抢占了小沙河山岭的有利地势，这里的战斗很紧张。侯副指挥在战斗中牺牲。陈翰章率部到来，增强了力量。大家奋不顾身地冲上山岭，毙伤敌联队长以下官兵多名。

在南沟方面，魏拯民见明月沟敌军没出来增援，就主动袭击了几个“集团部落”，又用电话向敌人挑战，诱来六汽车敌军，经过激战，敌人向南撤退。

第二天，陈翰章率部来到南沟，与魏拯民会合。他们估计

南逃之敌会返回来与我军决战，便将队伍埋伏在距公路六十米的地方。中午，果然六辆卡车满载敌军从安图县城方面开来。当这些敌军车进入我伏击圈，正要过一座桥的时候，抗联伏击部队发起攻势，将敌军就地全歼。这支被歼灭的敌军是抗联战士最痛恨的宫本“讨伐队”。它不仅疯狂进攻抗日联军，而且以“通匪者”罪名杀害了很多无辜百姓。这次连宫本在内，全队一百五十名日军和二十名伪军全被消灭，真是大快人心。

大沙河一战历时两天，消灭敌军五百多名，缴获轻机枪七挺，步枪三百支，掷弹筒及其它军用物资不计其数。

陈翰章与敌人作斗争机动灵活，注意智取。有一次，他率部攻占了敦化县官地镇，令伪警官打电话给附近的日军小林“讨伐队”，报告“敌情”要求增援。小林信以为真，出动二百余人，中途被陈翰章的埋伏部队所消灭。还有一次，陈翰章命令一支部队向敦化县东南方铁路沿线出击。日伪军得此情报，急忙向大石头一带集结军队。陈翰章却突然率主力部队攻占了敦化县以北的黑石屯，消灭日伪军三百余人。他还经常让部队化装成日军“讨伐队”或伪军，攻取“集团部落”，打击敌人。一九三九年冬，在额穆镇以北小青顶子和敌人交战，因敌众我寡，持续五小时未能打退敌人。陈翰章急中生智，点燃敌人隐身的芦苇塘，又趁势发起冲锋，敌人不支，逃窜而去。

陈翰章率领的部队是执行党的政策，遵守纪律的模范。在一个炎热的夏天，陈翰章带领部队从蛟河向东行进时，一路上找不到水喝，大家口渴难挨，有的战士昏倒了。休息时，有两个年轻的战士找水喝，发现一块瓜地。他俩看左右无人，就摘了几个瓜。陈翰章得知此事，马上把他们叫到跟前。这两个战士知道惹了祸，坦白地承认了错误。陈翰章严肃地说：“我们

的环境越艰苦，就越应该搞好群众关系，越要加强组织性、纪律性。”^①说完，又带着这两个战士去找瓜地主人道歉，并照价付款。这件事在当地群众中反响很大。军爱民，民拥军，游击区人民群众更加热情地支援子弟兵。为了帮助陈翰章部队解决粮食困难，群众在秋收时千方百计把粮食留在山坡、路口或石缝间，再捎信给陈翰章部队来取，或冒着生命危险送到部队去。有一年春节前，宁安新官地、葡萄沟、卧龙河三个村五、六百户群众，家家包饺子慰劳陈翰章部队。日伪统治时期，东北老百姓很少吃到肉和面，但为了子弟兵春节期间吃上饺子，他们宁肯自己不吃或少吃。陈翰章部队在人民群众支援下，不断发展壮大。

血洒镜泊湖

一九四〇年二月，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牺牲后，敌人妄想一鼓作气全歼我第一路军。从此，陈翰章部队的战斗越来越频繁，困难也越来越大。四月初，陈翰章带着队伍到敦化县牛心顶子密营换服装，到那里一看，被服厂已成废墟。地窝棚^②只剩下未烧尽的残壁，十八台缝纫机、储存的粮食和萝卜全不见了。令人痛心的是那些日夜为战士缝补军装的女同志惨遭杀害，尸体被剥成碎块扔在萝卜窖里。走到别的密营见到的也是同样凄惨的情景。原来是无耻的叛徒出卖了抗联建在深山里的密营，致使一批勤勤恳恳从事后勤工作的同志牺

^①温野、臧秀编著：《抗日英雄陈翰章》第72页。

^②半地上半地下的土房。

牲了宝贵的生命。

面对这残酷的现实，陈翰章常用杨靖宇的英雄事迹鞭策自己，教育战士。他说：“杨靖宇将军是战死了，他的死对我们来说是个伟大的榜样。就是战斗到死也要坚决地打击敌人，这才不愧是杨靖宇的同志。”^①

他带领同志们用战斗去解决一切军需。某夜，他们攻打敦化县北黄泥河子车站，得到很多粮食和布匹。第二天，转移到牛心顶子，在一个大庙里休息。这时，敌人正向山林深处“追剿”抗日联军。敌机发现陈翰章部队做饭的炊烟，立即轰炸牛心顶子。同时，二千多日伪军包围了牛心顶子。大庙被炸塌了，锅被炸飞了，伤亡三十多位同志，陈翰章的大腿也被子弹射穿。为了不使敌人“围歼”阴谋得逞，他把伤口简单包扎一下就指挥突围，但几次都没有成功。

夜幕降临，敌人的炮火渐渐稀疏下来。陈翰章在战士搀扶下，指挥部队悄然向北移动。把守北边的是伪军，战斗力不强。我们的战士以决一死战的气概杀开一条血路，冲出了重围。

陈翰章带着突围出来的队伍到敦化县沙河沿二龙江密营修整。由于缺药，陈翰章的伤口化脓，腿肿得很粗。军医见他伤势重，就把仅有的小半瓶药膏拿出来。陈翰章拒绝说：“我的伤不重，还是给别的伤员用吧！”^②陈翰章自己采用一种治疗办法：用筷子把一条清洁白布捅进伤口，又从伤口的另一头拉出来，来回拉动几次，把里面的脓血烂肉全清理出来。军医站在

^①关沫南：《在镜泊湖边》，载《险境》，工人出版社1959年版。

^②温野、臧秀编著：《抗日英雄陈翰章》第66页。

一旁，对陈翰章的“刮骨疗毒”精神十分钦佩。陈翰章让军医用热水把伤口冲洗干净，包扎好，若无其事地说：“恶疮怕愣人，你一楞它就投降了。以后你多照顾点伤员吧！我这点伤算不了什么。”^①陈翰章的土办法果然有效，伤口渐渐愈合了。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陈翰章指挥着部队继续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我们可以从敌人留下的不完整的记录中见其一斑：

五月中旬，袭击蛟河窝瓜站地区森林采伐场。

六月二日夜，率二百余人袭击舒兰县曲柳头子森林采伐事务所，杀日寇十三人、伪警察十四人。

六月五日夜，袭击五常县拉林河森林警察队香水河子分派队和森林采伐事务所，毙、俘日军二十六人、伪警察四人，解放劳工一百二十人，缴获粮食百余担。

六月二十五日，在张家湾西南六公里附近与日军町井队及警察队交战。

七月二十一日夜，率一百五十人袭击冲河镇，打死敌军官一人、士兵若干，缴获现款八千七百多元。

七月三十一日，南下至蛟河，袭击平地沟、平厂屯两“集团部落”，在威虎河地区，同石上警察队进行战斗十六次之多。

八月中旬，率一百五十人分三路东进。八月十四日夜，在额穆索东南三岔口桥梁附近渡河时与敌激战。

九月，到五常县境活动。十二日夜，率七十余人袭击山河屯，打死日寇一人，缴获价值六万余元的物资，另现款三千元，步枪四支。解放被关押的爱国者九人。

可见，陈翰章是在十分紧张的战斗中，率部东西南北往复穿

^①温野、臧秀编著：《抗日英雄陈翰章》第67页。

梭于吉黑两省边界，百折不回地同敌人周旋，相机主动出击，打击敌人。

一九四〇年秋，敌人调集吉林、牡丹江等地兵力围追陈翰章部队，形势十分严重。有人建议陈翰章率部东撤，保存实力。陈翰章以“无上级命令，东撤后又将使日寇加重对其它游击区的压力”而未采纳，坚持原作战区域的抗日游击战争^①。入冬以后，敌人利用大风雪和江湖封冻，缩紧包围圈。加上部队给养困难，许多干部、战士还没换上棉衣。陈翰章只穿一身缴获日军的呢军装，已破旧，脚上穿一双胶鞋，脚已冻肿^②。在这种情况下，三方面军党委决定主力一百余人向三江省方向突围，陈翰章率领六十余人的小支队留在镜泊湖地区牵制敌人。

十一月末，陈翰章带领小支队从额穆突围。十二月三日晚间，在宁安南部黄家屯袭击敌修路工棚和高岗子农园，割断警备电线，解除五名伪警察的武装，缴步枪五支，子弹五百发，大米、小米各九包。五日夜十点多钟，在北湖头攻打敌伐木材的“高岗作业所”，俘伪警察二十余名，缴获一些武器和粮食。敌追兵很快跟了上来，陈翰章下令烧了作业所，撤到镜泊湖上，借助湖上的冰凌作掩护，且战且退，摆脱了这股敌人。又几经血战，陈翰章身边只剩下十几个人了。敌大兵团还在围追他们，他们已经断粮，靠从积雪下找野果、菌类和打野兽充饥。

十二月六日夜，陈翰章带领同志们从镜泊学园出发，过尖山子，顺着鹰膀子山向镜泊湖东南方的小弯弯沟前进。小弯弯沟里有一座密营，比较隐蔽，里面还贮藏着粮食。鹰膀子山

①周保中：《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将军传略》，未刊稿。

②访问陈翰章牺牲地弯弯沟村群众记录，未刊稿。

东北角下有一个叫弯沟村^①的“集团部落”，村中住着伪警察大队和“讨伐队”。当陈翰章率队走到鹰膀子山北坡时，一个姓张的战士借口脚部有点伤，故意落在后面，乘天黑人们没有注意，逃进了弯沟村。敌哨兵发现了他，这个民族败类回答了敌人要知道的一切。

驻在弯沟村的敌人动用了一切交通工具，调来一千多敌兵，扑向小弯弯沟。

十二月八日晨寒风凛冽，乌云满天。陈翰章和战友们在小弯弯沟老密营外“抢子”^②歇脚。由于在没膝的雪地昼夜行军，他们又累又饿，到外“抢”找出藏在雪里的麦子，用雪水煮着吃了。饭后，他们刚要动身到里“抢子”去，那个姓张的叛徒领着敌人“讨伐队”远远地包围过来。

陈翰章把同志们集合起来，他从排头走到排尾，严峻而深情地看看每一个战士。然后指挥大家隐蔽在倒木、石砬子、大树后和敌人进行决死的战斗。这时的力量对比不是以一当十，而是以一当百，不能不令人惊讶的是激战竟持续了两个小时^③。

同志们一个个倒下了，包围圈在缩小。远处传来一个刺耳的声音：

“陈翰章，投降吧！给你大官做！”

“死也不当亡国奴！”陈翰章用怒斥和子弹回答敌人。几个敌人中弹倒在地上^④。

①今属黑龙江省宁安县。

②一种地窝棚。

③敌伪档案，关东宪兵司令部编，《昭和十五年度下半年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

④访问陈翰章牺牲地弯沟村群众记录，未刊稿。

陈翰章试图组织大家从南山坡突围。但一伙敌人围住了几个战士，他马上转身向敌人射击，掩护这些同志跑进树林里。霎时，敌人射出一排罪恶的子弹，陈翰章同志倒在血泊中，年仅二十七岁。

陈翰章生在镜泊湖畔，长期战斗在这个地区，最后又把一腔热血洒在这块养育自己的土地上。这里的人民对陈翰章的名字感到无限亲切，称之为镜泊英雄。至今，东北仍流传着这样的民歌：

镜泊湖水清亮亮，
一棵青松立湖旁。
喝口湖水想起英雄汉，
看见青松忘不了将军陈翰章。

附：本文除脚注外，参阅了下列资料：

1. 访问抗日联军老同志吕英俊、朴春日、乔树贵等谈话纪录。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存陈翰章生平案卷资料。
3. 原中共满洲省委文件，如：《团满洲省委文德关于满洲问题给团中央报告》（1934年12月19日）、《吉东省委宋一夫、周保中给师长陈翰章、副师长侯国忠转二军二师党委信》（1937年10月10日）、《周保中给宋一夫的信》（1938年5月3日）、《吉东省委宋一夫、周保中给张寿篪、金策并转北满临时省委信》（1938年9月4日）、《中共南满省委书记兼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副总指挥魏拯民给中共中央代表的报告》（1940年4月）等。
4. 纪云龙：《杨靖宇和抗联第一路军》，东北书店1946年出版。
5. 冈部善修编：《满洲国治安小史》，伪满洲国警察协会1944年5月日文版。
6. 敌伪档案中的有关资料。

附 录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副秘书长、理事、常务理事名单

会 长	何长工	
副 会 长	李 新	胡 华
秘 书 长	陈志凌	
副秘书长	杨世兰	
理 事	张静如 (北京)	蒋 杰 (北京)
	彭 明 (北京)	肖效钦 (北京)
	高 军 (北京)	许维之 (上海)
	翟作君 (上海)	郑健民 (天津)
	罗占元 (辽宁)	宋 春 (吉林)
	金宇钟 (黑龙江)	冯 英 (河北)
	陈文秀 (山西)	霍成勋 (山西)
	韩泰华 (山东)	曲 琦 (山东)
	孙其明 (安徽)	马洪武 (江苏)
	姚鸿瑞 (浙江)	杨源贵 (江西)
	刘勉玉 (江西)	蒋伯英 (福建)
	陈志凌 (河南)	尹俊忠 (河南)
	张玉鹏 (河南)	高玉临 (湖北)
	胡邦宁 (湖北)	刘梦华 (湖南)
	方大铭 (湖南)	杨世兰 (广东)
	胡提春 (广东)	曾傅先 (广西)

	段汝宏 (广西)		张 乃 (云南)		
	郑洪泉 (四川)		何守义 (四川)		
	彭承福 (四川)		齐 心 (陕西)		
	胡 海 (陕西)		董建中 (陕西)		
	马玉卿 (陕西)		张宝裕 (新疆)		
常务理事	方大铭	高玉临	杨源贵	郑洪泉	齐 心
	姚鸿瑞	蒋 杰	陈志凌	杨世兰	彭 明
	肖效钦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聘请的顾问名单

陆定一	李维汉	杨尚昆	习仲勋	肖 克	刘澜涛
王首道	莫文骅	刘 型	程子华	黄火青	陈丕显
胡立教	乔明甫	吴亮平	裴 桐	陈茂辉	李正文
王培育	罗章龙	罗 明	徐彬如	马齐彬	李洪林
温济泽	严辛吾	谢 华	林蕴晖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聘请的编委名单

主 编	胡 华				
副主 编	陈志凌	杨世兰			
编 委	彭 明	曹木清	方大铭	刘勉玉	唐纯良
	侯志英	刘富恒	房成祥	高玉临	元邦建
	郑洪泉	何鹄志	李育安	南 岗	郭洛夫
	卢 权	范寅铨	廖鑫初	李振民	陈瑞云
	田炳坤	王德宝	陈文秀		

封面设计：王艺光

统一书号：11094·82

定 价： 1.05 元